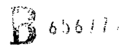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556－X/I·557
定价 10.90 元



一九五六年摄于成都寓舍

《寒夜》手稿之一页



一九四六年十月与小林摄于江湾



《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初版书影

目　录

憩　园

《憩园》，一九四四年十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五一年五月，共印行六版(次)。

一九五三年六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修订本。

一九五五年五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排新版，迄一九五八年三月，共印行八版(次)。

一九八八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新版一次，

一

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捏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哪儿？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

该挨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伧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朋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

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他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稍微发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湿的手里。

"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躲警报，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你看我这一身装束！"我带了一点窘相地答道。

"好了，好了，你不要挖苦我了。去年那次大轰炸以后，我在乡下住过两三个月就搬回来了。你住在哪儿？让我去看看，我以后好去找你，"他诚恳地笑道。

"国际饭店。"

"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有十来天。"

"那么你就一直住在国际饭店？你回到家乡十多天还住在旅馆里头？你真怪！你不是还有阔亲戚吗？你那个有钱的叔父，这几年做生意更发财了，年年都在买田。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放开我的手大声说，声音是那么高，好像想叫街上行人都听见他的话似的。

"小声点，小声点，"我着急地提醒他。"你知道他们早就不跟我来往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成名了，书都写了好几本，"他不等我说完便抢着说。"连我也很羡慕你呢！"

"你也不要挖苦我了。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套像样的西装，他们哪里看得起我？他们不是怕我向他们借钱，就是觉得有我这个穷亲戚会给他们丢脸。哦，你的伟大的小说写

成没有？"

他怔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你记性真好。我回家以后写了两年，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的作品，也不成。我译雨果的小说，别人漂亮的文章，我译出来连话都不像，丢开原书念译文，连自己也念不断句，一本《九十三年》①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我这大学文科算是白念了。从此死了心，准备向你老弟认输，以后再也不吹牛了。现在不讲这些，你带我到你的旅馆里去。国际饭店，是吗？这个大旅馆在哪条街，我怎么不知道！"

我忍不住笑起来。"名字很大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很小的。就在这附近。我们去罢。"

"怎么，这又是什么哲理？好，我去看看就知道。"他说着，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

① 《九十三年》：法国小说家和诗人维·雨果的长篇历史小说。

二

“怎么，你会住这样的房间！”他走进房门就惊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你住在这儿！这样黑，窗子也不打开！”他把窗门往外推开。他马上咳了两声嗽，连忙离开窗，掏出手帕揩鼻子。“煤臭真难闻。亏你住得下去！你简直不要命了。”

我苦笑，随便答应了一句：“我跟你不同，我这条命不值钱。”

“好啦，不要再开玩笑了，”他正经地说。“你搬到我家里去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一定要你搬去。”

“不必了，我过两天就要走，”我支吾道。

“你就只有这点行李吗？”他忽然指着屋角一个小皮箱问道，“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了，我连铺盖也没有带来。”

他走到床前，向床上看了看。“你本领真大。这样脏的床铺，你居然能够睡觉！”

我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行李越少越好。我马上就给你搬去。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住在我家里，我决不会麻烦你。你要是高兴，我早晚来陪你谈谈；你要是不高兴，我三天也不来看你。你要写文章，我的

花厅里环境很好，很清静，又没有人打扰你。你说对不对？”

我对他这番诚意的邀请，找不到话拒绝，而且我听见他这么一讲，我的心思也活动了。可是他并不等我回答，就叫了茶房来算清旅馆账，他抢先付了钱，又吩咐茶房把我的皮箱拿下楼去。

我们坐上人力车，二十分钟以后，便到了他的家。

三

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本来关着的内门，现在为我们的车子开了。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我的眼光刚刚停在字上面，车子就转弯了。车子在这个方石板铺的院子里滚了几下，在二门口停下来。朋友提着我的皮箱跨进门槛，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后面。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面便是大厅。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大厅上一个角落里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

什么地方传来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声音，可是眼前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赵青云！赵青云！”朋友大声唤道。我们走下天井。我向左边看，左边是门房，几扇门大开着，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我又看右边，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上有两扇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

“怎么到处都写着‘憩园’？”我好奇地想道。

“就请你住在这里头，包你满意！”朋友指着小门对我说。

他不等我回答，又大声唤起来："老文！老文！"

我没有听见他的听差们的应声，我觉得老是让他给我提行李，不大好，便伸过那只空着的手去，说："箱子给我提罢。"

"不要紧，"他答道，好像害怕我会把箱子抢过去似的，他加快脚步，急急走上石阶，进到小门里去了。我也只好跟着他进去。

我跨过门槛，就看见横在门廊尽处的石栏杆，和栏外的假山、树木、花草，同时也听见一片吵闹声。

"谁在花园里头吵架？"朋友惊奇地自语道。他的话刚完，一群人沿着左边石栏转了出来，看见我那位朋友，便站住，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

来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两个穿长衫的听差，一个穿短衣光着脚车夫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个穿一身干净学生服的小孩。这小孩的右边膀子被那个年轻听差拖着，可是他还在用力挣扎，口里不住地嚷着："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他看见我那位朋友，气愤地瞪了他一眼，噘起嘴，不讲话。

朋友倒微微笑了。"怎么你又跑进来了？"他问了一句。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进来不得？"小孩倔强地说。我看他：长长脸，眉清目秀，就是鼻子有点向左偏，上牙略微露出来。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光景。

朋友把皮箱放下，吩咐那个年轻的听差道："赵青云，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你顺便把下花厅打扫一下，黎先生要住在这儿。"年轻听差应了一声，又看了小孩一眼，才放开小

孩的膀子，提着我的皮箱沿着右边石栏杆走了。朋友又说："老文，你去跟太太说，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要她捡两床干净的铺盖出来，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脸盆、茶壶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头发花白、缺了门牙的老听差应了一声"是"，马上沿着左边石栏杆走了。

剩下一个车夫，惊愕地站在小孩背后。朋友一挥手，短短地说声："去罢。"连他也走开了。

小孩不讲话，也不走，只是噘起嘴瞪着我的朋友。

"这是你的材料，你很可以写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朋友得意地笑着对我说，然后提高声音："这位是杨少爷，就是这个公馆的旧主人，这位是黎先生，小说家。"

我朝小孩点一个头。可是他并不理我，他带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然后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大人似地问我的朋友道：

"你今天怎么不赶走我？你在做什么把戏？"

朋友并不生气，他还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从容地答道："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我介绍他跟你认识。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房子既然卖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找麻烦呢？"

"房子是他们卖的。我又没有卖过。我来，又不弄坏你的东西，我不过折几枝花。这些花横竖你们难得有人看，折两枝，也算不了什么。你就这样小器！"小孩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吵架？"朋友含笑问道。

"他们不讲理，我进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就拖我出去。他们说我来偷东西。真混帐！房子都让他们卖掉了，我还希罕你家里这点东西？我又不是没有饭吃，不过不像你有钱罢了。其实多几个造孽钱又算什么！"这小孩嘴唇薄，看得出是个会讲话的人，两只眼睛很明亮，说话的时候，一张脸挣得通红。

"你让他们卖掉房子？话倒说得漂亮！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他们还是要卖！"朋友哈哈笑起来。"有趣得很，你今年几岁了？"

"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孩子气恼地掉开头说。

那个年轻听差出现了，他站在朋友面前，恭敬地说："老爷，花厅收拾好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你去罢，"朋友吩咐道。

年轻听差望着小孩，又问一句："这个小娃儿——"

朋友不等年轻听差讲完，就打岔说："让他在这儿跟黎先生谈谈也好。"他又对我说："老黎，你可以跟他谈谈，"（他指着小孩）"你不要放过这个好材料啊。"

朋友走了，年轻听差也走了。只剩下我同小孩两人站在栏杆旁边。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他脸上愤怒的表情消失了，他正在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他不移动脚步，也不讲话。最后还是我说一句："你请坐罢。"我用手拍拍石栏杆。

他不答话，也不动。

"你今年几岁了？"我又问一句。

他自语似地小声答了一句："十五岁。"他忽然走到我面前，闪着眼睛，伸手拉我的膀子，央求我："请你折枝茶花给我

好不好?"

我随着他的眼光望去。石栏外，假山的那一面，桂树旁边，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深绿色的厚叶托着一朵一朵的红花。

"就是那个?"我无意地问了一句。

"请你折给我。快点儿。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孩子恳切地哀求，他的眼光叫我不能说一个"不"字。我知道朋友不会责备我随便乱折他园里的花。我便跨过栏杆，走到山茶树下，折了一小枝，枝上有四朵花。

他站在栏杆前伸着手等我。我就从栏外地上，把花递给他。他接过花，高兴地笑了笑，说一声："谢谢你，"马上转过身飞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后面唤他。可是他已经跑出园门听不见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小孩，"我这样想。

四

园里很静。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朋友把我丢在这里就不来管我了。我在栏外立了好几分钟，也不见一个听差进园来给我倒一杯茶。我便绕着假山，在曲折的小径里闲走。假山不少，形状全不同，都只有我身材那样高，上面披着藤蔓、青苔；中间有洞穴，穴内开着红白黄三色小草花；脚下小径旁草玉兰还没有开放。走完小径，便到一间客厅的阶下，客厅的窗台相当高，纸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绘着花鸟的绢窗帘掩住，我看不见房内的陈设，我想这应该是上花厅了。在这窗下，在墙角长着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一部分树枝伸出在梅花墙外，枝上还挂着残花。汤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满了一个墙角，有的已经变黄了。可是余香还一阵一阵地送入我的鼻端。

我在这树下立了片刻。我弯下身去拾了两片花瓣拿在手里抚摩。玉兰树是我的老朋友。我小时候也有过一个花园，玉兰花是我做小孩时最喜欢的东西。我不知不觉地把花瓣放到鼻端去。我忽然惊醒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这种奇怪的举动。我丢开了花瓣。但是我又想：那个小孩的心情大约也跟我现在的差不多罢。这么一想，我倒觉得先前没有跑去把小孩拉回来询问一番，倒是很可惜的事情了。

我并不走上台阶去推客厅的门（我看见阶上客厅门前左面有一张红木条桌和一个圆磁凳），我却沿着墙往右边走去。我经过一个养金鱼的水缸，经过两棵垂丝海棠，一棵腊梅，走到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前面。这花台一面临墙，一面正对着一间窗户全嵌玻璃的客厅。我知道这就是所谓“下花厅”，我那位朋友给我预备的临时住房了。花台上种着三棵牡丹，台前一片石板地。两棵桂花树长在院子里，像是下花厅的左右两个哨亭。左右两排石栏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兰花，花盆下全垫着绿色的圆磁凳。

我走上石阶，预备进花厅去。但是朋友的声音使我站住了。他远远地叫道：“老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杨家小孩什么时候走的？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

我掉过头去看他，一面说：“你们都走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又咽下去了，因为我看见他后面还有一个穿淡青色旗袍、灰绒线衫、烫头发的女人，和一个抱着被褥的老妈子。我知道他的太太带着老妈子来给我铺床了。我便走过去迎接他们。

“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太太，她叫万昭华，你以后就喊她昭华好了；这是老黎，我常常讲起的老黎。”朋友扬扬得意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太太微微一笑，头轻轻地点了一下。我把头埋得低，倒像是在鞠躬了。我抬起头，正听到她说：“我常常听见他讲起黎先生。黎先生住在这儿，我们不会招待，恐怕有怠慢的地方……”

朋友不给我答话的时间，他抢着说：“他这个人最怕受招

待，我们让他自由，安顿他在花厅里不去管他就成了。"

他的太太看他一眼，嘴唇微微动一下，可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只对他笑了笑。他也含笑地看了看她。我看得出他们夫妇间感情很好。

"虽说是你的老同学，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不好好招待怎么行！"太太含笑地说，话是对他说的，她的眼睛却很大方地望着我。

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嘴唇有点薄，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高高，她跟她的丈夫站在一块儿，她的头刚达到他的眉峰。年纪不过二十三四，脸上常常带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

"那么你快去照料把屋子给他收拾好。今晚上你自己动手做几样菜，让我跟他痛快地喝几杯酒，"朋友带笑地催他的太太道。

"要你太太亲自做菜，真不敢当……"我连忙客气地插嘴说。

"那么你就陪黎先生到上花厅去坐罢。你看黎先生来了好半天，连茶也没有泡，"她带着歉意地对她的丈夫说，又对我微微点一下头，便走向下花厅去了。老妈子早已进去，连那个老听差老文也进去了，他手里抱着更多的东西。

五

“怎么样？你还是依我太太的话到上花厅去坐呢，还是就坐在栏杆上面？不然我们在花园里头走走也好，”朋友带笑问我道。

我们这时立在门廊左面一段栏杆里。我背向着栏外的假山，眼光却落在一面没有被窗帘掩住的玻璃窗上，穿过玻璃我看见房内那些堆满线装书的书架，我知道这是朋友的藏书室，不过我奇怪他会高兴读这些书。我忍不住问他：“怎么你现在倒读起线装书来了？”

他笑了笑：“我有时候无聊，也读一点。不过这全是杨家的藏书，我是跟公馆一块儿买下来的。即使我不读，拿来做摆设也好。”

他提起杨家，我马上想到那个小孩，我便在石栏上坐下来，一面要求他：“你现在就把杨家小孩的事情告诉我罢。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你找到了材料吗？他跟你讲了些什么话？”他不回答我，却反而问我道。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要我给他折枝茶花，他拿起来就跑了，我没有办法拉住他，”我答道。

他伸手搔了搔头发，便也在石栏上坐下来。

“老实说，我知道的也不多。他是杨老三的儿子，杨家四弟兄，老大死了几年，其余三个好像都在省里，老二、老四做生意相当赚钱。老三素来不务正业，是个出名的败家子，家产败光了，听说后来人也死了。现在全靠他大儿子，就是那个小孩的哥哥，在邮政局做事养活一房人。偏偏那个小孩又不争气，一天不好好念书，常常跑到我这个花园里来折花。有天我还看见他在我隔壁那个大仙祠门口跟讨饭的讲话。他跑进来，我们赶他不走，就是赶走了他又会溜进来。不是他本事大，是我那个看门的李老汉儿放他进来的。李老汉儿原是杨家的看门头儿，据说在杨家看门有二十几年了。杨老二把他荐给我。我看他做事忠心，也不忍心多责备他。有一回我刚刚提了一句，他就掉眼泪。有什么办法呢？他喜欢他旧主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况且那个小孩手脚倒也干净，不偷我的东西。我要是不看见也就让他去了。只是我那些底下人讨厌他，常常要赶他出去。”

“你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吗？我不懂他为什么常常跑到这儿来拿花？他拿花做什么用？”我看见朋友闭了嘴，我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便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朋友不在意地摇摇头说，他没有想到我对小孩的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趣。“也许李老汉儿知道多一点，你将来可以跟他谈谈。而且我相信那个小孩一定会再来，你也可以问他。”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小孩再来，让我对付他，你

要吩咐你的听差不干涉才好。”

朋友得意地笑了笑，点点头说：“我依你。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罢。只是你将来找够材料写成书，应该让我第一个拜读！”

“我并不是为了写文章，我对那个小孩的事情的确感到兴趣。我多少了解他一点。你知道我们家里从前也有个大花园，后来也跟我们公馆一块儿卖掉了。我也想到那儿去看看，”我正经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还记得地方在暑袜街。你们公馆现在是哪一家在住？你打听过没有？只要知道住的是谁，让我给你设法，包你进去，”朋友同情地、热心地说。

“我打听过了。卖了十六七年，换了几个主人，已经翻造过几次，现在是一家百货公司了，”我带点感伤地摇摇头说。“我跟那个小孩一样，我也没有说过要卖房子，我也没有用过一个卖房子得来的钱。是他们卖的，这个唯一可以使我记起我幼年的东西也给他们毁掉了。”

“这有什么难过！你将来另外买一所公馆，照样修一个花园，不是一样吗？”朋友好心地安慰我。可是他的话在我听来很不入耳。

我摇摇头，苦笑道：“我没有做富翁的福气，我也不想造这个孽。”

“你真是岂有此理！你是不是在骂我？”朋友站起来责备我说，可是他脸上又现出笑容，我知道他并没有生我的气。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是指那些买了房子留给子孙去

卖掉的傻瓜，"我说着，我的气倒上来了。

"那么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把这个花园白白留给我儿子的，"朋友说，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姿势，头昂起来，眼里含笑，好像在表示他有什么伟大的抱负似的。我没有作声。歇了片刻他又说："不要讲这些闲话了。石头上坐久了不舒服。我们到下花厅去看看，昭华应该把屋子收拾好了。"

六

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匹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啊！"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带笑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也笑了。"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我们回去罢，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他也累了。我还要预备晚上的菜。你们晚上一边吃酒，一边慢慢谈罢，"姚太太忍住笑压低声音对她的丈夫说。

"好，好，"她的丈夫接连点着头，含笑地看了她一眼，说：

“让我再说一句。”他又向着我：“这个地方清静得很，在这儿写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太清静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说：“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来聊聊天。”

“你高兴，就请来谈谈，我很欢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害怕的，”我笑着回答。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还听见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够他开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来。我感到一点疲倦，不过我觉得心里畅快多了。我仰着头静静地听窗外树上无名的小鸟的歌声。

七

晚上就在这个下花厅里我和老姚(我开始叫他做“老姚”了)坐在一张乌木小方桌的两面,吃着他的太太做的菜,喝着陈年绍酒。菜好,酒好,他的兴致更好。他的话就像流水,他连插嘴的机会也不留给我。他批评各种各类人物,评论各种各样事情。他对什么都不满意。他一直在发牢骚。可是从他这无穷无尽的牢骚中,我却知道了一个事实: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甚至把他的第二次结婚看作莫大的幸福。他满意他这位太太,他爱他这位太太。

“老黎,你觉得昭华怎样?”他忽然放下酒杯,含笑问我道。

“很不错!你应该很满意了,”我称赞道。

他高兴地闭了一下眼睛,用右手三根手指敲着桌面,接连点了几下头,然后拿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忽然一个人微微笑起来:

“老黎,我劝你快结婚罢。有个家,心也要安定些。”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不要老是做恋爱的梦,那全是小说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华也没有讲过恋爱,还不是别人介绍才认识的。可是结了婚,我们过得很好。我们都很幸福。”

“我听说你们原是亲戚,”我插嘴说。

"虽说是亲戚，可是隔得远。我们素来就少见面。说真话，我对她比对我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喜悦使他那张开始发红的脸显得更红了。

"像你这样对结婚生活满意，还要整天发牢骚，倒不如我一个人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我又插嘴说。

"你不明白，对你说你也不会了解。中国人讲恋爱跟西洋人讲恋爱完全不同，西洋人讲了恋爱以后才结婚，中国人结了婚以后才开始恋爱，我觉得还是我们这样更有趣味，"他得意地、好像在阐明什么大道理似地慢吞吞说，一面还动着右手加强他的语气。

我不能忍耐了，便打岔道："算了，算了，你这种大道理还是拿去跟林语堂博士谈罢。他也许会请你写本《新浮生六记》，去骗骗洋人。我实在不懂！"

"你不懂？你看，这不是最好的例子？"他带一点骄傲地笑起来，侧过脸望着花厅门。我也掉过头去。他的太太进来了。周嫂打个灯笼跟在她后面。

我连忙站起来。

"请坐，请坐。菜做得不好，黎先生吃不惯罢，"她笑着说，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前微微亮了一下。

"好极了，我吃得很多。就是今天太麻烦你了。姚太太吃过饭吗？"我仍然站着笑答道。

"吃过了，谢谢你。请坐罢，不要客气，"她说。我坐下了。她走到她的丈夫身边，他抬起头看她，说："你再吃一点罢，"他把筷子递给她。她不肯接，却摇摇头说："我刚吃过。……你们

酒够了罢，不要喝醉了。你说黎先生酒量也不大，就早点吃饭罢，恐怕菜也要冷了。"

"好，不喝了。老文，周嫂，添饭来罢。"老姚点了点头，便提高声音叫人盛饭。

"小虎还没有回来？"他关心地问他的太太。

"我打发老李接他去了，已经去了好久，他也应该回来了，"她答道。

"辣子酱给他留得有吗？"他又问道。

"留得有。他爱吃的东西我都会留给他。"

饭碗送到桌上来了。我端着碗吃饭，我不想打扰他们夫妇的谈话。我忽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高叫："爹，爹！"我抬起头，正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十一二岁的小孩跑到朋友的身边来。

"你回来了？在外婆家玩得好吗？"朋友爱怜地问道，一面抚摩小孩的梳得光光的头。

"很好。我跟表哥他们又下棋又打扑克。明天是星期，不是老李拚命催，我还不想回来。外婆喊我明天再去耍，说下回不必打发老李来接，他们家的车子会送我回来。"

"好，下回你去，就不打发车子接你，让你玩个痛快，"朋友笑着说；"你回来连妈也不喊一声，你妈还在挂念着你呢！"

孩子站在朋友的左边，太太站在朋友的后面。孩子抬起脸看了他的后母一眼，短短地唤了一声，又把脸掉开了。他的后母倒温和地对他一笑，答应了一声，又柔声说："小虎，你还没有招呼客人。这位是黎叔叔。"

"你给黎叔叔行个礼,"朋友推着孩子的膀子说。

孩子向前走了两步,向我鞠了一个躬,声音含糊地唤了一声:"黎叔叔。"

这孩子可以说是我那个朋友的缩本,他的脸,眉毛,鼻子,嘴,都跟我那个朋友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服装。老姚穿蓝绸长袍,小姚穿咖啡色西装上衣,黄卡叽短裤,衬衫雪白,领带枣红。论体格和身材,小姚倒跟杨家小孩相似,可是装束和神采却大不相同了。

"老黎,你看,他像不像我?这是我的第二个宝贝!"老姚夸耀地说,他哈哈地笑着。我偷偷看了他的太太一眼。她红了脸,埋下头去。这告诉我:朋友的第一个宝贝便是她了。

老姚看见我不答话,便伸出左手在孩子的背上推一下,说:"你走过去一点,让黎叔叔看清楚!"

孩子向前再走两步,他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气动了动头,要笑不笑地说一句:"看嘛,"抄着手站在我的面前,他还带着一种类似傲慢或轻蔑的眼光在打量我。

"像不像?"朋友还在追问。

"真像!……不过我觉得……"

"真像"两个字就使他满意了,他似乎没有听见下面的"不过……"这半句话,他马上伸出左手对儿子说:"小虎,过来,你妈给你留得有辣子酱,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现在很饱。今晚上'宵夜'罢。"孩子跑到父亲身边,拉着父亲的手撒娇地要求:"爹,我今天跟表哥他们打扑克,输了四百五十块钱,你还我。"

“好，等一会儿你在你妈那儿拿五百块钱，”这位父亲爽快地一口答应了。“我问你，你在外婆家吃的什么菜？”

“妈，你等一会儿要给我啊，”孩子不回答父亲的问话，却侧过头去对他后母笑了笑，这一声“妈”叫得亲热多了。

“我回去就拿给你。你爹在跟你讲话。等一下你陪我一块儿进去，我要看着你换了衣服温习功课，”他后母温和地带笑说。

“是，”孩子不高兴地答应一声，他眼睛一眨，下嘴唇往右边一歪。这种表情，我先前在比较他们父子的面貌时就已经看到了。由于这种表情，拿整个脸来说，儿子实在不像父亲。

朋友太太看见小虎的这种表情，她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眼里却似乎含有一种说不出的哀愁。但是等我注意地看她的时候，她正在愉快地跟她的丈夫讲话，我在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类似哀愁的表情了。

姚太太带着小虎先走了。我和老姚吃完饭，又谈了好久的闲话，现在他不再发牢骚，却只谈他的太太和儿子的好处。我知道他和这个太太结婚三年多还没有生小孩。头一个太太留下一儿一女，但是女儿在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也跟着死了。

这一夜我睡在空阔的大客厅里。风吹着门响，树叶下落，鸟在枝上扑翅，沙石在空中飞舞。我并不害怕。可是我没有习惯这个环境，我不能安静地闭上眼睛。

我想着我那个朋友同他的太太和小孩的事情，我也想着杨家小孩的事情。我想了许久。我还把那两个小孩比较一下。我又想着姚太太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像她的丈夫所说的那

么幸福。我越想越睡不着。后来我烦躁起来，骂着自己道：“你管别人的事情做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你耽心！你好好地睡罢。”

可是在窗外黑夜已经开始褪色，小鸟吵架似地在树上和檐上叫起来了。

八

我睡到上午十点钟才起床，太阳照得满屋子金光灿烂。老文进来给我打脸水、泡茶，周嫂给我送早点来。午饭的时候老姚夫妇在下花厅里陪我吃饭。

“就是这一次，这算是礼貌。以后我们便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吃，不管你了，”老姚笑着说。

“很好，很好，我是随便惯了的，”我满意地答道。

“不过黎先生，你要什么，请只管喊底下人给你拿，不要客气才好啊，”姚太太说，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旗袍，上面罩了一件白色短外套。她听见我跟朋友讲起昨晚睡得不好，她便说：“这也难怪，屋子太敞了。我昨天忘记喊老文搬一架屏风来，有架屏风隔一下，要好一点。”

饭桌上的碗筷杯盘撤去不久，屏风就搬进来了。黑漆架子紫色绸心的屏风把我的寝室跟花厅的其余部分隔开来。

我们三个人还在这间“寝室”里闲谈了一会儿。他们夫妇坐在两张沙发上。老姚抽着烟，时时张口，带着闲适的样子吐烟圈，姚太太坐得端端正正，手里拿着茶杯慢慢地喝茶，好像在想什么事情。我却毫无拘束地翘着腿坐在窗前藤椅上。我们谈的全是省城里的事，我常常发问，要他们回答。

后来姚太太低声对她丈夫讲了几句话，她的丈夫便掷了烟头站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两个都不在家，她母亲"（他掉头看了看太太）"约我们去玩，还要陪她老人家听戏。你高兴听京戏吗？我可以陪你去，不过这儿也没有什么好脚色。"

"你知道我从来不看旧戏，"我答道。

他的太太也站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想你现在也许改变了，好些人上了年纪，就慢慢地圆通了。"

"可是也有人越老越固执啊，"我笑着回答。

朋友笑了，他的太太也笑了。她说："他是说他自己，他老是觉得他自己很圆通。"

"你不要讲我，你还不是一样。譬如你不喜欢听京戏，你母亲一说听戏，你就陪她去。我从没有听见你说过'不去'的话。你高兴看外国电影，没有人陪你去，你就不去看。所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个戏迷呢！"朋友跟他的太太开玩笑，太太不回答他，却只是微笑，故意把眼光射到窗外去，可是她那淡淡擦过粉的脸上已经起了红晕。她后来又收回眼光去看她的丈夫，嘴唇动了动，似乎在求他不要往下说。但是他的口开了，话不吐完，便很难闭上。他又说："老黎不是外人，让他听见没有关系，他不会把你写在小说里面。"（她的脸通红，她连忙装作去看什么东西，转过了身子。）"其实他还是你一个同志！他也爱看外国电影，以后有好片子，请他陪你去看罢。还有，老黎，你在这儿觉得闷的时候，要是高兴看线装书，我书房里多得很，我可以把钥匙交给你。"（他自己先笑起来）"我知道

你不会看那些古董的。我太太有很多小说，新的旧的都有。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她就有全套。这自然不是你们写的那一种。不过总是小说罢。我也看过几本，虽是文言译的，却也很能传神！新出的白话小说这里也有。”

太太似乎害怕他再讲出什么话来，她脸上的红晕已经消散了，这时便把身子掉向他催促道：“你一开头，话就讲不完。你也该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我还要进去收拾……”她的脸上仍旧笼罩着笑容，还是她那比阳光更亮的微笑。

“好，我不讲了。看你那着急的样子！”朋友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太太笑道。“我们今天把老黎麻烦够了。我们走罢。让他安静地写他的文章。”

我对他们夫妇微笑。我站起来送他们出去，现在我是这半个花厅的主人了。我站在窗下石栏杆前，望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亲密地谈着话，沿着石栏杆走过了上花厅，往里去了。

九

下半天他们夫妇果然不曾来。也没有别人来打扰我，除了周嫂来给我冲开水，老文给我送饭。

我吃过晚饭，老文给我打脸水来。我无意地说了一句："这太麻烦你们了，以后倒可以不必……"

老文垂着手眨着老眼答道："黎老爷，你怎么这样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好朋友，我们当底下人的当然要好好伺候。万一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不客气地骂我们几句。"

这番话使我浑身不舒服起来。我被人称作"黎老爷"，这还是头一次。我听着实在不顺耳。我知道他以后还会这样叫下去的，会一直叫到我离开姚家为止。这使我受不了。我想了想，只好老实对他说："你是老家人了，你跟别人不同。"（这句话果然发生了效力，他的脸上现出笑容来。）"请你不要喊我'黎老爷'，我们在'下面'都是喊先生，你就照'下面'的规矩喊我'黎先生'罢。"

"是，以后就依黎老爷的话；哦，是，黎先生。说老，我们在姚家'帮'了三十几年了。我们是看见我们老爷长大的。我们老爷心地好，做事待人厚道，就跟老太爷一模一样。"

"你们太太呢？"我问道。

"是说现在这位太太吗?"他问道。我点点头。老文便接着说下去:"太太过门三年多了,她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半句。她没有过门的时候,人人都说她是个新派人物,怕她花样多。她过来了大家都夸奖她好,她心地跟她相貌一样。她脸上一天总是挂着笑容。她特别看得起我们,说我们是姚家老家人。她有些事情还要问我们。我们伺候这样的老爷、太太,是我们底下人的福气。"笑容使他的皱脸显得更皱了,可是他一对细小的眼睛里包满泪水,好像他要哭起来似的。

我洗过脸,他便走到茶几旁去端脸盆。我连忙又问一句,因为我的好奇心被他的叙述引动了,我想从他的口里多知道一些事情。

"你们头一位太太呢?"

老文放下脸盆,看了我一眼,垂着手站在茶几前,摇摇头答道:"不是我们底下人胡言乱语,前头太太比这位差得太多,真赶不上。前头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爷,还有一位小姐,小姐后来也死了……"他突然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转过头去看门外。

"你们少爷我也见过,相貌跟你们老爷一模一样,"我接下去说,我想用这句话来引出他以后的话。

"不过脾气却跟老爷两样。"他看看我,又看看门外,他似乎想收回那句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定知道我清清楚楚地把话听进去了。

"不要紧,你有话只管讲,我不会告诉别人。你说得不错。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少爷对你们太太不大好。"

"黎——先生,你还不知道,虎少爷自来脾气大,不说对他

后娘，就是对他亲生妈也不好。前头太太去世时候，虎少爷快八岁了，他哭都没哭一声。他外婆太宠他，老爷也太宠他，我们太太拿他简直没有办法。"他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我听见周大娘说，我们太太为他的事还哭过好几回，连老爷都不晓得。"他停了一下，仍旧小声说下去："太太回娘家，要带他去，他死也不肯去。他自己的外婆总说我们太太待不得前娘儿子，这两年赵家外老太太简直不到我们家来了，就是时常打发人来接虎少爷过去耍。我们太太逢年过节还是到赵家去。去年赵家怕警报，下乡去住了大半年，就把虎少爷接去住了三四个月。虎少爷回都不想回来了。老爷、太太打发我们去接了好几趟，才接回来的，回来还大发脾气，说在城里头炸死了，归哪个负责！老爷不骂他，太太也不好讲话。其实他在赵家从来不翻书，一天就跟表哥表弟赌钱……"

"你们老爷为什么这样不明白？像你们少爷这样年纪，做父亲的正应该好好管教他，"我插嘴说。

"唉，"老文着急地叹了一口气，"老爷宠他，什么事都依他，从小就是这样。叫我们底下人在旁边干着急。"他忽然忘了自己地提高声音："年纪不小了，已经十三岁了，还在读高小第四册。"过后他气恼地昂起头来，自语道："我们说是说了，就是给旁人听见，也不怕，我们顶多告假回家就是了。"

"他十三岁？我还以为至多十一岁呢！"

"心思多的人不肯长，有什么办法？"老文的声音里还含着怒气。

"昨天那个杨家少爷也不过这样年纪……"我说。

"杨家少爷？"老文惊诧地问道，但是他不等我解释，马上接着说，"我们晓得就是常常跑进来折花的那一个。他家里从前也很阔，听说比我们老爷还有钱，现在败了。不过饭还吃得起。我听见看门的李老汉儿说，那个杨少爷今年还不满十五岁，已经上了三年中学，书读得很好。"

"你们老爷不是说他不肯好好念书吗？"我问道。

"那是老爷的话。我们讲的是李老汉儿的话，我们也不晓得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原说，既然书读得好，怎么又会常常跑进我们花园来要花？这个道理我们实在不明白。问起李老汉儿，他也不肯说，我们多问两句，他就流眼泪水。昨天他还跟我们讲过情，说是只要老爷不晓得，又没有给赵青云看见，就让杨少爷来折几枝花罢。我们倒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也不想跟杨少爷为难，人家好好的少爷，公馆又原是他们家卖出来的，再说折两枝花，也值不了几个钱，横竖老爷、少爷都不爱花，就是太太一个人高兴看看花。其实太太也讲过，一两枝花有什么要紧，人家喜爱花，就送他一两枝。只是赵青云顶不高兴，花儿匠老刘请了三个月病假，现在归赵青云打扫花园，他顶讨厌旁人跑进花园里头来。老爷也吩咐过不要放杨少爷进公馆来，说是怕把虎少爷教坏了。所以赵青云碰到杨少爷，总要吵嘴。一个要赶，一个不肯走，偏偏杨少爷人虽小，力气倒不小，嘴又会讲话。有时候赵青云一个人把他没有办法，我们碰到，只好去帮忙。"

"你们老爷害怕虎少爷跟着杨少爷学坏，是不是你们少爷喜欢跟杨少爷一块儿玩？"我又问。

"哼，我们虎少爷怎么肯跟杨少爷一堆耍？他顶势利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从来不肯好好地跟我们讲一句话。老爷真是太小心。"

"你们太太是个明白人，她可以劝劝你们老爷，对虎少爷的教育不好这样随便啊，"我说。

老文绝望地摇着头："没有用。老爷什么事都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头有点糊涂。你跟他讲，他不会听。"他弯下身子，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我说："听说太太跟老爷讲过几回，虎少爷在家里不肯念书，时常到他外婆家去赌钱，又学了些坏习气，她做后娘的不大好管教，怕赵家讲闲话，要老爷好好管他。老爷却说，年纪小的人都是这样，大了就会改的。虎少爷人很聪明，用不着管教。太太碰了几回钉子，也就不敢多讲话了。赵家对太太顶不好，外老太太同两位舅太太都是这样，她们不但在外头讲闲话，还常常教唆虎少爷跟太太为难。老爷一点也不管。太太跟周大娘讲过，幸好她自己没有添小少爷，不然，她做后娘更难做了。"

"你们太太的处境也太苦了，"我同情地、不平地说，"真是想不到。"

"是啊，要不是周大娘跟我们说，我们哪儿会晓得？太太一天都是笑脸，见到人总是有说有笑的。我们只求老太爷的阴灵保佑她添两位小少爷，将来大起来，做大事情，给她出一口气。"老家人的诚心的祝福在这空阔的厅子里无力地战抖着。我看见他用手揩眼睛，觉得心里不痛快，站起来，默默地在屋里走了几步。

我觉得老文的眼光老是在我的身上打转，便站定了，望着他那微微埋下的头，等着他讲话。

“黎先生，这些话请你不要告诉旁人啊，”他小心地央求我，脸上愤怒的表情完全消失了。我看到一种表示自己无力的求助的神情。没有门牙的嘴像一个黑洞。

“你放心，我绝不会告诉人，”我感动地说。

“多谢你，我们今天把心里头的话都讲出来了。黎先生，我们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底下人，我们也晓得好歹，明白是非，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老文埋着头，捧着脸盆，伤感地流着泪走出去了。

我一个人站在下花厅门口。我引出了他的这许多话，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可是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么？

没有。我只觉得有什么野兽的利爪在搔我的胸膛。

十

第二天老文送午饭来，他告诉我虎少爷昨晚又没有回家，还说了一些关于小虎的话，又说起小虎甚至在外面讲过他的后母的坏话。我听了，心里不大痛快。午饭后，我不能在屋里工作，也不想出去逛街。我在花厅里，在园子里走了不知若干步，走累了，便坐到沙发上休息；坐厌了，我又站起来走。最后我闷得没有办法，忽然想起不如到电影院去消磨时间。我刚从石栏杆转进门廊，就看见周嫂给我送晚饭来，说是老文告假上街去了，所以由她送饭。

我只好回到下花厅里吃了晚饭。周嫂冲了茶，倒了脸水。她做事手脚快，年纪在四十左右，脑后梳一个大髻，脸相当长，颜色黄，颧骨高，嘴唇厚，眉毛多，身体似乎很结实。她在我面前不肯讲话。我故意问她，虎少爷在家不在家。

"他？不消说又到赵家去了。我们太太回娘家，千万求他去，他也不肯。他只爱到赵家去耍钱，"周嫂扁起嘴，轻蔑地说。

"你们老爷喊他跟太太去，他也不听话吗？"我再问一句。

"连老爷也将就他，他是姚家的小老虎，小皇帝。"她掉开头，不再讲话了。

晚饭后我走出大门，打算到城中心一家电影院去。看门人李老汉正坐在大门内一把旧的太师椅上，抽着叶子烟，看见我便站起来，取下烟管，恭敬地唤了一声："黎老爷，"对我和蔼地笑了笑。

我出了大门，这声"黎老爷"还使我的耳朵不舒服，我便转回来。他刚坐下，立刻又站起身子。

"李老汉儿，你坐罢，不要客气，"我做个手势要他坐下，一面温和地对他说："你不要喊'老爷'，他们都喊我'黎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黎先生，我明白，"他恭顺地回答。

"你坐罢，你坐罢。"我看见旁边没有别人，决定趁这个机会向他打听杨家小孩的事。我在对面一根板凳上坐下来，他也只好坐了。

"听说，你以前在杨家帮过很久，是吗？"我望着他那光秃的头顶问道。

"是，杨老太爷房子刚刚修好，我就进来了，那是光绪三十二年，离现在三十几年了。我起初当大班抬轿子，民国六年跟人家打架，腿跌坏了，老太爷出钱给我医好，就喊我看门。"他埋下头把烟管在一只鞋底上敲着，烟蒂落下地来，他连忙用脚踏灭了火。他把烟管横放在他背后椅子上。

"杨家的人都好吗？"我做出关心的样子问道。

"老太爷民国二十年就过世了。大老爷也死了五年多了，只有一个少爷，公馆卖了，他就到'下面'去，一直没有消息。二老爷在衡阳，经营生意，很顺手。四老爷在省城什么大公司

当副经理，家境也很好。就是三老爷家产弄光了，吃口饭都很艰难……"他接连叹了几口气，摇了几下头，抚摩了几下他那不过一寸长的白胡须。

"昨天来的那个小少爷就是他们杨家的人吗？"

"是，这是三老爷的小少爷。跟他父亲一样，很清秀，又很聪明，人又好强。三老爷小时候，老太爷顶喜欢他，事事将就他。后来三老爷长大了，接了三太太，又给朋友带坏了，把家产败得精光，连三太太的陪奁也花光了。后来三太太、大少爷都跟他吵嘴，只有这个小少爷跟他父亲好。"

"那么杨家三老爷还在吗？"我连忙插嘴问道。

"这个……我不晓得，"他摇了几下头。我注意他的眼睛，他虽然掉开脸躲避我的眼光，可是我见到了他一双眼睛里的泪水，我知道他没有对我说真话，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想用话套出他的真话来。

"杨家大少爷不是在邮政局做事吗？那么一家人也应该过得去。这位小少爷还在上学，现在要送子弟上学，也要花一笔大钱！"

"是啊，他们弟兄感情好，小少爷读书又用功。大少爷很喜欢他兄弟，就是不喜欢他父亲。小少爷在学堂里头，每回考试，都中头二三名。"李老汉说着，得意地捏着胡须微笑了，可是眼里的泪水还没有干掉。

"不错，这个我也看得出来，的确是个好孩子，"我故意称赞道；"不过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常常跑到这儿来拿花，跟姚家底下人为难呢？他爱花，可以花钱买，又不贵。何

必要折别人家的花？”

“黎先生，你不晓得，小少爷心肠好，他折花也不是自家要的。”

“送人，也可以花钱去买！茶花外面也有卖的，”我接下去说，我看见一线亮光了。

“外头茶花不多，就是有，也比不上杨家公馆里的！栽了三十多年了，三老爷小的时候，花园里头就有茶花。一共两棵，一红一白。白的一棵前年给虎少爷砍坏了。现在就剩这一棵红的。三老爷顶喜欢这棵茶花。他里说不务正业，可是那回说起卖房子，倒不是三老爷的意思，二老爷同四老爷要拿钱去做生意，一定吵着要卖，大老爷的大少爷不过二十七八岁，没有结婚，性子暴躁，平日看不起家里几个叔叔，也吵着卖房子，说是把家产分干净了，他好到外国去读书，永远不回省来。三太太的钱给三老爷花光了，也想等到卖了房子，分点钱来过活。大家都要卖，三老爷一个人说不能卖也不中用。当时大家都着急得很，怕日子久了会变卦，所以房价很便宜。得了钱大家一分，三老爷没有拿到一个钱。”他的嘴又闭上了，一嘴短而浓的白胡须掩盖了一切。

“他怎么会没有拿到一个钱呢？三太太他们分到钱总会拿点给他花。至少他吃饭住房子得花这笔钱，”我惊奇地追问道，我相信他一定对我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黎先生说的是，”他恭顺地答道。

我知道他不会再对我讲什么话了。他大概觉察出来我在向他打听消息，我在设法探出他心里的秘密，他便用这个“是”

字来封我的嘴。我要是再追问下去，恐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他对我的疑惧，还不如就此打住，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向他探询罢。

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在门前晃了一下。李老汉马上站起，脸色全变了，他那张圆圆脸由于惊恐搐动起来，好像他见到什么他害怕看见的东西似的。

我也吃了一惊。我站起来，走出了大门。我向街中张望。我只看见一个人的背影：瘦长的身材，粘染尘土的长头发，和一件满是油垢快变成乌黑的灰布夹袍。他走得很快，仿佛害怕有人在后面追他一般。

十一

我朝着他去的方向走，走过一个庙宇似的建筑，我瞥见了“大仙祠”三个大字。我忽然记起老姚的话。他说看见过杨少爷在这个庙门口跟乞丐在一块儿。他又说大仙祠在他的公馆隔壁，其实跟他的公馆相隔有大半条街光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走进了大仙祠。

庙很小。这里从前大概香火旺盛，但是现在冷落了。大仙的牌位光秃秃地立在神龛里，帷幔只剩了一只角。墙壁上还挂着一些“有求必应”的破匾。供桌的脚缺了一只，木香炉里燃着一炷香；没有烛台，代替它们的是两大块萝卜，上面插着两根燃过的蜡烛棍。一个矮胖的玻璃瓶子，里面插了一枝红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明明是昨天我折给杨少爷的那枝花。

奇怪，怎么茶花会跑到这儿来呢？我想着，我觉得我快要把一个谜解答出来了。

神龛旁边有一道小门通到后面，我从小门进去。后面有一段石阶，一个小天井，一堵砖墙。阶上靠着神龛的木壁，有一堆干草，草上铺了一床席子，席子上一床旧被，枕头边一个脸盆，盆里还有些零碎东西。在天井的一角，靠着砖墙，人

用几块砖搭了一个灶，灶上坐着一个瓦罐，正在冒热气。

谁住在这儿呢？难道杨家小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或者杨家小孩是大仙的信徒？我问着自己。我站在阶上，出神地望着破灶上的瓦罐。

我听见背后一声无力的咳嗽。我回过头去。一个人站在我的后面：瘦长的身材，蓬乱的长头发，满是油垢的灰布长袍。他正是刚才走过姚家门口的那个人。他的眼睛正带着疑惧的表情在打量我。我也注意地回看他。一张不干净的长脸似乎好些天没有洗过了，面容衰老，但是很清秀。眼睛相当亮，鼻子略向左偏，上嘴唇薄，虽然闭住嘴，还看得见一部分上牙。奇怪，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似的。

他老是站着打量我，不作声，也不走开。他看得我浑身不舒服起来，仿佛他那一身油垢都粘到我身上来了一样。我不能再忍受这种沉默的注视，我便开口发问：

"你住在这儿吗？"

他没有表情地点一下头。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一句：

"罐子里的东西煮开了。"我指着灶上的瓦罐。

他又点一下头。

"这儿就只有你一个人？"过了几分钟，我又问一句。

他又点一下头。

怎么，他是一个哑巴？我又站了一会儿，同他对望了三四分钟。我忽然想起：他的鼻子和他的嘴跟杨家小孩的完全一样。两个人的眼睛也差不多。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见。难道他就是杨家三老爷？难道他就是杨家小孩的父亲？

我应该向他问话，要他把他的身世告诉我。没有用。他不讲话，却只是点着头，我怎么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即使他不是哑巴，即使他真是那个小孩的父亲，他也不会对我这个陌生人泄露他的秘密。那么我老是痴呆地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我失望地走出了小门。他也跟着我出来。我走到供桌前看见瓶里那枝茶花，我忍不住又问一句：

"这枝花是你的？"

他又点一下头。这一次我看见他嘴角挂了一丝笑意。

"这是我前天亲手在姚公馆折下来的，"我指着茶花说。

他似信非信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觉得他是在笑，或许不是笑也说不定），过后又点一下头。

"是杨家小少爷给你的吗？"我没有办法，勉强再问一句。

他再点一下头，索性撇开我，走下铺石板的院子，站到大门口去了。我没有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这时庙里光线相当暗，夜已经逼近了。

我扫兴地走出庙门。在我后面响起了关门的声音。我回过头看。两扇失了光彩的黑漆大门把那个只会点头的哑巴关在庙里了。

我站在庙门前，掏出表来看，才六点十分，我马上唤住一部经过的街车，要那个年轻车夫把我拉到蓉光大戏院去。

我心里装了许多人的秘密。我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忘记。

十二

我回到姚家，还不到九点半钟。小虎正站在大厅上骂赵青云。他骂的全是粗话。赵青云坐在门房的门槛上，穿着短衫，袖子差不多挽到肩头，露出两只结实的膀子，冷一句热一句地回骂着。老文坐在二门内右面黑漆长凳上抽叶子烟。

“黎先生，回来啦，”老文站起来招呼我。

“他有什么事？”我指着小虎问道。

“他输了钱回来发脾气，怪赵青云接他早了。是太太打发赵青云去接他的。太太说他晚上还要温习功课，早晨七点钟上课，六点钟就该起来。其实他哪儿是读书，不过混混寿缘罢了，”老文摇头叹息道：“一个月里头总有十天请假，半个月迟到的。上了七年学认字不过一箩筐。这真是造孽！”

“老爷没有回来吗？”我问道。

“还早哟。今天老爷、太太陪外老太太看戏，要到十二点才回来。老爷不在家，他发脾气，也没有人理他。赵青云又是个硬性子，不会让他，是他自讨没趣。”

小虎在大厅上跳来跳去，口里×妈×娘地乱骂，话越来越难听。有一次他跳下天井，说是要打赵青云。赵青云也站起来，把膀子晃了两晃，一面回骂道：“×妈，你敢动一下，老子

不把你打成肉酱不姓赵！”

小虎胆怯地退了一步。这时二门外响起包车的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小虎连忙向前走了两步，把两手插在西装袋里，得意地笑道：“好，你打罢。老爷回来了。看你敢不敢打！”

一部包车同两部街车在二门口停住了。车上走下一个素服的中年太太、一个穿花旗袍梳两条小辫子的小姐和一个穿青色学生服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先后跨进门槛。老文垂下双手招呼了他们。他们对他点了点头。

小虎看见回来的不是他的父亲，回头便跑，跑上大厅的阶沿，又站住大声骂起来。那位太太和小姐走过他的身边，他并不理睬她们。她们也不看他。只有那个青年站住带笑问他一句：“虎表弟，你在跟哪个吵嘴？”

“你不要管！”小虎生气地把身子一扭，答了一句。

青年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就从侧门往内院去了。

“这是小虎的表哥吗？”我问老文道。

“是。这是居孀的姑太太，还有大小姐跟二少爷。他们都晓得我们虎少爷的脾气，能避开就避开。老爷不在面前，虎少爷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姑太太是长辈，你看他连招呼也不招呼。姑太太是我们老爷的亲姐姐，比老爷大不到两岁。姑老爷死得早，也留得有田地，姑太太一家人也能过活。老爷好意接姑太太来住，恐怕也因为公馆里头房子多，自己一家大小三个住不完。老爷、太太待姑太太都很好，就是虎少爷看不起人家。他常常讲姑太太家里没有什么钱，他们姚家有千多亩田。田多还不是祖先传下来的！人家小姐、少爷都在上大学读书，从

来不乱花钱，好多人夸奖，那才是自己的本事。"老文提起小虎，气就上来了。他一开口便发了这一大堆牢骚。我了解他的心理，我知道他的愤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哪天一定要好好地劝劝你们老爷，再这样下去，不但害了小虎一辈子，并且会苦坏你们的太太，"我说。

"不中用，黎先生，不中用。我们老爷就是在这件事上头看不明白。况且还有赵家一家人教唆。坏就坏在赵家比我们老爷更有钱，虎少爷就相信钱。偏偏太太娘家又没有多少钱，家境比我们姑太太还差，虎少爷当然看不上眼。就是太太过门那年，他到万家去过两回，以后死也不肯再去。"

"你们太太娘家还有些什么人？"

"万家除了外老太太，还有大舅老爷、大舅太太、两位少爷。大舅老爷比太太大十多岁，在大学里教书，听说名声很好。两位少爷都在外州县上学。虽说没有多少钱，人家万家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那才像一个家！哪儿像赵家，没有一个人做正经事情，就只知道摆阔，赌钱！连我们底下人也看不惯。黎先生，你想，虎少爷今天去赵家，明天去赵家，怎么不会学坏？"

"想不到你这样明白，"我赞了他一句。

"黎先生，你太夸奖了，我们底下人再明白，又有什么用，还不是做一世底下人！在老爷面前我们一个屁也不敢放。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我们还敢跟他顶嘴吗？我们就是想替太太'打抱不平'，也不敢向老爷吐一个字。况且人家又是恩爱夫妻。外头哪一个不说老爷跟太太感情好！

……虎少爷进去了。黎先生，你也进屋去休息罢。我们又吵了你半天。我们去给你打脸水。”他把一直捏在手里的叶子烟管别在后面裤带上，叹息似地微微摆着头，走下天井里去了。我只得跟着他走进“憩园”去。

十 三

我就这样地在姚家住下来。朋友让我自由，给我方便。园子里很静，少人来。有客人拜访，朋友都在上花厅接待他们。其实除了早晚，朋友在家的时候就不多。我知道他并没有担任什么工作，听说他也不大喜欢应酬。我问老文，老爷白天出门做什么事，老文说他常常去“正娱花园”喝茶听竹琴，有时也把太太拉去陪他。

我搬来姚家的第六天便开始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七本书，也就是我的第四本长篇小说。是一个老车夫和一个唱书的瞎眼妇人的故事。我动身回乡以前，曾把小说的结构和内容对一位文坛上的前辈讲过。那时他正在替一家大书店编一套文学丛书，要我把小说写好交给那个书店出版，我答应了他。我应当对那位前辈守信。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关在下花厅里写了一个星期，已经写了三万多字。我预计在二十天里面可以完成我这部小说。

每天吃过晚饭我照例出去逛街。有时走得较远，有时走了两三条街便回来，坐在大门内板凳上，找李老汉谈天。我们什么话都谈，可是我一提到杨家的事，他便封了嘴，不然就用别的话岔开。我觉得他在提防我。

每天我走过大仙祠，都看见大门紧闭着。我轻轻地推一下，推不开。有一次我离庙门还有四五步远，看见一个小孩从庙里出来。我认得他，他明明是杨少爷。他飞也似地朝前跑，一下子就隐在人背后不见了。我走到大仙祠。大门开了一扇，哑巴站在门里。我看他，他也看我。他的相貌没有改变，只是一双眼睛泪汪汪的，左手拿着一本线装书。

他退后两步，打算把我关在门外。我连忙拿右手抵住那扇门，一面埋下眼睛，看他手里的书，问道："什么书？"

他呆呆地点一下头，却把那只手略略举起。书是翻开的，全是石印的大字，旁边还加了红圈。我瞥见"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十四个字，我知道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印本《唐诗三百首》。

"你在读唐诗？"我温和地问道。

他又点一下头，往后退了两步。

我前进两步，亲切地再问："你贵姓？"

他仍旧点一下头。泪水从眼角滴下来，他也不去揩它，好像没有觉察到似的。

我抬起眼睛看供桌，香炉里燃着一炷香。茶花仍然在瓶里，但是已经干枯了。我又对他说一句："还是换点别的花来插罢。"

他这一次连头也忘记点了。他痴痴地望着花，泪水像两根线一样挂在他的脸颊上。

我忽然想到这天是星期六。我来姚家刚刚两个星期。那次杨少爷来要花也是在星期六。那个小孩大概每个星期六到

这儿来一次。他一定是来看他的父亲。不用说，哑巴就是杨老三。照李老汉说，杨家卖了公馆，分了钱，杨老三没有拿一个。他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给家里人赶出来了；至于他怎么会住到庙里来，又怎么会变成哑巴，这里面一定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可是我有什么办法知道呢？他自己不会告诉我。杨家小孩也不会告诉我。李老汉——现在李老汉不跟我谈杨家的事了。

哑巴在我旁边咳了一声嗽，不止一声，他一连咳了五六次。我同情地望着他，正想着应该怎样给他帮忙。他勉强止了咳，指着大门，对我做手势，要我出去。我迟疑一下，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大门在我后面关上了。我也不回过头去看。浅蓝色天空里挂起银白的上弦月，夜还没有来，傍晚的空气十分清爽。

我在街上慢慢地走着。我希望我能够忘记这些谜一样的事情。

十 四

“老黎！老黎！”一个熟习的声音在叫我。从迎面一部包车上跳下来一个巨大的影子。

我站定了，抬起头看。老姚笑容满面地站在我面前。

“我正耽心找不着你，想不到在半路上给我抓住了，真巧！”他满意地笑道。他马上掉转脸吩咐车夫：“你把车子先拉回家去。”

车夫应了一声，便拉起车子走了。

“有什么好事情？你这样得意！”我问道。

“碰到你，我的难题解决了，”老姚笑答道。“我今天跟昭华约好七点钟去看电影，两张票子都买好了。哪知道我到赵家去，赵家一定要留我吃晚饭，晚上陪老太太听川戏，不答应是不行的。可是我太太看电影的事怎么办呢？我想，只好请你陪她去。不过我又怕你不在家。现在没有问题了。”

“其实你看了电影再去听戏也成，”我说。

“可是我还要赶回赵家去吃饭啊。现在我先回家跟昭华讲一声。”

“你不去，恐怕你太太不高兴罢。”

“不会，不会，”他摇摇头很有把握地说；“她脾气再好没有

了。她也知道我平日不高兴看电影，我去也是为了陪她。”

“赵家没有请你太太吃饭？”

“你怎么这样罗苏，我看你快变成老太婆了，”老姚带笑地抱怨道。“快走，昭华在家里等我们。我还要赶到赵家去。赵家在南门，我们这儿是北门！”

我笑了笑，便跟着他走回公馆去。在路上他还是把我的问话回答了。他还向我解释：“赵老太太不愿意看见昭华，说是看见昭华就会想起她的亲生女儿，心里不好过。自从我头个太太死后，赵老太太就没有到我家来过。其实昭华对赵家起先也很亲热。后来赵家常说怕惹起老太太伤心，不敢接她去玩，她才没有再到赵家去。其实这也难怪赵家，老太太爱她的女儿，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我头个太太又是她的独养女。”

“那么赵老太太看见你同小虎，就不会想到她的独养女吗？”我不满意他这个解释，便顶他一句。

“她喜欢小虎极了。今晚上听戏还是小虎说起的，”他似乎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却只顾说些叫我听了不高兴的话。

我们到了家。老姚要我回到房里等着。我跨进了憩园的门槛，还听见他在吩咐老文：“你到外面去给黎先生雇一辆车来。”

十五

我在园子里走了十多分钟，看见夜的网慢慢地从墙上、树上撒下地来。两三只乌鸦带着疲倦的叹息飞过树梢。一只小鸟从桂花树枝上突然扑下，又穿过只剩下一树绿叶的山茶树，飞到假山那面去了。

老姚夫妇来了。太太脸上仍旧带着她的微笑。她身上穿一件灰色薄呢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黑绒窄腰短外衣。老姚也脱去了长袍，换上一身西服，左膀上搭了一件薄薄的夹大衣。

"老黎，走罢，你不拿东西吗？"老姚站在石栏杆前，高兴地嚷起来。

"好。我不拿东西，"我一面回答，一面走上石阶，沿着栏杆去迎他们。

"黎先生，对不起啊，又耽误你的工作，"姚太太笑着对我道歉。

"姚太太，你太客气了。他知道"（我指着她的丈夫）"我是个电影迷，"我笑答道，"你们请我看电影，还说对不起我，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不要再讲什么客气话了，快走罢，不然会来不及的，"老

姚在旁边催促道。

我们走出园门。三部车子已经在二门外等着了。他们夫妇坐上自己的包车，我坐上街车，鱼贯地出了大门。

过了两条街，在十字路口，朋友跟他的太太分手了。又过了六七条街，我们这两部车子在电影院门口停下来。

我抬头看钟，知道还差八九分才到开映的时间。电影院门前只有寥寥十几个人。今天映的片子是《战云情泪》，演员中没有一个大明星，又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不合这里观众的口味也未可知。

戏院里相当宽敞，上座不到六成。我们前面一排，就空了五个位子。姚太太在看说明书，可是她没有看完，电灯便熄了。

银幕上映出来一个和睦家庭的生活，一个安静、美丽的乡村环境。然后是一连串朴素的悲痛的故事。我的心为那些善良人的命运痛苦。我看见姚太太频频拿手帕揩她的眼睛，我还听见她一阵阵的轻微的吐气。

映到那个从战地回来的父亲躺在长沙发上咽气的时候，片子忽然断了。电灯重燃起来，姚太太嘘了一口气，默默地埋下了头。我却抬起脸，毫无目的地把眼光射到一些座位上去。

我呆了一下。在我右面前三排的座位上，我看见了杨家小孩，就是我先前在大仙祠门口看见的那个样子。他正在跟旁边的一位中年太太讲话，这位太太脸上擦了点粉，头发梳成一个小髻，蓝花旗袍上罩了一件灰绒线衫，在她右面还有一个穿灰西装的年轻人，她侧过头对那个年轻人说了两句话，她笑

了，那个年轻人也笑了。过后那个年轻人忽然回过头看后面。他的脸被我看清楚了。除了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滑、脸色比较白净外，他的脸跟杨家小孩的脸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真巧！许多事都碰在一块儿。想不到我又在这个电影院里看见了杨家小孩的母亲和他的哥哥。

电灯又灭了。片子接着映下去。最后战争结束，兵士们回到故乡。那个善良的姑娘在她同母亲重建起来的田庄上，在绝望的长期等待中，毕竟见到了她的情人的归来。

人们离开座位走了。电灯再亮起来。姚太太看了我一眼，便也站起来。我对她短短地说一句："片子还不错。"她点点头，答了一句："我倒没有想到。"

姚太太怕挤，她主张让旁人先出去。等我们走到门口，车子已经被人雇光了。我看见杨家母子坐上最后三辆街车走了。

老李正在台阶下等候姚太太，看见她便大声说："太太，车子在这儿。"

"黎先生的车子在哪儿？"姚太太问道。

老李答道："我雇好一部，给人家抢去了。今天车子少。到前面多半雇得到。太太要先坐吗？"

我连忙说："姚太太，请先上车罢。我自己到前面去雇车好了。要是没有车，走回去也很方便。"

"老李，你把车拉回去。我陪黎先生走一节路，等着雇到车再坐。横竖今晚上天气好，有月亮，"姚太太不同我讲话，却温和地吩咐老李说。

"是，太太，"老李恭敬地答道。

我只好同姚太太走下台阶。老李拉着车子慢慢地在前面走。我们两个在后面跟着。

十 六

我们跟着车子转了弯。我们离开了嘈杂的人声，离开了辉煌的灯光，走进一条清静的石板巷。我不讲话，我耳朵里只有她的半高跟鞋的有规律的响声。

月光淡淡地照下来。

"两年来我没有在街上走过路，动辄就坐车，"她似乎注意到她的沉默使我不安，便对我谈起话来。

"我看，姚太太，你还是先坐车回去罢。还有好几条街，我走惯了不要紧，"我趁这个机会又说一次。这不全是客气话，因为我一则耽心她会走累；二则，这样陪她走路，我感到拘束。

"不要紧，黎先生，你不要替我耽心，我不学学走路，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她看了我一眼，含笑道。"前年有警报的时候，我们也是坐自己的车子'跑警报'，不过偶尔在乡下走点路。这两年警报也少了。诵诗不但自己不喜欢走路，他还不让我走路，也不让小虎走路。"

"姚太太在家里很忙罢？"

"不忙。闲得很。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用的底下人都不错，有什么事情，不用吩咐，他们会办得很好。我没有事，就看书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读过几本。"

我最怕听人当面说读过我的书。现在这样的话从她的口里出来，我听了更惭愧。我抱歉地说："写得太坏了。值不得姚太太读。"

"黎先生，你太客气了。你是诵诗的老朋友，就不应该对我这样客气。诵诗常常对我讲起你。我不配批评你的大作，不过我读了你的书，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觉得诵诗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他认识的人虽然多，可是知己朋友实在太少，"她诚恳地说，声音低，但吐字清楚，并且是甜甜的嗓音；可是我觉得她的语调里含得有一种捉不住的淡淡的哀愁。我怀着同情地在心里说：你呢？你又有什么知己朋友？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可是在她面前我不能讲这样的话。我对着她只能发出唯唯的应声。

我们走过了三条街。我没有讲话，我心里藏的话太多了。

"我总是这样想，写小说的人都怀得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然一个人的肚子里怎么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一个人的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所以，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诵诗帮忙……"

"姚太太，你这又是客气话了，我能够给他帮什么忙呢？他不是过得很好吗？他的生活比我的好得多！"我感动地说。我一面觉得我明白她的意思，一面又害怕我猜错她的真意，我用这敷衍话来安慰她，同时也用这话来表明我在那件事情上无能为力。

"黎先生，你一定懂我的话，至少有一天你会懂的。我相信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平常人只会看表面，

你们还要发掘人心。我想你们的生活也很苦，看得太深了恐怕还是看到痛苦多，欢乐少……”

她的声音微微战抖着，余音拖得长，像叹气，又像哭泣，全进到我的心里，割着我的心。

我失去了忍耐的力量，我忘记了我自己，我恨不能把心挖了出来，我恳切地对她说：“姚太太，我还不能说我懂不懂你的意思。不过你不要耽心。请你记住，诵诗有你这样一位太太，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激动得厉害，以下的话我讲不出来了。到这时，我忽然害怕她会误会我的意思，把我的话当作一个玩笑，甚至一种冒犯。

她沉默着，甚至不发出一点轻微的声息。她略略埋下头。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脸来。可是她始终不回答我一句。我也不敢再对她说什么。她的眼睛向着天空，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这沉默使我难堪，但是我也不想逃避。她不提坐车，我就得陪她走回公馆。不管我的话在她心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既然说出我的真心话，我就得硬着头皮承担那一切的后果。我并不懊悔。

她的脚步不像先前那样平稳了。大概她也失去了心境的平静罢。我希望我能够知道她这时候在想什么事情。可是我怎么能够知道？

离家还有两条街了，在那个十字路口，她忽然掉过脸看我，问了一句：“黎先生，听说你又在写小说，是吗？”她那带甜味的温柔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的。我没有事情，拿它来消磨时间。"

"不过一天写得太多，对身体也不大好。周嫂说，你整天伏在桌子上写字。那张方桌又矮，更不方便。明天我跟诵诗说换一张写字台罢。不过黎先生，你也应该少写点。你身体好像并不大好，"她关心地说。

"其实我也写得不多，"我感激地说。接着我又加上两句："不写，也没有什么事情。我除了看电影，就没有别的嗜好，可是好的片子近来也难得有。"

"我倒喜欢读小说。读小说跟看电影差不多。我常常想，一个人的脑筋怎么会同时想出许多复杂的事情？黎先生，你这部小说的故事，是不是都想好了？你这回写的是哪一种人的事？"

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她讲了。她似乎听得很注意。我讲到最后，我们已经到了家。

老李先拉着车子进去。姚太太同我走在后面。李老汉恭敬地站在太师椅跟前，在他后面靠板壁站着一个黑黑的人。虽然借着门檐下挂的灯笼的红光，我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并且我又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可是我马上断定这个人就是大仙祠里的哑巴。然而等我对姚太太讲完两句话，从内门回头望出去，我只看见一个长长的人影闪了一下，就在街中飞逝了。

我没有工夫去追问这件事。我陪着姚太太走过天井，进了二门。

"我嫁到姚家以后第一次走了这么多的路，"她似乎带点喜悦地笑道。过后她又加了一句："我一点也不累。"走了两

步，她又说："我应该谢谢你。"

我以为她要跟我分手进内院去，便含笑地应道："不要客气。明天见罢。"

她却站住望着我，迟疑一下，终于对我说了出来："黎先生，你为什么不让那个老车夫跟瞎眼女人得到幸福？人世间的事情纵然苦多乐少，不见得事事如意。可是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要是我能够写的话，我一定不让那个瞎眼女人跳水死，不让那个老车夫发疯，"她恳求般地说，声音里充满着同情和怜悯。

"好，"我笑了笑，"姚太太，那么为了你的缘故就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罢。"

"那么谢谢你，明天见，"她感谢地一笑，便转身走了。

我当时不过随便说一句话，我并不想照她的意思改变我的小说的结局。可是我回到花厅以后，对着那盏不会讲话的电灯，我感到十分寂寞。摊开稿纸，我写不出一个字。拿开它，我又觉得有满腹的话需要倾吐。坐在方桌前藤椅上，我听见她的声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听见她的声音。坐到沙发上去，我听见她的声音。"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句话不停地反复在我的耳边响着。后来我的心给它抓住了。在我面前突然现出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给人间增加苦恼，我让一些纯洁的眼睛充满泪水。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没有带来一声欢笑。我把自

己关在我所选定的小世界里，我自私地活着，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白纸上，整天唠唠叨叨地对人讲说那些悲惨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热诚的人灭亡，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我让好心的瞎眼女人投江，正直的老车夫发狂，纯洁的少女割断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不能伸出手去揩干旁人的眼泪？为什么我不能发散一点点热力减少这人世的饥寒？她的话照亮了我的内心，使我第一次看到那里的空虚。全是空虚，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作品。

绝望和悔恨使我快要发狂了：我已经从我自己世界里的宝座上跌了下来。我忍受不了电灯光，我忍受不了屋子里的那些陈设。我跑到花园里去，我在两棵老桂花树中间来来回回地走了许久。

这一夜我睡得很迟，也睡得很坏。我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我在梦里也否定了我自己。

十 七

第二天我起床并不晚。可是我头痛，眼睛又不舒服。然而我并没有躺下来，我跟自己赌气，我摊开稿纸写，写不出，不想写，我还是勉强写下去。从早晨七点半钟一直写到十点半，我一共写了五百多字。在这三个钟点里面，我老是听见那个声音："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呢？"我还想倔强地用尽我的力量来抵抗它。可是我的笔渐渐地不肯服从我的驾驭了。

我把写成的五百多字反复地念了几遍，在这短短的片段里，我第一次看出了姚太太的影响。我气愤地掷开笔，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动气。就在这个时候老姚进来了。

我抬起头回答他的招呼，勉强地对他笑了笑，我仍然坐在藤椅上，不站起来。

"怎么今天你脸色不好看？"他吃惊地大声问道。

"我昨晚写文章没有睡好觉，"我低声回答。我对他撒了谎。

"是啊，我昨晚上十二点钟以后回来，还听见你在屋里咳嗽，"他接着说。"其实你身体不大好，不应该睡得太迟。反正花园里很清静，你也有空，何必一定要拚命在晚上写！"从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关心是真诚的。我很感激他，因

此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跟他谈谈小虎的事，对他进一个忠告。

“你是跟小虎一块儿回来的吗？”我问道。

“不错。小虎这个孩子对京戏满懂。他看得很有兴趣，”老姚夸耀似地笑答道。

“不过太迟了，对他也不大好。小孩子平日应当早睡觉，而且晚上他还要在家里温习功课。他外婆太宠他了，我害怕反而会耽误他。你做父亲的当然更明白，”我恳切地对他说，我把声音故意放慢，让每个字清清楚楚地进到他的耳里。

他大声笑起来。他在我的肩头猛然一拍：“老弟，你这真是书生之见。我对小虎的教育很有把握。昭华起先也不赞成我的办法，她也讲过你这样的话。可是现在她给我说服了。对付小孩，就害怕他不爱玩，况且家里又不是没有钱。爱玩的小孩都很活泼。不爱玩的小孩都是面黄肌瘦，脑筋迟钝，就是多读了几本书，也不见得就弄得很清楚。不是我做父亲的吹牛，小虎到外面去，哪个不讲他好！”

“小虎除了赵家，恐怕很少到别家去过罢，”我冷冷地嘲讽道。

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仍然得意地对我笑着：“就是赵家也有不少的人啊！”

“那是他外婆家。外婆偏爱外孙，这是极普通的事情，”我正经地说。“可是别的人呢？是不是都喜欢他？”我本来想咽下这样的话，然而我终于说了出来。

他迟疑了片刻，可是他仍然昂头答道：“你指什么人？就拿我们家里来说罢，昭华也从没有讲过一句他的坏话。我姐

姐不大喜欢小孩，不过她对小虎也不错。这个孩子就是太聪明，太自负。自然，聪明的孩子不免要自负。我以后还得好好教他。"

"这倒是很要紧的，不然我害怕将来会苦了你太太。我觉得你对小虎未免有点偏爱。当心不要把他宠坏了。"我这是诚恳的劝告，不是冷冷的嘲讽了。

"哪儿有这种事情？"他哈哈大笑道。"你没有结过婚，不会懂做父亲的道理。不用你替我耽心。我并不是糊涂虫。"

"不过我觉得旁观者清，你应当考虑一下，"我固执地说。

"老弟，这种事情没有旁观者清的。我对小虎期望大，当然不会忽略他的教育。"他拍拍我的肩头。"我们不要再谈这种事情，这样谈法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你完全是外行。"他得意地笑起来。

我没有笑。我掉开头，用力咬我的下嘴唇。我暗暗地抱怨自己这张嘴不会讲话。我不能使他睁大眼睛，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不能使他了解他所爱的女人的灵魂的一隅。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来了。还是昨天那一身衣服，笑容像阳光似地照亮她的整个脸。她招呼了我，然后对她的丈夫说："赵家又打发人来接小虎过去。"

"那么就让他去罢，"她的丈夫不加思索地接口说。

"我觉得小虎耍得太多了，也不大好。他最近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我耽心他今年又会——"她柔声表示她的意见，但是说到"会"字，她马上咽住下面的话，用切盼的眼光看她的丈夫，等着他的回答。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摇摇头说；"上一回是学校不公平，不怪他。并且今天是礼拜，赵家来接，不给他去，赵家又会讲闲话。其实赵家一家人都喜欢他，他到赵家去，我们也可以放心。"

"不过天天去赵家，不读书，学些阔少爷脾气，也不大好，"她犹豫一下，看他一眼，又埋下头去，慢慢地说。

"爹！爹！"小虎在窗外快乐地叫道。他带着一头汗跑进房来。他穿了翻领白衬衫和白帆布短裤。他看见他的后母，匆匆地叫了一声"妈"，过后又用含糊的声音招呼我一声。他对我点了一下头，可是他做得那么快，我只看见他的头晃了晃。

"什么事？你这样高兴！"朋友爱怜地笑着问。

"外婆打发车子来接我去耍，"小虎跑到父亲面前，拉着父亲的一只手答道。

"好罢，不过你今天要早点回来啊，"老姚抚摩着孩子的头说。

"我晓得，"孩子高兴地答应着，他放下父亲的手，接着又说一句："我去拿衣服，"也不再看父母一眼，就朝外面跑去。

姚太太望着窗外，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你这位做父亲的也太容易讲话了，"我开玩笑地对老姚说，我不满意他的这种"教育"。

姚太太掉过脸来看我。

"这是父子的感情，没有办法，"老姚摇摇头说，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对他的这种"教育"也并非完全满意。

"我耽心的倒是小虎耍久了，更没有心肠读书，"姚太太插

嘴说，她对丈夫笑了笑。

"不会的，不会的，"老姚接连摇着头说，"你这是过虑。我有把握不叫小虎染到坏习惯。"

"黎先生，你相信他的把握吗？"她抿嘴笑着问我道。

"我不相信，"我摇头答道。"照他说，他对什么事都有把握。"

姚太太点着头说："这是公道话。他对什么事都很自负，不大肯听别人劝。"她又看他一眼。

他仍然带着愉快的笑容，动了一下嘴，正要讲话，周嫂的长脸出现了。

"老爷，大姑太太请你去一趟，说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周嫂说。

老姚对我说："那么我们下午再谈罢。昭华倒可以多坐一会儿。"他马上跟着周嫂走了。

"黎先生，我已经跟诵诗讲过了，写字台等一会儿就给你搬来，"她站在窗前望了望丈夫的背影，忽然转过身子对我说。

"谢谢你。其实不换也好，这张方桌也不错，"我客气地说。

"这张方桌稍微矮一点。你一天要写那么多的字，头埋得太低，不舒服，"她说。

"我这样写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太麻烦你们，我心里也很不安。"

"黎先生，你以后不要这样客气好不好？你是诵诗的老同学，就不该跟我客气，"她温和地笑道。

“我并没有客气——”我的话被一阵闹声打断了。

“什么事情?”她惊讶地自语道，便向门口走去，我也走到那里。

杨家小孩同赵青云正站在石栏杆前吵架，杨家小孩嚷着：“我来找黎先生讲话，你没有权干涉我。”

“黎先生认不得你。你明明是混进来偷东西的，你怕我不晓得你的底细!”赵青云挣红脸骂道。

“赵青云，你让他进来罢，”姚太太在门内吩咐道。

“是，”赵青云答应一声，就不再讲话了。

杨家小孩走到门前，对她行一个礼，唤道：“姚太太。”她含笑地点一下头，轻轻答了一声：“杨少爷。”

他又向着我唤声：“黎先生。”

“你进来坐罢。你找黎先生有什么事情?”她温和地问他。不等他回答，她又对我说：“我先走了。要是杨少爷要花，黎先生，请你折两枝给他罢。”

“谢谢你，姚太太，”杨家小孩感谢地答道。

她走了。我看见小孩的眼光送着她的背影出去。

十八

“你坐罢，”我先开口。

他看看我，动动嘴，似乎要说什么话，却又没有说出来。

“你是不是来要花的？”我带笑地问他。

“不，”他摇摇头。

“那么你找我谈什么事情？”我站在方桌前面，背向着窗。他的手放在藤椅靠背上，眼睛望着窗帷遮住了的玻璃。

“黎先生，我求你一件事……”他咽住下面的话，侧过脸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

“什么事？你尽管说罢，”我鼓舞地对他说。

“黎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到大仙祠去，好不好？”他两只眼睛不住地霎动，好像要哭的样子。

“为什么呢？你怎么晓得我到大仙祠去过？”我惊愕地问道。

“我我——”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答不出来。

“那个哑巴是你的什么人？”我又问一句。

“哑巴？哑巴？”他惊讶地反问道。

“就是住在大仙祠里头的哑巴。”

“我不晓得。”他避开了我的眼光。

"我看见你拿去的那枝茶花。"

他不作声。

"我昨天看见你跟你母亲、哥哥一块儿看电影。"

他动了一下嘴，吐出一个声音，马上埋下了头。

"你为什么不要我到大仙祠去？只要你把原因对我讲明白，我就依你的话。"

他抬起头看我，泪珠不断地沿着脸颊滚下来。

"黎先生，请你不要管那些跟你不相干的事，"他哭着说。

"不要哭，告诉我大仙祠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话？我或者可以给你帮点忙，"我恳切地说。

"我说不出来，我说不来！"他一面说，一面伸起手揩眼睛。

"好，你不要说罢。什么事我都知道。大仙祠那个人一定是你父亲。……"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忽然放下手，用力摇着头，大声否认道：

"他不是！他不是！"

我走过去，拉住他的两只手，安慰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对旁人讲的。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告诉我，你父亲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他挣脱了我的手，往门外跑去。

"不要走，我还有话对你说！"我大声挽留他。可是他的脚步声渐渐地去远了。只有他一路的哭声在我的耳边响了许久。

我没有移动脚，我知道我不会追上他。

十 九

这天午饭以前写字台果然搬到下花厅来了。桌面新而且光滑，我在那上面仿佛看见姚太太的笑脸。

可是坐在这张写字台前面，我整个下午没有写一个字。我老是想着那个小孩的事情。

后来我实在无法再坐下去。我的心烦得很，园子里又太静了。我不等老文送晚饭来，便关上了下花厅的门，匆忙地出去。

我走过大仙祠门前，看见门掩着，便站住推一下，门开了半扇，里面没有一个人。我转身走了。

我在街口向右转一个弯，走了一条街。我看见一家豆花便饭馆，停住脚，拣了一张临街的桌子，坐下来。

我正在吃饭，忽然听见隔壁人声嘈杂，我放下碗，到外面去看。

隔壁是一家锅魁店，放锅魁的摊子前面围着一堆人。我听见粗鲁的骂声。

"什么事情？"我向旁边一个穿短衣的人问道。

"偷锅魁的，挨打，"那个人回答。

我用力挤进人堆，到了锅魁店里面。

一个粗壮的汉子抓住一个人的右膀，拿擀面棒接连在那个人的头上和背上敲打。那个人埋着头，用左膀保护自己，口里发出呻吟，却不肯讲一句话。

"你说，你住在哪儿？叫啥子名字？你讲真话，老子就不打你，放你滚开！"打人的汉子威胁地说。

被打的人还是不讲话。衣服撕破了，从肩上落下一大片，搭在背后，背上的黑肉露出了一大块。他不是别人，就是大仙祠里的哑巴。

"你说，说了就放你，你又不是哑巴，怎么总是不讲话？"旁边一个人接嘴说。

被打的人始终不开口。脸已经肿了，背上也现出几条伤痕。血从鼻子里流下来，嘴全红了，左手上也有血迹。

"你放他罢，再打不得了。他是个哑巴……"我正在对那个打人的汉子讲话，忽然听见一声痛苦的惊叫，我掉头去看。

杨家小孩红着脸流着泪奔到哑巴面前，推开那个汉子的手，大声骂着：

"他又没有犯死罪，你们做什么打他？你看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你们只会欺负好人！"

众人惊奇地望着这个孩子。连那个打人的人也放下手不作声了，他带着一种茫然的表情看这个小孩。被打的人仍旧埋下头，不看人，也不讲话。

"我们走罢，"小孩亲热地对他说，又从裤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他："你揩揩鼻血。"小孩拿起他的右手，紧紧捏住，再说一句："我们走罢。"

没有人干涉他，没有人阻挡他。这个孩子扶着被打的人慢慢地走到街心去了。许多人的眼光都跟在他们后面。这些人好像在看一幕情节离奇的戏。

两个人的影子看不见了。众人议论纷纷。大家都奇怪："这个小娃儿"是那个"叫化子"的什么人。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那个哑巴不给钱，拿了一个锅魁，给人捉住，引起了这场纠纷。

"先生，饭冷了，请过去吃罢，我给你换碗热饭来，"隔壁饭店的堂倌过来对我说。

"好，"我答应一声。我决定吃完饭到大仙祠去。

二十

我走到大仙祠。门仍然掩着，我推开门进去。我又把门照旧掩上。

前堂没有人，后面也没有声音。我转到后面去。

床铺上躺着那个哑巴。脸上肿了几块，颜色黑红，鼻孔里塞着两个纸团。失神的眼光望着我。他似乎想起来，可是动了一下身子，又倒下去了。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你不要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做着手势，温和地安慰他。

他疑惑地望着我。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是穿皮鞋的脚。我知道来的是杨家小孩。

果然是他。手里拿着一些东西，还有药瓶和热水瓶。

“你又来了！你在做侦探吗？”他看见我，马上变了脸色，不客气地问道。

这可把我窘了一下。我没有想到他会拿这种话问我。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回答他：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同情你们，想来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帮忙。我并没有坏心思。”

他看了我一眼，他的眼光马上变温和了。可是他并不讲话。他走到床铺前，放下药瓶和别的东西。我去给他帮忙，先把热水瓶拿在我的手里。他放好东西在枕边，又把热水瓶接过去。他对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去泡开水。"他又弯下身子，拿起了脸盆。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拿不了，你把热水瓶给我罢，"我感动地说。

"不，我拿得了，"他不肯把手里的东西交给我。他用眼光指着铺上的病人："请你陪陪他。"他一手提着空脸盆，一手拿着热水瓶，走出去了。

我走到病人的枕边。他睁着眼睛望我。他的眼光迟钝，无力，而且里面含着深的痛苦。我觉得这对眼睛像一盏油干了的灯，它的微光渐渐在减弱，好像马上就要熄了。

"不要紧，你好好地养息罢，"我俯下身子安慰他说。

他又睁大眼睛看我，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似的。他的脸在颤动，他的身子在发抖。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照料他，便慌慌张张地问他："你痛吗？"

"谢谢你，"他吃力地说。声音低，但是我听得很清楚。我吃了一惊。他不是一个哑巴！那么为什么他从前总是不讲话呢？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他是个好孩子，"他接着说，"请你多照应他。……"以后的话，他没有力气说出来。

那个小孩拿着热水瓶，捧着脸盆进来了。

我接过脸盆，蹲下去，把盆了放在病人枕头边的地上，把脸帕放到盛了半盆水的盆子里绞着。

"等我来，"小孩放好热水瓶，伸过手来拿脸帕。

我默默地站起来，让开了。我立在旁边看着小孩替病人洗了脸，揩了身，换了衣服，连鼻孔也洗干净了，换上了两团新的药棉；过后他又给病人吃药。我注意地望着那两只小手的动作，它们表现了多大的忍耐和关切。这不是一个十三四岁小孩的事情，可是他做得非常仔细、周到，好像他受过这一类的训练似的。

病人不讲话，甚至不曾发过一声呻吟。他睁大两只失神的眼睛望着小孩，顺从地听凭小孩的摆布。在他那臃肿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像哭泣一样的微笑，他的眼光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的眼光。等到小孩做完那一切事情以后，他忽然伸出他的干瘦的手，把小孩的左手紧紧地抓住。"我对不住你，"他低声说，"你对我太好了……"泪水从他的眼里迸了出来。

"我们都不好，让你一个人受苦，"小孩抽咽地说了一句，声音就哑了，许久吐不出一个字。他坐在床铺边上。

"这是我自作自受，"病人一个字一个字痛苦地说，声音抖得很厉害。

"你不要讲了，你看你成了这个样子；我们都过得好，"小孩哭着说。

"这样我也就心安了，"病人叹了一口气说。

"可是你……你做什么一定要躲起来？做什么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小孩哭得更伤心了。他把头埋在病人的膀

子上。

病人爱怜地抚摩着小孩的头："你不要难过。我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不，不，我们要送你到医院去！"小孩悲痛地摇着头说。

"去医院也没有用，医院医不好我的病，"病人微微摇摇头，断念似地答道。小孩没有作声。"我现在好多了，你回家去罢。不要叫家里人耽心。"病人说一句话，要喘息几次，声音更弱，在傍晚灰黄的光线下，他的脸色显得更加难看，只有一对眼睛有点生气，它们爱怜地望着小孩的微微颤动的身子。

"那么你跟我回家去罢，在家里总比在这儿好些，"小孩忽然抬起头哀求地说。

"我哪儿还有家？我有什么权利打扰你们？那是你们的家，"病人摇着头，酸苦地说。

"爹！"孩子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着叫起来。"为什么你不该回去？难道我们家不是你的家？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又不是丢脸事情！我做什么还不敢认我自己的父亲！……"孩子又把头埋下去，这一次他俯在父亲的胸前呜呜地哭起来。

"寒儿，我知道你心肠好。不过你母亲他们不会原谅我的。而且我也改不了我的脾气。我把你们害够了。我不忍心再——"他两只手抱着儿子的头，呜咽了许久。我在旁边连声息也不敢吐。我觉得我没有权利知道那一家人的秘密，我更没有权利旁观这父亲和儿子的痛苦。可是现在要偷偷地退出大仙祠去，也太晚了。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提高声音说："你回去罢。我宁肯死

也不到你们家去。”

父亲有气无声地哭起来。孩子不抬头，却哭得更伤心了。我看不清楚父亲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两只手压在儿子的后脑勺上。后来连那两只手也看不见了。

我走过去，俯下身子，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肩头。我拍了三次，孩子才抬起头来，转过脸看我。我同情地说："你让他休息一会儿。”

孩子慢慢地站起来。父亲轻轻地嘘一口气。没有别的声音。

“他累了，精神支持不住。不要跟他多讲话，不要叫他伤心、难过，”我又说。

“黎先生，你说该怎么办？他一定不肯回家，又不肯进医院。在这儿住下去，怎么行！”孩子说。

“我看只要你母亲跟你哥哥来接他，他一定肯回去，”我说。

停了好一会儿，孩子才用痛苦的声音回答我："他们决不会来的。你不晓得他们的脾气。要是他肯进医院，就好办了。不过我不晓得住医院要花多少钱。”他的声音低到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那么明天就送他进医院罢；就是三等病房也比这儿好得多。你手头没有钱，我可以设法，”我诚恳地说。我的声音稍微大一点，但是我想病人已经睡着了，这些时候我就没有听见他的声息。

“不，不能够让你出钱！”孩子摇头拒绝道。

“你不要这样固执。病人的身体要紧，别的以后再讲。等他身体好了，我们还可以找个事情给他做。你想他肯做事吗？”我对他解释道。

“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办罢，”小孩感激地说。

“我们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前在这儿见面，一块儿送他进医院去，就这样决定罢。你明天要上学吗？”

“我上午缺两堂课不要紧。我明天一定在这儿等你。黎先生，你先回去罢。我还要点燃蜡烛在这儿陪我父亲。”

病人轻轻地咳一声嗽，过后又没有声息了。小孩划了五根火柴，才把蜡烛点燃。

“好，我去了。有事情，你到姚家来找我。”

我听见他的应声才迈步走出小门，进到黑暗的天井里去。

二十一

我回到姚家，经过大门的时候，李老汉站起来招呼我。

“你们三老爷在大仙祠生病，我跟他小少爷讲好明天送他进医院去，”我对他说。我告诉他这个消息，因为我知道除了那个小孩，就只有他关心杨老三。

李老汉睁大眼睛张大嘴，答不出话来。

“你不用瞒我了，你们三老爷还来找过你，我看见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安慰他说。我又添上一句：“我告诉你，我想你会抽空去看他。”

“多谢黎先生，”李老汉感激地说。他又焦急地问：“三老爷病不要紧罢？”

“不要紧，养养就会好的。不过他住在大仙祠总不是办法。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不劝他回家去住？看样子他家里还过得去。”

李老汉痛苦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黎先生，我晓得你心地厚道。我不敢瞒你，不过说起来，话太长，我心头也过不得，改一天向你报告罢。”他把脸掉向门外街中。

“好。我进去找老文来替你看门。你到大仙祠去看看罢。”

“是，是，”他接连说。我跨过内门，走到阶下，他忽然在后

面唤我。我回过头去。他带着为难的口气恳求我："三老爷的事情，请黎先生不要跟老文讲。"

"我知道，你放心罢，"我温和地对他点一下头。

我进了二门，走下天井。门房里四扇门全开着，方桌上燃着一盏清油灯。老文坐在门槛上，寂寞地抽着叶子烟。一支短短的烟管捏在他的左手里，烟头一闪一闪地亮着。他的和善的老脸隐约地在我的眼前现了一下，又跟着烟头的火光消失了。

我向着他走去。他站起来，走下台阶迎着我。

"黎先生回来了，"他带笑招呼我。

我们就站在天井里谈话。我简单地告诉他，李老汉要出去替我办点事情，问他可以不可以替李老汉看看门。

"我们去，我们去，"他爽快地答道。

"老爷、太太都在家吗？"我顺便问他一句。

"老爷跟太太看影戏去了。"

"虎少爷回来没有？"

"他一到外婆家，不到十一二点钟是不肯回来的。从前还是太太打发人去接他，现在老爷又依他的话，不准太太派人去接，"他愤慨地说。在阴暗中我觉得他的眼光老是在我的脸上盘旋，仿佛在说：你想个办法罢。你为什么不讲一句话？

"我讲话也没有用。今早晨，我还劝过他。他始终觉得虎少爷好，"我说，我好像在替自己辩解似的。

"是，是，老爷就是这样的脾气。我们想，只要虎少爷大了能够改好，就好了，"老文接着说。

我不再讲话。老文衔着烟管，慢慢地走出二门去了。

月亮冲出了云层，把天井渐渐地照亮起来，整个公馆非常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过来一阵笛声。月亮又被一片灰白的大云掩盖了。我觉得一团黑影罩上我的身来。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忧虑抓住了。我在天井里走了一会儿。笛声停止了。月亮还在云堆里钻来钻去。赵青云从内院走出来，并不进门房，却一直往二门外去了。

我走进了憩园。我进了我的房间。笛声又起来了。这是从隔壁来的。笛声停后，从围墙的那一面又送过来一阵年轻女人的笑声。

我在房里坐不住，便走出憩园，甚至出了公馆。老文坐在太师椅上，可是我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在斜对面那所公馆的门前围聚了一群人。两个瞎子和一个瞎眼女人坐在板凳上拉着胡琴唱戏。这个戏也是我熟习的：《唐明皇惊梦》。

过了十几分钟的光景，唐明皇的"好梦"被宫人惊醒了。瞎子闭上嘴，胡琴也不再发声。一个老妈子模样的女人从门内出来付了钱。瞎子站起来说过道谢的话，用竹竿点着路，走进了街心。走在前面的是那个唱杨贵妃一角的年轻人，他似乎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亮光，他不用竹竿也可以在淡淡的月光下走路。他领头，一路上拉着胡琴，全是哀诉般的调子。他后面是那个唱安禄山一角的老瞎子，他一只手搭在年轻同伴的肩头，另一只手拿着竹竿，胡琴挟在腋下。我认得他的脸，我叫得出他的名字。十五年前，我常常有机会听他唱戏。现在

他唱配角了。再后便是那个唱唐明皇一角的瞎眼妇人。她的嗓子还是那么好。十五年前我听过她唱《南阳关》和《荐诸葛》。现在她应该是四十光景的中年女人了。她的左手搭在年老同伴的肩上，右手拿着竹竿。我记得十五年前便有人告诉我，她是那个年老同伴的妻子，短胖的身材，扁圆的脸，这些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老得多了。

胡琴的哀诉的调子渐渐远去。三个随时都会倒下似的衰弱的背影终于淡尽了。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小说里的老车夫和瞎眼女人。眼前这对贫穷的夫妇不就是那两个人的影子么？我能够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难道我还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么？

我被这样的思想苦恼着。我不想回到那个清静的园子里去。我站在街心。淡尽了的影子若隐若现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忽然想起去追他们。我迈着快步子走了。

我又走过大仙祠的门前。我听见瞎子在附近唱戏的声音。可是我的脚像被一种力量吸引住了似的，在那两扇褪了色的黑漆大门前停下来。我踌躇了一会儿，正要伸手去推门。门忽然开了。杨家小孩从里面走出来。

他看见我，略有一点惊讶，过后便亲切地招呼我："黎先生。"

"你现在才回去？"我温和地问道。

"是的，"他答道。

"他现在好些了？"我又问。"睡了罢？"

"谢谢你，稍微好一点儿，李老汉儿在那儿。"

“那么，你回去休息罢，今天你也够累了。”

“是，我明早晨九点钟以前在这儿等你。黎先生，你有事情，来晏点儿也不要紧。”

“不，我没有事，我不会来晏的。”

我们就在这门前分别了。我等到他的影子看不见了，又去推大仙祠的门。我轻轻地推，门慢慢地开了一扇，并没有发出声响。

我走下天井，后面有烛光。我听见李老汉的带哭的声音：“三老爷，你不能够这样做啊……”

我没有权利偷听他们谈话，我更没有权利打岔他们。我迟疑了两三分钟，便静静地退了出来。我听见“三老爷”的一句话：“我再没有脸害我的儿子。”

我回到公馆里。二门内还是非常静。门房里油灯上结了一个大灯花。我看不见人影。月亮已经驱散了云片，像一个大电灯泡似地挂在蓝空。

我埋着头在天井里走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唤“黎先生”。我知道这是姚太太。我答应着，一面抬起头来。

她穿一件青灰色薄呢旗袍，外面罩着白色短外套，脸上仍旧露出她那好心的微笑。老李拉着空车上大厅去了。

“姚太太看电影回来了，诵诗呢？”

“他路上碰到一个朋友，找他谈什么事情，等一会儿就回来。黎先生回来多久了？我们本来想约黎先生出去看电影，在花厅里找黎先生，才知道黎先生没有吃饭就出去了。黎先

生在外面吃过饭了？”

“我有点事情，在外面吃过了。今天的片子还好罢？”

“就是《苦海冤魂》，好是好，只是太惨一点，看了叫人心里很难过，”她略略皱一下眉头。她的笑容消失了。

“啊，我看过的，是一个医生跟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结果两个人都冤枉上了绞刑台。两个主角都演得很好。”

她停了一下，带着思索的样子说：“我奇怪人对人为什么要这样残酷。一个好心肠的医生跟一个失业的女戏子，他们并没有害过什么人，为什么旁人一定要把他们送上绞刑台？为什么人对人不能够更好一点，一定要互相仇恨呢？”

她仰起头看天空，脸上带了一种哀愁的表情，这在银白的月光下，使她的脸显得更纯洁了。她第一次对我吐露她的心里的秘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终于显露出来了。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丈夫的不了解。……这应该是多么深的心的寂寞啊……

同情使我痛苦。其实我对她有的不止是同情，我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情。我可以说，纵使我在现社会中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我的生命不值一文钱，但是在这时候只要能够给她带来幸福，我什么也不顾惜。

可是怎么能够让她明白我这种感情呢？我不能对她说我爱她，因为这也许不是爱。我并没有别的心思。我只想给她带来幸福，让她的脸上永远现出灿烂的微笑。

“这是旧道德观念害人。不过电影故事全是虚构的，我知道人间还有很多温暖，”我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她，话虽然简单，

可是我把整个心都放在这里面，我加重语气地说，为了使她相信我的话，为了驱散她的哀愁。

她埋下眼光看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低声说："我明白，不过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舒服了。我不说帮助人，就是给诵诗管家，也没有一点成绩。有时候想起来，也很难过。"

"小虎的事情我也知道，"我终于吐出小虎的名字来。"诵诗太疏忽了，我也劝过他。为这件事情姚太太你也苦够了。不过我想诵诗以后会明白的。你也该宽心一点。"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才低声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赵家要这样恨我？为什么为了我的缘故就把好好的小虎教成这个样子？我愿意好好地做赵家的女儿，做小虎的母亲，他们却不给我一个机会，他们把我当作仇人。外面人不明白的，一定会说我做后娘的不对。"

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我望着她那紧锁的双眉，讲不出话来。她的眼光停留在二门外照壁上，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

"赵家为什么这样恨我？我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原因来，"她接着说；"或许因为我到姚家来诵诗对我很好，据说是比对小虎的妈妈还好，只有这件事情是他们不高兴的。不过这又不是我的错。我从没有在诵诗面前讲过别人一句坏话。我到姚家来也不过二十岁，我在娘家，是随便惯了的。我母亲耽心我不会管家，不会管教孩子。我自己也很害怕。我一天提心吊胆，在这么大一个公馆里头学着做主妇，做妻子，做母亲。我自己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人教我。我愿意把他前头太太的母

亲当作自己的母亲，前头太太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可是我做不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诵诗也不给我帮忙。我现在渐渐胆小起来了。”她说着又埋下头去。

“姚太太，你倒不必灰心。连我这样的人也并不看轻自己，何况你呢？”我诚心地安慰她。

“我？黎先生，你在跟我开玩笑罢？”她抬起头含笑地对我说。“我哪儿比得上你？”

“不是这样。你也许不知道你昨晚上那几句话使我明白多少事情，要是我以后能够活得积极一点，有意义一点，那也是你的力量。你给别人添了温暖。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够活得更积极些？……”

我觉得她的明亮的眼睛一直在望我，眼光非常柔和，而且我仿佛看见了泪珠，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老姚就回来了。

“你们都在这儿！为什么不进花厅去坐？”他高兴地嚷道。

“我们谈着话在等你，”她回答了一句，态度很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已经站了好久了，黎先生恐怕累了罢。”

“是的，你们也该休息了，明天见罢，”我接着说。

我们一块儿走上石阶。他们从大厅走进内院，我便走入憩园。

二十二

早晨七点半钟的光景，我走出姚家大门，李老汉站在门檐下用忧愁的眼光看我，招呼了一声“黎先生”。他好像要对我讲话，可是我匆匆地点一下头，就走到街心去了。

不久我到了大仙祠。门大开着。我想，一定是杨家小孩先来了。我急急走到后面去。

后面静静地没有人。我不但看不见病人的影子，并且连被褥、脸盆、热水瓶等等都没有了。干草零乱地堆在地上。草上有一张纸条，是用一块瓦片压住的，纸条上写着：

> 忘记我，把我当成已死的人罢。你们永远找不到我。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
>
> 寒儿
>
> 父 字。

从这铅笔写的潦草的字迹，我看出一个人的心灵。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堕落”的故事，可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我明白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我拿着纸条在思索。小孩的脚步声逼近了。我等着他。

“怎么，黎先生你一个人？”小孩惊愕地说；“我父亲呢？”

"我刚才来，你看这张字条罢，"我低声说，我把字条递给他，一面掉开头，不敢看他的脸。

"黎先生，黎先生，他到哪儿去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两只手抓住我的左边膀子疯狂地摇撼着，绝望地叫道。

我用力咬嘴唇，压住我的激动，故意做出冷静的态度说："我看只有依他的话把他忘记。我们不会找到他了。"

"不能，不能！我们都过得好，不能够让他一个人去受罪！"他摇着头迸出哭声说。

"可是你到哪儿去找他？这样大的地方！"

他突然扑倒在干草上伤心地哭起来。

我的眼睛是干的。我仰起头，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我想问天：我怎样才能够减轻这个孩子的痛苦？可是天青着脸，不给我一个回答。它也不会告诉我他的父亲的去处。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拿走了被褥和别的东西，决不会去寻死。因此，我让这个孩子哭着，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事实上我也没有可以安慰他的话了。

后来孩子的哭声停止了，他站起来，哀求地对我说："黎先生，你知道得多，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请你老实告诉我。我不害怕，请你对我说真话。"

我想了一会儿，我还是躲避着他的眼光，我温和地回答他："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去问李老汉儿，说不定他知道得多一点。"

"是，是，我记起来了，昨晚上我走的时候，他还在这儿跟

我父亲讲话，"孩子省悟般地说。

"那么我们一路到姚家去罢，你快把眼泪揩干，"我轻轻地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

我们走过前堂的时候，供桌上还放着玻璃瓶，但是那枝干枯了的茶花却不见了。

二十三

李老汉站在大门口，脸朝着我们来的方向，仿佛在等候我们似的。

杨家小孩跑到他面前，焦急地抓住他的左膀问道："李老汉儿，你晓得我父亲到哪儿去了？"

"小少爷，我不晓得，"李老汉忧郁地摇着头答道。

"你一定晓得，他昨晚上跟你讲过好些话。你快告诉我，我要去找他，"小孩固执地恳求道。

"小少爷，我实在不晓得，"李老汉的声音战抖得厉害。他埋下头，似乎不愿意让杨家小孩多看他一眼。

"那么我走过后，他还跟你讲些什么话？李老汉儿，他们都说你有良心，你不会骗我一个小娃儿。我要找到他，黎先生给我帮忙，我们先医好他的病，以后我会去求我母亲，求我哥哥，接他回家。这对他只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他？……"小孩声音不高，不过他很激动，只见他在眨眼睛。后来哭声把他的咽喉堵塞了，他说不出话来。他放开李老汉的膀子，伸手揩了揩眼睛。

我心里很难过，便走近一步，对李老汉低声说："李老汉儿，你就对他说了罢。"

李老汉抬起头来，伸起右手在他的光秃的头顶上摩了几下。我听见他长叹一声，接着他痛苦地答道："三老爷的确没有讲过他要到哪儿去。昨晚上他跟我讲了好些话。他说过他要搬开大仙祠，搬到一个小少爷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劝他不要拚命苦他自己。他说他什么都看穿了，就只舍不得小少爷。不过为了小少爷好，他应当躲起来，不要再跟小少爷见面。他要叫小少爷慢慢忘记他，像太太跟大少爷那样，当作他已经死了。我说：'三老爷，你不能这样做，你会伤小少爷的心。'他说：'长痛不如短痛。不然以后叫他伤心的时候太长了。'我也不大懂三老爷这个道理，我还以为是他老人家病了随便讲话。后来我就回来了。这全是真话。我哪儿敢骗小少爷？"他的眼圈红了，眼泪不住地滚下脸颊来。

小孩跑进门内，坐在太师椅上蒙住脸低声哭起来。李老汉转过身子，睁大眼睛，惊愕、悲痛、怜惜地望着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我走到小孩面前，轻轻地拉他的手，说："我们到里面去坐坐。不要哭了，哭是没有用的。"

他挣扎着，不肯把手拿下来。我又说了一遍。

"你把他给我找回来！你还我爹！"他赌气地哭着说，这次他拿下了手。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早熟的孩子说出完全小孩气的话。

"好，我一定给你找回来，我一定把他还给你，"我也用哄小孩的话去安慰他。

他终于顺从地闭了嘴站起来。

二十四

在我的房间里，我让他坐在沙发上，我用了许多话安慰他。他不再哭了。他只是唯唯应着。有时他那对哭肿了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有时他望着门。

"我到外头去走一会儿，"他忽然站起来说。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并没有跟着他出去。我觉得疲倦，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不想再动一下。

我还以为他会再进房来。可是过了半点多钟，却听不见他的声息。后来我走到门外去看，园子里也没有他的影子。他已经走了，应该走远了。

我没有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探听出他的父亲的故事，我感到寂寞，我觉得心里不痛快。可是我不想上街，我也不想睡觉。为了排遣寂寞，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放在我的小说里面。

这一天我写得很多。我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动了。老车夫在茶馆门口挨了打，带着一身伤痕去找瞎眼女人。他跌倒在她的门前。

…………

"你怎么啦？"女人吃了一惊，她摸索着，关心地问道。

她抓到他那只伸过来的手。

“我绊了跤，”车夫勉强笑着回答。

“啊哟，你绊倒哪儿？痛不痛？”她弯下身去。

“没有伤，我一点儿也不痛！”车夫一面揩脸上的血迹，一面发出笑声。可是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

这两个人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讲话。他们在生活，在受苦。他们又拿他们的痛苦来煎熬我的心。正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老文忽然气咻咻地跑进房来报告：“有预行了。”据他说这是本年里的第二次预行警报。我看表，知道已经是三点十分，我料想敌机不会飞到市空来，但是我也趁这个机会放下了笔。

我问老文，老爷、太太走了没有。他回答说，他们吃过午饭就陪姑太太出去买东西，现在大约在北门外“绳溪花园”吃茶，听竹琴。他又告诉我，虎少爷上午到学校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又问他公馆里的底下人是不是全要出城去躲警报。他说，放了“空袭”以后，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走，只有李老汉留下来看家。李老汉一定不肯跑警报，也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还同老文谈了一些闲话，别了许久的空袭警报声突然响起来了。

“黎先生，你快走罢，”老文慌张地说。

“你先走，我等一下就走，”我答道。我觉得累，不想在太阳下面跑许多路。

老文走了。园子渐渐地落入静寂里。这是一种使人瞌睡

的静寂。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还是听不见人声。

我站起来。我的疲倦消失了。我便走出下花厅，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注意到园里的绿色更浓了。我又沿着石栏杆走出了园子。

我走到大门口，李老汉安静地坐在太师椅上。街上只有寥寥几个穿制服的人。

“黎先生，你不走吗？”李老汉恭敬地问道。

“我想等着放‘紧急’再走，”我说着便在太师椅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放‘紧急’再走，怕跑不到多远；还是早走的好，”他关心地劝我。

“走不远，也不要紧。到城墙边儿，总来得及，”我毫不在乎地说。

他不作声了。但是我继续往下说：“李老汉儿，请你对我讲真话。你们三老爷究竟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医院？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去？”我这次采用了单刀直入的办法。

他怔了一下。我两眼望着他，恳切地说下去：“我愿意帮忙他，我也愿意帮忙你们小少爷。你为什么还不肯对我讲真话？”

“黎先生，我不是不讲真话。我今天上午讲的没有一句假话。”他的声音颤得厉害，他低下头，不看我。我知道他快要哭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为什么要苦苦地糟蹋他自己？”我逼着问道，我不给他一点思索的时间。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黎先生，你不晓得，人走错了一步，一辈子就算完了。他要回头，真是不容易。我们三老爷就是这样。他的事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他花光了家产，自己觉得对不起一家人，后来失悔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用儿子的钱，就藏起来，隐姓埋名，不肯让家里人晓得，却偏偏给小少爷找到了。小少爷常常送钱给他，送饮食给他，折花给他，小少爷在我们公馆里头折的花就是给三老爷送去的，三老爷顶喜欢公馆里头的茶花。”

我知道李老汉讲的不全是真话，他至少隐瞒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放松他，我接着又问一句：

“你们三太太跟大少爷怎么不管他呢？”

李老汉把头埋得更深一点。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我的眼光掉向着街心。几个提包袱、抱小孩的行人从门前走过。我听见一个男人的粗声说：“快走！敌机来啦！”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发紧急警报。

李老汉抬起头来，泪水还顺着他的脸颊滚，白胡须上面粘着的口水在发亮。

“这件事我也不大明白。大少爷自来就跟三老爷不大对。卖公馆那一年，大少爷毕业回省来刚进银行做事。三老爷在外头讨姨太太租小公馆已经有好几年，三太太拿他也没有办法。大少爷回来常常帮三太太跟三老爷吵。不晓得怎样三老爷就搬出来了。大少爷也不去找他，只有小少爷还记得他父

亲，到处去找他，后来才在街上碰到。三老爷住在大仙祠。小少爷就一直跟到大仙祠，三老爷没有办法，才跟小少爷讲了真话……”

我不敢看李老汉脸上的表情。我只是注意地听他讲话。忽然警报解除了。他也闭了嘴。他这段话给我引起了新的疑问。我还想追问他，可是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大门外去了。

“那个做丈夫、做父亲的人一定是被他的妻子和儿子赶出家里来的。”——这一个思想忽然在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

李老汉已经泄露了够多的秘密了，我也应该让他安静一会儿。

二十五

十二天慢慢地过去了。日子的确过得很慢，并且很单调。我上半天写小说，下半天逛街。小说写得不顺利，写得慢，有时我还得撕毁整页稿纸来重写。那两个不幸的人的遭遇抓紧了我的心。我失掉了冷静，我更难驾驭我的笔了。

朋友姚国栋至少隔一天要来看我一次，同我上天下地乱谈一阵。他还是那么高兴，对什么都有把握，对什么都不在乎，虽然他整天不歇口地发牢骚。同时他夸他的太太，夸他的儿子，夸他的家庭幸福。

姚太太一个星期没有到下花厅来了。她在害病。不过听朋友的口气，她好像是在"害喜"，所以朋友并不为太太的病发愁，他反而显得高兴似的。但是，没有她的面影，我的房间也失去了从前的亮光，有时我还感到更大的寂寞。

逛街的时候，我老是摆脱不掉这样一个思想：有一天我会碰到杨家小孩和他的父亲。我不单是希望知道那一家的秘密，我还想尽我的微力给他们帮一点忙。但是省城是这么大，街上行人是这么多，我到哪里去寻找那个父亲的影子？不说父亲，就是那个小孩，我这些日子里也没有见过一面。我知道从李老汉的口中我可以打听到小孩的地址。但是我每次经过

大门，看见他那衰老、愁烦的面颜，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再拿杨家的事情去折磨他。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他用失神的眼光望我，我忽然觉得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好像在问："你找到他吗？"我摇摇头用失望的眼光回答："没有，连影子也没有。"第二天他又用同样的眼光询问，我也用同样的眼光回答。第三天又是一样的情形。这样继续了好些天。有一次我差一点生气了，我想对他说：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找到他，为什么老是来问我？

但是星期六来了。离我看见小孩父亲挨打的日子刚好三个礼拜。

这天我起床后就觉得头昏，仿佛有一块重东西压在我的头上，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又觉得寂寞。我只希望老姚来找我谈天，我可以安静地靠在沙发上听他吹牛。可是这一天我偏偏看不见老姚的影子。老文送午饭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老爷出门赴什么人的宴会去了。我又问起太太的病，他说，太太的病好多了，听周大娘讲太太有了小宝宝。他又说，万家外老太太同舅太太一早就来了。我没有问到虎少爷，可是老文也告诉我：虎少爷昨天去赵家玩，晚上没有回来，太太叫老李拉车去接，赵家外老太太却把老李骂了一顿，说是她要留虎少爷住半个月，省得在家里受后娘的气。老李回来，没有敢把这些话报告太太，怕惹太太怄气。不用说，老文接着又发了一顿牢骚。关于赵家同虎少爷的事，他的见解跟我的相差不远。我也说了几句责备赵家的话，后来他收了碗碟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我醒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园子里轻声咳嗽。我站起来，走到门前。

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怎么，杨家小孩会站在山茶树下！我揉了一下眼睛。他明明站在那里，穿一身灰色学生服，光着头，在看树身上的什么东西。

我走下石阶。小孩似乎没有看见我。我一直走到他的背后。他连动也不动一下。

“你在看什么?”我温和地问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来。他的脸瘦多了，也显得更长，鼻子更向左偏，牙齿更露。

“我看爹的字，”他轻轻答道。他又把眼光移到树身上去。在那里我看见三个拇指大的字：杨梦痴。刻痕很深，笔划却已歪斜了。我再细看，下面还有六个刻痕较浅的小字——庚戌四月初七。那一定是刻树的日期，离现在也有三十二年了。那时他父亲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你得到他的消息吗?”我低声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我也没有，”我又说。我的眼光停留在刻字上。我心里想着：这是一条长远的路啊。我觉得难过起来了。

停了片刻，他忽然转过脸来，哀求地对我说：“黎先生，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找到他吗？他究竟躲在哪儿?”

我默默地摇摇头。

“黎先生，他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看见他?”他又问道。他拚命眨他的眼睛，眼圈已经变红了。

我望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瘦脸，同情使我的心发痛，我痛苦地劝他：

“你就忘了他罢。你还老是记住他有什么用？你看你自己现在瘦得多了。你不会找到他的。”

“我不能，我不能！我忘不了他。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带着哭声说。

“你在哪儿去找他呢？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你又是个小孩子。”

“那么你给我帮忙，我们两个人一定找得到他。”

我怜悯地摇摇头：“不说两个人，就是二十个人也找不到他。你还是听他的话，好好地读书罢。”

“黎先生，我想到他一个人在受罪，我哪儿还有心肠读书？我找不到他，不能够救他，就是读好书又有什么用？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我抓住他一只膀子，带点责备的口气说：“你不能说这种话。你年纪小，家里有母亲。况且人活着，并不是——”

“妈有哥哥孝顺她，爹只有一个人，他们都不管他在外头死活……”他噘着嘴打断了我的话，眼泪流到嘴边了，他也不揩一下。

“你们都是一家人，为什么你妈跟你哥哥对你爹不好呢？你应该好好劝他们，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

他摇摇头：“我讲话也没有用。哥哥恨死了爹，妈也不喜欢爹。哥哥把爹赶出来了，就不准人再提起爹……”

我终于知道那个秘密了。这真相也是我早已料到的。可

是现在从儿子的口中，听到那个父亲的不幸的遭遇，我仿佛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我无法说明我这时的心情。我忽然想躲开他，不再看他那憔悴的面容；我忽然想拉着他的手疯狂地跑出去，到处寻找他的父亲；我忽然又想让他坐在我的房里，详细地叙说他的家庭的故事。

我自己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么做。我同那个小孩在山茶树下站了这许久，我不觉得疲倦，也忘记了头昏。我似乎在等待什么。

果然一个声音，一个甜甜的女音在后面响起来了。它不让我有犹豫的时间。

"小弟弟，你不要难过，你把你爹的事情跟我们说了罢。黎先生同我都愿意给你帮忙。"

我们一齐回过头去。姚太太站在假山前面，病后的面颜显得憔悴，她正用柔和的眼光看小孩。

"你们的话我也听见几句，我不是故意来偷听的。"她凄凉地一笑。"我不晓得小弟弟会有这样的痛苦。"她走过去，拿起小孩的一只手，母亲似地用爱怜的声音说："我们到黎先生房里去坐坐。"

小孩含糊地答应一声，就顺从地跟着姚太太走了。他们两人走在前头，像姐弟似的。我跟在后面，一面走，一面望着她那穿浅蓝洋布旗袍的苗条的背影。

二十六

"小时候爹顶爱我。我记得从我三岁起，就是爹带我睡觉。妈喜欢哥哥。哥哥自小就不听爹的话。爹一天不在家，到晚上才回来，回来就要跟妈吵嘴，有时候吵得很凶，妈哭了，第二天早晨爹跟妈讲几句好话，妈又高兴了。过两天他们又吵起嘴来。我顶怕听他们吵嘴，哥哥有时还帮妈讲几句话。我躲在床上，就是在大热天，也用铺盖蒙着头，不敢做声，也睡不着觉。后来爹上床来，拉开我的铺盖，看见我还睁开眼睛，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吵嘴吵得我不能睡觉，我说不出话，我只点点头。他望着我，他说他以后不再跟妈吵嘴了，我看见他流眼泪水，我也哭了，我不敢大声哭，只是轻轻地哭。他拿好多话劝我，我后来就睡着了。"

小孩这样地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坐在靠床那张沙发上，姚太太坐另一张沙发，我坐在床沿上。我们的眼睛都望着他，他的眼睛却望着玻璃窗。他自然不是在看窗外的景物，他的视线给淡青色窗帷遮住了。他一双红红的眼睛好像罩上了一层薄雾，泪水满了，却没有滴下来。我想，那么他是在回顾他的童年罢。

"他们以后还是常常吵嘴，爹还是整天不在家，妈有时

候也打打麻将。输了钱更容易跟爹吵嘴。有一回我已经睡了，妈拉我起来，要我同哥哥两个给爹磕头。妈说：'你们两个还不快给你们爹磕头，求他给你们留下几个钱活命，免得将来做叫化子丢他的脸！快跪呀，快跪呀！'哥哥先跪下去，我也只得跟着他跪下。我看见爹红着脸，拚命抓头发，结结巴巴地跟妈说：'你这何必呢，你这何必呢！'这一天爹没有办法了，他急得满屋子打转。妈只是催我们：'快磕头呀，快磕头呀！'哥哥真的磕头，我吓得哭起来。爹接连顿脚抓头发，结结巴巴，说了好几个'你'字。妈指着他说：'你今天怎么不讲话了！你也会不好意思吗？他们都是你的儿子，你拿出你做父亲的架子，教训他们呀！你跟他们说，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不是他们爷爷留给他们的钱！'爹说：'你看寒儿都给你吓哭了。你还紧吵什么！给别人听见大家都丢脸！'妈更生气了。她说话声音更大，她说：'往天你吵得，怎么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说不得！你怕哪个不晓得你在外头嫖啊，赌啊！哪个不笑我在家里守活寡……'爹连忙蒙住耳朵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给你下跪好不好？'妈抢着说：'我给你跪，我给你跪！'就扑通一声跪下来。爹站住没有动。妈哭起来，拉着爹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说：'你可怜我们母子三个罢。你这样还不如爽爽快快杀死我们好，免得我们受活罪。'爹一句话也不说，就甩开妈的手转身跑出去了。妈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回转来。妈哭，哥哥哭，我也哭。妈望着我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不然我们大家都要饿死了。'我讲不出一句话。我听见哥哥说：'妈，你放心，我长大了，一定要给你报仇！'这天晚上妈就让我一个人睡，妈

还以为爹会回来，妈没有睡好，我也没有睡好。我睁起眼睛紧望清油灯，等着爹回来。鸡叫了好几回，我还看不见爹的影子。

"爹一连两晚上都没有回来，妈着急了，打发人出去找爹，又叫哥哥去找，到处都找不到。妈牌也不打了，整天坐在家里哭，埋怨她自己不该跟爹吵嘴。第三天早晨爹回来了，妈又有说有笑的，跟爹倒茶弄点心。爹也是有说有笑的。后来我看见妈交了一对金圈子给爹，爹很高兴。下午爹陪着妈，带着我跟哥哥出去看戏。

"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做梦也做过几回。爹跟妈有二三十天没有吵嘴。我们也过得很高兴。爹每晚上回来得很早，并且天天给我带点心回来。有一晚上我在床上偷偷跟爹说：'爹，你以后不要再跟妈吵嘴罢，你看你们不吵嘴，大家都过好日子。'他对我赌咒说，他以后决不再吵嘴了。

"可是过了不多久，他又跟妈大吵一回，就像是为着金圈子的事情。吵的时候，妈总要哭一场，可是过两天妈跟爹又好起来了。差不多每过一两个月妈就要交给爹一样值钱的东西。爹拿到东西就要带着妈跟我们出去看戏上馆子。再过一两个月他们又为着那样东西吵起嘴来。年年都是这样。

"他们都说我懂事早。的确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明白。我晓得钱比什么都有用，我晓得人跟人不能够讲真话，我晓得各人都只顾自己。有时候他们吵得凶了，惊动了旁人，大家来看笑话，却没有人同情我们。

"后来他们吵得更凶了。一回比一回凶。吵过后妈总是哭，爹总是在外头睡觉。连我跟哥哥都看得出来他们越吵感

情越坏。我们始终不明白，妈为什么吵过哭过以后，又高兴把东西拿给爹，让他带出去。不但东西，还有钱。妈常常对我们说，钱快给爹花光了。可是妈还是拿钱给爹用。妈还跟我们讲过，她拿给爹的是外婆留给她的钱，爹现在拿去做生意。爷爷留下的钱早就给爹花光了。

"爹拿到东西，拿到钱，在家里才有说有笑，也多跟妈讲几句话。拿不到钱他一天板起脸，什么话也不说。其实他白天就从来不在家，十天里头大约只有一两天看得见他的影子。

"有一天爹带我出去买东西，买好东西，他不送我回家，却把我带到一个独院儿里头去。那儿有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记得她有张瓜子脸，红粉擦得很多。她喊爹做'三老爷'，喊我做'小少爷'；爹喊她做'老五'，爹叫我喊她'阿姨'。我们在那儿坐了好久。她跟爹很亲热，他们谈了好多话，他们声音不大，我没有留心去听，并且我不大懂阿姨的话。她给我几本图画书看，又拿了好些糖、好些点心给我。我一个人坐在矮凳子上看书。我们吃过晚饭才回家。一路上爹还嘱咐我回家不要在妈面前讲'阿姨'的事。爹又问我，觉得'阿姨'怎样。我说'阿姨'好看。爹很高兴。我们回到家里，妈看见爹高兴，随便问了两三句话，就不管我了。倒是哥哥不相信我的话，他把我拉到花园里头逼着问我，究竟爹带我到过什么地方。我不肯说真话。他气起来骂了我几句也就算了。这天爹对我特别好，上了床，他还给我讲故事。他夸我是个好孩子，还说要好好教我读书。这时候我已经进小学了。

"第二年妈就晓得了'阿姨'的事情。妈有天早晨收拾爹

的衣服，在口袋里头找到一张'阿姨'的照像同一封旁人写给爹的信。爹刚刚起来，妈就问爹，爹答得不对，妈才晓得从前交给爹的东西，并不是拿去押款做生意，全是给'阿姨'用了。两个人大吵起来。这一回吵得真凶，爹把方桌上摆好的点心跟碗筷全丢在地下。妈披头散发大哭大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种凶相。后来妈闹着要寻死，哥哥才去请了大伯伯、二伯伯来；大伯娘、二伯娘也来了。大伯娘、二伯娘劝住妈；大伯伯、二伯伯把爹骂了一顿，事情才没有闹大。爹还向妈陪过礼，答应以后取消小公馆。他这一天没有出门，到晚上妈的气才消了。

"这天晚上还是我跟爹一起睡。外面在下大雨。我睡不着，爹也睡不着。屋里电灯很亮，我们家已经装了电灯了，我看见爹眼里有眼泪水，我对他说：'爹，你不要再跟妈吵嘴罢。我害怕。你们总是吵来吵去，叫我跟哥哥怎么办？'我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又说：'你从前赌过咒不再跟妈吵嘴。你是大人，你不应该骗我。'他拉住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父亲。我以后不再跟你妈吵嘴了。'我说：'我不信你的话！过两天你又会吵的，会吵得连我们都没有脸见人。'爹只是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他们以后再也不吵嘴了。可是过不到一个月，我又看见爹跟妈的脸色不对了。不过以后他们也就没有大吵过。碰到妈一开口，爹就跑出去了，有时几天不回来。他一回家，妈逼着问他，他随便说两三句话就走进书房去了。妈拿他也没有办法。

“大伯伯一死，公馆里头人人吵着要彻底分家，要卖公馆。妈也赞成。就是爹一个人反对，他说这是照爷爷亲笔画的图样修成的，并且爷爷在遗嘱上也说过不准卖公馆，要拿它来做祠堂。旁人都笑爹。他的话没有人肯听。二伯伯同四爸都说，爹不配说这种话。

“他们那天开会商量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在上海打仗了。在堂屋里头，二伯伯同四爸跟爹大吵。二伯伯拍桌子大骂，四爸也指着爹大骂。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话。我躲在门外看他们。爹说：‘你们要卖就卖罢。我绝不签字。我对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我是个不肖子弟。我丢过爹的脸。我卖光了爹留给我的田。可是我不愿意卖这个公馆。’爹一定不肯签字。二伯伯同四爸两个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们这一房没有人签字，公馆就卖不成。妈出来劝爹，爹还是不肯答应。我看见四爸在妈耳朵边讲了几句话，妈出去把哥哥找来了。哥哥毕业回省来不到两个月，还没有考进邮政局做事。他走进来也不跟爹讲话，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把字签了。爹瞪了他一眼。他就大声说：‘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三房的事情我可以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二伯伯连忙把纸收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还有四爸，还有大伯伯的大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一个走开了。爹气得只是翻白眼，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堂屋里头只剩下他一个人，我走到他面前，拉住他一只手。我说：‘爹，我是你的儿子。’他埋下头看了我好一阵。他说：‘我晓得。唉，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们到花园里头去看

看，他们就要卖掉公馆了。'

"爹牵着我的手走进花园，那个时候花园的样子跟现在完全一样。我还记得快到八月节了，桂花开得很好，一进门就闻到桂花香。我跟着爹在坝子里走了一阵。爹忽然对我说：'寒儿，你多看两眼，再过些日子，花园就不是我们的了。'我听见他这样说，我心里也很难过。我问过他：'爹，我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二伯伯他们一定要卖掉公馆？为什么他们大家都反对你，不听你的话？'爹埋下头，看了我一阵，才说：'都是为钱啊，都是为钱啊！'我又问爹：'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够再进来了？'爹回答说：'自然。所以我叫你多看两眼。'我又问他：'公馆卖不掉，我们就可以不搬家吗？'爹说：'你真是小孩子，哪儿有卖不掉的公馆？'他拉我到茶花那儿去。这一阵不是开花的时候，爹要我去看他刻在树上的字。就是我刚才看的那几个字。我们从前有两棵茶花，后来公馆卖给你们姚家，"(他的眼光已经掉回来停留在姚太太的脸上了)"一棵白的死了。现在只有一棵红茶花了。爹指着那几个字对我说：'它的年纪比你还大。'我问他：'比哥哥呢？'他说：'比你哥哥还大。'他叹了一口气，又说：'看今天那种神气，你哥哥比我派头还大。现在我管不住他，他倒要来管我了。'我也说：'哥哥今天对你不好，连我也气他。'他转过身拍拍我的头，看了我一阵，过后他摇摇头说：'我倒不气他。他有理，我实在不配做他父亲。'我大声说：'爹，他是你的儿子。他不该跟旁人一起欺负你！'爹说：'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我连忙说：'那么你不要再到"阿姨"那儿去。你天天在家陪着妈，妈就会高兴的。

我就去跟妈说！'他连忙蒙住我的嘴，说：'你不要去跟妈讲阿姨的事。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这几个字，我当初刻的时候，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我想不到今天我们两个会站在这儿看它。过两天这个公馆、这个花园就要换主人，连我刻的几个字也保不住。寒儿，记住爹的话，你不要学我，你不要学你这个不争气的父亲。'我说：'爹，我不恨你。'他不讲话，只是望着我。他流下眼泪水来。他叹一口气，把一只手按着我的肩头，他说：'只要你将来长大了不恨我不骂我，我死了也高兴。'他说得我哭起来。他等我哭够了，便拿他的手帕给我揩干眼睛。他说：'不要哭了。你闻闻看，桂花多香，就要过中秋了。我刚接亲的时候，跟你妈常常在花园里头看月亮。那个时候还没有花台，只有一个池塘，后来你哥哥出世的时候，你爷爷说家里小孩多了，怕跌到池塘里去，才把池塘填了。那个时候我跟你妈感情很好，哪儿晓得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他又把我引到金鱼缸那儿去。缸子里水很脏，有浮萍，有虾子，有虫。爹拿手按住缸子，我也扶着缸子。爹说：'我小时候爱在这个缸子里喂金鱼，每天放了学，就跑到这儿来，不到他们来喊我吃饭，我就不肯走。那个时候缸里水真干净，连缸底的泥沙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弄到了两尾"朝天眼"，你爷爷也喜欢它们。他常常到这儿来。有好儿回他跟我一起站在缸子前头，就跟我们今天一样。那几回是我跟我父亲，今天是我跟我儿子。现在想起来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我们又走回到桂花树底下。爹仰起头看桂花。雀子在树上打架，掉了好些花下来。爹躬着腰捡花。我也蹲下去捡，爹捡了一手心的花。过

后爹去打开上花厅的门，我们在里头坐了一阵，又在下花厅坐了一阵。爹说：'过几天这都是别人的了。'我问爹，这个花园是不是爷爷修的。爹说是。他又说：'我想起来，你爷爷临死前不多久，有一天我在花园里头碰到他，他跟我讲了好些话，他忽然说："我看我也活不到好久了。我死了，不晓得这个花园、这些东西，还保得住多久？我就不放心你们。我到现在才明白，不留德行，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这许多年我真糊涂！"你爷爷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天才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已经迟了。'……"

姚太太用手帕蒙住眼睛轻轻地哭起来。我在这个小孩叙述的时候常常掉过眼光去看她，好久我就注意到她的眼里泛起了晶莹的泪光。等到她哭出声来，小孩便住了嘴，惊惶地看她，亲切地唤了一声："姚太太。"我同情地望着她，心里很激动，却讲不出一句话来。下花厅里静了几分钟。小孩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在脸上滚着。姚太太的哭声已经停止了。这两个人的遭遇混在一块儿来打击我的心。人间会有这么多的苦恼！超过我的笔下所能写出来的千百倍！我能够做些什么？我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望着他们。我恨起自己来。这沉默使我痛苦。我要大声讲话。

小孩忽然站起来。他用手擦去脸上的泪痕。难道他要走开吗？难道他不肯吐露他的故事的最重要的部分吗？他刚刚走动一步，姚太太抬起脸说话了："小弟弟，你不要走，请你讲下去。"

"我讲，我讲！"小孩踌躇一下，突然爆发似地说，他又在沙

发上坐下了。

“刚才我心头真有点难过，”她不好意思地说，一面用手帕轻轻地揩她的眼睛。“你爷爷那两句话真有意思。可是我奇怪你这小小年纪，怎么会记得清楚那许多事情？过了好些年你也应该忘记了。”

“爹的事情只要我晓得，我就不会忘记。我夜晚睡不着觉，就会想起那些事，我还会背熟那些话。”

“你晚上常常睡不着吗？”我问他。

“我想起爹的事就会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越想我越觉得我们对不住爹……”

“你怎么说你对不住你父亲？明明是他不对。谁也看得出来是他毁了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我忍不住插嘴说。

“不过我们后来对他也太凶了，”小孩答道；“他已经后悔了，我们也应该宽待他。”

“是，小弟弟说得对。宽恕第一。何况是对待自家人，”姚太太感动地附和道。

“不过宽恕也应当有限度，而且对待某一些顽固的人，宽恕就等于纵容了，”我接口说，我暗指着赵家的事情。

她看了我一眼，也不说什么，却掉转头对小孩说：“小弟弟，你往下讲罢。”她又加上一句：“你讲下去心头不太难过罢，你不要勉强啊。”

“不，不，”小孩用力摇着头说；“我说完了，心头倒痛快些。爹的事我从没有对旁人讲过。家里头人总当我是个小孩子。他们难得跟我讲句正经话。其实论年纪我也不小了。我不再

是光吃饭不懂事的小孩子了。”

“那么请你讲下去，让我们多知道一点你爹的事情。等我先给你倒杯茶来，”她说着就站起来。

“我自己来倒，”小孩连忙说，他也站起来。可是姚太太已经把茶倒好了。小孩感激地接过茶杯，捧着喝了几大口。

我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走到写字台前。我把藤椅挪到离小孩四五步远的光景，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用同情的眼光看这个早熟的孩子。在他这个年纪，对痛苦和不幸不应该有这样好的记性，也不该有这样好的悟性。就是叫我来讲，我也不能把他的父亲半生的故事说得更清楚。不幸的遭遇已经在这个孩子的精神上留下那么大的影响了。

二十七

小孩继续讲他的父亲的故事：

"公馆一个多月还没有卖掉。'下面'仗打得厉害，日本飞机到处轰炸，我们这里虽然安全，但是谣言很多。二伯伯他们着急起来，惰卖不掉房子。二伯伯第一个搬出去，表示决心要卖掉公馆。接着四爸也搬走了，大哥也搬走了。妈跟哥哥也另外租了房子要搬出去，爹不答应。爹跟他们吵了一回嘴。后来我们还是搬走了。爹说要留下来守公馆，他一个人没有搬。

"搬出来以后，我每天下了课，就到老公馆去看爹。我去过十多回，只看见爹一面。我想爹一定常常到'阿姨'那儿去。妈问起来，我总说我每回都碰到爹，妈也不起疑心。

"后来公馆卖给你们姚家，各房都分到钱，大家高高兴兴。我们这一房分到的钱，哥哥收起来了。爹气得不得了。他不肯搬回家，他说要搬到东门外庙里去住个把月。妈劝他回家住，他也不肯答应，后来哥哥跟他吵起来，他更不肯回家。其实我们新搬的家里头一直给他留得有一间书房。我们新家是一个独院儿，房子干干净净，跟老公馆一样整齐、舒服。我也劝过爹回家来住，说是家里总比外头好。可是爹一定不肯回

家。哥哥说他并不是住在庙里头养身体，他一定是跟姨太太一起住在小公馆里头享福。哥哥还说那个姨太太原来是一个下江妓女。

"过了两个月，爹还没有搬回来。他到家里来过四五回，都是坐了半点多钟就走了。最后一回，碰到哥哥，哥哥跟他吵起来。哥哥问他究竟什么时候搬回家，他说不出。哥哥骂了他一顿，他也不多讲话，就溜走了。等我跑出去追他，已经追不到了。以后他就不回来了。过了一个多月，元宵节那天，我听见哥哥说，爹就要搬回来了。妈问他怎么晓得。他才对我们说，爹那个妓女逃走了，爹的值钱东西给她偷得干干净净，爹在外头没有钱，一定会回家来。我听见哥哥这样讲，心里不高兴。我觉得哥哥不应该对爹不尊敬。他究竟是我们的爹，他也没有亏待我们。

"我不相信哥哥的话。可是听他说起来，他明明知道爹住在哪儿，并且他也在街上见过那个下江'阿姨'。我在别处打听不到爹的消息，我只好拉着哥哥问，哥哥不肯说。我问多了，他就发脾气。不过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哥哥时常讲起爹，我也听到一点儿。我晓得爹在到处找'阿姨'，都没有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爹住的地方，我没有法子去找他。

"后来有一天爹回来了。我记得那天是阴历二月底。他就像害过一场大病一样，背驼得多，脸黄得多，眼睛落进去，一嘴短胡子，走路没有气力，说话唉声叹气。他回家的时候，我刚刚从学堂里回来，哥哥还没有回家。他站在堂屋里头，不敢进妈的房间。我去喊妈，妈走到房门口，就站在那儿，说了一句：

'我晓得你要回来的。'爹埋着头，身子一摇一摆，就像要跌下去一样。妈动也不动一下。我跑过去，拉住爹的手，把他拖到椅子上坐下。我问他：'爹，你饿不饿？'他摇头说：'不饿。'我看见妈转身走了。等一下罗嫂就端了洗脸水来，后来又倒茶拿点心。爹不讲话，埋着头把茶跟点心都吃光了。我才看见他脸上有了一点血色。我心里很难过，我刚喊一声'爹'，眼泪水就出来了。我说：'爹，你就在家里住下罢，你不要再出去找"阿姨"了。你看，你瘦成了这样！'他拉住我的手，说不出一句话，只顾流眼泪水。

"后来妈出来了。她喊我问爹累不累，要不要到屋里去躺一会儿。爹起初不肯，后来我看见爹实在很累，就把他拉进屋去了。过一会儿我再到妈屋里去，我看见爹睡在床上，妈坐在床面前藤椅上。他们好像讲过话了，妈垂着头在流眼泪水。我连忙溜出去。我想这一回他们大概和好了。

"我们等着哥哥回来吃饭。这天他回来晏一点。我高高兴兴把爹回家的消息告诉他。哪晓得他听了就板起脸说：'我早就说他会回来的。他不回来在哪儿吃饭？'我有点生气，就回答一句：'这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不回来？'哥哥也不再讲话了。吃饭的时候，哥哥看见爹，做出要理不理的样子。爹想跟哥哥讲话，哥哥总是板起脸不做声。妈倒还跟爹讲过几句话。哥哥吃完一碗饭，喊罗嫂添饭，刚巧罗嫂不在，他忽然发起脾气来，拍着桌子骂了两句，就黑起一张脸走开了。

"我们都给他吓了一跳。妈说：'不晓得他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怎么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爹埋着头在吃饭，听见妈的

话，抬起头来说：‘恐怕是因为我回来的缘故罢。’妈就埋下头不再讲话了。爹吃了一碗饭，放下碗。妈问他：‘你怎么只吃一碗饭？不再添一点儿？’爹小声说：‘我饱了。’他站起来。妈也不吃了，我也不吃了。这天晚上爹很少讲话。他睡得早。他还是跟我睡在那张大床上。我睡得不好，做怪梦，半夜醒转来，听见爹在哭，我轻轻喊他，才晓得他是在梦里哭醒的。我问他做了什么梦，他不肯说。

“爹就在我们新家住下来。头四天他整天不出街，也不多说话，看见哥哥他总是埋着头不做声。哥哥也不跟他讲话。到第五天他吃过早饭就出去了，到吃晚饭时候才回来。妈问他整天到哪儿去了。他只说是去看朋友。第六天又是这样。第七天他回来，我们正在吃晚饭，妈问他在外头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晏才回家来。他还是简简单单说在外头看朋友。哥哥这天又发脾气，骂起来：‘总是扯谎！什么看朋友！哪个不晓得你是去找你那个老五！从前请你回家，你总是推三推四，又说是到城外庙里头养病！你全是扯谎！全是为了你那个老五！我以为你真的不要家了，你真的不要看见我们了。哪晓得天有眼睛，你那个宝贝丢了你跟人家跑了。你的东西都给她他光了。现在剩下你一个光人跑回家来。这是你不要的家！这是几个你素来讨厌的人！可是人家丢了你，现在还是我们来收留你，让你舒舒服服住在家里。你还不肯安分，还要到外头去跑。我问你，你存的什么心！是不是还想在妈这儿骗点儿钱，另外去讨个小老婆，租个小公馆？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决不容你再欺负妈！……’

"爹坐在墙边一把椅子上，双手蒙住脸。妈忍不住了，一边流眼泪水，一边插嘴说：'和，'（我哥哥小名叫和）'你不要再说了。让爹先吃点饭罢。'哥哥却回答说：'妈，你让我说完。这些年来我有好多话闷在心头，不说完就不痛快。你也太老实了。你就不怕他再像从前那样欺负你！'妈哭着说：'和，他是你的爹啊！'我忍不住跑到爹面前拉他的手，接连喊了几声'爹'。他把手放下来。脸色很难看。

"我听见哥哥说：'爹？做爹的应该有爹的样子。他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他儿子看待过？'爹站起来，甩开我的手，慢慢儿走到门口去。妈大声在后面喊：'梦痴，你到哪儿去？你不吃饭？'爹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还是走开好，我住在这儿对你们并没有一点儿好处。'妈又问：'那么你到哪儿去？'爹说：'我也不晓得。不过省城宽得很，我总可以找个地方住。'妈哭着跑到他身边去，求他：'你就不要走罢。从前的事都不提了。'哥哥仍旧坐在饭桌上，他打岔说：'妈，你不要多说话。难道你还不晓得他的脾气！他要走，就让他走罢！'妈哭着说：'不能，他光身一个人，你喊他走到哪儿去？'妈又转过来对爹说：'梦痴，这个家也是你的家，你好好地来支持它罢。在外头哪儿有在家里好！'哥哥气冲冲地回到他屋里去了。我实在忍不住，我跑过去拉住爹的手，我一边哭，一边说：'爹，你要走，你带我走罢。'

"爹就这样住下来。他每天总要出一趟街。不过总是在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有时也向妈、向我要一点儿零用钱。我的钱还是向哥哥要的。他叫我不要跟哥哥讲。哥哥以为爹每天在家看书，对他也客气一点，不再跟他吵嘴了。他跟我住一间

屋。他常常关在屋里不是看书就是睡觉。等我放学回来，他也陪我温习功课。妈对他也还好。这一个月爹脸色稍微好看一点，精神也好了些。有一天妈对我们说，爹大概会从此改好了。

"有个星期天，我跟哥哥都在家，吃过午饭，妈要我们陪爹去看影戏，哥哥答应了。我们刚走出门，就看见有人拿封信来问杨三老爷是不是住在这儿。爹接过信来看。我听见他跟送信人说：'晓得了，'他就把信揣起来。我们进了影戏院，我专心看影戏，影戏快完的时候，我发觉爹不在了，我还以为他去小便，也不注意。等到影戏完了，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他，都找不到。我说：'爹说不定先回家去了。'哥哥冷笑一声，说：'你这个傻子！他把我们家就当成监牢，出来了，哪儿会这么着急跑回去！'果然我们到了家，家里并没有爹的影子。妈问起爹到哪儿去了。哥哥就把爹收信的事说了。吃晚饭的时候，妈还给爹留了菜。爹这天晚上就没有回来。妈跟哥哥都不高兴。第二天上午他回来了。就只有妈一个人在家。他不等我放学回来，又走了。妈也没有告诉我他跟妈讲了些什么话。我后来才晓得他向妈要了一点钱。这天晚上他又没有回家。第二天他也没有回来。第三天他也没有回来。妈很着急，要哥哥去打听，哥哥不高兴，总说不要紧。到第五天爹来了一封信，说是有事情到了嘉定，就生起病来，想回家身上又没有钱，要妈给他汇路费去。妈得到信，马上就汇了一百块钱去。那天刚巧先生请假，我下午在家，妈喊我到邮政局去汇钱，我还在妈信上给爹写了几个字，要爹早些回来。晚上哥哥回家听

说妈给爹汇了钱去，他不高兴，把妈抱怨了一顿，说了爹许多坏话，后来妈也跟着哥哥讲爹不对。

“钱汇去了，爹一直没有回信。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一点消息。妈跟哥哥提起他就生气。哥哥的气更大。妈有时还耽心爹的病没有好，还说要写信给他。有一天妈要哥哥写信。哥哥不肯写，反而把妈抱怨一顿。妈以后也就不再提写信的话。我们一连三个多月没有得到爹的消息，后来我们都不讲他了。有一天正下大雨，我放暑假在家温习功课，爹忽然回来了。他一身都泡胀了，还是坐车子回来的，他连车钱也开不出来。人比从前更瘦，一件绸衫又脏又烂，身上有一股怪气味。他站在街沿上，靠着柱头，不敢进堂屋来。

“妈喊人给了车钱，站在堂屋门口，板起脸对爹说：‘你居然也肯回家来！我还以为你就死在外州县了。’爹埋着头，不敢看妈。妈又说：‘也好，让你回来看看，我们没有你，也过得很好，也没有给你们杨家祖先丢过脸。’

“爹把头埋得更低，他头发上的水只是往下滴，雨也飘到脸上来，他都不管。我看不过才去跟妈说，爹一身都是水，是不是让他进屋来洗个脸换一件衣服。妈听见我这样说，她脸色才变过来。她连忙喊人给爹打水洗澡，又找出衣服给爹换，又招呼爹进堂屋去。爹什么都不说，就跟哑巴一样。他洗了澡，换过衣服，又吃过点心。他听妈的话在我床上睡了半天。

“哥哥回来，听说爹回家，马上摆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听见妈在嘱咐他，要他看见爹的时候，对爹客气点。哥哥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吃晚饭时候，他看见爹，皱起眉头喊了一声，

马上就把脸掉开了。爹好像有话要跟他讲，也没有办法讲出来。爹吃了一碗饭，罗嫂又给爹添了半碗来，爹伸手去接碗，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没有接好碗，连碗带饭一起掉在地上，打烂了。爹怕得很，连忙弯起腰去捡。妈在旁边说：'不要捡它了。让罗嫂再给你添碗饭罢。'爹战战兢兢地说：'不必，不必，这也是一样。'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缘故，哥哥忽然拍桌子在一边大骂起来。他骂到：'你不想吃就给我走开，我没有多少东西给你糟蹋，'爹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哥哥指着妈说：'妈，这都是你姑息的结果。我们家又不是旅馆，哪儿能由他高兴来就来，高兴去就去！'妈说：'横竖他已经回来了，让他养息几天罢！'哥哥气得更厉害，只是摇着头说：'不行，不行，他把我们害到这样，我不能让他过一天舒服日子！我一定要找个事情给他做。'第三天早晨他就喊爹跟他一起出去，爹一句话也不讲，就埋着头跟他走了。妈还在后面说，爹跟哥哥一路走，看起来，爹就像是哥哥的底下人。我听到这句话，真想哭一场。

"下午哥哥先回来，后来爹也回来了。爹看见哥哥就埋下头。吃饭的时候哥哥问他话，他只是回答：'嗯，嗯。'他放下碗就躲到屋里去了。妈问哥哥爹做的什么事。哥哥总说是办事员。我回屋去问爹，爹不肯说。

"过了四五天，下午四点钟光景，爹忽然气咻咻地跑回家来。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妈出去买东西去了。我问爹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爹一边喘气，一边说：'我不干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吃苦我并不怕，我就丢不下这个脸。'他满头是汗，只见汗珠往下滴，

衣服也打湿了。我喊罗嫂给他打水洗脸。他刚刚洗好脸，坐在堂屋里吃茶。哥哥就回来了。我看见哥哥脸色不好看，晓得他要发脾气，我便拿别的话打岔他。他不理我，却跑到爹面前去。爹看见他就站起来，好像想躲开他的样子。他却拦住爹，板起脸问：'我给你介绍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了几天就不干了？'爹埋着头小声回答：'我干不下来。有别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干。'哥哥冷笑说：'干不下来？那么你要干什么事情？是不是要当银行经理？你有本事你自己找事去，我不能让你在家吃闲饭。'爹说：'我并不是想吃闲饭，不过叫我去当听差，我实在丢不下杨家的脸。薪水又只有那一点儿。'哥哥冷笑说：'你还怕丢杨家的脸？杨家的脸早给你丢光了！哪个不晓得你大名鼎鼎的杨三爷！你算算你花了多少钱！你自己名下的钱，爷爷留给我们的钱，还有妈的钱都给你花光了！'他说到这儿妈回来了，他还是骂下去：'你倒值得，你阔过，耍过，嫖过，赌过！你花钱跟倒水一样。你哪儿会管到我们在家里受罪，我们给人家看不起！'爹带着可怜的样子小声说：'你何必再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哥哥接着说：'后悔？你要是晓得后悔，也不会厚起脸皮回家了。从前请你回家，你不肯回来。现在我们用不着你了。你给我走！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不承认你这样的父亲！'爹脸色大变，浑身抖得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要讲话又讲不出来。妈在旁边连忙喊住哥哥不要再往下说。我也说：'哥哥，他是我们的爹啊！'哥哥回过头看我，他流着眼泪水说：'他不配做我的爹，他从我生下来就没有好好管过我。我是妈一个人养大的。他没

有尽过爹的责任。这不是他的家。我不是他的儿子。'他又转过脸朝着妈：'妈，你说他哪点配作我的爹？'妈没有讲话，只是望着爹，妈也哭了。爹只是动他的头，躲开妈的眼光。哥哥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交给妈，说：'妈，你看这封信。好多话我真不好意思讲出来。'妈看了信，对着爹只说了个'你'字，就把信递给爹，说：'你看，这是你公司一个同事写来的。'爹战战兢兢地看完信，一脸通红，嘴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真的，我敢赌咒！有一大半不是真的。他们冤枉我。'妈说：'那么至少有一小半是真的了。我也听够你的谎话了，我不敢再相信你。你走罢。'妈对着爹挥了一下手，就转身进屋去了。妈像是累得很，走得很慢，一面用手帕子揩眼睛。爹在后面着急地喊妈，还说：'我没有做过那些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诬赖我的。'妈并不听他。哥哥揩了眼泪水，说：'你不必强辩了。他是我的好朋友，无缘无故不会造谣害你。我现在没有工夫跟你多说。你自己早点打定主意罢。'爹还分辩说：'这是冤枉。你那个朋友跟我有仇，他舞弊，有把柄落在我手里头，他拿钱贿赂我，我不要，他恨透了我……'哥哥不等他说完，就说：'我不要听你这些谎话。你不要钱，哪个鬼相信！你要是晓得爱脸，我们也不会受那许多年的罪了。'哥哥说了，也走进妈屋里去了。堂屋里只有爹跟我两个人。我跑到爹面前，拉起他的手说：'爹，你不要怄他的气，他过一阵就会失悔的。我们到屋里歇一会儿罢。'爹喊了我一声'寒儿'，眼泪水就流出来了。过了半天他才说：'我失悔也来不及了。你记住，不要学我啊。'

"吃晚饭的时候，天下起雨来。爹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

哥哥又跟爹吵起来。爹说了两三句话　哥哥忽然使劲把饭碗朝地下一甩，气冲冲地走进屋去。我们都放下碗不敢讲一句话。爹忽然站起来说：'我走就是了。'哥哥听见这句话，又从房里跳出来，指着爹说：'那你马上就给我走！我看到你就生气！'爹一声不响就跑出堂屋，跑下天井，淋着雨朝外头走了。妈站起来喊爹。哥哥拦住她说：'不要喊他，他等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不管他们，一个人冒着雨赶出去。我满头满身都湿透了。在大门口我看见爹弯着背在街上走，离我不过十几步远。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我的声音给雨水遮盖了。我满嘴都是雨水。我就要追上他了，忽然脚一滑，我'一扑扒'绊倒在街上。我一脸一身都是泥水。头又昏，全身又痛。我爬起来，又跑。跑到街口，雨小了一点，我离开爹只有三四步了，我大声喊他，他回过头，看见是我，反而使劲朝前面跑。我也拚命追。他一下子就绊倒了，半天爬不起来。我连忙跑过去搀他。他脸给石头割破了，流出血来。他慢慢儿站起，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跑来做什么？'我说：'爹，你跟我回家去。'他摇摇头叹口气说：'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说：'爹，你不能这样说。我是你的儿子，哥哥也是你的儿子。没有你，哪儿还有我们！'爹说：'我没有脸做你们的父亲。你放我走罢。不管死活都是我自己情愿。你回去对哥哥说，要他放心，我决不会再给你们丢脸。'我拉住他膀子说：'我不放你走，我要你跟我回去。'我使劲拖他膀子，他跟着退了两步。他再求我放他走。我不肯。他就把我使劲一推，我仰天跌下去，这一下把我绊昏了。我半天爬不起来。雨大得不得

了。我衣服都泡胀了。我慢慢儿站起来，站在十字路口，我看不见爹的影子，四处都是雨，全是灰白的颜色。我觉得头重脚轻，浑身痛得要命。我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我咬紧牙齿走了几步，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觉得我好像又绊了一跤，有人把我拉起来。我听见哥哥在喊我。我放心了，他半抱半搀地把我弄回家去。我记得那时候天还没有黑尽。

"我回到家里，他们给我打水洗澡换衣服，又给我煮姜糖水。妈照料我睡觉。她跟哥哥都没有问起爹，我也没有力气讲话。这天晚上我发烧得厉害。一晚就做怪梦。第二天上午请了医生来看病。我越吃药，病越厉害，后来换了医生，才晓得药吃错了。我病了两个多月，才好起来。罗嫂告诉我，我病得厉害的时候，妈守在我床面前，我常常大声喊：'爹，你跟我回家去！'妈在旁边揩眼泪水。妈当天就要哥哥出去找爹回来。哥哥真的出去了。他并没有找回爹。不过后来我的病好一点，妈跟哥哥在吃饭的时候又在讲爹的坏话。这也是罗嫂告诉我的。

"我的病好起来了。妈跟哥哥待我都很好！就是不让我讲爹的事。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一点爹的消息。也许他们真的不晓得。他们好像把爹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我在街上走路，也看不到爹的影子。我去找李老汉儿，找别人打听，也得不到一点结果。二伯伯、四爸、大哥他们，在公馆卖掉以后就没有到我们家里来过。他们从来不问爹的事。

"在第二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家里没有客人，这一年来妈很少去亲戚家打牌应酬，也少有客人来。跟我们家常常来往

的就只有舅母同表姐 那天我们母子三个在家过节，妈跟哥哥都很高兴。只有我想起爹一个人在外头不晓得怎样过日子，心里有点儿难过。吃过午饭不久，我们听见有人在门口问杨家，罗嫂去带了一个人进来。这个人穿一身干净的黄制服，剪着光头。他说是来给杨三老爷送信。哥哥问他是什么人写的信。他说是王家二姨太太写的。哥哥把信拆开了，又问送信人折子在哪儿。送信人听说哥哥是杨三老爷的儿子，便掏出一个红面子的银行存折，递给哥哥说：'这是三万元的存折，请杨三老爷写个收据。'我看见哥哥把存折拿在手里翻了两下，他一边使劲地咬他的嘴唇，后来就把折子递还给送信人，说：'我父亲出门去了，一两个月里头不会回来。这笔款子数目太大，我们不敢收。请你拿回去，替我们跟你们二姨太太讲一声。'送信人再三请哥哥收下，哥哥一定不肯收。他只好收起存折走了。他临走时还问起杨三老爷到哪儿去了，哥哥说，'他到贵阳、桂林一带去了。'哥哥扯了一个大谎！妈等送信人走了，才从房里出来，问哥哥什么人给爹送钱来。哥哥说：'你说还有哪个，还不就是他那个宝贝老五！她现在嫁给阔人做小老婆，她提起从前的事情，说是出于不得已，万分对不起爹，请爹原谅她。她又说现在她的境遇好一点，存了三万块钱送给爹，算是赔偿爹那回的损失……'妈听到这儿就忍不住打岔说：'哪个希罕她那几个钱！你退得好！退得好！'我一直站在旁边，没有插嘴的资格。不过我却想起那个下江'阿姨'红红的瓜子脸，我觉得她还是个好人。她到现在还没有忘记爹。我又想，倘使她知道爹在哪儿，那是多么好，她一定不会让爹流

落在外头。

“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爹的消息。到去年九月有个星期六下午妈带我出去看影戏，没有哥哥在。我们看完影戏出来，妈站在门口，我去喊车子。等我把车子喊来，我看见妈脸色很难看，好像她见了鬼一样。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不是。她问我看见什么人没有。我说没有看见。妈也不说什么。我们坐上车子，我觉得妈时常回过头看后面。我不晓得妈在看什么。回到家里，我问妈是不是碰到了什么熟人。哥哥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妈变了脸色，小声跟我说：‘我好像看见你爹。’我高兴地问她：‘你真的看见爹吗？’她说：‘一定是他，相貌很像，就是瘦一点，衣服穿得不好。他从影戏院门口，跟着我们车子跑了好几条街。我说：‘那么你做什么不喊他一声，要他回家呢？’妈叹了一口气，后来就流下眼泪水来了。我不敢再讲话。过了好一阵，妈才小声说了一句：‘我想起来又有点儿恨他。’我正要说话，哥哥回来了。

“我这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在床上总是想着我明天就会找到爹，着急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一早就起来。我不等在家里吃早饭就跑出去了。我去找李老汉儿，告诉他，妈看见了爹，问他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爹。他劝我不要着急，慢慢儿找。我不听他的话。我缺了几堂课，跑了三天，连爹的影子也看不见。

“又过了二十多天，我们正在吃晚饭，邮差送来一封信，是写给妈的。妈接到信，说了一句：‘你爹写来的，’脸色就变了。哥哥连忙伸过手去说：‘给我看！’妈把手一缩，说：‘等我先看

了再给你，'就拆开信看了。我问妈：'爹信里讲些什么话？'妈说：'他说他身体不大好，想回家来住。'哥哥马上又伸出手去把信拿走了。他看完信，不说什么就把信拿在油灯上烧掉。妈要去抢信，已经来不及了。妈着急地问哥哥：'你为什么要烧它？上面还有回信地址！'哥哥立刻发了脾气，大声说：'妈，你是不是还想写信请他回来住？好，他回来，我立刻就搬走！家里的事横顺有他来管，以后也就用不到我了。'妈皱了一下眉头，只说：'我不过随便问一句，你何必生气。'我气不过就在旁边接一句话：'其实也应该回爹一封信。'哥哥瞪了我一眼，说：'好，你去回罢。'可是地址给他烧掉了，我写好回信又寄到哪儿去呢？

"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有一天，天黑不久，妈喊我出去买点东西，我回来，看见大门口有一团黑影子，我便大声问是哪个。影子回答：'是我。'我再问：'你是哪个？'影子慢慢儿走到我面前，一边小声说：'寒儿，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我看见爹那张瘦脸，高兴地说：'爹，我找了你好久了，总找不到你。'爹摩摩我的头说：'你也长高了。妈跟哥哥他们好吗？'我说：'都好。妈接到你的信了。'爹说：'那么为什么没有回信？'我说：'哥哥把信烧了，我们不晓得你的地址。'爹说：'妈晓得罢？'我说：'信烧了，妈也不晓得了。妈自来爱听哥哥的话。'爹叹了一口气说：'我早就料到的。那么没有一点指望了。我还是走罢。'我连忙拉住他的一只手。我吓了一跳。他的手冰冷，浑身在发抖。我喊起来：'爹，你的手怎么这样冷！你生病吗？'他摇摇头说：'没有。'我连忙捏他的袖子，已经是阴历九

月，他还只穿一件绸子的单衫。我说：'你衣服穿得这样少，你不冷吗？'他说：'我不冷！'我想好了一个主意，我要他在门口等我一下，我连忙跑进去，跟妈说起爹的情形，妈拿出一件哥哥的长衫和一件绒线衫，又拿出五百块钱，要我交给爹，还要我告诉爹，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妈说妈决不会回心转意的，请爹不要妄想。妈又说即使妈回心转意，哥哥也决不会放松他。我出去，爹还在门口等我。我把钱和衣服交给他，要他立刻穿上。不过我没有把妈的话告诉他。他讲了几句话，就说要走了，我不敢留他，不过我要他把他的住处告诉我，让我好去找他。我说，不管哥哥对他怎么样，我总是他的儿子。他把他住处告诉我了，就是这个大仙祠。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大仙祠去，果然在那儿找到了爹。爹说他在那儿住得不久，搬来不过一个多月。别的话他就不肯讲了。以后我时常到爹那儿去，有时候我也给爹拿点东西去。我自然不肯让哥哥晓得。妈好像晓得一点儿，她也并不管我。我在妈面前只说我见到了爹，我并不告诉她爹在什么地方。不过我对李老汉儿倒把什么事情都说了。他离爹的住处近，有时候也可以照应爹。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时常到你们公馆里头来。"（小孩侧过脸朝着姚太太笑了笑，带了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掉。）"爹爱花，爹总是忘不掉我们花园，他时常跟我讲起。我想花园本来是我们的，虽说是卖掉了，我进去看看，折点花总不要紧。我把我这个意思跟李老汉儿说了，他让我进去。我头一回进来，没有碰到人，我在花台上折了两枝菊

花拿给爹，爹高兴得不得了。以后我来过好多回。每回都要跟你们的底下人吵嘴。有两回还碰到姚先生，挨过他一顿骂，有一回还挨了那个赵青云儿下打。老实说，我真不愿意再到你们这儿来。不过我想起爹看到花欢喜的样子，我觉得我什么苦都受得了。我不怕你们的底下人打我骂我。我又不是做贼。我也可以跟他们对打对骂。只有一回我碰到你姚太太，你并没有赶我。你待我像妈妈、像姐姐一样，你还折了一枝腊梅给我。我在外头就没有碰到一个人和颜悦色地跟我讲过话，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我那些伯伯、叔叔、堂哥哥、堂弟弟都看不起我们这一房人，不愿意跟我们来往，好像我们看见他们，就会向他们借钱一样。爹跟我讲过，就在前不久的时候，有一天爹在街上埋头走路，给一部私包车撞倒了，脸上擦掉了皮，流着血。那是四爸的车子，车夫认出是爹，连忙放下车子去搀爹。爹刚刚站起来，四爸看到爹的脸，认出是他哥哥，他不但不招呼爹，反而骂车夫不该停车，车夫只好拉起车子走了。四爸顺口吐了一口痰，正吐在爹身上。这是爹后来告诉我的。

"爹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有天下午爹在商业场后门口碰见'阿姨'从私包车下来。她看见爹，认出来他是谁，便朝着爹走去，要跟爹讲话。爹起初有点呆了，后来听见她喊声'三老爷'，爹才明白过来，连忙逃走了。以后爹也就没有再看见她。爹说看见'阿姨'比看见四爸早两天。我也把'阿姨'送钱的事跟他讲了。他叹了两口气，说，倒是'阿姨'这种人有良心……"

小孩讲了这许多话，忽然闭上嘴，精力竭尽似地倒在沙发

靠背上，两只手蒙住了眼睛。我们，我同姚太太，这许久都屏住气听他讲话，我们的眼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现在我们仿佛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呼吸畅快多了。我看见姚太太也深深地嘘了一口气。虽然她用手帕在揩眼睛，可是我看出来她的脸上紧张的表情已经消失了。

"小弟弟，我想不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也亏得你，换个人不会像你这样，"她温柔地说。小孩不作声，也不取下手来。过了片刻，她又说："你爹呢，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大仙祠？请他过来坐坐也好。"小孩的轻微的哭声从他一双手下面透了出来。我对着姚太太摇摇头，小声说，"他父亲不愿意拖累他，又逃走了。"

"可以找到吗？"她低声问。

"我看一时不会找到，说不定他已经离开省城。他既然存心躲开，就很难找到他，"我答道。

小孩忽然取下蒙脸的手，站起来，说："我回去了。"

姚太太马上接嘴说："你不要走。你再耍一会儿，吃点茶，吃点点心。"

"谢谢你，我肚子很饱，吃不下。我真的要回去了，"小孩说。

"我看你很累。你一个人说了这许多话，也应该休息一会儿，"姚太太关心地说。

小孩回答道："我一点儿也不累，话说完了，我心里头也痛快多了。这几年来我在心里头背① 来背去，都是背这些话。我

① 背：即"背诵"的意思。

只跟李老汉儿讲过一点儿。今天全讲了。……我真的要走了。妈在家里等我。"

"那么你以后时常来耍要,你可以把我们这儿当做你自己的家,"姚太太恳切地说。

"我要来的,我要来的!这儿是我们的老家啊!"小孩说完,就从大开着的玻璃门走出去了。

二十八

"你要来啊，你要来啊！"姚太太还赶到花厅门口，恳切地招呼小孩道。

"我看他不会来了，"我没有听见小孩的回答，却在旁边接了一句。

"为什么呢？"她转过脸来，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这个地方有他那么多痛苦的回忆，要是我，我不会再来的，"我答道，我觉得心里有点不好受。

"不过这儿也应该有他许多快乐的回忆罢，"她想了一会儿，才自语似地说。"我倒真想把花园还给他。"她在书桌前的藤椅上坐下来。

我吃了一惊，她居然有这样的念头！我便问道："还给他？他也不会要的。而且诵诗肯吗？"

她摇摇头："诵诗不会答应的。其实他并不爱花。我倒喜欢这个花园。"过后她又加一句："我觉得这个孩子很不错。"

"他吃了那么多苦，也懂得那么多。本来像他这样年纪倒应该过得更好一点，"我说。

"不过现在过得好的人也实在不多。好多人都在受苦。黎先生，你觉得这种苦有没有代价？这种苦还要继续多久？"她

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恳切地等候我的回答。

"谁知道呢！"我顺口答了一句。但是我触到她的愁烦的眼光，我马上又警觉起来。我不能答复她的问题，我知道她需要的并不是空话。但是为了安慰她，我只好说："当然有代价，从来没有白白受的苦。结果不久就会来的。至少再过一两年我们就会看到胜利。"

她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她微微点一下头，又把眼睛抬起来，她不再看我，但是她痴痴地在望着什么呢？她是在望未来的远景罢。她微微露出牙齿，温和地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胜利只是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它。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又能够做什么呢？我还不是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肠。黎先生，你一定会看不起我。"她把眼光埋下来望我。

"为什么呢？姚太太，我凭什么看不起你？"我惊讶地问道。

"我整天关在这个公馆里，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有好好地给诵诗管过家，连小虎的教育也没法管。要管也管不好。我简直是个废人。诵诗却只是宠我。他很相信我，可是他想不到我有这些苦衷。我又不好多对他讲。……"

"姚太太，你不应该苛责自己。要说你是个废人，我不也是废人么？我对一切事不也是空有一番心肠？"我同情地说，她的话使我心里难过，我想安慰她，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话。

"黎先生，你不比我，你写了那么多书，怎么能说是废人！"她提高声音抗议道，同时友谊地对我笑了笑。

"那些书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些空话！"

"这不能说是空话。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她的眼睛感动地亮起来，她仿佛又看见什么远景了。

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为快乐而颤动起来。我愿意相信她的话，不过我仍然分辩说："我们不过是在白纸上写黑字，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一些人的时间，惹起另一些人的憎厌。我们靠一支笔还养不活自己。像我，现在就只好在你们家做食客。"我自嘲地微笑了。

她马上换了责备的调子对我说："黎先生，你在我面前不该讲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是食客呢？你跟诵诗是老朋友，并且我们能够在家里招待你这样的客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姚太太，你说我客气，那么请你也不要说'荣幸'两个字，"我插嘴说。

"我在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她含笑答道。但是她的笑容又渐渐地淡下去了。"我并不是在夸奖你。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母亲是个好心肠的旧派老太太，我哥哥是个旧式的学者。在学堂里头我也没有遇到一位好先生，那些年轻同学在我结婚以后也不跟我来往了。在姚家，我空时候多，他出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无聊就只有看书。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从前的天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广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人们的心。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不幸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高兴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难过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说：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我插嘴更正道。

她点一下头，接下去说：“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痛快点，活得有意义点，谁能没有理想呢！很早我听过一次福音堂讲道，一个英国女医生讲中国话，她引了一句《圣经》里的话：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从前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才明白了。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那些笑声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劳！我有时候想，就是出去做一个护士也好得多，我还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搀这个一把，给那个拿点东西，拿药来减轻第三个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话驱散第四个人的寂寞。”

“可是你也不该专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我感动地第二次插嘴说。

“我哪儿是忘了我自己，这其实是在扩大我自己。这还是

一部外国小说里面的说法。我会在旁人的笑里、哭里看见我自己。旁人的幸福里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里有我,旁人的思想里、记忆里也有我。要是能够做到这样,多么好!”她脸上的微笑是多么灿烂,我仿佛见到了秋夜的星空。我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暗暗地想:这多么美!我又想:这笑容里有诵诗罢?随后又想:这笑容里也有我么?我感到一种昂扬的心情,我仿佛被她抬高了似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感激地望着她。但是那星空又突然黯淡了。她换了语调说下去:“可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好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她说到这一句,似乎无意地看了一下她的肚皮,她的脸马上红了。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安慰她,我想说的话太多了,也许她比我更明白。她方才那番话还在我的心里激荡。要说“扩大自己”,她已经在我的身上收到效果了。那么她需要的应该是一个证明和一些同情罢。

“黎先生,你的小说写完了罢?”她忽然问道,同时她掉转眼睛朝书桌上看了一下。

“还没有,这几天写得很慢,”我短短地答道。她解决了我的难题,我用不着讲别的话了。

她掉过头来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关心地说:“你太累了,慢慢儿写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快完了,就差了一点儿。不过这些天拿起笔总写不下去。”

“是不是为了杨家孩子的事情?”她又问。

"大概是罢，"我答道，可是我隐藏了一个原因：小虎，或者更可以说就是她。

"写不下去就索性休息一个时候，何必这样苦你自己，"她安慰地说，接着她又掉头看了看书桌上那叠原稿，一边说："我可以先拜读原稿罢？"

"自然可以。你高兴现在就拿去也行。只要把最后一张留下就成了，"我恳切地说。

她站起来，微笑道："那么让我拿去看看罢。"

我走过去，把原稿拿给她。她接在手里，翻了一下，说："我明天就还来。"

"慢慢儿看，也不要紧，不必着急，"我客气地说。

她告辞走了。我立在矮矮的门槛上，望着这静寂的花园，我望了许久。

二十九

晚上，天下着雨。檐前雨点就好像滴在我的心上似的，那单调的声音快使我发狂了。我对着这空阔的花厅，不知道应该把我的心安放到哪里去。我把屏风拉开来，隔断了那一大片空间。房间显得小了。我安静地坐在靠床那张沙发上。电灯光给这间屋子淡淡地抹上一层紫色(那是屏风的颜色)。我眼前只有忧郁和凄凉，可是远远地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唤我，那是快乐的、充满生命的声音；我隐隐约约地看见那张照亮一切的笑脸。“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好像又听见了这句话，还是那熟悉的声音。我等待着，我渴望着。然而那个声音静了，那张笑脸隐了。留给我的还是单调的雨声和阴郁的景象。

一阵烦躁来把我抓住了。我不能忍耐这安静。我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我的头也发着隐微的刺痛，软软的沙发现在也变成很不舒适的了。我站起来，收了屏风。我在这个大屋子里来回走了好一会儿。我打算走倦了就上床去睡觉。

但是我开始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心底渐渐地升上来。我的头烧得厉害。我全身仿佛要爆炸了。我踉跄地走到书桌前面，在藤椅上坐下来，我摊开那一张没有给姚太太带走的小说原稿，就在前一天搁笔的地方继续写下去。我越写越快。我

疯狂地写着。我满头淌着汗，不停地一直往下写。好像有人用鞭子在后面打我似的，我不能放下我的笔。最后那个给人打伤腿不能再拉车的老车夫犯了盗窃行为被捉到衙门里去了，瞎眼女人由一个邻居小孩陪伴着去看他，答应等着他从牢里出来团聚。

....

"六个月，六个月快得很，一眨眼儿就过去了！"老车夫高兴地想着，他还没有忘记那个女人回过头拿她的瞎眼来望他的情景。他想笑，可是他的眼泪淌了下来。

....

我写到两点钟，雨还没有住，可是我的小说完成了。

我丢下笔，我的眼睛痛得厉害，我不能再睁开它们。我一摇一晃地走到床前，我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关电灯。

早晨，我被老姚唤醒了。

"老黎，你怎么还不起来？六点多了！"他笑着说。

我睁开眼睛，觉得屋子亮得很。我的眼睛还是不大舒服，我又闭上它们。

"起来，起来！今天星期，我们去逛武侯祠。昭华也去。她快打扮好了。"他走到床前来催我。

我又把眼睛睁开，说："还早呢！什么时候去？"一面还在揉眼睛。

"现在就去！你快起来！"他答道。"怎么！你眼睛肿了，一

定是昨晚上又睡晏了。怪不得你连电灯都没有关。刚才我还跟昭华谈起你，我们都觉得你这样不顾惜身体，不成。你脸色也不大好看。晚上应该早点睡。的确你应该结婚了。"他笑起来。

"我的小说已经写完，以后我不会再熬夜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不必为结婚的事情替我着急了，"我笑答道。

"快四十了，不着急也得着急了，"朋友开玩笑地说。但是他立刻换了语调问我："你的小说写完了？"

"是，写完了。"我站起来。

"我倒要看你写些什么！我忘记告诉你，昭华昨晚上看你那本小说居然看哭了。她等着看以后的。她没有想到你写得这么快。你把原稿给我，我给她带去。那个车夫跟那个瞎眼女人结果怎样？是不是都翘辫子了？我看你的小说收尾都是这样。这一点我就不赞成。第一，小人小事，第二，悲剧。这两样都不合我的口味。不过我倒佩服你的本领。我自己有个大毛病，就是眼高手低。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老是吹牛，也进步不了。"

"不要挖苦我了。我那种文章你怎么看得上眼？我倒想不到会惹你太太流眼泪。后面这一点原稿请你带去，让她慢慢儿看完还给我好了。"我走到写字台前，把桌上一叠原稿交给他。

"好，我给她拿去。"他看见老文打脸水进来，又加一句："我先进去，等你洗好脸吃过早点我再来。"

过了半点钟光景他同他的太太到园子里来。我正在花台

前面空地上散步。她的脸色比昨天好看些，也许是今天擦了粉的缘故。病容完全消失了。脸上笼罩着好像比阳光还明亮的微笑。她穿了一件浅绿色地（浅得跟白色相近了）印深绿色小花的旗袍，上面罩了一件灯笼袖的灰绒线衫。

"黎先生，真对不起，诵诗今天把你吵醒起来了。我们不晓得你昨晚上赶着写完了你的小说。你一定睡得很少，"她含笑说。

"不，我睡够了，诵诗不来喊我，我也要起来的。"我还说着客气话。

"老黎，你这明明是客气话。我喊你好几声，才把你喊醒，你睡得真甜，"老姚在旁边笑着说。

我没法分辩，我知道我露了一点窘相。我看见她微微一笑，对她的丈夫说："我们走罢。黎先生不晓得还要不要耽搁。"

"我好了，那么就走罢，"我连忙回答。

二门外有三部车子在等我们。我照例坐上在外面雇来的街车，我的车夫没有他们的车夫跑得快，还只跑了六七条街，我的车子就落在后面了。我看见他们的私包车在另一条街的转角隐去。后来我的车子又追上了他们。姚太太的在太阳下发光的浓发又在我前面现出来。老姚正回过头大声跟她讲话，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不过我能够看到他的满意的笑容。

快要出城的时候，我的车子又落后到半条街以上了。我这辆慢车刚跑到十字路口，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衫的苦力拦住了路。他们两个人一组抬着大石块，从城外进来，陆续经过我面前。人数大约有三十多个。还有四五个穿制服背枪拿鞭子

的人押着他们。他们全剃光头，只在顶上留了一撮头发，衣服脏得不堪，脚下连草鞋也没有穿一双。我坐在车上，并没有注意这个行列，我觉得那些人全是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庞，眼睛陷入，两颊凹进，脸色灰白，头埋着，背驼着，额上冒着汗。他们默默地走了过去。无意间我的眼光挨到其中的一张脸，就停在那上面了。我惊叫了一声。我的叫声虽然不高，却使得那张脸朝着我这面转过来。那个人正抬着扁担的前一头，现在站住了，略略抬起头来看我。还是那张清秀的长脸，不过更瘦，更脏，更带病容。在他看我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还露出一点光彩，但是马上就阴暗了。他动了动嘴唇，又好像想跟我说什么话，却又讲不出来，只把右手稍微举了一下。那只干枯的手上指缝间长满了疥疮，有的已经溃烂了。他用右手去搔那只搭在扁担上的左手。他这一搔，我浑身都好像给他搔痒了。

“走！你想做啥子！”一个粗声音在旁边叱骂道。接着一下鞭子打在他的脸上，他“哎呀”叫了一声，脸上立刻现出一条斜斜的红印，从耳根起一直到嘴边，血快淌出来了。他连忙用手遮住他的伤痕。眼泪从他那双半死似的眼睛里迸出来，他也不去揩它们，就埋下头慢慢地走了。

“杨——”我到这时才吐出一个字来，痛苦像一块石头塞住我的喉管，我挣扎了好久，忽然叫出了一声“杨先生”。

他已经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匆匆地看我一眼。他还是什么也不说地走了。我想下车去拉他回来。但这只是我一时的想法，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就让我的车夫把车子拉过街口了。

三十

我的车子到了武侯祠，老姚夫妇站在大门口等我。

“怎么你现在才到！我们等了你好久了，”老姚笑问道。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我简单地回答他。他并没有往下问是谁。我正踌躇着是不是要把刚才看见杨梦痴的事告诉他的太太，却听见她对老姚说：“我们等一会儿跟老李招呼一声，他给黎先生喊车子，要挑一部跑得快的。”剃光头的杨梦痴的面颜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我心里暗想，倒亏得这个慢车夫，我才有机会碰见杨梦痴。

我现在知道那个父亲的下落了！可是我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么？我能够救他出来么？救他出来以后又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他有没有重新作人的可能？——我们走进庙宇的时候，我一路上想的就是这些问题。两旁的景物在我的眼前匆匆地过去，没有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我们转进了一条幽静的长廊，它一面临荷花池，一面靠壁。我们在栏杆旁边一张茶桌前坐下来。

阳光还没有照下池子，可是池里已经撑满了绿色的荷伞。清新的晨气弥漫了整个走廊。廊上几张茶桌，就只有我们三个客人。四周静得很。墙外高树上响着小鸟的悦耳的鸣声。

堂倌拿着抹布懒洋洋地走过来。我们向他要了茶，他把茶桌抹一下又慢慢地走开了。过了几分钟，他端上了茶碗。一种安适的感觉渐渐地渗透了我全身，我躺在竹椅上打起瞌睡来。

"你看，老黎在打瞌睡了，"我听见老姚带笑说。我懒得睁开眼睛，我觉得他好像在远地方讲话一样。

"让他睡一会儿罢，不要喊醒他，"姚太太低声答道："他一定很累了，昨晚上写了那么多的字。"

"其实他很可以在白天写。晚上写多了对身体不大好。我劝过他，他却不听我的话，"老姚又说。

"大概晚上静一点，好用思想。我听说外国人写小说，多半在晚上，他们还常常熬夜，"姚太太接着说，她的声音低到我差一点听不清楚了。"不过这篇小说写完，他应该好好地休息了。"她忽然又问一句："他不会很快就走罢？"

我的睡意被他们的谈话赶走了，可是我还不得不装出睡着的样子，不敢动一下。

"他走？他要到哪儿去？你听见他提过走的话吗？"老姚惊讶地问道。

"没有。不过我想他把小说写好了，说不定就会走的。我们应该留他多住几个月，他在外头，生活不一定舒服，他太不注意自己了。老文、周嫂他们都说，他脾气好，他住在我们花园里头，从来不要他们拿什么东西。给他送什么去，他就用什么，"姚太太说。

"在外面跑惯的人就是这种脾气。我就喜欢这种脾气！"老姚笑着说。

"你也跑过不少地方，怎么你没有这种脾气呢？"姚太太轻轻地笑道。

"我要特别一点。这是我们家传。连小虎也像我！"老姚自负地答道。

姚太太停了一下，才接下去说："小虎固然像你，不过他这两年变得多了。再让赵家把他纵容下去，我看以后就难管教了。我是后娘，赵家又不高兴我，我不好多管，你倒应该好好管教他。"

"你的意思我也了解。不过他是赵家的外孙，赵家宠他，我也不便干涉。横竖小虎年纪还小，脾气容易改，过两年就不要紧了，"老姚说。

"其实他年纪也不算小了。……别的都可以不说。赵家不让他好好上学，就只教他赌钱看戏，这实在不好。况且就要大考了。你看今晚上要不要再打发人去接他回来？"姚太太说。

"我看打发人去也没有用，还是我自己走一趟罢。不过小虎外婆的脾气你也晓得，跟她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只有跟她求情还有办法，"老姚说。

"我也知道你我处境都难，不过你只有小虎这个儿子，我们也应该顾到他的前途，"姚太太说。

"你这句话不对，现在不能说我只有小虎一个儿子，我还有……"他得意地笑了。

"呸！"她轻轻地啐了他一口。"你小声点。黎先生在这儿。我说正经话，你倒跟人家开玩笑。"

"我不说了。再说下去，就像我们特意跑到这儿来吵架

了。要是给老黎听见，他写起小人小事来，把我们都写进去，那就糟了，"老姚故意开玩笑道。

"你可不是'小人'啊。你放心，他不会写你这种'贵人'的，"姚太太带笑地说。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咳声嗽，慢慢地睁开眼睛来。

"黎先生，睡得好罢？是不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她亲切地问我。

我连忙分辩说不是。

"我们正在讲你，你就醒了。幸好我们还没有讲你的坏话，"老姚接着说。

"这个我相信。你们决不是为了讲我的坏话才来逛武侯祠的，"我说着，连自己也笑了。

"老黎，你要不要到大殿上去抽个签，看看你的前程怎样？"老姚对我笑道。

"我用不着抽。你倒应该陪你太太去抽支签才对，"我开玩笑地回答。

"好，我们去抽支看看，"老姚对他的太太说。他站起来，走到太太的竹椅背后去。

"这个没有意思，我不去！"他的太太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你何必把它认真！去罢，去罢，"他接连地催她站起来。

"好，我在这儿守桌子，你们去罢。既然诵诗有兴致，姚太太就陪他走一趟罢，"我凑趣地帮老姚说话。

姚太太微笑着，慢慢地站起来，掉过脸对她的丈夫说："我这完全是陪你啊。"她又向我说："那么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你可以好好地睡觉了。"她笑了笑，拿着手提包，挽着丈夫的膀子走了。

这时我后面隔两张桌子的茶桌上已经有了两个客人，这是年轻的学生，各人拿了一本书在读。阳光慢慢地爬下池子。几只麻雀在对面屋檐上叽叽喳喳地讲话。一种平静、安适的空气笼罩着这个地方。我正要闭上眼睛，忽然，对面走廊上几个游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疲倦马上消失了。我注意地望着他们，我最先看到杨家小孩（他穿了一身黄色学生服），其次是他的哥哥，后来才看见他的母亲同一位年轻小姐。她们走在后面，那位小姐正在跟杨三太太讲话，她们两个都把脸向着池子，忽然杨三太太笑了，小姐也笑了。走在前面的两个青年都停住脚步，掉转身子跟那位小姐讲话。他们也笑了。

他们的笑声隐隐地送到我的耳里来。我疑心我是在做梦。我刚才不是还看见那个丈夫和父亲？我不是亲眼看见那一下鞭打？现在我又听见了这欢乐的笑声！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那个抬石头的人相隔这么近，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保存着一点点旧日的记忆，可是过去的爱和恨在我的眼里还凝成一根链子，把他们跟那个人套在一起。我一个陌生人忘不掉他们那种关系。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来裁判他们，然而他们的笑声引起了我的反感。他们正向着我这面走来，他们愈走近，我心里愈不高兴。我看见小孩的哥哥陪着那位小姐从小门转到外面去了。小孩同他母

亲便转到我这条走廊上来。小孩走在前面，他远远地认出了我，含笑地跟我打招呼，他还走到茶桌前来，客气地唤了我一声："黎先生。"

"你跟你母亲一块儿来逛武侯祠，"我笑着说，我看见他那善良、亲切的笑容，我的不愉快渐渐地消失了。

"是，还有我哥哥，跟我表姐，"他带笑回答，便掉转身到他的母亲身边去，对她低声讲了几句话。她朝我这面看了一眼，便让他挽着她的膀子走到我面前，他介绍说："这是我妈。"

我连忙站起来招呼她。她对我微笑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请坐"。我仍然立着。她又说："我寒儿说，黎先生时常给他帮忙，又指教他，真是感谢得很。"

"杨太太，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说得上帮忙？更说不上指教。令郎的确是个好子弟，我倒喜欢他，"我谦虚地说。小孩在旁边望着我笑。

"黎先生哪儿晓得，他其实是最不听话的孩子，"她客气地答道，又侧过头去对她的儿子说："听见没有？黎先生在夸奖你，以后不要再淘气了。"过后她又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我们不打扰你了。"她带笑地又跟我点一下头，便同儿子一路走了。

"黎先生，再见啊，"小孩还回过头来招呼我。

我坐下来。我的眼里还留着那个母亲的面影。这是一张端正而没有特点的椭圆形脸，并不美，但是嘴角却常常露出一种使人愉快的笑意。脸上淡淡地搽了一点粉，头发相当多，在后面挽了一个髻。她的身上穿了一件咖啡色短袖旗袍。从面

貌上看，她不过三十几岁的光景(事实上她应当过了四十!)，而且她是一个和善可亲的女人。

那是可能的吗，杨家小孩的故事？就是这个女人，她让她的儿子赶走了父亲吗？——我疑惑地想着，我转过头去看他们。母子两个刚在学生后面那张茶桌上坐下来，母亲亲切地对儿子笑着。她决不像是一个冷酷的女人!

"老黎，好得很，上上签!"老姚的声音使我马上转过头去。他满面光采地陪着太太回来了，离我的茶桌还有几步路，正向着我走来。

"在哪儿？给我看看，"我说。

"她不好意思，给她撕掉了，"老姚得意地笑着说。

"没有什么意思，"她红着脸微微笑道。

我也不便再问。这时小孩的哥哥陪着小姐进来了，我便对姚太太说："杨家小孩的哥哥来了，那个是他的表妹。"

姚太太抬起头，随着我的眼光看去。老姚也回过头去看那两个人。

小姐穿了一件粉红旗袍，两根辫子垂在脑后，圆圆的一张脸不算漂亮，但是也不难看，年纪不过十八九，眼睛和嘴唇上还带着天真的表情。她并不躲避我们三个人的眼光，笑容满面地动着轻快的步子走过我们的身旁。

"两弟兄真像！哥哥就是白净点，衣服整齐点。也不像是厉害的人，怎么会对他父亲那样凶！简直想不到!"姚太太低声对我说。

"人不可以貌相。其实他父亲也太不争气了，难怪他——"

老姚插嘴说。从这句话我便知道姚太太已经把小孩的故事告诉她的丈夫了。

"表妹也不错，一看就知道是个实心的好人。弟弟在哪儿呢？"姚太太接着说。

"就在那张桌子上，他母亲也在那儿，"我答道，把头向后面动了一下。

"对啦，我看到了，"她微微点头说。"他母亲相貌很和善。"她喝了两口茶，把茶碗放回到桌上。她又把眼光送到那张茶桌上去。过了好几分钟，她又回过头来说："他们一家人很亲热，很和气，看样子都是可亲近的人。怎么会发生那些事情？是不是另外还有原因？"

"我给你说，外表是不可靠的。看人千万不要看外表。其实就是拿外表来说，那个小孩哪里比得上小虎！"老姚说。

姚太太不作声。我也沉默着。我差一点儿要骂起小虎来了。我费了大力才咽下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我咬紧嘴唇，也把脸掉向那张茶桌。

我的感情已经有了改变，现在变得更多了。我想：我有什么权利憎厌那几个人的笑声和幸福呢？他们为什么不应该笑呢？难道我是一个宣言"复仇在我"的审判官，还得把他们这仅有的一点点幸福也完全夺去吗？

断续的笑声从他们的桌上传过来。还是同样的愉快的笑声，可是它们现在并不刺痛我的心了。为什么我不该跟着别人快乐呢？为什么我不该让别人快乐呢？难道我忘了这一个事实：欢乐的笑声已经渐渐地变成可珍贵的东西了？

没有人猜到我的心情。我跟老姚夫妇谈的是另一些话。其实我们谈话并不多，因为老姚喜欢谈他的小虎，可是我听见他夸奖小虎就要生气。

十一点光景，我们动身到庙里饭馆去吃午饭。小孩也到外面去。他走过我们的茶桌。我们刚站起来，他忽然过来先跟姚太太打个招呼，随后拉着我的膀子，向外走了两步。他带着严肃的表情小声问我："你有没有打听到我爹的消息？"

我踌躇了一下。话几乎要跳出我的口来了，我又把它们咽下去。但是我很快地就决定了用什么话来回答他。我摇摇头，很坦然地说："没有。"我说得很干脆，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说谎。

小孩同我们一路出去。老姚夫妇在前面走，我和小孩跟在后面。小孩闭紧嘴，不讲话。我知道他还在想他的父亲的事。他把我送到饭馆门口。他跟我告别的时候，忽然伸过头来，像报告重要消息似地小声说："黎先生，我忘记告诉你一件喜事：我表姐其实是我未来的嫂嫂。他们上个星期订婚的。"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不等我说话就转身跑开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这个孩子不像是一个有着惨痛身世的人。他的脚步还是那么轻快。这件"喜事"显然使他快乐。

我这样想着，他的表姊的圆圆脸就在我的跟前晃了一下。这是一张没有深印着人生经验的年轻的脸，和一对天真地眨着的亮眼睛。我应该替这个小孩高兴。真的，他不该高兴吗？

"老黎，你站在门口干吗？"老姚在里面大声叫我。

我惊醒地转过身去。我在饭桌旁坐下来以后，便把小孩告诉我的“喜事”转告他们。

“那位小姐倒还不错。看起来他们一家人倒和和气气的。好些家庭还不及他们。我觉得也亏得那个做哥哥的，全靠他一个人支持这个家，”姚太太说着，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三十一

这天回到家里，我终于把遇见杨老三的事情对老姚夫妇讲了。

他们在表示了怜悯、发出了叹息以后，一致主张设法救那个人出来。老姚自负地说他有办法，他知道那个地方，他有熟人在那里做事。他的太太第一个鼓舞他，我也在旁边敦促。他一时高兴，就叫人立刻预备车子，他要出去找人想办法。他说他对这件事情很有把握。

老姚走后，他的太太还跟我谈了一阵话。她认为那个人出来以后，我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主张先送他进医院。她说，等他从医院出来，她的丈夫总可以给他找一个适当的工作，将来他的坏习气改好了，我们再设法让他们一家人团聚。我们说着梦话，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我们太相信老姚的"把握"了。

晚上我等着老姚来报告他活动的结果。可是等到十点钟我还没有听见老姚的脚步声。疲倦开始向我袭击。蚊子也飞到我的周围来了。在这一年里，我第一次注意到蚊子的讨厌。我又看见一只苍蝇在电灯下飞舞。我失掉了抵抗的勇气。我躲到帐子里去了。

这一晚我得到一个无梦的睡眠。早晨我醒得很迟，没有人来打扰我。我起来了许久，老文才来给我打脸水。

从老文的嘴里，我知道朋友昨晚回家迟，并且为着小虎的事情跟他的太太吵了架，今天一早就坐车出去了。

"这不怪太太。虎少爷在赵家白天赌钱，晚上看戏，不去上学读书，又不要家里人去接。太太自然看不惯，老爷倒一点不在乎。太太打发人去接，接了两天都接不回来。老爷说自己去接，他倒陪赵外老太太带虎少爷去看戏，看完戏，还是一个人回来。太太多问了几句，老爷反而发起脾气来，把太太气哭了，"老文带着不平的语调说，他张开没有门牙的嘴，苦恼地望着我。

"你们太太呢？"我关心地问他。

"多半还没有起来。不过今早晨老爷出门的时候，并不像还在生气的样子，现在多半没有事情了。我们还是听见周大娘讲的。"

我吃过早点以后不久，周嫂来收捡碗碟，还给我带来我那小说的全部原稿。她说："太太还黎先生的，太太说给黎先生道谢。"

姚太太把原稿给我装订起来了，她还替我加上白洋纸的封面和封底。倒是我应该感谢她。我把这个意思对周嫂说了，要周嫂转达。我又向周嫂问起吵架的事。周嫂的回答跟老文的报告差不多，不过更详细一点：他们吵得并不厉害，不久就和解了。老爷一讲好话，太太就止哭让步。今早晨老爷出门，还是为着别的事情。

周嫂跟老文一样，不知道杨家的事。我从她的口里打听不到老姚昨天奔走的成绩。不过我猜想，周嫂说的别的事情大概就是杨梦痴的事罢。看情形姚太太今天不会到花园里来了。我只有忍耐地等着老姚回来。

直到下午三点钟光景，老姚才到下花厅来看我。

"唉，不成，不成！没有办法！"他一进来，就对我摇头，脸上带了一种厌倦的表情（我从没有见过他有这一类的表情！）。他走到沙发前，疲乏地跌坐下去。

"你一定打听到他的下落了。那么以后慢慢想法也是一样，"我说。

"就是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地方倒找到了，可是问不到姓杨的人。那里根本就没有姓杨的人！要是找到人，我一定有办法。"

我望着他的脸，我奇怪他平日那种洒脱的笑容失落在什么地方去了。我感到失望，就说："也许是他们故意推脱。"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我那个朋友陪我一起去，他们不会说假话来敷衍我。"他停了一下，抬起手在鬓边搔了搔，沉吟地说："说不定他用的不是真姓名。"

"这倒是可能的，"我点头说，一道光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不错，一定是这样。他出了事害怕给家里人丢脸，才故意改了姓名。那么说不定就是认出他来，他也会不承认自己是杨梦痴。"

"这就难办了，"老姚说。他掏出烟盒来，点了一支纸烟抽着，一面倒在沙发靠背上。我看见他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我

想起他跟他的太太吵架的事。我打算给他劝告，却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才好。过了好几分钟，他稍微弯起身子，又说："我还有个办法。你把杨老三的相貌给我仔细地描写一番。我过两天想法亲自去看一看。只要找到他本人，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保出来再说。或者我再找你去看一看，你一定会认出他。"

这是一个好办法！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好像在崎岖的山道上瞥见了一条大路。我凭着记忆把杨梦痴的面貌详细地描绘了一番，他听得很仔细，好像要把我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似的。

谈完杨梦痴的事，我们都感到一点疲倦。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老姚忽然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阵。他愁烦地望着我，说："老黎，我昨天跟昭华吵过架。"他又掉转身踱起来。

"为什么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说你们夫妇吵架。"我故意做出惊愕的样子，其实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原因。

他把手放在鬓上搔了搔，走到我的面前站住了。他皱了皱眉毛，说："就是为了小虎的事情。昨天我去赵家接他，没有接回来，他外婆留他多耍几天。昭华觉得我太纵容小虎，她抱怨我，我们就吵起来了。后来还是我让了步，才没有事。其实是她误会了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不接小虎回家。我实在拗不过他外婆。有钱人的脾气真古怪。她又只有这么一个外孙。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他求助似地向我摊开两只手。我不讲一句话。我不满意他那种态度。

他走回到他原先坐的沙发前面坐下来。他接着说："我昨

晚上整晚都没有睡好觉。我越想心里越不好过。这是我们头一次吵架。我们结婚三年多，从来没有吵过架。现在开了头，以后就难说了。昨天也是我不好，我先吵起来。"他又取出一根纸烟，点着抽了几口。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说："这的确是你不好。你根本就不该让赵家毁掉小虎，小虎是你的儿子。——"

"你不能说赵家毁他。赵家比我更爱小虎，"他不以为然地插嘴说。他把纸烟掷在地板上，用脚踏灭了火。

我生起气来。这一次轮着我站在他面前讲话了。我挥着手大声说："你还说不是毁掉他？你想想看小虎在赵家受的是什么教育！赌钱，看戏，摆阔，逃学……总之，没有一件好事！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一事不做，年年买田，他们儿子、孙子、外孙、曾孙、重孙都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吃饭，睡觉吗？你以为我们人就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父母，一辈子抱住钱啃吗？"我觉得自己脸都挣红了。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老姚连忙摇着手说；"你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钱上面。"

我的气还没有消，我固执地说："我并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上回我劝你，你明明白白跟我说过，你又不是没有钱，用不着害怕小虎爱赌钱不读书。其实讲起赌钱，一个王国也可以输掉，何况你一院公馆，千把亩田！我们是老朋友，我应当再提醒你，杨家从前也是这里一家大富，现在杨老三怎样了？"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连连挥手说。他不跟我发脾

气，也不替他自己辩护。他只是颓丧地躺在沙发上。

我并不同情他，我继续用话逼他。我说："你也应当想到你太太，你这样，叫她做后娘的怎么办？你当初就应当想到赵家的脾气，就不该续弦；既然续了弦就不该光想到赵家。我怕你为着赵家，毁了你自己的幸福还不够，你还会毁掉你太太的幸福。"我只顾自己说得痛快，不去想他的痛苦。后来我看见他用左手蒙住两只眼睛，我才闭了嘴。

以后我们都没有讲话。他取下手来，抽完一支烟才告辞走了。

这天我刚刚吃过晚饭，老姚忽然来约我去看影戏。我知道他是陪太太去的。我想，在他们夫妇吵过架以后，我应该让他们多有时间单独在一起，不要夹在中间妨碍他们，我便找个托辞推掉了。我顺口问他去看什么片子，他答说是《吾儿不肖》。我感到惊喜。我看过这部影片，已经很陈旧了，不过对他们倒是新鲜的。并且它一定会给老姚一个教训，也许比我的劝告更有效。

我送他们夫妇上车。姚太太安静、愉快地对我微笑，笑容跟平日一样。老姚的脸上也有喜色，先前的疲倦已经消散了。

我希望他们以后永远过着和睦的日子。

三十二

第二天老姚在午饭时间以前来看我。他用了热烈的语调对我恭维昨晚的影片。他受了感动，无疑地他也得到了教训。他甚至对我说他以后要好好地注意小虎的教育了。

我满意地微笑。我相信他会照他所说的做去。

“小虎昨天回来了罢？”我顺口问了一句。

“没有。昨天我跟昭华回来太晚，来不及派人去接他。今天我一定要接他回来，”老姚说着，很有把握地笑了笑。

老姚并没有吹牛。下一天早晨老文来打脸水，便告诉我，虎少爷昨晚回家，现在上学去了。后来他又说，虎少爷今天不肯起床，还是老爷拉他起来的，老爷差一点儿发脾气，虎少爷只好不声不响地坐上车子让老李拉他去上学。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痛快，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我洗好脸照常到园子里散步。吃过早点后不久我便开始工作。

我在整理我的小说。我预计在三个多星期里面写成的作品，想不到却花了我这么多天的工夫。我差一点对那位前辈作家失了信。他已经寄过两封信来催稿了。我决定在这个星期内寄出去。

整理的工作相当顺利。下半天老姚同他的太太到园里

来，我已经看好五分之一的原稿了。

他们就要去万家，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顺便到我这里来坐一会儿，或许还有一个用意：让我看见他们已经和好了。下午天气突然热起来。丈夫穿着白夏布长衫，太太穿着天蓝色英国麻布的旗袍。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表情。

"黎先生，谢谢你啊，"姚太太看见我面前摊开的稿纸，带笑地说。"我觉得你这个结局改得好。"

"这倒要感谢你，姚太太，是你把他们救活了的，"我高兴地回答她。

"其实你这部小说，应该叫做《憩园》才对。你是在我们的憩园里写成的，"老姚在旁边插嘴说。

"是啊。黎先生可以用这个书名做个纪念。本来书里头有个茶馆，那个瞎眼女人从前就在那儿唱书。车夫每天在茶馆门口等客，有时看见瞎眼女人进来，有时看见她出去，偶尔也拉过她的车。他们就是在那儿认得的。后来瞎眼女人声音坏了，才不在那家茶馆唱书。那家茶馆里头也有花园，黎先生叫它做明园。要改，就把明园改做憩园好了，"姚太太接着说，这番话是对她的丈夫说的，不过她也有要我听的意思。我听见她这么熟悉地谈起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愿意依照她的意思办这件小事。

"不错，不错，叫那个茶馆做憩园就成了，横竖不会有人到我们这儿来吃茶。老黎，你觉得怎样？"老姚兴高采烈地问我道。

我答应了他们。我还说："你既然不在乎，我还怕什么？"

我拿起笔马上在封面上题了"憩园"两个字。

他们走的时候，我陪他们出去。栏杆外绿磁凳上新添的两盆栀子花正在开花，一阵浓郁的甜香扑到我的鼻端来。我们在栏前站了片刻。

"黎先生，后天请你不要出去，就在我们家里过端午啊，"姚太太侧过脸来说。

我笑着答应了。

"啊，我忘记告诉你，"老姚忽然大声对我说，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昨天我碰到我那个朋友，我跟他讲好了，过了节就去办杨老三的事。他不但答应陪我去，他还要先去找负责人疏通一下。我看事情有七八成的把握。"

"好极了。等事情办妥，杨梦痴身体养好，工作找定，我们再通知他家里人，至少他小儿子很高兴；不过我还耽心他那些坏习气是不是一时改得好，"我带笑说。

"不要紧，杨老三出来以后，什么事都包在我身上，"老姚说着，还得意地做了一个手势。

"黎先生，花厅里头蚊子多罢？我前天就吩咐过老文买蚊香，他给你点了蚊香没有？"姚太太插嘴问道。

"不多，不多，不点蚊香也成，况且又有纱窗，"我客气地说。

"不成，单是纱窗不够，花厅里非点蚊香不可！一定是老文忘记了，等会儿再吩咐他一声，"老姚说。

我们走出园门，看见车子停在二门外，老文正站在天井里同车夫们讲话。姚太太在上车以前还跟老文讲起买蚊香的

事，我听见老文对她承认他忘记了那件事情，老文的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现出抱歉的微笑。可是并没有人责备他。

我回到园内，心里很平静，我又把上半天改过的原稿从头再看一遍，我依照老姚夫妇的意思，把那个茶馆的招牌改作了"憩园"。

我一直工作到天黑，并不觉得疲倦。老文送蚊香来了。我不喜欢蚊香的气味，但也只好让他点燃一根，插在屋角。我关上门。纱窗拦住了蚊子的飞航。房里相当静，相当舒适。我扭燃电灯又继续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三点钟，我把全稿看完了。

睡下来以后，我一直做怪梦。我梦见自己做了一个车夫，拉着姚太太到电影院去。到了电影院我放下车，车上坐的人却变做杨家小孩了！电影院也变成了监牢。我跟着小孩走进里面去，正碰见一个禁子押了杨梦痴出来。禁子看见我们就说："人交给你们了，以后我就不管了。"他说完话，就不见了。连监牢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站在一个大天井里面。杨梦痴戴着脚镣，我们要给他打开，却没有办法。忽然警报响了，敌机马上就来了，只听见轰隆轰隆的炸弹声，我一着急，就醒了。第二次我梦见自己给人关在牢里，杨梦痴和我同一个房间。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情进来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罪名。他又说他的大儿正在设法救他。这天他的大儿果然来看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去会了大儿回来，却对我说他的大儿告诉他，他的罪已经定了：死刑，没有挽救的办法。他又说，横竖是一死，不如自杀痛快。他说着就把头朝壁

上一碰。他一下就碰开了头，整个头全碎了，又是血，又是脑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醒来的时候，满头是汗，心咚咚地跳。窗外响起了第一批鸟声。天开始发白了。

后来我又沉沉地睡去。到九点多钟我才起来。

我对我这部小说缺乏自信心。到可以封寄它的时候，我却踌躇起来，不敢拿它去浪费前辈作家的时间。这天我又把它仔细地看了一遍，还是拿它搁起来。到端午节后一天我又拿出原稿来看一遍，改一次，一共花了两天工夫，最后我下了决心把它封好，自己拿到邮局去寄发了。

我从邮局回来，正碰到老姚的车子在二门外停下。他匆匆忙忙地跳下车，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你回来得正好，我有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我惊讶地问道。

"我打听到杨老三的下落了，"他短短地答了一句。

"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交保出来吗？"我惊喜地问他，我忘了注意他的脸色。

"他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那么现在在哪儿？"

"我们到你房里谈罢，"老姚皱着眉头说。我一边走一边想：难道他逃出来了？

我们进了下花厅。老姚在他常坐的那张沙发上坐下来。我牢牢地望着他的嘴唇，等着它们张开。

"他死了，"老姚说出这三个字，又把嘴闭上了。

"真的？我不信！他不会死得这么快！"我痛苦地说，这个

打击来得太快了。“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他！”

“他的确死了，我问得很清楚。你不是告诉我他的相貌吗？他们都记得他，相貌跟你讲的一模一样，他改姓孟，名字叫迟。不是他是谁！我又打听他的罪名，说是窃盗未遂，又说他是惯窃，又说他跟某项失窃案有关。关了才一个多月。……”

“他怎么死的？”我插嘴问道。

“他生病死的。据说他有一天跟同伴一块儿抬了石头回来，第二天死也不肯出去，他们打他，他当天就装病。他们真的就把他送到病人房里去。他本来没有大病，就在那儿传染了霍乱，也没有人理他，他不到三天就死了。尸首给席子一裹，拿出去也不知道丢在哪儿去了。……”

“那么他们把他埋在哪儿？我们去找到他的尸首买块地改葬一下，给他立个碑也好。我那篇小说寄出去了，也可以拿到一点钱。我可以出一半。”

老姚断念地摇摇头说：“恐怕只有他的阴魂知道他自己埋在哪儿！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可是问不到他尸首的下落。害霍乱死的人哪个还敢粘他！不消说丢了就算完事。据说他们总是把死人丢在东门外一个乱坟坝里，常常给野狗吃得只剩几根骨头。我们就是找到地方，也分不出哪根骨头是哪个人的。”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连忙咬紧牙齿。一阵突然袭来的情感慢慢地过去了。

“唉，这就是我们憩园旧主人的下场，真想不到，我们那棵茶花树身上还刻得有他的名字！”老姚同情地长叹了一声。

死了，那个孩子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我不是在做梦？这跟我那个晚上的怪梦有什么分别！我忽然记起他留给小儿子的那封短信。“把我看成已死的人罢……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他就这样地过完这一辈子么？我不能说我同情他。可是我想起大仙祠的情形，我的眼泪就淌出来了。

“我去告诉昭华，”老姚站起来，自语似地说，声音有点嘶哑；他又短短地叹一口气，就走出去了。

我坐着动也不动一下，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种不可抗拒的疲倦从头上压下来。我屈服地闭上了眼睛。

三十三

我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每天下午发烧，头昏，胃口不好，四肢软弱。我不承认我害病。我有时还出去看电影。不过我现在用不着伏在桌上写字了。天晴的日子我一天在园子里散步两次。我多喝开水，多睡觉。

老姚每天来看我一次，谈些闲话。他不知道我生病，只说我写文章太辛苦了，这两天精神不大好。他劝我多休息。他自己倒显得精力饱满。他好像把那些不痛快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似的，脸上整天摆着他那种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笑容，他还常常让我听见他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太太也常来，总是坐一些时候，就同丈夫一道回去。到底是她细心，她看出了我在生病，她劝我吃药；她还吩咐厨房给我预备稀饭。她的平静的微笑表示出内心的愉快。我在旁边观察他们夫妇的关系，我觉得他们还是互相爱着，跟我初来时看见的一样。小虎也到我的房里来过两次，我好久没有被他正眼着过了。他现在对我也比较有礼貌些。我向他问话的时候，他也客气地回答几句。从老姚的口中我知道赵老太太带着孙儿、孙女到外县一个亲戚家里作客去了，大约还要过两个星期才回省来。小虎没有人陪着玩，也只好安安分分地上学读书，回家温课，并且也肯

听父亲的话了。

那么这一家人现在应该过得够幸福了。我替他们高兴，并且暗暗祝福他们。有一天我向老文谈起小虎，我说小虎现在改变多了。老文冷笑道："他才不会改好！黎先生，你不要信他。过几天赵外老太太一回来，他立刻又会变个样子。老爷、太太都是厚道的人，才受他的骗。我们都晓得他的把戏。"我不相信老文这番话，我认为他对小虎的成见太深了。

我这种患病的状态突然停止了。我不再发热，也能够吃饭。他们夫妇来约我出去玩，我看见他们兴致好，一连陪他们出去玩了三天。第三天我们回来较早，他们的车子先到家。我的车夫本来跑得不快，在一个街口转弯的时候，又跟迎面一部来车相撞，这两位同业放下车吵了一通，几乎要动起武来，却又忍住，互相恶毒地骂了几句，各人拉起车子走了。我回到姚家，在大门内意外地碰到杨家小孩。他正坐在板凳上跟李老汉谈话。

"黎先生，你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小孩看见我，高兴地跳起来。"姚太太他们回来好一阵了。"

"你好久没有来了，近来好吗？"我带笑望着他，亲切地说。

"我来过两回，都没有碰到你。我近来忙一点，"小孩亲热地答道。

"我们进去坐罢，今天月亮很好，"我说。

他跟着我进里面去了。他拉着我的手，用快乐的调子对我说："黎先生，我哥哥明天结婚了。"

我问他："你高兴吗？"我很力压住我的另一种感情，我害

怕我说出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讲的话。

他点点头说："我高兴。"他接着又解释道："他们都高兴，我也高兴。我喜欢我表姐，她做了嫂嫂，对我一定更好。"

这时我们已经进了花园的门廊。石栏杆外树荫中闪着月光，假山上涂着白影，阴暗和明亮混杂在一块儿。

"你晚上还没有来过，"我略略俯下头对小孩说。

"是，"他应了一声。

我们沿着石栏杆转到下花厅门前。栀子花香一股一股地送进我的鼻里来。

"我不进去，我在下面站一会儿就走，"小孩说。

"你急着回去，是不是帮忙准备你哥哥的婚礼？"我笑着问他。

"我明天一早就要起来，客人多，我们家里人少，怕忙不过来，"小孩答道。

我们走下台阶，在桂花树下面站住了。月光和树影在小孩的身上绘成一幅图画。他仰起头，眼光穿过两棵桂花树中间的空隙，望着顶上一段无云的蓝空。

"我想参加你哥哥的婚礼，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欢迎，欢迎！"小孩快乐地说。"黎先生，你一定来啊！"我还没有答话，他又往下说："明天一定热闹，就只少了一个人。要是爹在，我们人就齐了。"他换了语调，声音低，就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他忽然侧过头，朝我的脸上看，提高声音问道："黎先生，你还没有得到我爹的消息吗？"

我愣了一下，毅然答道："没有！"我马上又加一句："他好像不在省城里了。"

"我也这样想。我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他。李老汉儿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要是还在这儿，一定会有人看见他，我们大家到处找，一定会找到他的！他一定到别处做事去了，说不定他有天还会回来。"

"他会回来，"我机械地应道。我并不为着自己的谎话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连他这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也要打破呢？

"那么我会陪他到这儿来，看看他自己亲手刻的字，"小孩做梦似地说，就走到山茶树下，伸手在树身上抚摩了一会儿。他的头正被大块黑影盖着，我看不见他的脸上的表情。他不讲话。园里只有小虫唤友的叫声，显得相当寂寞。一阵风吹起来，月影在地上缓缓地摇动，又停住了。两三只蚊子连连地叮我的脸颊。我的心让这沉默淡淡地涂上了一层悲哀。突然间那个又瘦又脏的长脸在我的脑际浮现了，于是我看见那双亮了一下的眼睛，微动的嘴唇和长满疥疮的右手。我并没有忘记这最后的一瞥！他要跟我讲的是什么话？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让他在垂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现在太迟了！

"黎先生，我们再朝那边儿走走，好不好？"小孩忽然用带哭的声音问我。

"好，"我惊醒过来了。四周都闪着月光，只有我们站的地方罩着浓影。我费力地在阴暗中看了这个小孩一眼。我触到

他的眼光，我掉开头说了一句："我陪你走。"我的心微微地痛起来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假山中间的曲折的小径。他走得很慢，快走到上花厅纸窗下面的时候，他忽然站住，用手按住旁边假山的一个角说："我在这儿绊过跤，额楼① 就碰在这上头，现在还有个疤。"

"我倒看不出来，"我随口答了一句。

"就在这儿，给头发遮住了，要不说是看不见的。"他伸起右手去摸伤疤，我随着他的手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

我们沿着墙，从玉兰树，走到金鱼缸旁边，他把手在缸沿上按了一下，自语似地说："我还记得这个缸子，它年纪比我还大。"过了两三分钟，他朝着花台走去。后来我们又回到桂花树下面了。

"到里两去坐坐耍，"我站得疲乏了，提议道。

"不，我要回去了，"小孩摇摇头说；"黎先生，谢谢你啊！"

"好，我知道你家里人在等你，我也不留你了。你以后有空常常来玩耍。"

"我要来，"孩子亲切地答道。他迟疑了一下，又接下去说："不过听说哥哥有调到外县当主任的消息，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那么将来爹回来，也找不到我们了。"从这年轻的声音里漏出来一点点焦虑，这使我感动到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但是在这中间小孩告辞走了。临走他还

---

① 额楼：前额。

没有忘记邀请我，他说："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来啊。李老汉儿晓得我们的地方。"

我只好唯唯地应着。

我走进我的房间，扭开电灯，看见书桌上放了一封挂号信。我拆开信看了，是那位前辈作家写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四千元的汇票，这是我那本小说的一部分稿费。他在信上还说："快来罢，好些朋友都在这里，我们等着你来，大家在一块儿可以做点事情。……"他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的确是我的老朋友，我三年多没有看见他们了。

这一夜我失眠，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想到走的事情。的确我应该走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杨梦痴的故事完结了，老姚夫妇间的"误会"消除了。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地方等着我去。我还要留在憩园里干什么呢？我不能在这儿做一个长期的食客！

第二天老姚夫妇来看我，我便对他们说出我要走的话。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惊讶与失望的表情。自然，他们两个人轮流地挽留我，他们说得很诚恳。可是我坚决地谢绝了。我有我的一些理由。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折衷办法：我答应明年再来，他们答应在半个月以后放我走。我当时就把买车票的事托给老姚。

这天周嫂来给我送饭，老文替李老汉看门。据说李老汉请假看亲戚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去参加杨家的婚礼，去给他的旧主人再办一天事。不过他回来以后，我也没有对他提过这样的话。

三十四

十天平静地过去了。星期三的早晨老文告诉我一个消息：赵外老太太已经从外州县回省，昨天下午打发人来接了虎少爷去，并且说得明白，这回要留虎少爷多住几天，请姚老爷不要时常派车去接他回家。我听着，厌恶地皱起了眉头。我想：为什么又来扰乱别人家庭的和平呢？

下午老姚来通知我，他已经替我订了星期六的车票（他还交给我买票的介绍信），并且讲好星期五下半天他们夫妇在外面馆子里给我饯行。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的太太今天不大舒服，又知道他等一会儿要到赵家去。我问他小虎这回是不是要在赵家久住。他先说，外婆刚回省，接小虎去陪她，多住几天也不要紧，反正学堂已经放暑假，不必温习功课；后来他说，后天就要接小虎回来给我送行。最后他又说："这两天天气热起来了，车上很不舒服，你不如到了秋凉再走罢。"

我自然不会听从他的话。他走了。我想到赵老太太的古怪脾气，我有点为姚太太，为这一家人的幸福耽心。可是老姚本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这一天的确很热。我没有上街。我搬了一把藤躺椅到窗下石栏杆旁边，我坐在躺椅上，捧着一卷书，让那催眠歌似的

蝉噪单调地在我的耳边飘过，这样消磨了我的整个下午。从晚上九点钟起落着大雨，天气又转凉了。

雨哗啦哗啦地落了很久。我半夜醒来还听见雷声和水声。我耽心屋瓦会给雨打破，又耽心园里花木会给雨打倒。可是我第二天睁开眼睛，看见的却是满屋的阳光。

下午四点钟光景，老姚正在园里跟我闲谈。他把我常坐的那张籐椅搬出来，放到台阶下花盆旁边，他坐在那里悠闲地听着蝉声，喝着新泡的龙井。忽然赵青云带着紧张的脸色跑了进来，声音战抖地说："老爷，赵外老太太打发人来请老爷就过去，虎少爷给水冲起走了。"

"什么！"老姚正在喝茶，发出一声惊叫，就把手里杯子一丢，跳了起来。茶杯打碎了，水溅到我的脚上。

"虎少爷跟赵家几位少爷一路出城去浮水①。他们昨天下午也去过。今天水涨了，虎少爷不当心，出了事情。水流得急，不晓得人冲到哪儿去了，"赵青云激动地说。

老姚脸通红，额上不住地冒汗，眼珠也不转动了，他伸起手搔着头发。停了片刻他声音沙哑地说："我立刻去。我不进去了。你去跟太太说我有事情出去了。你们不要让太太知道虎少爷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赵青云连连答应着"是"。他先出去了。

我站起来轻轻地拍一下老姚的肩头，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事情或者不至于——"

---

① 浮水：游泳。

“我知道，我自己也应该负责。我走了。你要是见到昭华，不要告诉她小虎的事情，”老姚皱紧眉头打岔说，只有片刻的工夫，他的脸色就变成灰白了。他茫然看我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就走了出去。

我跟着他走出园门。我看见他坐上包车。我也没有再跟他讲话。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反复地咀嚼着他那句话：“我自己也应该负责。”这是他的真心话。他的确是有责任的。但是我的平静的心境给这件意外事情扰乱了，这一天就没有恢复过来。

老文送晚饭来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他眨着他那对小眼睛说：“黎先生，天老爷看得明白，做得公道，真是报应分明啊。”我茫然望着他这张似笑非笑的皱脸。他解释般地接下去说：“赵家天天想害我们太太，结果倒害了他自家外孙。这又怪得哪个？要是老爷肯听太太的话，也不会有这回事情。太太受了几年罪，现在也该出头了。”

他这番话要是迟几天对我讲，我也许会听得很高兴。可是现在听到，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不想反驳他，我只是淡淡地提醒他一句：“不过你们老爷就只有这一个少爷啊！”

老文埋下头，不作声了。我端着碗吃饭，可是我的眼光还时常射过去看他的脸。我看见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掉转身子朝着窗外，偷偷地揩眼睛。他走到门口，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再走过来收碗的时候，他一边抹桌子，一边战战兢兢地说：“只求天保佑虎少爷没有事情就好了。”凭他的声音，我知道这句话是从他心里吐出来的。

"也许不会有事情。"我也应了一句。我故意用这句话来安慰他。其实我同他一样地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找回小虎的尸首来。

三十五

我们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老姚的介绍信去汽车站买票。起初是没有到时间，以后是找不到地方，再后是找不到人。一直到十一点半钟我才把手续办好，拿到车票。可是人已经累得不堪了。

我记起来，在这附近有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那是一家兼卖饭菜的茶馆，房子筑在小河旁边，有着茅草盖的屋顶，树枝扎的栏杆，庭前种了些花草，靠河长了几棵垂柳。进门处灌木丛生，由一条小径通入里面。在大门外看，这里倒像是一座废园。这个茶馆我去过一次，座位清洁，客人不多，我倒喜欢这种地方。

我在河畔柳荫下围栏前一张小茶桌旁边坐下来。我吃了两碗面，正靠在竹椅背上打瞌睡，忽然给一阵嘈杂的人声惊醒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看见一些客人兴奋地朝外面跑去。也有几个人就站在围栏前向对岸张望。对岸横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路，路的另一边是一块稻田，稻田外面又是一条白亮亮的河。我面前这条小河便是它的支流。看热闹的乡下人和小孩们正拉成一根线从黄土路到它那里去。

“什么事？他们在看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我看见一个堂倌走过来，便指着那些站在围栏前张望的人问他道。

“淹死人，”堂倌毫不在意地答道，好像这是很平常的事。他朝我用手指指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轻蔑地动一下嘴添上一句：“在这儿怎么看得见？”

又淹死人！怎么我到处都看见灾祸！难道必须不断地提醒我，我是生活在苦难中间？

一个胖女人用手帕蒙住脸呜呜地哭着走过去了。她后面跟着一个老妈子同一个车夫模样的男人。他们是从河那边来的。

“这是他的妈，刚才哭得好伤心，”堂倌指着那个女人说。“她是寡妇，两房人就只有这一个儿子。”

“什么时候淹死的？”我问。

“昨天下半天，离这儿有好几里路！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说是给人打赌，人家说，你敢浮过对面去？他说声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浮过去。昨天水太大，他不当心，浮到半路上，水打了两个漩儿，他就完了。尸首冲到这儿来，给桥柱子挡住了，今早晨才看见，他妈晓得，刚才赶来哭一场，现在多半去给他预备后事。”堂倌像在叙说一个古代的故事似的，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

我不再向他问话，疲倦地把头放在竹椅的靠枕上，阖上了眼睛。我并没有睡意，我只是静静地想着小虎的事。

大概过了半点钟罢，一切都早已回到平静的状态里面了。我站起来付了钱，走出大门去。我走了不到一百步，在路上，

我看见了堂倌讲的那座桥。桥头还站着五六个人。好奇心鼓动我走到那里去。

桥静静地架在两岸上，桥身并不宽。在我站的这一头左边有一棵低垂的柳树，树叶快挨到水面了，靠近这棵柳树，在桥底下，仰卧地浮着一个完全赤裸的年轻人。他的左手向上伸着，给一条带子拴在桥柱上，右手松弛地垂在腰间。一张端正的长脸带着黑灰色，眼睛和嘴唇都紧紧闭着。他好像躺在那里沉睡，绝不像是一具死尸。

"简直跟活人一样！"我惊奇地自语道。

"起先更好看，一张脸红彤彤的！"旁边一个乡下人接嘴说，"等到他母亲来一哭，脸色立刻就变了。"

"真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地再说一句。

"我亲眼看见的，未必还有假！"他说着，瞪了我一眼。

我埋下头，默默地注视这张安静的睡脸。渐渐地我看得眼花了。我好像看见小虎睡在那里。我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叫起来，连忙揉了揉眼睛，桥下还是那一张陌生的睡脸。这就是死！这么快，这么简单，这么真实！

三十六

我回到姚家，看见老文同李老汉在大门口讲话。我问他们有没有虎少爷的消息。他们回答说没有。又说老爷一早带了赵青云出去，一直没有回来。老文还告诉我，太太要他跟我说，今天改在家里给我饯行。

“其实可以不必了。虎少爷出了事情，你们老爷又不在家，太太又有病，何必还客气，”我觉得不过意就对老文说了。

“太太还讲过，这是老爷吩咐的，老爷还说要赶回来吃饭，”老文恭顺地说。

“老爷赶得回来吗？”我顺口问道。

“老爷吩咐过晚饭开晏点儿，等他回来吃，”老文说到这里，立刻补上一句：“陪黎先生吃饭。”

老姚果然在七点钟以前赶回家。他同他的太太一起到下花厅来。他穿着白夏布的汗衫、长裤，太太穿一件白夏布滚蓝边的旗袍。饭桌摆好在花厅的中央。酒壶和菜碗已经放在桌上。他们让我在上方坐下，他们坐在两边。老姚给我斟了酒，也斟满他自己的杯子。

菜是几样精致可口的菜，酒是上好的黄酒。可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胃口。我们不大说话，也不大动筷子。我同老姚还

常常举起酒杯，但我也只是小口地呷着，好像酒味也变苦了。饭桌上有一种沉郁的气氛。我们(不管是我或者是他们)不论说一句话，动一下筷子，咳一声嗽，都显得很勉强似的。他们夫妇的脸上都有一种忧愁的表情。尤其是姚太太，她想把这阴影掩藏，却反而使它更加显露了。她双眉紧锁，脸色苍白，眼光低垂。她的丈夫黑起一张脸，皱起一大堆眉毛，眼圈带着灰黑色，眼光常常茫然地定在一处，他好像在看什么，又像不在看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不过我想，我的脸色一定也不好看罢。

"黎先生，请随便吃点儿菜，你怎么不动筷子啊？"姚太太望着我带笑地说。我觉得她的笑里有苦涩味。她笑得跟平日不同了。

"我在吃，我在吃，"我连声应着，立刻动了两下筷子，但是过后我的手又不动了。

"其实你这回应当住到秋凉后才走的。你走了，我们这儿更清静了。偏偏又遇到小虎的事，"她慢慢地说，提到小虎，她马上埋下头去。

我一直没有向老姚问起小虎的下落，并不是我不想知道，只是因为我害怕触动他的伤痛。现在听见他的太太提到小虎的名字，我瞥了他一眼，他正埋着头在喝酒，我忍不住问他的太太道："小虎怎么了？人找到没有？"

她略略抬起脸看我一眼，把头摇了摇。"没有。诵诗到那儿去看过，水流得那么急，不晓得冲到哪儿去了。现在沿着河找人到处打捞。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她哽咽地说，

泪水在她的眼里发亮了，她又低下头去。

"是不是给别人搭救起来了？"我为着安慰他们，才说出这句我自己也知道是毫无意义的话。

姚太太不作声了。老姚忽然转过脸来看我，举起杯子，声音沙哑地说："老黎，喝酒罢。"他一口就喝光了大半玻璃杯的酒。姚太太关心地默默望着他。他马上又把杯子斟满了。

"老姚，今天我们少喝点。我自然不会喝酒。可是你酒量也有限，况且是空肚子喝酒……"我说。

"不要紧，我不会醉。你要走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碰到一块儿喝酒，今天多喝几杯有什么关系！吃点菜罢，"他打断了我的话，最后拿起筷子对我示意。

"天气热，还是少喝点儿罢，"他的太太在旁边插嘴说。

"不，"他摇摇头说；"我今天心里头不好过，我要多喝点儿酒。"他又把脸向着我："老黎，你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我不劝你。我只想喝酒，不想讲话，昭华陪你谈谈罢。"他的一双眼睛是干燥的。可是他的面容比哭的样子还难看。

"不要紧，你不必管我，你用不着跟我客气，"我答道。"其实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已经不算是客人了。"

"也没有几个月，怎么说得上久呢？黎先生，你明年要来啊！"姚太太接着说。

我刚刚答应着，老姚忽然向我伸过右手来，叫了一声"老黎"。他整个脸都红了。我也把右手伸过去。他紧紧捏住它，恳切地望着我，用劲地说着两个字："明年。"

"明年，"我感动地答应着，我才注意到两只酒瓶已经空

了。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喝光一杯酒。

"这才够朋友！"他说，就把手收回去，端起酒杯喝光了。过后他向着他的太太勉强地笑了笑，说："昭华，再开一瓶酒罢。喊老文去拿来。"

"够了，你不能再喝了，"他的太太答道。她又转过脸去，看了老文一眼。老文站在门口等着他们的决定。

"不，我还没有喝够，我自己去拿。"他推开椅子站起来，他没有立稳，身子晃了两晃，他连忙按住桌面。

"怎么啦？"他的太太站起来，惊问道。我也站起来了。

"我喝醉了，"他苦笑地说，又坐了下来。

"那么你回屋去躺躺罢，"我劝道。我看他连眼睛也红了。他不回答我，忽然伸起双手去抓自己的头发，痛苦地、声音沙哑地嚷起来："我没有做过坏事，害过人！为什么现在连小虎的尸首也找不到？难道就让他永远泡在水里，这叫我做父亲的心里怎么过得去！"他蒙住脸呜呜地哭了。

"姚太太，你陪他进去罢，"我小声对他的太太说，"他醉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他这两天也太累了。你自己也应当小心，你的病刚好。你们早点休息罢。"

"那么我们不陪你了，你明年——"她只说了这几个字，两只发亮的黑眼睛带了惜别的意思望着我。

"我明年一定来看你们，"我带点感伤地说。我看见她的脸上浮出了凄凉的微笑。她的眼光好像在说：我们等着你啊！她站到丈夫的身边，俯下头去看他，正要讲话。

老姚忽然止了哭，取下蒙脸的手，站起来，用他的大手拍

我的肩头，大声说：

"我明天早晨一定送你到车站。我已经吩咐过，天一亮就给我们预备好车子。"

"你不必送我。我行李少，票子又买好了，一个人走也很方便。你这两天太累了。"

"我一定要送你，"他固执地说。"明天早晨我一定来送你。"他让太太挽着他的膀子摇摇晃晃地走出花厅去了。我叫老文跟着他们进去，我耽心他会在半路上跌倒。

我一个人坐在这个空阔的厅子里吃了一碗饭，又喝光了那杯酒。老文来收碗的时候，他对我说太太已经答应，明天打发他跟我上车站去。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够像平日那样地听他长谈，我的脑筋迟钝了。酒在我的身上发生效力了。

酒安定了我的神经。我睡得很好。我什么事都不想，实在我也不能够用思想了。

老文来叫醒我的时候，天刚发白，夜色还躲藏在屋角。他给我打脸水，又端了早点来。等我把行李收拾好，已经是五点多钟了。我决定不等老姚来，就动身去车站。我刚刚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文，就听见窗外有人在小声讲话，接着脚步声也听见了。我知道来的是谁，就走出去迎她。

我跨出门槛就看见姚太太同周嫂两人走来。

"姚太太，怎么你起来了？"我问道，我的话里含得有惊喜，也有感激。我并且还想着：老姚也就要来了。

"我们还怕来不及，"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说。她跟我走进

厅子里去，一边还说："诵诗不能够送你了，他昨晚上吃醉了，吐了好几回，今早晨实在起不来，很对不起你。"

"姚太太，你怎么还这样客气！"我微笑道。接着我又问她："诵诗不要紧罢？"

"他现在睡得很好，大概过了今天就会复原的。不过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你知道他多爱小虎，又一连跑了两天，精神也难支持下去。倘使以后你有空，还要请你多写信劝劝他，劝他看开一点。"

"是的，我一定写信给你们。"

"那么谢谢你，你一定要写信啊！"她笑了笑，又转过脸去问老文："车子预备好了罢？"

"回太太，早就好了，"老文答道。

"那么，黎先生，你该动身了罢？"

"我就走了。"我又望着她手里拿的一封信。这个我先前在门外看见她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便问她："姚太太，是不是要托我带什么信？"

"不是，这是我们的结婚照片，那天我找了出来，诵诗说还没有送过你照片，所以拿出来给你带去。"她把信封递给我。"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两个朋友啊，我们不论什么时候都欢迎你回来。"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我找回她那照亮一切的笑容了。

我感谢了她，可是并不取出照片来看，就连信封一起放在我的衣袋里。然后我握了一下她伸过来的手："那么再见罢。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请你替我跟诵诗讲一声。"

我们四个人一路出了园门，老文拿着我的行李，周嫂跟在姚太太后面。

"请回去罢，"我走下天井，掉转脸对姚太太说。

"等你上车子罢。今天也算是我代表他送你，"她说着一直把我送到二门口。我正要上车，忽然听见她带着轻微的叹息说："我真羡慕你能够自由地往各处跑。"

我知道这只是她一时的思想。我短短地回答她一句："其实各人有各人的世界。"

车子拉着我和皮箱走了，老文跟在后面，他到外面去雇街车。车子向开着的大门转弯的时候，我回头去看，姚太太还立在二门口同周嫂讲话。我带了点留恋的感情朝着她一挥手，转眼间姚公馆的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那两个脸盆大的红字"憩园"仍然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它们看着我来，现在又看着我去。

"黎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喊我，我回过头，正看见李老汉朝着我的车子跑来。我叫老李停住车。

李老汉跑得气咻咻的，一站住就伸手摸他的光头。

"黎先生，你明年一定要来啊！"他结结巴巴地说，一张脸也红了，白胡须在晨光中微微地摇颤。

"我明年来，"我感谢地答应道。车子又朝前滚动了。它走过大仙祠的门前，老文刚雇好车子坐上去。至于大仙祠，我应当在这里提一句：我有一个时期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在四五天以前就开始拆毁了，说是要修建什么纪念馆。现在它还在拆毁中，所以我的车子经过的时候，只看见成堆的瓦砾。

后　　记

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正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来应当遵照那些先生的指示，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钱并不会给我增加什么。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并且钱就跟冬天的雪一样，积起来慢，化起来快。像这本小说里所写的那样，高大房屋和漂亮花园的确常常更换主人。谁见过保持到百年、几百年的私人财产！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是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同信仰。

这本小说是我的创作。可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那些主人公说的全是别人说过的话。

“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像这样的话不知道已经有若干人讲过若干次了。我高兴我能在这本小说里重复一次，让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除了找钱以外，他还有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做。

巴　金 1944年7月。

附　录

《憩园》法文译本序

我高兴我的小说《憩园》也给译成了法文，让《家》的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地主家庭怎样地走向没落和灭亡。

一九四四年《憩园》初版发行的时候，我写过如下的“内容说明”：

> 这部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爷病死在监牢中，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认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有勇气冲出来。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公馆里出生的。我写的是真实的生活。《憩园》中的杨老三杨梦痴就是《家》里面的高克定。他的死亡是按照他真实的结局写的。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感到愤怒，可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小说《憩园》中就没有一个敢于斗争的

人。我的小说只是替垂死的旧社会唱挽歌。

然而这一切终于像梦魇似地过去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还有我的读者今天正迈着大步向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过去痛苦的回忆和新旧社会的对比，只能加强他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法国的朋友和读者倘使从这个忧郁的故事中看到我们在其中生活过的旧社会，更加理解摆脱了旧枷锁的新中国人意气昂扬的精神面貌和我们迫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和决心，热情地紧握我们伸过去的友谊的手，那么作为小说的作者，我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1978年5月3日。

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一九四六年一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初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一版，迄一九五三年五月，共印行十版(次)。

一九五五年五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一版。

小　引

一

巴金先生：

你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罢。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张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二十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院出来，又要到另一家医院去。你问我去治什么病，我答说割胆囊。你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不妨写下来。我说，我想试一下，要是写成功，一定请你替我看一遍。你没有表示拒绝。

在医院中我真的开始写起日记来，后来却中断了。那自然是开刀后的事。不过出院后住在某父执的家中我又凭着记忆补足了它。但是我并没有敢把我这草率的"病中日记"寄给你看，一则我知道你忙，二则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后你逃到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①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心"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

① 桂柳：桂林和柳州。

尘封了的"病中日记"。我找出它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它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以供世人阅读，但是对于像你这样愿意了解人心的人，它也许有点用处。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不过原稿十八章字数过多，我不想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个整数。我没有抄下副稿。我把原稿寄给你，让你自由处置。

然而有两件事情我还得向你"添说"。我用了"添说"两字，因为那是我无法在"日记"中叙述，而又必须让你知道的。

一、到今天我还没有打听到杨大夫（杨木华大夫）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过衡阳没有。医院方面得过她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电报，但那是在衡阳被围攻了两星期之后才收到的。那便是她的最后的信息了。我问过好些从衡阳一带逃难出来的人，都答说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他们在路上没有遇见过她。

二、给朱云标母亲的信，我至今未写，因为我没有问到她的通信处。我到××坡××器材库去找过朱云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下略）

陆 怀 民 1945年2月，贵阳。

二

怀民先生：

（上略）"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

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明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

最近我听见一个从湘桂逃难出来的朋友说，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热心地帮忙抢救受难的人，有人说她后来受了伤，又有人说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车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车停在站上，她一个人下车去买食物，她回来时列车被炸着火了。她紧张地奔走，帮忙抢救车上的人。可是她的亲人并没有能够救出来。她本人后来也不见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也可能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据说那个杨大夫是一个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

不过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杨木华大夫。因为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的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个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他很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最近有个朋友从成都来，他才从××医院出来不久，他在那里遇见过一位姓杨的女大夫，也是浓发大眼的小姐，也是衡阳人，不过她的额上有块小伤疤，她的名字并不叫“木华”，她叫“再生”。可能是杨木华大夫改了名字，也可能是我的朋友见到了另一个人。

总之，我们还可以继续打听杨木华大夫的消息。

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罢)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叮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记印出就死去的话，请你为我谢谢我们的卫生局长，因为这是托了他的福，他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早升天国，将来历史会感激地记载他的名字。

巴　　金 1945年7月，重庆。

第 一 章

六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已带铺盖来吗？”我答

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罢。"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

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

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罢？"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罢？"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小便臭，不觉自语道："哪儿来的臭气？"

"老郑来倒小便壶啊，"第六床接着说。

我不知道老郑是谁，但是我看见一个工友提了一只铅桶朝着我们这面走来。他把桶放在第四床床脚边，却去拿了第六床、第七床的便壶来，把小便倾在桶里。我听见一阵溅水声，正要拿手帕蒙鼻孔，一股带大蒜气的尿臭已经扑到鼻孔里来了。工友把便壶放回到原处，又去把铅桶提到第七床床脚放着。又是一阵暴雨声和一阵臭。工友放回便壶以后，我看见第六床伸了右手到床下面去摸凳子。他的手只能挨到凳子的一只角。无论如何他拿不到便壶。

"哎呀，又是这样乱放！"第六床皱紧浓眉自语道。接着他大声唤道："老郑！老郑！"

老郑已经到第九床那里去了，他回过头板起脸孔问道："什么事？"

"小便壶我拿不到呀！"第六床着急地说。

"拿不到，你讲话客气点。说个'请'字，又不是花钱的事。我们也是人啊！"老郑说；他那张四方脸仍然是死板板的，不说肉，连颊上挨近鼻梁地方的几颗麻子也不肯动一下。他也是浓眉，厚嘴唇，不过鼻子却是塌的，眼白上牵了几根红丝。

"总是这样凶，我才只说了一句话，"第六床诉苦般地自语道。

老郑走过来，嘴里叽咕着，伸手把第六床床下的凳子拉了一半到外面，他又拿起便壶用力在凳上一放，一面说："现在该拿得到罗。你屙罢，你屙罢，"他并不正眼看这个病人，就气冲冲地走了。接着倒尿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个工友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我感到一点儿不平，又

觉得有点儿奇怪，暗暗想道。可是第六床却不作声了。

我也不想讲话。我有一点儿睡意，就微微闭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这中间我好像听见隔壁第四床病人的呕吐声，但是我也并不注意。

“试表，试表！”少女的声音在我旁边唤着。我睁开眼睛。一个矮胖的看护小姐站在我的床前，她递给我一支温度表，说：“好好地衔在嘴里。”我点点头。我把它放在口里，我想笑，想说：“难道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又听见她在说：“把手伸出来！”便把左手伸给她让她去数脉搏。她默默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两三个字就走了。我听见她又在唤第四床：“试表！试表！”那个割了盲肠的病人发出两声痛苦的呻吟。

“你还难过吗？”少女的声音问道。

病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

“你要喝水，是不是？”她柔声再问。

病人短短地应了一声。

“我拿给你喝好罗。”她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俯下身去，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口边，让水慢慢流进病人的嘴里。

“够罗。等一会儿再喝罢，”她像在吩咐小孩似地说。我看那个病人，他的嘴边有一圈短短的胡子，额上有好几条皱纹。他至少比她大十几岁。在他面前她却露出那样的大人气，她其实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胡小姐！胡小姐！”第九床的病人在唤她。

“哪样？”她抬起头问道。

"你今天进城罢?"

"我今天不进城。方小姐进城。你要买哪样?"胡小姐微笑道。她的脸型像一个"曰"字,是扁圆的。

"方小姐是那个身材高高、脸长长的罢?"第三床的病人坐起来说。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颧骨略高,牙齿稍稍突出,头发剪得带了点滑稽相。

"那是袁小姐,人家脸并不长啊。方小姐就是那个举止呆呆板板、不大爱笑的,不过人却是很好的。试表!"她说着,就走到第三床跟前,把表递给那个病人。

"说好,我看这个医院里就只有你胡小姐好,没有哪个比得上!"第三床带笑说,他并不把温度表放进口里去。

"不要乱说啊。医院里有四个病室,你没有见过的护士多得很!"胡小姐笑答道。她又催他一声:"快试表,不要拿着玩!"她一面在数他的脉搏。

"我又没有发烧,天天试温度干什么!"第三床毫不在乎地说。

"那不管。你只要住院一天,不管病好没有好,就得试温度,验脉搏,"胡小姐说完,就向第二床走去,不再理那个多话的病人了。

我口里还衔着一支温度表,她不来拿去。我不能忍耐,只姐取出来让自己先看一下。我果然取出来了。可是我把它横着拿在手里,始终着不出水银升到多高,我看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我的温度多少。

胡小姐来了。"不要自己拿出来乱看,"她责备地说,就把

温度表从我的手里抢了去。我问她："发烧吗？"

"有一点点，不要紧，"她答道，便匆匆走开了。

第四床的病人忽然哇地一声吐起来。我听见第三床在喊："胡小姐，快来，第四床吐了。"

"不要紧，他是要吐的，"胡小姐回过头来朝第四床望了一眼，简单地答道。她继续向着病室里那张唯一的条桌走去。那是她们护士办公的地方。条桌后面还有一块略带方形的空地。正面壁上开了一堵大窗，两边各放着一个放药品和用具的带柜子的橱。

第四床止了吐，歇了一两分钟，却含糊地叫起来，声音不大，我只听见"小姐"两个字。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我看他，他的脸色黄得真难看，嘴唇痛苦地微微动着。

"胡小姐，胡小姐，第四床在叫你！"第三床大声说。

胡小姐正站在条桌前和护士长汪小姐讲话，就掉转头问了他一句："哪样？"

"他请你过来有事情，"第三床带笑说。

胡小姐迟疑一下，还是走过来了。她一直走到第四床床前，埋下头声音温和地问那个病人："你要哪样？是不是要喝水？"

病人诉苦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还是不清楚，不过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心里难过，要睡枕头。

"不行，你打过麻药针，不好睡枕头。今天故意把你枕头拿走的。再难过你也得熬过今天，一天熬过就好罗，"胡小姐摇摇头说。

病人应了一声就不再响了。我却开始想着：他还是半身麻醉就这样难受。我将来开刀的时候要全部麻醉。那怎么受得了！这样一想，我真有点儿害怕了。我掉过脸不敢再看他。我勉强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老郑！老郑！你去给我叫碗大卤面来！"我听见一个好像熟悉的声音在大声说。我睁开眼睛，看见老郑端了一个木盘盛着几个浅口的土饭碗，他走到第四床跟前，放了一个碗在方木柜上，说："你自己会吃吗？流质。"病人哼了一声。老郑也不去管他在说什么，就转过身向第三床问道："苏先生，你喊肉丝面？"

"大卤面，快点儿去，我饿得受不住了！"第三床露出一排黄牙齿带笑说。

"好的，"老郑答应一声，他又向第七床走去。他留下一个碗给那个病人。

"老郑，老郑！"又是第六床的叫唤声。老郑回过头厌恶地朝第六床看了一眼，连哼也不哼一声。

"我要买鸡蛋，"第六床似乎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恨意，他只顾自己说，他的右手正伸在枕头下面摸他的钞票。

"刚才走到你面前，你连屁也不放一个。走过了你倒要买东西罗，我又不是你公馆里的听差，"老郑咕噜着。他并不理睬第六床，却端着木盘，从第八床床脚边的过道，走到对面那一部分去了。

老郑去远了。第六床的右手抓着几张钞票，压在铺盖上。

他呆了似地望着老郑的背影，半晌才吐出一声"啊哟！"接着是一声叹息！他的眉毛和眼睛显得更朝上竖了。"何必这样欺负人！"他用了一种古怪的声音轻轻地说。我害怕多看他这样的神气。

"他们那种人只晓得要钱，你给他一点钱，他就不会这样，"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嘴说，说话的人坐在第八号病床上。一块白布（也许是一方手帕）从他的下巴一直束到前额，在发际打了一个蝴蝶似的小结，那两只小翅膀高高地翘着。这样一来，他的脸显得丰满多了。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背心和一件白布衬衫。

"给钱也要到出院的时候，这里又不是旅馆客栈，"第六床咕噜地说。

"现在不比从前了，生活这样高，天天在涨，哪个人不要钱！"第八床的病人接嘴说。第八床和第三床排在一根直线上（在我的眼睛看来，它们算是横放的），中间还留了一大块空地位，两张直放的病床占据了这个地位的一大半，那就是第十一床和十二床。十一床床头靠近第九床的床脚，十二床的床头挨近第二床的脚。

"老沈，你又在讲什么？讲个笑话罢？"第三床带笑打岔道。

"现在不好讲笑话，小姐要干涉的，"第八床答道。"我在讲医院。就说住院罢，从前在南京、上海，只要搬进医院，你身上不用带一毛钱。现在连胶布都要自己去买来。没有胶布你休想换药。再说：你缴了一笔住院费，不到你出院，过两天钱

扣得差不多了，入院处的彭先生就会跑来像讨债一样逼着你要钱。简直跟客栈一样……”

“少讲点话好不好。你们病轻的人不在乎，人家现在要休息。第四床今天才开过刀，”胡小姐突然走过来抱怨似地插嘴说，不过她的脸上并没有恼怒的表情。

“好，老沈，不要讲了。免得惹起胡小姐生气，”第三床带笑地说。

“今天让胡小姐刮了胡子罗，”第八床笑答道。他又转向胡小姐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好，你怎么也学起袁小姐那个样子来！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快不要乱说。人家袁小姐也是好人，”胡小姐的胖脸上绽出了一丝笑意。

“是，我晓得。这里的小姐都是好人，没有一个不好的，”第八床说着，自己忍不住先笑了。

“好，好，请你不要讲了。等会儿大夫来碰见，又要怪我们护士不负责，”胡小姐微微皱起眉毛说。她说完便掉头走开了。

第八床做了一个鬼脸，这是对着第三床做的。他不再作声了。第三床也躺下去，用铺盖蒙着头睡了。

但是屋子里并不是清静的。别的病人在讲话。后来胡小姐也在同汪小姐谈话。一个穿红绒线衫的护士从外面进来，在条桌前立了两分钟，又匆匆地走出去了。接着一个短小精悍的护士走进来。她站在药橱前面取什么东西。

大夫进来了，来的不止一个，有男有女，穿着一样的白色

工作衣。前面一个就是给我看病的冯大夫。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应该来看我的病了。"这样想着，我感到一点安慰，同时又有一点兴奋。

冯大夫和别的大夫们围着条桌站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在看病历表，在写字。我的好奇的眼光只能探索到这一点。……但是冯大夫和一个女大夫向着我走来了。女大夫的手里还捧着一个放了好些药瓶的长方形匣子。她比冯大夫矮一个头，身子却比他宽。浓发，大眼，厚嘴唇，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立在我的病床的两边。冯大夫张开他那仿佛用墨笔绘上了两撇八字胡的薄嘴唇，和蔼地笑问道："你今天进来的？"

"是。"我点点头，过后又急切地问他："明天就可以开刀吗？"

冯大夫不回答，却反问我："你不觉得什么痛苦罢？"

"不，"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后天给你照 X 光相，"冯大夫看了看病历表，说。

"照了 X 光就可以开刀吗？"我又问。

"不一定。看了相片再说，"冯大夫答道。他揭起我的铺盖："让我看一下。"

他已经在门诊室里看过了。但是他说还要看，而且旁边有一位年轻女大夫（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六岁），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露出我的肚皮。不过我不能不听从大夫的命令。我终于把穿在身上的衣服（绒线衣、衬衫、汗衣）向上挽起来。他俯下头，摸摸，敲敲，听听，然后叫我盖上被。他用英语和女大夫讲了几句话。她也用英语回答。我不明白他们讲些

什么，我只听懂几个单字，却连不起来。

女大夫开始向我问话。她问得详细，从我的父母和家庭状况，我的职业，以及个人嗜好都问到了。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说话快，只见嘴在动（因为我这些时候一直在偷偷地看她的嘴唇），好像在背书似的。我觉得有许多问话和我的病完全没有关系（后来我听见每个大夫对新入院的病人都问着这样的一套话）。冯大夫在她问话的中间走开了。

"现在我给你取血来验，不要害怕，不会痛的，"她说着就转过身向着方木柜，在她那个木匣子里取什么东西。"你朝右边偏一下，"我听见她这样吩咐。我顺从了。我的左耳被针扎了一下。并不怎么痛。我继续把右边脸颊压在枕上。过了片刻，我觉得她用棉花在我的左耳上揉擦了一下。我想应该没有事了。果然她捧着木匣子，沿着十一床旁边的过道走向条桌去了。

"这个女大夫姓什么？"我转过脸去问第六床。

"我不知道，"第六床摇头回答。

"她吗？姓杨，杨大夫，"第八床插嘴说。

"姓杨，杨大夫，"我跟着在心里念了一遍。我喜欢看她那亲切、豪爽的面貌。

"你怎样？有什么不舒服？"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的右面响起来。是谁在问？难道又来一个大夫给我诊病？我又把脸掉向右边。

一个瘦小的大夫背向着我，正在向第四床问话。

"我心里难过得很，"病人回答。

“那是麻药的关系，开刀地方痛不痛？”大夫又问。

“有一点点。我不想吃东西。”吐字比先前清楚，声音还是微弱无力。

“这不要紧。你这两天不能乱吃东西，只能喝点水，吃点流质。”

“我没有枕头睡不好。只想吐。我想睡枕头。”

“今天不行。明天就给你睡枕头。你要是忍不住，请小姐给你打一针；要是晚上还睡不着，你请小姐给你吃点睡药，等一会儿我关照小姐一声。”

病人听见大夫这番话，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大夫走了。病人又发出两三声短短的呻吟。

过了一阵，其实时间相当长久，不过我并没有计算时间（我的表停了）。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在这中间我有时候闭上眼睛养神，有时候又睁开眼，向各处看看，有时候又和第六床的病人说一两句话。我不再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从门外走进来。深灰色的衣服上粘着油腻，腰间系了一条围裙，袖子挽起来。我一看便知道他是饭馆的堂倌。他来这儿做什么？我想道。

“老许，我叫的面为什么不端来？我等了两点钟了。”第三床大声说。“岂有此理！”

“我实在没有空，老郑又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是你叫的，”老许走过来，陪笑地向第三床解释道。“我就去给你端来，好

不好？”

“现在不要了，要吃饭了。给我炒个菜罢，炒猪肝，”第三床说。

“老许，老许！”好像四面八方都在叫他。这个年轻的堂倌一面应着，一面转动脸向各处点头。他又走到第八床那里。

“炒什么菜？”他带笑问第八床。

“炒一盘蛋，”第八床回答。

“老高，老高！”一个沙哑的粗声在喊。这声音是从第十一床发出来的。这个病人枕头下垫着靠背，我只能看见他的头，面且这只是一个头顶。头发剪得很短，我看不见他的面貌，却可以猜想到，这个人有一张圆圆脸和一个结实的身体。

我不知道谁是老高。老许还在同第八床讲话。

“老高！老高！”第十一床继续在喊。声音里似乎含得有愤怒和焦急。

“他不是老高。老高没有来。他是老许，”第八床带笑地接嘴说。

“老许！老许！”第十一床立刻接着叫起来。

“你要炒菜吗？”老许掉转身，微微埋下头问道。

“我要一碗炸酱面，要快！”沙哑的粗声说。

“好，回头我给你送来，”老许答应着。

“老许，给我炒盘榨菜肉丝！”第九床抬起头来说。我看见他一只手按住左眼，眼睛上垫着一叠纱布。他和第十一床一样，头也是剪得光光的。他穿着医院里发给病人穿的宽大的白布短衣。

"好，明天早晨还要小笼包饺吗？"老许堆着一脸笑说。

"当然要，"第九床答道。他接着又叮嘱一句："菜要早点送来，不要等到饭都冷罗！"

"不会的，"老许答道。这时候在对面一角的病床中间有好几个人不耐烦地接连喊"老许"，老许大声应着，匆匆地走过去了。

"真没有办法，简直把这里弄成菜馆了。叫他不要送菜进来，他总不肯听，"汪小姐大声抱怨道，她这时候正站在条桌前面同那个短小精悍的小姐讲话。

"你不准他送菜进来，那么我们从哪里得到营养？大夫天天叫我们吃好东西，医院又不给我们吃。自己出钱买，你们又不准。哪有这种道理！"第八床咕噜地说，他的声音不高，不会给汪小姐听见。

"老郑，老郑！"第十一床忽然粗声叫起来。

没有人理他。他一直叫下去。

"哪样？"汪小姐立在原处，抬起头，问道。

第十一床不回答。只是叫着："老郑，"这是痛苦的声音。

那个短小精悍的小姐挺着她那还未发育完全的胸部走到第十一床床前，问他："十一床，你要哪样？"

他含糊地吐出三个字。我听不清楚。我只听见那位小姐加重语气再问一句。

病人的回答仍旧是含糊不清楚的，不过声音倒更像是痛苦的呻吟了。

“刘小姐，他要大便盆，”第九床取下了左眼上的纱布，坐直身子，解释道。

“好的，我给你喊老郑来，”刘小姐说着便挺直身子端起肩头走开了。

我听见她在外面喊老郑，大约叫了四五声。她应该走远了。过了几分钟，她又从外面走进来。她走到第十一床那里，温和地对他说：“老郑不在。他就回来。你等一下。”

“我不能等，喊他快点来！”病人近乎粗暴地说。

“给你说，老郑不在，只好等他回来，”刘小姐板起面孔说。

第十一床不作声了。可是等到刘小姐走开了，他却开始低声呻吟起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罢，第十一床又大声在叫“老郑”。

“十一床，你不要吵。老郑不在，你吵也没有用。人家病重的要休息，要静养，你懂得规矩的，”汪小姐仍旧站在原处，只是把眼光射过来，她带着教训的口气说。

“小姐啊！快，快！大便盆，快拿来！小姐，做做好事啊！老郑！”第十一床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又叫起来，而且声音更痛苦了。

“给你说等老郑回来就拿来。你喊我又有什么用！”汪小姐不耐烦地说。

“老郑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一个病室里二十四张病床，从没有空过。这么多的病人，靠他招呼，他倒躲起来不做事！”刘小姐接下去抱怨道。

“小姐啊，做做好事啊！做做好事啊！”第十一床继续大声

呻吟道。

"给你说，叫你不要吵，别人要静养！"刘小姐走过来干涉道。

"你也奇怪。你要大便，喊小姐干什么。小姐们又不是给你拿大便盆的，"第八床的老沈笑嘻嘻地插嘴对第十一床说，他高兴自己又抓到跟小姐们开玩笑的机会了。

刘小姐不再作声。她用责备的眼光瞅了第八床一眼，又回到条桌那面去了。

"其实小姐们拿回把大便盆，又有什么不可以！既然是来看护病人，还摆什么臭架子！"第九床不以为然地自语道。他躺下来，侧着身子，闭上眼睛睡了。

第十一床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我看见他忽然伸起右膀来，挥动一下，又放下去了。这是一只带红色的光膀子，非常结实，肌肉就像要蹦出来似的。

"好罗，老郑来罗，"胡小姐松口气地说。老郑从容地走进病室来，手里提着一把铜开水壶。

"老郑，十一床要大便盆，"胡小姐说。

"等我先冲了开水，"老郑短短地答道，脸上的表情并不曾起一点变化，或者可以说他的脸上根本就没有表情，好像他的脸是用纸糊起来似的。他说了，便走到第一床的方木柜前面拿起壶冲开水。

胡小姐不说话了。刘小姐低声骂了一句："岂有此理！"可是第十一床这个病人看见了老郑，又大声叫起来："老郑，大便盆，快点啦，快点啦！"

老郑只管冲他的开水，并不去理睬第十一床。他默默地走过第二床，第三床，第四床……一壶冲满了又是一壶。老郑走到第七床前面了。第十一床的呻唤声始终没有停止，不过声音轻了些。忽然他动了一下头，好像他想转过脸来看老郑，我看见他的半边脸，但这只是短短的一瞥！黑红色的、结实的圆圆脸。他的头立刻又放平了。他气咻咻地叫着："快点啦！快点啦！"

我的心被这叫声搅得非常难过。我用手蒙住两耳，用被蒙着头，但是并没有用。我更加不舒服。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催促老郑把大便盆拿来呢？为什么医院里容许这种恶意的作弄？我想说话，我的喉咙发痒了。我咳了一声嗽。

但是第九床占了先。那个光头的年轻人一翻身坐起来。他睁大他那双小眼睛瞪着老郑，用带怒的声音说："老郑，你就把大便盆给他拿来罢。让他这样吵下去有什么好处！吵得大家都不安宁。"

老郑立刻掉转身，走了两步，对着第十一床气愤地说："不要喊罗，我就去给你拿来！"他把开水壶放在地上，踏着大步往外面走了。

"这种人只晓得要钱！你有钱给他，你就是他的祖宗！没有钱你就是他的孙子！"第九床对着老郑的背影厌恶地骂道。

这次并不要等多大一会儿工夫，大便盆拿来了。老郑把它往第十一床的床沿上一放，大声说："好罗，好罗，你屙罢。不要吵罗。草纸在哪儿？你有草纸吗？拿出来。"

第十一床含糊地说了一句话。

"我不晓得，"老郑摇头说。他揭起被单(铺盖刚才落到床脚了)，把那个扁而长的洋磁盆塞到病人的身子下面去，过后又大声吩咐："你屙好，不要又吵，我自家会来拿。病房里二十几个病人，我又不是专伺候你一个人的。"他说了便去拿起水壶继续冲开水。

第十一床不再呻吟叫嚷了，病房里顿时显得清静多了。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疲倦地闭上我的眼睛，我愿意享受这片刻的休息。

"不吵了，现在该舒服了，"一个人开玩笑地说，我不用睁开眼清，便知道这句话是第八床说的。我仿佛看见了他那对滚圆的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

"这都是老郑害人，可以说是恶作剧，"另一个人带笑地接嘴说。我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第三床那个姓苏的。

我没有睡，我也不想什么。但是我仍旧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陌生的浙江口音在旁边讲话，我把眼睛微微睁开，朝第六床看。一个司机打扮的中年人站在第六床的右边，眼光定在那个病人的脸上。我又闭上了眼。

可是这两个朋友的谈话(不用说，他一定是第六床朱云标的朋友)仍旧断断续续地送进我的耳里来。虽然我并不注意地听他们，但是谈话的内容却被我抓住了，被我这爱管闲事的心抓住了。这个朋友是"独汽二营"① 的一个司机，就要开车

① "独汽二营"：独立汽车队第二营。

到××地方去。他来告别,并且劝病人安心养伤,不要着急。

“医官原说过两个星期包接好,到现在还没有上石膏,都是骗人的话,”第六床烦躁地说。

“治病有快有慢,哪里说得准!医官不会害你的。这个医院不敲竹杠,医官也有名,病该几天好,就不好早一天出院。你请准了假,多住一两个星期也不要紧……”

这次第六床又来打岔了:“你不晓得这个地方真气闷啊!我只想早一天回到库里去。……不过我又害怕会成残废。……”他停了停,又说:“我前年正月底出来,我娘总不放心,她不肯给我走。我一定要走,就走罗。如果我成了残废,我这辈子就没脸见我娘啊。……我想起,就有点懊悔……”

我睁开了眼睛。

“你哪里会成残废?这个医院外科主任黄医官很出名,他不知道接好了多少断骨头!……我们营里好几个弟兄,都是他治好的。”

“我运气太不好,我不是黄医官看的。是林医官,福建人,他讲话我听不大明白。……他脾气不好。多问两句话,他就不高兴。……我看他治不好我的病,”第六床皱紧眉头说。

“你不要乱想!这点小伤哪里会治不好!……”那个朋友说。

“开饭啦!老许怎么还不把菜送来!”第八床忽然大声说。

“他等一阵再不送来,我们吃完饭就不要罗。我们要他端回去!”第九床笑着说。

“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我回去了。我后天出发,明天

再来看你。你要不要买东西?"第六床的朋友稍稍向外移动一下,对着病人温和地问道。

"我不要……"病人摇摇头回答,但是马上又改变了口气说:"你带点大蒜头来。"

"好,我走了,"朋友再说一句,就向外走了。

第六床挺直地躺在床上。我想说一两句话安慰他。我把眼光射到他的脸上去。他板着脸,两只大眼角各缀了一颗眼泪。我不敢出声了。

一个工友模样的人两手端着木盘过来,盘里盛着六碗饭,有干的,有稀的。他走到第六床前面,问道:"要干饭吗稀饭?"(这时盘里只剩下三碗了。)

"干饭,"第六床答道。工友把饭碗放在床沿上。"再要一碗,"他又说,工友再放一碗干饭在床沿上。第六床动动头,又说:"你把我柜子下面那块木板拿出来。"

工友不作声,却把木盘放在第六床的被单上,弯下身子去拿起木板递给第六床。他端着那碗稀饭问我:"要稀饭吗?"

"好,给我,"我坐起来接过碗。碗里有调羹,我就捧着碗,尝了两调羹白稀饭。我望望第六床。他已经把木板放在胸前,两碗饭都摆在木板上。他伸出赤裸的右膀,正用调羹在搅拌一个碗里的干饭。两只眼睛注意地盯着饭碗。

"就吃白饭吗?还有没有菜?"我侧着脸问他。他好像没有听见。他不理我。

但是我的疑问已经得到解答了。老郑端了菜来,是一样地用浅口的土饭碗盛着,放在木盘里端来的。第九床不要,第

八床也不要。第六床要了，我也要了一碗。是豆芽，做法：干煮或干炒，都说得通；还放得有一点儿盐，有味道。但是我没有吃，只喝了一碗白稀饭。第六床却吃光了整碗黄豆芽，并且吃了两碗干饭。

我再看别的病人。第八床在等着外面的炒菜。第十一床却大声叫着："老郑，小姐，添饭！"

"十一床饭量倒很好，每顿至少吃两碗干饭，"第九床在和第八床谈闲话，他刚把眼光从第十一床那里收回来，好奇地说。

"他没有内病，当然吃得，"第八床答道。

"我看他的内病厉害。你不觉得，他现在有点神志不清，他总是不肯喝水，"第九床说。

"不过他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喊痛罗。他刚来的那两天才怕人，"第八床说。"我从没有见过烧得这样凶的人！"

"你还怕他不叫痛。等一阵大夫来给他打盐水针，就够你听的！"第九床笑了。

"吃饭罢。老许的菜不会来罗，再等下去，连饭甑子都端起走罗，"第八床提议道，他就走下床来，一面还说："我给你带碗饭来。我还有酱菜。"

"老许真拆烂污！等一阵他送菜来，我一定要他拿回去！"第九床气愤地说。

第八床添了两碗饭来，递了一碗给第九床。他又从方木柜里拿出一个罐子，放在第九床的柜上，打开来，两人共吃着。

他们吃完饭不久，工友们把碗筷调羹和饭甑全收走了。

他们正在大声讨论老许究竟会不会送菜来的问题。仿佛叫过菜的人都参加了这个讨论，连对面那一个角里也有人发言响应。于是老许进来了。他也端着一个木盘。他跨进门槛，就听见一些人说："不要罗。饭都吃过罗。拿回去。"

他似信似疑地向各处望了望。他朝着第九床(或第十一床)走来。他摆出一副客气的笑脸。

"真的吃过罗。你不信，到厨房去问问看。哪个叫你不早送来！我还特地嘱咐你过，"第九床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说(他还露出一种报复的满足)。我觉得他这时的面貌正像一个小孩玩了恶作剧以后的得意的面容。他想笑又故意忍住笑。

"拿回去。下次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照顾你罗！外头馆子又不止你们一家！难道我们一定要吃你们的菜！"第三床插进来大声责备道。

"我实在忙不过来，老板又不肯多请人，请你们原谅，"老许赔笑道。

"原谅不原谅，另是一个问题。饭吃完罗，只好请你把菜给老板送回去。我们不能光吃菜啊，"第九床得意地笑着说。他的眼睛快要眯成一条缝了。

老许还没有答话。第十一床忽然呻吟般地叫起来："老许，面！我的炸酱面端来没有？"

"来罗，来罗，"老许连忙答道，他那张带着呆板的穷相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他走到第十一床的床头，在方木柜上放下面碗，揭开那个盖在碗上的碟子，然后把插在围裙间的筷子取出一双来，递在那只伸出来的黑红色的手里。

“你扶我，扶我一下，”第十一床吃力地说。我看见老许放下木盘，身子俯在床头。病人发出断续的两三声呻吟（声音并不大），最后老许抬起头来说：“好啦罢？”病人含糊地哼了一声。我又看见老许把面碗递给他。他不再出声了。不过他吃面的声音很响，我想他吃面一定费力。

老许端着木盘走出去了。第九床满意地笑起来，说：“今天老许回去一定要挨老板一顿骂。这不怪我们，哪个叫他拆烂污！”

“你莫忙得意。这几样菜他明天会照样给我们送来！你想他们那种人还有好心肠吗！”第三床安闲地坐在床上，两只腿在被单下面屈着，膝头抬得高高的。他正拍着右膝盖在哼京戏，听见第九床的话，便接嘴说。

“不怕他，不怕他。我们记住明天不吃那几样菜，我们明天另外叫几样菜。他就没有办法罗，”第八床说着，做了一个滑稽的笑脸。

“好，我们明天早晨不吃炒猪肝，炒鸡蛋，榨菜肉丝……”第九床说到这里，又得意地“嘻嘻”笑了。

“对，我们大家记住，不上他的当，”第三床接下去说。他也蒙住嘴在笑。

我觉得奇怪：几个病人会为着这么一件小事情笑得像快活的孩子一样。可是他们谈得很高兴，而且反复地谈论着，一直谈到一位年轻的大夫走近第十一床来的时候。

“怎么样？今天吃糖没有？喝了几壶水？”大夫望着第十

一床发问道。

"喝了，"第十一床答道。他又提高声音着急地说："我今天喝过水啊，不要打针啦。"

"又要打盐水针罗，"第八床伸出半截舌头偷偷地笑道。

"好，今天只打三瓶。你忍一下就过去了，"这个长长脸、面貌和善的大夫温和地说。

"我不要打啦，我不要打啦！"第十一床摇摆着头号哭似地说。

可是汪小姐搬了一个木架子来（我忽然想到它跟衣架相像，以前就放在药橱旁边，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放在第十一床的床脚边，架子上挂着一个大口的玻璃瓶，有一根橡皮管通下来，这根橡皮管在中途又分成了两股，每股头上各套了一根针。两根针都放在玻璃瓶里，瓶口用一方纱布盖着，瓶内已经有了一点儿盐水。胡小姐拿了三瓶盐水来，放在方木柜上。汪小姐揭开纱布取出针，递给胡小姐，她把三瓶盐水都倒在玻璃瓶里。大夫俯下头去揭开被单的下半幅。我听见他说："怎么大便盆都还没有拿走！"

"老郑也太没有道理。好久了，还不给人家把大便盆拿开！"胡小姐接嘴说。

"给他拿开罢，"大夫说。接着他又说一句："还是空的！"

"我屙不出来呀！"病人痛苦地粗声说。

"哪个叫你不多喝水！给你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听见没有？你要把壶里的水喝干，大便就会通的，"胡小姐像责备孩子似地说。

“我给你说，你以后要听大夫的话，不然我下次起码给你打十瓶，”大夫说。

“张大夫，我不打啦！我不打啦！”

但是两根针都插好了。他们已经盖好他的被单。汪小姐把架上挂的玻璃瓶弄正，便走开了。她走路很慢，而且身子扭着，她好像缠过脚似的。张大夫在跟胡小姐低声谈话。病人睡了似地不出声。瓶里的盐水逐渐在减少，它走得相当快。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第十一床忽然痛苦地叫起来，他的床动了一下。

“不要动！还有两瓶，打完就不打了，”胡小姐说，她又拿一瓶盐水往架上那个大瓶里而倒。

“做做好事呀！小姐，我不打啦！我不打啦！”病人继续叫嚷着。他又动一下。大夫连忙按住他的大腿，带点儿威胁地警告道：

“不许动，就要打完了。万一把针弄断在里两，那就只有开刀，更够你痛了。”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张大夫，做做好事呀！”

“不要打？我问你还要命不要？你没有钱买药，叫你吃糖你不肯吃，叫你喝水你又不喝。你们公司里也不给你送钱来。这两天给你打的葡萄糖针还是我想法给你捐来的。盐水是医院里做的，也不要你花钱。你还不打！要救你的命我也算想尽办法了，”张大夫发牢骚地说。

病人这次用一声短促的呻吟来回答。他应该听懂了大夫的话。

胡小姐把最后一瓶盐水倒在大瓶里，回来把空瓶仍旧放在方木柜上。她用怜悯的眼光(我想应该是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顺着张大夫的口气接下去说："等你的朋友下回来看你，你要跟他们说清楚，要他们去向你们公司办交涉，要公司负担你全部医药费，不然你的病怎么好得了！你是替公司做事烧坏了的，论情理，凭良心，他们都应该出钱把你医好。你懂不懂我的话？"

"懂！"只有一个字的回答。

"你懂就好罗。那么以后打针你就不要叫啊，"胡小姐说。

"他懂又有什么用？他住院一个多星期，就只有一个人来看过他一回，还不晓得是不是他的朋友，"第九床插嘴说。他做出一种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样子。他的话刚说完，第十一床又大声呻吟起来。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做做好事啦！"

"好啦！好啦！马上就打完了。你还吵什么！"张大夫略带厌烦地说，他轻声吩咐胡小姐几句话，便离开第十一床，向我这面走来。他走到第七床那里，对那个沉默的病人说了几句话。那个病人一直是静静地躺着，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也不曾听见他的声音。我也听不见他回答大夫的问话。我不知道他害的什么病，但是我想，我明天就会知道的。

张大夫从第七床走到我眼前来。他对我微微一笑。我记起来了，那天在门诊室我见过他一面，不过他并没有给我诊病。他的年纪不会超过三十，一对眼睛特别小，眉毛也不浓，头发并未加意梳理，稀得可以看见头顶了。但是这些并没有

使他的脸显得难看。而且我觉得他的微笑是带着善意的。

"冯大夫来给你看过了?"他问道。

"是的。他说还不能开刀,"我急切地盼望这句话会使他给我一个较确定、较详细的解答。可是他只是笑着说:

"你何必着急,治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自然希望能早点儿治好病。住院太久,我负担不起。"

"不会太久的,至多两礼拜,你放心罢。你在哪里办公?"

"我现在赋闲。"

他沉吟片刻,又说:"不过住院费数目很小,连伙食一天也只有五十五元。"他和善地笑了笑。

杨大夫进来了,她也到我的床前来。她不说话,含笑地望着我和张大夫,她好像是来找张大夫谈话的。

"不过额外添菜的钱恐怕是一笔大数目,我看三等伙食对病人不大相宜。况且我的住院费还是借贷来的。"我说的是真话。我在"入院处"预缴的款子还是向两个朋友借来的。

"你缴了多少入院费?两三千罢?"他问。

"我缴了八千。"

"太多了,你用不着缴那么多,"杨大夫插嘴说。

"不过将来可以退还给他的,"张大夫含笑地对她说。

"冯大夫说,开刀的时候还要人输血。买四百西西血,大约要花五千元。所以我多缴一点儿,"我回答。

"哦,"杨大夫点了点头。张大夫注意地把我看了三四分钟(我随便估计的时间),过后便说:"要是你经济有问题,我可以找院长商量免去你的住院费。"

我看他一眼，那张脸上还留着微笑的痕迹，始终是和善的面貌。我感谢他好心的帮助，即使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也愿意感谢他，因为我看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说："那么，请你帮忙。"杨大夫用英语跟他讲了几句话。

"你好好养息罢。你只管放心治病。"他说着，便同杨大夫转过身走了。他们走去看第四床。杨大夫没有再说话，但是我觉得她像一个长姊似地对我笑了笑。

"你现在还难过吗？"张大夫问那个病人。

第四床点点头，哼了一声，无力地翻了翻眼睛望望他。

"不要怕，到明天就会好多了。你不要乱动啊，要好好睡，"张大夫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嘱咐道。

病人唯唯地应着，他又翻了翻眼睛，把后脑袋在垫干草的被单上用力擦了两下，过后又垂下了眼皮。

"张大夫！张大夫！"第三床唤道。

"什么事？你快出院了罢？"张大夫抬起头问道。

"廖大夫今天上午说要我出院。我实在没有办法出去。我想住到下礼拜三。请你替我讲一声，好不好？"

"其实你的病差不多好了，早点出去也行。"

"张大夫，你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多不方便。我怕出去伤口又会灌脓。"第三床的脸上露出恳切的哀求表情，两只眼睛牢牢地望着张大夫。

"我看你的伤口不会有问题，"张大夫沉吟地说；过后他又加一句："你给我看看，"他便伸手去揭病人的铺盖，铺盖揭起，病人的汗衣钮扣没有扣上，病人自己动手解绷带，张大夫

给他帮忙。绷带松开了。

“你只要小心点，就不会灌脓的。你可以出院了，”张大夫匆匆地看了一眼，就用绷带盖上了他的伤口。

“不过我想多住几天。我的钱说不定要到下礼拜二才送得来，早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第三床固执地要求道。

“看罢。要是病床需要得不太急，多住两天也不要紧，”杨大夫忍不住插嘴说。张大夫点一下头，温和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第三床满意地笑了。他坐起来，张开嘴对着第八床大声说：

“老沈，我可以跟你一道出院了。”

“好的，我请你到我妹夫的茶馆里去耍，”第八床笑着回答。

夜来了。它是在我没有注意的当口进来的。张大夫走后不多久，我忽然觉得电灯亮起来。其实电灯光并不怎么亮，我们这一个角只有从梁上悬垂下来的两盏半明半暗的灯。发射亮光的还是悬在条桌上空的一盏。但是四周的黑暗衬托出屋子里灯光辉煌。

夜来了。接着是一段沉闷的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谈话的声音压低了，甚至停止了。代替它的是一片仿佛被压抑住的呼吸声。

我旁边第六床呼呼地在打鼾，第四床没有声音。我也有一点儿睡意了。……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好一会儿，忽然醒了过来。第九床在

和第八床讲话，他吃吃地笑着，第八床也低声笑了。

“笑什么？老沈！大声讲啊！”第三床高声说。

“老洪在讲老和尚的故事，”第八床短短地答道，他又咕咕地笑了。

“大声讲，大声讲，大家都好听！”第三床笑着说。

“你过来，这是不好大声讲的，”第九床得意地笑道。

“你们过来讲，我也有一个故事，”第三床索性坐起来说。

“你过来坐，这边空气好一点，”第八床说。

忽然一个少女的声音插进来说：“你们小声点讲好不好！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到晚上也不歇一会儿？别人要睡觉嘛。”声音并不清脆，略带沙声，但仍然是年轻的女音。矮小的白衣少女在第九床床前站了片刻，便走开了。

“刘小姐，刘小姐，”第八床在后面唤道。他那两只手帕角蝴蝶似地停在他的头上。脸被手帕包得更像猴子脸了。

“什么事？”刘小姐回转来，带了责备的口气问道。

“请你给我吃点安眠药，”第八床忍住笑，故意做出严肃的面容恳求道。

“你吃安眠药做什么？大夫没有开过方，不能拿给你吃，”刘小姐正经地说。

“不给我吃药，我睡不着觉，还是要吵的，”第八床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真是调皮。你吵，又有什么好处。总是不肯听话！”刘小姐嘟起嘴抱怨道。“马上就要来查病房罗。给大夫碰见教训几句，大家都不好。”她又挺起胸笔直地走了。

"不要紧，有我，"第八床笑道。

"老沈，有你，又有什么用？你有多大的面子？"第三床开玩笑地说。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知趣点。洪文全，你不要再讲话，早点睡罢。你不好好休养，你眼睛更难得好罗。"胡小姐端了药盘走过来，木盘上面摆着几个酒杯样的小杯子。她把木盘放在方木柜上，递了一个小杯子给第九床，一面说："吃罢，安眠药。"

"哪里是安眠药？就是我天天吃的那个。胡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刘小姐到底是你的好朋友，要你来帮忙她。"第九床孩子似地做出狡猾的笑容。

"快吃！快吃！"胡小姐催促道，她看见第九床吃了药，便端起木盘走开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睁大眼睛望着胡小姐。我等着她走到我的床前，我等着她来给我药吃。可是她端着药盘走过去了。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为什么不给我吃药？为什么不理我？……

但是查病床的时刻到了。我看见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陪着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大夫和一个满脸须根的瘦小大夫向我们这面走来。他们在每张病床前立了一两分钟，问了病人几句话，或者大夫跟大夫交谈几句，他们在第十一床床前站的时间久一点，仿佛在商谈什么事情。那个高身材的大夫翻了翻手里的病历表，把头摇了两摇。我看见他的侧面，却看不到他的脸部表情。

他们来到第六床床前了。高身材的大夫站在那只被吊着的膀子旁边，他伸手捏了一下病人的手腕，问道："没有什么不舒服罢？今天换过药了？"

"还好，"第六床毫不迟疑地答道。

高身材的大夫不讲话了。他刚掉转身子，冯大夫就指着我对他说了一句英国话。我听不清楚，大概是在讲我的病罢。高身材的大夫走到我的床脚边就站住了，用英语向冯大夫问了一句话，冯大夫也用英语回答，他的答话不止一句，他接连说着，高身材的大夫时时在点头。杨大夫也插进来讲话。她也讲英语。张大夫和瘦小的大夫也参加这个讨论。

这个讨论大约继续了三五分钟，或者更多一点。最后高身材的大夫说了一句话，大家便离开了我的病床。他们在第四床旁边停留的时间不多。瘦小的大夫向第四床问了两三句话，又向高身材的大夫讲了两三句，便走开了。

他们在第三床旁边没有停留，大家全围到第二床那里去了。然而瘦小大夫又回转身来跟第三床讲话。

"你什么时候出院？明天吗？"我听见他在问。

"廖大夫，我想多住几天，"第三床声音微微战抖地说。

"你的病已经好了，用不着再住院了。外面有好多人等着病床，你也该让一下，"廖大夫坚持地说。

"我想住到下礼拜三。我怕出院早了，伤口又会灌脓。"

"下礼拜三太久了，不成。你伤口不会灌脓了。你要换药到门诊部来换还是一样。住院没有好处。"

"我晓得，不过……"

廖大夫有点儿不耐烦了，不高兴地打岔说："我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我只知道你应该出院，你不出去，我就要下逐客令。"

"我并不是不想出院，不过……"第三床温和地向廖大夫解释，可是廖大夫并不听他的话，就走了。

第三床寂寞地坐在床上，两只手抱住膝盖。他默默地呆望着廖大夫的背影。

"老苏，怎样？他又催你出去吗？"过了一会儿第八床忽然大声问道。虽说声音大，但已经走到对面去了的廖大夫是不会听见的。

停了片刻，第三床才回答："我不出去！我要等他来赶我。"

"你不用害怕，你果真不走，他也不会赶你的。我在这里看得太多了，"第九床安慰他说。

"在第四病室里头，你是第一老资格，"第八床笑着说。

"我还有十二天就满三个月了，我比老陈（我后来才知道第一床接腿骨的病人姓陈）、老苏都早得多。我倒想出院，可是大夫不让我出去。他要赶我，我倒求之不得，"第九床得意地说。

"我看你还要住个把月，"第八床开玩笑地说。

"这也说不定。其实我现在也不着急了。刚进来的时候，心里很急，恨不得马上治好眼睛就出院。现在不在乎了。大夫说住几天我就住几天，"第九床笑答道。

"你放心，这样便宜的旅馆，不会让你久住的，"第三床冷笑说。

"那更好，我可以少闻点尿臭。……现在病房查过了。又该老李来倒小便壶了，那种倒法我实在不敢当，"第九床说。

"其实他不必把铅桶提进病房来，把小便壶拿到外面去倒，还不是一样，"第八床说。

"从前有个老周就是这样，我进来不到一个月他就走了。大概尿臭有消毒的功用，所以小姐们也不干涉……"第九床说。

第八床笑着说了一句对小姐们不恭敬的话。第九床和第三床都笑了，第二床也笑了。我也笑了一声。

但是铅桶又提进病室来了。老李是一个瘦小的黑脸工友，穿着长衫，腰间束了一根腰带，衣服的前襟挽起了半幅。他带进来可怕的尿臭和溅水声。我连忙把头缩了一半在被窝里。我听见老李的脚步慢慢地走近，又渐渐地走远。人声也逐渐消失，整个病室突然静了下来。我不是说没有声音，但是声音并不使人心烦，却使人感到寂寞。

不知道谁把我们这一角的两盏电灯都关了。只有条桌上空的灯光明亮地照着一个穿红绒线衫的小姐，她埋着头在看书。

"林小姐，"对面那一角有人用无力的声音唤道。

"哪样？"她问着，便站起来。

"林小姐，请你过来一下，"病人哀求着。

她去了，剩下一张空的桌子。

我的眼皮垂下来，我要睡了。

第 二 章

六月二日(星期五)

"起来,洗脸!"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吃惊地睁开眼睛,我醒了。一个黑影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电灯光刺痛我的眼睛。眼角的睫毛由于眼屎粘在一起了,痒得我难受。我伸手去揉眼睛。

条桌前电灯非常亮。病房里有一种好像可以触摸但是不大刺鼻的臭气。有一些起伏的鼾声。窗外一片蓝色(一部分的窗户是整夜开着的),天还没有亮,麻雀嘈杂地在外面叫起来。我看我四周的病床。第八床站在床前穿外面衣服。第三床已经坐起来,侧着身子,用两只手在绞干方木柜上脸盆里的一张脸帕。第六床正用他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拿着一张带水的脸帕在自己的脸上乱擦(脸盆放在床沿上)。老李走过来,把这个脸盆拿走了。他转过头看我一眼,问道:"洗脸吗?"

"好,"我应了一声,接着打一个呵欠。

老李把脸水送来了。是一个画着花鸟的洋磁脸盆,可是洋磁快脱落尽了。一眼望去,仿佛一盆灰黑的水,其实水倒是干净的,温温的并不烫,对我正合适。我匆匆地洗了脸,又用我带来的茶杯,从茶壶里倒了昨晚剩下的凉开水,漱了口。屋

里人声逐渐增多，这时好像整个病房都醒过来了。

窗外蓝色已经褪尽，天亮了。

"老李，大便盆！老李，脸水！"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

"就来，就来，我只有一双手啊！"老李大声答应着。

他虽然接连地这样答应，可是叫的人还是不停地在叫。也没有人干涉他们，或者伺候他们。就只有老李一个人在病房里乱跑。那个穿红毛线衫的看护小姐先前到外面去了，现在又同另一个穿蓝绒线衫的小姐说着话进来。她们在条桌前立了一会儿。蓝衣小姐出去了。红衣小姐拿着那个插满温度表的洋磁杯子向着我们的病床走来。

试表，验脉搏，问大便，——这是应有的早课。以后便是早餐的时刻。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这么早！或者是我的表走得慢？

早餐只有稀饭，是由厨房里的工友端着木盘送来的。稀饭来了好几分钟，才有人端菜来：一碗煮豆子，除了咸外，别无滋味。我吃了一碗白稀饭，便不想再吃了。可是我惊奇地看见第六床一连吃了三碗，最后一碗是红衣小姐过来拿碗去给他添的。我看清楚了她的面貌。长长脸，高高的鼻子，有点儿像我的一个亲戚，但是看起来她比我那个亲戚和善些。

开过早饭后，静了好一会儿，忽然进来了五六个看护小姐，全是一个式样的滚蓝布边的白衣和白头布。红衣小姐办了交代，挟着一本书走了。

她们在条桌前低声谈笑一会儿，便把口罩戴上，我知道铺床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又有人在叫老李拿"大便盆"。但是老

李的影子早已不见了。我想出去找寻厕所。我穿好衣服，下了床，向着门口走去。

我刚走到门前，看见一个工友模样的年轻麻脸人，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我便请他给我指点去厕所的路。他告诉我：顺着窗下向右走，走过一道门，再走过"开刀房"旁边，就看得见厕所。它是在一棵大树脚下，和"太平房"是并排的。

我不需要他说得这样详细。可是他偏偏提到"开刀房"和"太平房"两个可怕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难道我到这个时候还想退缩吗？

这是一个阴天，早晨相当凉。但是空气扑到脸上，使人觉得新鲜，舒服。天井里芍药正开着花，还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后院，我便沿着这条路走去。

我跨过门槛，发觉自己站在厨房门前了。那里静静的没有人。我探了头进去看，地方相当宽，很干净，灶上坐着两把铜壶，和一个大的铜器具（我不知道应该称它做什么）。我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身，原来老郑进了厨房。他看我一眼，对我说："要开水吗？就要开了。"

"不是，我顺便看看，"我勉强笑着说。我看见他又在望我，便客气地加一句："现在你上班吗？"

"我是一至八，现在是老张的班，"他答道。我想，老张一定是那个对我提起"太平房"的工友。

"你们一天也够辛苦啊，"我用了同情的声调说。

"那不是！一个人每天八点钟伺候一个病房，倒屎倒尿都要来，还要上街买东西。有时候还要抬死人！这点工钱也不

容易挣啊，"他对我发起牢骚来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仗打完，情形就不同了，"我安慰他说。

"都是这样说，不晓得将来是不是这样的，"他带一点儿疑惑的神情说。

"厕所在后面罢，"我不想同他再讲下去了，便短短地问这一句。

"转出去，就是，"他点点头说。就在这个时候第八床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一定也是到厕所去的。他穿着布衬衫，灰布背心，浅黄色短裤，衬衫的襟还露在外面。他一蹦一跳地走过去了。

我跟着他走去。走出这短短的过道，我见到一片空地，但是一些树木和房屋阻止了我的视线。我第一眼就看见开刀房。那是新盖的玻璃屋子。玻璃窗被白窗帷遮掩了，人看不到房内的情形。黄色的木门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手术室"。我不由自主地望着那道紧闭的门，我想：有一天它会为我打开的。我为什么要望着它呢？我不能说。……并且我也不能说我是不是希望那一天早些来。我只知道我盼望那样的一天早过去。

我看见厕所了。它不是在大树的脚下，它倒在大树的后面，离大树有四五步光景。从我这一面看，应该说是在它的左边，有三间黑漆的木造平房，大门关得紧紧的，也看不见有窗户。它们和厕所之间还隔着一块草地。我不知道它们中间哪一间是"太平房"，或者全是。

厕所的门正对着我。我进去了。里面很干净，似乎比病房还少臭气。一条长长的宽沟和突起的一块一块的方的踏脚石。那不是真石头，却是用水门汀做的，数目大约在十六七八之间，我没有数过它们。在踏脚石中间的小坑里洒得有石灰。我在这些踏脚石中间拣了两块站定了蹲下来，凑巧就在第八床的旁边。他比我更靠里。靠外还蹲着三个人，好像都是大夫，但是很快地他们全出去了。只剩下我和第八床。他忽然问我：

"你带了草纸吗？"

我奇怪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难道他向我讨草纸？不然……这不是一句陌生人交谈时的客套话！

我摸摸衣袋，只有一张草纸。我又摸另一个衣袋，再也没有了。我拿着唯一的一张草纸给他看，我没有用话回答。

"我不要。我怕你没有。这里头草纸也是要自备的，"他摇摇头说，古怪地笑起来。

"那么我没有买草纸又怎么办？可以向医院要罢？"我半奇怪半着急地问他。

"你自己出钱买。合作社有的是。合作社上午开两个钟头，下午开两个钟头，就在第四病室外面那个院子，走出第四病室外面那道门就看得见。你进来时候一定走过。"

"我没有看见。"

"那么一定是没有开门。你几点钟进来住院的，上午吗下午？"

"下午，大概一点钟光景罢，"我回答。

"你什么病，割盲肠吗？"

"不是，是割胆囊。"

"这种病倒没听见讲过。是大手术罢？"

"其实也普通。开起刀来，多半算大手术，"我停了一下，才答道。

"我是医眼睛，又说扁桃腺发炎，现在差不多全好罗。你开刀，不晓得是半身麻醉还是全部麻醉？我倒奇怪，割掉胆囊，人会不会变得胆小？"他不停地霎着眼睛说。

我不愿意别人向我提起开刀的话，我有点儿害怕。他这几句带玩笑的话听来，更叫人耽心。我只短短地回答一句，"不晓得，"就站起来，准备走了。

"啊，还没有请教贵姓？我姓沈，三点水的沈，"他好像害怕我马上走出门去，连忙用话来留住我。

"久仰，久仰。敝姓陆，"我从没有对人说过这种客套话。这次却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我是存心讽刺他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打扰我呢？我逃出门外去了。

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朗了。灰云已经褪去大半，让蓝空露出脸来。阳光照在树梢。我立在树下，仰头一望，觉得眼睛非常舒适，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不过在病室里躺了半天工夫，却仿佛和这样清新的空气分别了几个月似的。

我在大树四周踱了一会。我还不觉得怎么累。我又立在树下，望着开刀房，因为那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随手关上门，转到后面去了。门仍然关得紧紧的，我

什么也看不见。护士的白衣刚刚隐去，从屋后又转出一个女人来。她也穿白衣服，但那是外套似的大夫的工作衣，她没有扣上钮扣，让衣服敞开，当胸露出浅灰色的旗袍。

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杨大夫。身子结实，不算矮，胸部发达，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颇像一个豪爽的男人，不同的是她的胸部随着她的身子微微颤摇着。

她向着我走来。她走到我的身边了。我还以为她不会认识我，我没有打算招呼她。可是她却对我微笑，大大方方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起来了？"

"病室里空气不大好，我出来走走，"我带笑答道。

她站在我面前，两只大眼略带注意地望着我，温和地说："早晨出来敞散步也好，不过不要走多罗。昨晚上睡得好罢？"

"睡得好。可是天没有亮就给人喊醒了。我觉得病人不必起得这么早。应该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其实病人整天躺在床上，随时都可以睡的。而且晚上查过病房就是睡眠时间，不会睡眠不够，"她笑着反驳道。她正要转身走开，我连忙用话留住她。

"杨大夫，你看我开刀不会有危险罢？"我问道，这个疑问并不是我当场随便找来，它先前还烦扰过我的心。

"不会，不会！"她说着把头用力摇了两摇，她那堆浓发在我的眼前晃了两晃。"上个月我们还医好一个，就是冯大夫开的刀，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怕。"

"我不怕，我不怕，"我说着偷偷地望着她那对黑黑的、和善的大眼睛，我的疑感被她的话一下子消除了。她不像是会

说假话的，并且看相貌，她是一个直爽的人。

“明天星期六，你可以照X光，”她又说，“下星期就可以开刀。你早点进去罢。记住不要多动啊！”她笑着对我微微点一下头就走了。

我觉得心里很轻松，看了看地上摊开的阳光，又仰起头吸入了一大口空气，我也离开了这棵大树，我回到病室去了。

我踏上石阶，跨进门槛。靠着两边柱头放得有脸盆架，我便走到右边一个脸盆架前面洗了手。我回到第五号病床去。我经过第十一床的时候，我看了那个病人一眼。他正睡得昏昏沉沉的，头偏向右边，下巴靠着肩头，眼睛闭着，嘴半张开，急促地在吐气。一张圆圆脸，紫红的脸色，一脸健康相，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我的床已经铺好了，干净，整齐。我很满意，便脱去外面衣服，钻进被里去了。

胡小姐和一个戴眼镜的小姐正在铺第六号病床。那个小姐大概是广东人，讲不好普通话。她对第六床说："你大小便要当心。你又把被单弄脏啦。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不方便呀！”第六床着急地说。他的脸色一直是红黄的，但是他的眼角却显得更往上竖了。

“你讲什么？”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向他略略埋下头，问道。

“我说我不方便呀！”第六床显得更着急了，他伸出他那只光着的右膀。站在他右边的胡小姐连忙说“不要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刚刚叠好的被单又弄乱了。他把膀子从肘拐弯

曲着，在脸上晃了两下，他用力说："我一只手不方便呀！"

"手放回去！"胡小姐说，她拿着他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了，然后又把被单拉平。

"不要再动啦，你再动，我就不管了，"胡小姐教训似地说。

"我晓得，"第六床短短地答道。

两个护士抱着换下来的旧被单，拿着刷子等等走开了。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护士问胡小姐："他是哪里的人？讲话好难懂！"

"他是浙江人。不过你的话也不大好懂，"胡小姐笑答道。

"张小姐讲的是广东官话，毛闷台（没问题）啊！"第九床插进来，开玩笑地说。两个护士也笑了。

"洪文全，你少调皮啊，等会儿打起针来，你又要叫苦的，"胡小姐转过头装出威胁的样子说。

"不叫，不叫，"第九床故意点头陪笑道。他好像还要讲话，但是忽然叫出了一声"哎呀！"便伸起手去摸头。

"哪样？哪样？"胡小姐连忙回转身跑到他面前去，吃惊地问。一只麻雀"扑——"的一声从第九床的头上飞到窗外去了。

第九床取下手来，一手的脏东西。"岂有此理！偏偏屙到我头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他跳下床来侧着身子在方木柜里拿草纸。

"这是报应，洪文全，你以后还调皮嘛，"胡小姐高兴地笑道。

"在第四病室住久了，不调皮也学会调皮了，"第九床接嘴说。好几个病人都忍不住笑了。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和平，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

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作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罢,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多讲话,大夫就要来罗,"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声了。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雀不要吵嘛,"第九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老郑!大便盆!"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第八床自语似地说:"又在放警报了。"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然而这样的话是不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老郑!"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病痛的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张小姐站在条桌前

大声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唤起来。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着？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我便下床来。站着，我不觉得吃力。我决定走出去。我刚走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你又跑出去？少跑点啊！"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罗。"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厨房思没有别人。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你找他什么事？"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我答道。

"又是十一床。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拿去他又屙不出来。不要理他！由他去喊！"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请你帮忙把大便盆拿给他罢，"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撒撒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脸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回到病室里去。冯大夫还没有来。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我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我站住看他一眼。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罗，"我对他说，我想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拿去，大便盆来罗，"他一面说，一面把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我看你也该灌肠啦。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你要舒服，你就该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有什么意思？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第九床插嘴说，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头。"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陆先生喊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听见

他那样呻唤，我心里也不好过。真是前世造了孽。”

“你有空，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罗，”老郑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我怕他又忘记罗。”

“好嘿，”老郑答道。他又转过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道：“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我请他给我买半斤饼干和一包白糖，我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他。他告诉我，这两样东西，合作社都有，比在外面买便宜些。我看见别人托他买草纸，我记起了第八床的话，我也托他买了一刀。

我忽然想吐痰，连忙在方木柜上去找吐痰杯，吐痰杯不见了，只有那把绘着蓝色山水的茶壶。我再看别的病床的方木柜上面都没有吐痰杯。是谁拿了去倒呢？难道我为了这个又要出去找老张、老郑吗？我觉得我应该求助于护士了。但是胡小姐不在病室里。我看见一个瘦小身材瓜子脸的护士在脸盆架前洗手。我不知道她的姓，我就简单地喊道：“小姐！”我还含着一口痰。

“哪样？”小姐回过头来，问道。她擦干了手，向着我走来。

“吐痰杯，”我指着嘴说。

“拿去倒罗，消了毒就送回来的，”她匆匆地答道，还没有走到我的床前就转身走开了。

果然不到两分钟光景，一个相当高大的男护士便把吐痰杯拿回来了。他用一个木盘盛着它们，木盘不算小，上面放得下十几二十个大杯子。他端着木盘一路走来，到一张病床前，便放下一个杯子。他给我的杯子，柄已经断了。我记得昨天用的不是这一个。我拿起它来吐痰，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要是没有好好消毒呢！……这应该是过虑的想法。可是这么一想，我更不安了，我又联想到起身时候用的脸盆，脸盆并没有消过毒，甚至没有用水冲洗过，脏的倒出后接着就倒进新的来。要是我用的脸盆刚刚是那个害眼睛的病人用过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一块儿来了。他们站在我的床前，冯大夫在左，杨大夫在右，张大夫立在我的床脚边。

"今天觉得怎样？"冯大夫温和地问。

"很好，"我答道。

冯大夫翻看了一下手里拿的病历表，又说："你还有点发烧？"

"不过我不觉得。"

"你爱动不大好。你最好整天躺着不要起来。我怕你发烧会耽误开刀，"杨大夫偏着头对我说，两只大眼圆圆的、黑黑的望着我，嘴角露出了笑意。

我偷偷地望着她的嘴。就是不说话的时候，她的嘴也是微微张开的。

"杨大夫的话你懂罢？你好好躺着，等明天照了X光再说。

要是没有问题，下星期就给你开刀，"冯大夫接下去说。

"谢谢你们，"我说。张大夫没有说话。他们走开了。……

一个矮胖的大夫站在第六床的左边，正在解开那只吊着的膀子上的绷带。"……我给你说过叫你不要乱动。明明包得好好的，都给你搞得一塌糊涂！……真麻烦！……你胶布够不够？拿出来！"

"没有罗，"病人回答。

"那么拿钱出来喊人去买，"大夫不耐烦地说。他把刚解开的绷带又草草地缠好了。

第六床用右手在被单下摸出一个纸包来。"要多少钱？"他自语似地问道。"一百块钱够不够？"

"不够，你先买三百块钱再说，"大夫粗声说，他从病人手里接过了三张百元钞票，转过头，看见先前拿吐痰杯来的男护士正埋着头在用抹布揩十二床的方木柜，便唤道："密斯脱周。"男护士答应着，马上走过来了。

"密斯脱周，请你喊老张拿去买胶布，等着要用的！"大夫把钱交给周先生，自己却离开这个病人走到对面那个角里去了。

"唉，他又走罗。就是这样不认真，怎样医得好啊！"第六床竖起眼睛着急地抱怨道。

"他就会来的，你不要急。治病要有耐心啊，"我这样安慰他。我说的是真话，我自己已经学会忍耐了。

"我晓得，我恐怕难好罗。这是我自己运道不好，"他绝望地微微摆着头。他因为左手被绑在那里，动一下头都不大方

便，不然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会坐起来的。他似乎在用眼光寻找医生。但是他这样躺着，怎么能够看见他呢？

杨大夫又来了，手里拿了一个木盒子。她把它放在我的床沿上，拿那条宽的橡皮带子缠住我的膀子。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掉开脸不看她。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橡皮带子松了。我的膀子自由了，她要走了。我连忙回过脸去问道："这是什么？"

"验血压的，"她答道，她转过身子和蔼地看我一眼。

"就要开刀吗？为什么要验血压？"我又问。

"你要这样着急，就不给你开刀罗，"她摇摇头，很大方地开玩笑说。

"那么，我就在医院里住一辈子，"我答道。

"欢迎，欢迎！"她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过后她换过话题问我："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牌子上写得有的，"我说。

"看样子你不过二十，其实我只大你两岁，"她姊姊似地微微一笑说。她捧着验血压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走开了。

我望着她那宽大的身影，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和她谈过话，感到愉快，甚至喜悦。

"拿去！胶布来罗！"我听见这个声音吃了一惊，但是立刻就知道这是周先生给第六床买了胶布回来了。他把一叠胶布放在被单上，就放在第六床的胸前。

"医官啦？他还不来？"第六床并不对周先生表示谢意，却

先抱怨起大夫来。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周先生没有理他，便走开了，脸上露出一点扫兴的神气，好像不满意这个病人连一声"谢谢"也要吝惜。

"小姐，小姐！"第六床唤道，他声音不高，也不大清楚，没有被护士听见。也没有人理他。

"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一句。

"我找小姐请医官来，"他答道。

"大夫自己会来的，"我说着，一面坐起来看对面，我看见那个胖大夫正在左边那个角里，似乎在给一个病人换药。我又说："他在那边换药。"

"这边没有弄好，又到那边去弄，真是不负责！"他又在抱怨。

我无法再说话。不过我心里暗想：空抱怨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只有等着大夫来换药。

大夫在十几分钟以后来了。他的红润的脸上现出愉快的微笑，顺口问着："胶布买来了？"

"买来了，"第六床低声答道，他把胶布递给胖大夫。他这个人有点儿奇怪，不管他在背后怎样抱怨，他见了大夫的面却又像个温顺的孩子，连话也讲不出来。

"密斯李，密斯李，请过来一下，"林大夫转过头向条桌那面叫道。我看见先前跟我讲过话的那个小姐答应着，拿着一个洋磁碗走了过来。

于是林大夫动手解绷带。换药的工作开始了。我还没有看清楚那个大夫在做些什么（我没有敢正眼去看那只手上的

伤痕)，却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唤："哎呀！"接着就是林大夫的平静的声音：

"碰都没有碰到，痛什么。……好多了。就是你自己要乱搞……"

"我没有乱搞，"病人分辩说。

"你没有乱搞，我给你包得好好的，怎么会弄得一塌糊涂……"病人不再分辩。大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我这次给你包好，你自己再乱搞，我下次就不管你了。听见没有？"最后四个字是他板起面孔说出来的。他的手动得极快，已经把那只受伤的手包好了。他拿了一根细带子穿过那块小小的方木板去(这木板是用来垫胶布的，手指便弯曲地半伸在胶布下面)，接着又把这根细带拴在铁架上。这样膀子便吊起来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严厉的表情被"自满"逐渐赶走了。

"现在舒服了罢，"大夫偏着头看了看他的成绩，得意地问道。

"舒服，"病人轻轻地回答，并且答得极快。可是等着大夫走到了洗脸架前面，他却把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一面带哭相地说："唉，天晓得，哪里说得上舒服？这只手一定要成残废的。"

他的这种脾气我实在无法了解。我带点儿不满意的口气问他："你既然觉得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又对大夫说舒服呢？"

"给他说有什么用！他还是不管你，"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只有一股怨气。我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太强了，但是

我还想说服他，至少我要使他知道他的错误。我又说：

"你是来治病的。你不相信大夫，为什么又让他看你的病？"

"我想再换个医院，"他说。

我不再跟他说话。我心想：你已经换过一个医院了，还想换几个呢？

下午两点到三点钟之间第二床出院了。他的太太果然来接他。她是一个苍白脸的女人，年纪不到三十，脑后垂着两根细长的辫子，穿一件淡青色旗袍。她很会应酬。她温和地跟第十二床讲了几句话，又向汪小姐说了感谢的话，然后拿着丈夫的一个包袱，一只手还扶着他，两个人慢慢地走出了第四病室。他们夫妇跨出门槛之前，并没有忘记向某几个病人告别。两三个病人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他们一走，汪小姐就叫老郑来把第二床的被褥和草垫全拿走了，只剩下一副光光的木板。现在是老郑当班的时候，冲水和倒便壶的事已经做过了。

我看见这张床空出来，有点儿高兴。我想，少了一个人，房里空气应该好一点。其实这只是我的幼稚的想法。空气似乎并没有好一些。而且这个病床在一个钟点以后就被一位新的病人占去了。

新病人是一个老头子，他是给人用担架抬进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在旁边照料他。他进来的时候，张大夫正在给第十一床打盐水针。同昨天一样，第十一床呻吟着，吵着

不要打。同昨天一样，张大夫说："喊你吃糖，你不吃。要你喝水，你不喝。你还不要打针！你是不是不要命啦？"

"我不打啊，我不打啊！"第十一床疯狂地喊着。他动了一下身子。

"你不要乱叫，不要动！"张大夫按住他的腿，命令般地说。"今天只给你打一千二百西西，你要乱叫乱动，我就给你多打一倍！"

"我难过呀！张大夫，不打啦！"第十一床仍旧在叫。

"不打罗，就要完罗，"胡小姐安慰他说。架子上那个大玻璃瓶里还有半瓶水，但是今天水走得相当快，我看见水在减少。

第九床在跟第一床讲话："奇怪，他怎么偏偏不爱喝水？说他不喝白开水，给他买了茶叶放进去，买了白糖放进去，他还是不肯喝。他这个人真固执！"

"固执？他是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看他不会久。人都糊涂了！"第八床摆出聪明人的神气回答道。

新病人躺在担架上面，等候看护小姐把床铺好，然后由抬担架的人抬他到病床上去。现在他应当被称为"第二床"了。他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我。颈项上缠着绷带，好像后颈生疮似的。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两颊完全陷进去，差不多只有皮包骨了。嘴唇的四周有一圈不曾修整过的花白的短须。他闭着嘴含糊地呻吟，偶尔也睁开眼睛，用他无力的眼光看他面前的景物，眼白带红色，眼角还留着半干的眼屎，连下眼睫毛也被眼屎粘成一片了。

“啊！啊！”他忽然大声叫道，那个中年公务员从条桌前面走到病床前来了，还把头俯到他的枕边去。

“××那边的钱你要还去啊，”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吩咐道。

“我晓得。你老人家好好地养病，不要管那些事情，”中年公务员温和地答道。

老人含糊地应了两声，又静了一会儿。第十一床的叫声也停止了。

杨大夫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她走到条桌前和坐在那里写字的张大夫讲了几句话，然后走过来看这个新来的老病人。她叫那个中年人扶着老人坐起来，她解开他的颈项上绷带的时候，我也在床上坐起，伸着颈项去望那个可怕的疮。是的，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

“啊哟，烂成了这样。为什么早不来医？”杨大夫吃惊地说。

“他不信西医，一定要找土方治，说是半个月包好。不晓得贴的是什么膏药，越贴越坏。到今天二十六天了。他受不住才答应到医院来。他本来身体很好，不像现在这样，”那个公务员说。

“自然罗，随便贴点膏药怎么行！要是早点送来医院，他也不会病到这样，”杨大夫带了点责备的口吻说。

“不要动啊，”她向病人吩咐了一句，便匆匆地走到条桌那面去，但是很快地又走了回来。胡小姐也跟着她来了。病人始终垂着头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按住两个膝头，嘴里哼哼唧唧

就没有停过。

"老先生，你忍一下痛不要紧，我把腐肉给你弄干净，好上药，"杨大夫温和地叮嘱着，她的两只手开始忙碌地工作；胡小姐在旁边帮忙，这个女孩的脸上带了一点害怕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敢正眼看那个疮口。杨大夫的眼光却定在疮上面，她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那个中年人仍旧站在病人旁边，我找不出适当的字形容他的脸色，他似乎比胡小姐更怕看那个疮口。他时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好像他的心很寂寞。而且我觉得在他的脸上除了忧伤外，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

"哎哟！"病人忽然大声叫起来，但只是这一声。中年公务员立刻把正向着窗外的眼光转到病人的脸上，轻轻地问了一句："痛得厉害吗？"

"好啦，好啦！就完啦！"杨大夫安慰他道。她开始把新的纱布放到疮口上去。

"痛啊，"病人诉苦般地说。

"好罗，不会痛罗！"杨大夫又说，她几下就把绷带束好了。她嘘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胡小姐说了一声："密斯胡，谢谢你啊！"就让那个宽脸女孩把用具收拾起走了。她又对病人说："老先生，你睡下罢。"她又对那个中年人说："你扶他睡下罢。"然后她走到脸盆架前去洗手。

"你回去啊，"老人呻吟地说，声音不大清楚，但是我还可以听出来。

"我晓得，"公务员答应着，他用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

杨大夫又走回来。她对那个中年人说："我给你说，他身

体太差了。医院里伙食他不能吃。你每天给他炖点鸡汤、牛肉汤送来罢。"

中年人迟疑着还没有回答，病人却在床上插嘴说："我吃素啊！"

杨大夫没有听懂他的话，公务员接着解释道："他是吃长素，不粘荤的。"

"病到这样，还管这种事情！他不多吃营养东西，是不会好的，"杨大夫笑着说。

"不过他很固执，不见得就肯吃荤，我想先买点鸡蛋给他冲蛋花吃也好，"公务员低声陪笑道。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此刻心里很焦灼。

"在医院里跟在家里不同，住进来就得听大夫的话。大夫办的，总是对病人有益的事，"杨大夫说到这里，忽然一个面孔陌生的护士从外面进来把她叫出去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呆呆地立在原处，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他埋下头来，靠近病人的脸说："大夫的话你听见罢。你以后不要再固执啊。你是晓得的，我已经负了一万多块钱的债了。大夫喊我炖鸡汤，我哪里来的钱？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你要好好听大夫的话啊……"

"我晓得，"病人痛苦地呻唤道。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听不出是什么意里。他似乎想分辩，然而痛苦或者别的原因使他讲不下去。

"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处？"第三床应该是一个更细心的旁观者，他一直把颈项伸得那么长。现在他忍

不住出来讲话了。

中年公务员吃惊地掉过头看说话的人，他的忧愁的眼光落在第三床的突出的嘴上，他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向着第三床走了两步，客气地说声："还没有请教贵姓。"

"敝姓苏。你贵姓——"

"敝姓陈。我们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

"那位是令亲吗？怎么病到这样，才来住院？"

"他是我父亲，"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点不自然的表情。"其实原先只有个很小的疮，他不肯医，后来大了，他又要找土方治，贴膏药，后来才越烂越大。我早就说送他到医院来，他一定不肯。其实住在家里很不方便。家里房间小，人又多，我们又没有医学知识。我劝了他多少次，昨天他才答应来门诊部看看。就是刚才这位女大夫看的。"（第三床插嘴说："这是杨大夫，人倒很好。"）"她签了字要他住院。昨天没有病床，今天有空我才找人把他抬进来，我还请了一天假。"

"也亏他受得住，烂得连骨头都看得见了。他今年高寿——我看总过了六十罢。"

"今年六十六了。就是这个月的生日。他身体本来很好，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到一个月肉都光了。在家里看他病到这样也很可怜。这几天他嘴里又烂了。吃东西也不方便。"

"这样大年纪，害这种病，真是运气不好。不过我看你也够苦罗，"第三床同情地说。

"还不是！这是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话说！四五千块钱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哪里够！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

钱还是换掉我女人一个金戒指才凑够的。大夫还要我给他炖鸡汤。可是钱从哪里来？他真要害死我！”

我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病人的侄儿或外甥，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人。现在听见一个儿子向着陌生人抱怨他父亲的病，却有点听不进去。

“这也难怪他，得了病也没有办法。只怪生活太高，大家都吃苦，”第三床安慰他说。

“是，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哑了，他马上把脸转开。

第三床也不讲话了，他躺下去休息。那个儿子掉转身，回到他父亲的床前去。第九床仍旧在对第八床讲故事。两个人不时低声笑着。第十一床好像在昏睡，他不动，也不叫了。连我旁边的第六床也睡着了。

我坐久了，感到一点倦意，便躺下去。一种舒适的感觉在我的四肢散布。我想睡，但是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又惊醒了，我以为我跌了一跤，却发见自己安稳地睡在床上。我不知道我睡去了若干时间。病室里不太闹，和我先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差不多。第九床同第八床的谈话还没有完，现在是第八床在讲故事了。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第六床把一只光赤的右膀露在外面，手里拿了一本书低声念着。第四床今天好些了，脸上痛苦的表情淡了不少。他闭着眼在睡，他现在可以睡枕头了。

老人仍旧侧着身子睡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哼唧。他的儿子已经走了。吃晚饭的时候，厨房里的人端了一碗稀饭给他。他坐起来，用他那瘦得见骨的手捧着碗，用调羹舀着稀饭，慢慢地送到口里。他的手抖得厉害，他常常把嘴俯下去将就手；喝完一碗稀饭，在他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他差不多每喝一口，就要哼一两声。我望着他，我的心都紧了。

他还没有放下饭碗，杨大夫匆忙地进来了。她好像是进来拿东西的。但是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老人坐在床上，便走到他的床前，大声嘱咐道：

"老先生，你不要坐起来嘛。你要吃饭，你请小姐喂你。你身体太弱，你不能多动啊！"

老人抬起头看她一眼，呻吟般地应了一声。

"那么，你现在就睡下去，你不要坐起来嘛，"杨大夫又说。她站在旁边望着他，似乎要看见他睡下去才走开。他只好把碗放下，虽然动作很慢，但是他终于睡下去了。

"杨大夫！杨大夫！"对面那个角里有病人在叫她。她答应着走到对面去了。

"做个大夫也不容易。病人找你，你就得去，不管你怎样忙，"第三床自语道。没有人搭腔。过了半晌，他又提高声音对第八床说："老沈，你出去看看老许好不好？"

"怎么样？你要叫面吗？"第八床问道。

"叫面还是其次的事。第一是去把老许骂一顿，问他为什么今天一天都不来，"第三床带笑地大声说。关于老许不来的事，他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好几次，而且已经发过不少的怨言

了。他们昨天有过一点小小的得意，还定下一个对付老许的计划，原以为今天还可以得到一个笑乐的机会。可是老许不来，这样就把他们的计划破坏了。今天两顿饭的时候，他们对着那碗只能说是“煮熟”的素菜发脾气、着急。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他又可以带笑地讲起这件事了。

“好，我就去，我也要吃点东西。我去给你叫碗大卤面来，老洪也要叫面，”第八床说着，就掀开被单坐起来穿鞋子。

“我也要碗大卤面。不吃点好的睡不着觉。我住医院花的钱还是给馆子拿去的多，至少总有七八千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床上，两只肘拐平平地压着耸起的膝头。他的态度相当安闲。

“这样说，嘴比命更要紧啊，”第八床接嘴说了一句，便一跳一蹦地走出去了。

我无目的地把眼光掉向窗外。我右面第二床和第三床头上的两扇窗全撑了起来，左边只开了第八床头上的一扇。右边的窗较低，窗外现出一段芭蕉的绿叶。左边的窗较高，银杏的树梢像图画似地绘在窗外的蓝天上，从那不太繁密的枝叶间露出来一角样楼和黑漆的栏杆，一个白衣的影子在廊上闪过。

但是窗外的蓝天渐渐在变色，时面淡，时而深，有时像灰色，有时又像亮蓝。树影也渐次模糊。突然楼窗里开起电灯来。

我收回眼光。条桌前的电灯亮了。一个人站在第十一床

的左侧。他穿着短装，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你好点吗？”他问。

“唉，”第十一床叹了一口气。“我心里难过。”

“还在吃药罢？医官怎么说？”

“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医官天天打针，痛死我啦！他们都不来看我，”他呻吟地说，声音粗，吐字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懂他的意思，猜出他的话来。

“他们都没有空，路又远。我向秦股长报告，秦股长不理会，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朋友诉苦一般地解释道。

“你没有跟他讲，医官说我的病很重，要钱医治……”

“我向秦股长报告，×××（第十一床的姓名）病势很重，要求公司添发医药费。秦股长把我骂一顿，说是我说假话。他还说×××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肯多给……”

“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第十一床叫号般地说，声音里掺杂着哭声，好像一只垂死的猛兽的哀号。

那个朋友停了一会儿，然后安慰他说：“你好好地养伤罢。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给你设法，再向公司办交涉。”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边，又说：“这里八十块钱，你先拿去用。”

第十一床没有回答，也没有拒绝的表示。

"我走罗，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啊，"那个朋友站了两三分钟后又说，于是掉转身子往外面走了。病人转动着头，他似乎在用目光送他的朋友出去。过后我看见他把朋友留下的钞票收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这个时候老郑进来了。他向我们这面走来，问道："买不买东西？我好一起买回来。"

"我买，我买！"第十一床大声说。老郑便在他的床前站住了。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索。

"你买东西，快拿钱来！"老郑等得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催他道。

"白糖，白糖，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用力说，他把钱交给老郑。

"盐水针打怕了，他现在要吃糖了！"第三床在旁边含笑道。我听着，心里很不好过。我觉得寂寞。我又有点害怕。真的，那个人就在我的脚下，和我隔得这么近。要是我处在他的境地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白糖买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那个病人吩咐老郑："多放些在茶壶里。"

"我拿茶壶给你，你自己放罢，"老郑回答道，把茶壶和糖都放在床沿上，他捧着代别人买的东西走开了。

第十一床默默地、吃力地动着手把糖放在茶壶里面。过后他似乎大大地喝了几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喝了多少。

但是老郑下班前提了开水壶来冲水的时候，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我听见他在说："还是大半壶开水！大夫喊你多吃，

买了糖来又不吃，看你这个病怎么得好啊！”

“我吞不下去，”第十一床声音含糊地答了一句。

“吞不下也要吞啊！你没有钱吃药，只好将就点！”老郑又说。病人不作声了。

这天晚上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叫过。我们这一面一共是十二张床。在这些病人中，就只有第二床偶尔低声呻吟，但是后来他也落进昏睡里去了。病室里充满了一起一伏的打鼾声，一种混合着西药味的臭气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睡不着。

护士小姐很早就关了我们这面的电灯。也没有人讲话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似乎比别的病人睡得更熟。

第四床今天可以吃东西了。他吃“半流”（半流质，医院里的用语，就是汤里面还有一点煮得软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像番薯片、猪肝等等），并且没有吐过一次。他的病的确有了起色。下半天我午睡醒来，偏过头去看他，他还对我微笑。他似乎想和我讲话。可是他没有开口，我也什么都不曾说。

第 三 章

六月三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我照过 X 光了。我急切地想知道结果怎样。可是杨大夫告诉我应该等到下个星期。她还说，假如我没有别的病症，那么我下星期三便可以进开刀房了。

我除了等待外，别无办法。我想，我是能够等待的，而且我应该等待。我决定不再去想我自己的问题了。为了消磨时间，我得找事情做。我决定多多观察，这就是说多多留心看别的病人在这个病室里怎样过日子，怎样对付他们的病痛。

这一层我的确做到了。

昨晚这个病室里相当静。第十一床整夜没有吵过。第二床只哼过几声，这个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里面。但是到今天早晨护士小姐刚刚铺好床以后，他忽然叫起来：

"我要出恭啦！"老人的声音不算十分大，而且不很清楚。起初并没有人理他，也许他们都没有听懂他的话。后来第三床替他向护士小姐解释明白了，护士小姐又去唤了老张来。

老张把大便盆送到第二床那里，并且放好在铺盖下面。老张刚走开，病人忽然坐起来了，他就坐在大便盆上，裤子褪到膝盖边，大腿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看起来容易使人联想到鸡

腿。我怀疑，他怎么能用它们走路。

“你怎么坐起来啦？大夫喊你好好躺着不要动……”第三床关心地提醒他道。但是他埋着头不出声。两只手没有地方搁，便抄在胸前，整个身子发出微微的颤动，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

护士走过来了，那是张小姐。她立在第一床的床脚边，用好奇的眼光望这个老人。她说：“老先生，你这样不行啊，杨大夫说过不要你起来。”

过了片刻老人才说：“不起来，我屙不出啊！”他的头不停地颤摇着。

“其实你多试试就会习惯的，”张小姐说；“你快睡下去。你懂不懂？你身体太弱，不应该多动。”

老人不作声，也不躺下去，只是可怜地摇着他的身子。

“真固执！不管自己身体受得住受不住，也不听大夫的话……”张小姐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老病人，她不满意地摇摇头，站着再看了几分钟，便咕噜着走回到条桌那边去了。

但是她刚走到条桌的右端，老人又大声叫起来：“草纸，草纸！”

“医院里没有草纸，要你自己买，”第三床对他解释道。

“我没有钱啊，”老人说。

“你没有钱买，就不用，”第三床略带不满地说。

“草纸！草纸！”老人不理会第三床，却只顾喊着。

张小姐赌气般地又走过来，把两三张裁过的草纸掷到老人的被单上，短短地说：“拿去，拿去！”马上转身走了。

"到底是你本领大，你用草纸不花钱。我们要用，十三块钱一刀，"第三床嘲笑地说。

老人不回答。他却蹲起来。他的身子摇摇颤颤地动着。他似乎想侧着身子躺下去。可是不知道怎样，他却向前一扑，身子伏倒在被上，一个光屁股耸了起来，腿弯的皮肤有几种颜色，白的像发霉，红的像腐烂，黄的带黑。

"喂，你怎样啦？"第三床惊问道。他从床上站起来。他这句话把张小姐和汪小姐同时唤来了。老人开始呻唤着。

"老先生，怎么啦？"她们也跟着惊问道。张小姐还说："你趴着干什么？"

"我看他是坐不住，倒下去的，"第三床说。

她们扶着他在床上躺下去。对她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吃力的工作。他整个身子不停地战抖，嘴里也继续发出低声的呻吟。汪小姐带着一种勉强忍住的厌恶的表情把大便盆拿到床底下去。张小姐在替这个病人整理铺盖和被单，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是听见她的声音："以后不要再坐起来啊，你听见没有？"

年老的病人含糊地应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懂了张小姐的话。她们离开病床的时候，我听见张小姐对汪小姐说："怎么他身上这样臭？"

"应该给他洗个澡。我也有点闻不得那种气味，"汪小姐答道。

我照了X光回来，杨大夫正在病室里给第二床换药。病人没有坐起来，却扑倒在床上。杨大夫的手一动，他就哼一声。

药换过了。杨大夫问他："你今早晨吃过什么东西？"

"稀饭，"老人含糊地回答。第三床马上替他接下去："他吃了半碗稀饭。"

"半碗稀饭哪里够！你儿子给你送鸡汤来没有？"杨大夫又问。

"我吃素。"

"吃素没有用。我喊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不然，我治不了你这个病！"杨大夫命令地说。"你儿子来，你记住要他给你炖鸡汤送来。"

话刚说完，病人的儿子就进来了。他右手提了一副生猪肝，左手拿着一个大的洋磁漱口盅。他站在床前，杨大夫抬起头看见他，便对他说："你来得正好。鸡汤送来没有？"

这个中年人怔了一下，过后便把猪肝提得高高的，一面回答道："我买了新鲜猪肝来。我就去煮汤给他吃。"

杨大夫皱了皱眉，微微摇着头，低声说："单吃一点猪肝哪里够？你每天至少得给他送两碗鸡汤来。"

儿子露出了苦笑，声音略带战抖地说："我实在负担不起。为着他这场病，我已经花了一万多罗，钱还是借来的。要再借，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你给他输血罢，这是不花钱的，"杨大夫稍稍带一点不快地说。

儿子吃了一惊，害怕的表情立刻罩上脸来。他略带慌张地说："我贫血，头晕，我不能输血。"

"你不用怕，我还没有验过你的血，"杨大夫说，"还不晓得

你的血型对不对。"她怜悯地微笑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似乎知道跟大夫争论对自己不会有好处，便把眼光掉到猪肝上面，自语道："我去把猪肝煮给他吃。"他转身往外面走了。

杨大夫也默默地走到条桌那边去。她一直坐在条桌前做事情。（汪小姐有时坐在她旁边写字，有时到某一张病床前去看看。有时又到外面去。）后来那个儿子拿着漱口盅进来了。他把它放在方木柜上，过后又拿起它来，把汤倒在一个饭碗里，一面俯下头对病人说："猪肝汤来罗，我里头还冲了两个鸡蛋，你多吃点罢。大夫的话，你该听见了。我这样瘦，哪里还有多的血？你不要跟我为难罢。"

"我吃素……"病人固执地说。

"你吃素！现在你还要吃素，你就是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儿子着急地说，苍白色的脸变红了。他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我想他会哭罢。但是他并没有哭出来。

他的父亲一声不响，索性连哼也不哼了。他仍旧站在床前等候父亲的答话。忽然那个老人痛苦地叹了一口气。"你让我死罢……"老人断断续续地说。

"不！……"儿子吐出这一个字，他立刻埋下头，用手帕盖住脸，大声擤起鼻涕来。过后他又走出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才慢慢地从外面进来，先去洗了手，然后到他父亲的病床前，他站在床脚边呆呆地望着病人的脸，他好像不敢走近枕头边去似的。

杨大夫过来了，她一本正经地对那个儿子说："我看他身体太差，非输血不行。"

儿子恐惧地向后退了一步，他似乎害怕杨大夫马上就抓他去输血似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杨大夫站在他的面前，温和地说："你不要怕，你不肯输血，你就拿出五千块钱买血罢。"

"五千块，我哪里来的钱啊？"儿子做出要哭的样子说，"一家五口人还要吃饭……"

"那么你自己输血也好，等一会儿我给你验血。我给你担保，不会有危险，"杨大夫微微皱起眉头说。

"我每天要到局里办公，又要到医院来。我一家人就靠我这点薪水吃饭……"儿子唠唠叨叨地分辩说。可是杨大夫已经掉转身子走了。他有点失望、扫兴，好像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同情似的。他带着求助的、诉冤的表情向四周看。他的眼光触到第三床的眼光了。

"这个年头，大家都苦，有什么办法！你忍耐点罢，"第三床劝他道。

"忍耐也要忍耐得下去啊，"他半晌才吐出这句话来。

"现在还是先治好他的病再说，"第三床说。

"病自然应该医治。不过他总不肯听大夫的话，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事事要由他，这怎么治得好病。今天买了一副猪肝，煮好汤给他端来，他又不肯吃。"说到这里，儿子立刻走到方木柜前面去，看了看碗里盛的汤。他端起碗，俯下头，温和地说："快冷了，你吃点罢。"

“我不想吃，”病人答道。

“大夫说的，你一定要吃。不吃，你的病就治不好。我来喂你罢，”儿子说，就拿起调羹喂他的父亲喝汤。

“我不吃啦！”病人喝了两口以后，忽然伸出手挥动一下，好像要推开他儿子的手似的，一面厌烦地说。

“才只两口，再吃一点罢，”儿子央求道。

“不吃啦，不吃啦！”病人接连地嚷着。儿子只好把碗放回到方木柜上去。我听见这个中年人叹了一口气，也看见他微微地摆了两下头。他还掉转身子向着第三床，绝望地摊着两只手叹息说：

“他还是不肯吃。”

“慢慢来罢，”第三床同情地笑了笑，安慰他说。

儿子拿着脸盆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再进来的时候，已经用一方花手帕对折成三角形从鼻梁系到后脑，代替了口罩，盖住了鼻孔和嘴唇。他绞干脸帕替他的父亲揩脸。

第二床似乎睡去了。病室里渐渐地静了下来。第九床和第八床睡得正熟，他们的讲不完的故事也跟着睡去了。第六床老是瞪着眼不出声，不知道他为着什么事一直在生气。第一床的靠背高高地支起来，他靠着它，让一个理发匠给他剪发，两只腿始终在被单下面高高地突起。第四床在看张小姐先前借给他的一本小说。他早晨已经同我交谈过了。我知道他姓孔，是邮局的一个职员。他害急性盲肠炎，前天上午进院来开刀。说是再迟三四个钟头，他就没有救了。他似乎是一个和

善可亲的人。他又告诉我，第七床也是害一样的病，是大前天晚上抬进医院来的，就在那个晚上开的刀。他是听见大夫讲的，那个人来得更迟，算是运气好，没有出毛病。

吃过午饭以后第十床和第十二床的病人出院了。但是病床没有空到半点钟，就被两个新的病人占据了。睡在第十二床的是一个害眼睛的司机，说是在"独汽四营"服务，穿着一身蓝布制服。一个年轻的广东人睡第十床，他的病我说不清楚，好像是在肚脐眼上面偏左的地方生了一块东西，说是不痛，又跟肉瘤不同。它究竟是什么，冯大夫、廖大夫都还不能断定。

第十床年纪不过二十，从他回答大夫的话(有人找了张小姐来做翻译)，我知道他已经结过婚并且有一个男孩了。但是看他的举止、态度，他又像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不懂事的孩子。他这个病没有给他带来痛苦，所以他的脸上常常露出笑容。他爱吃零食，随身带进来不少的糖果，装在一个咖啡罐子里面。给他诊病的大夫一走，他就拿出一把糖果来慢慢地吃着。看见他这种安闲的态度，谁也会忘记自己是躺在医院里面。

但是正当他安闲地吃着糖果的时候，就在他的脚下，沉默了一早晨的第十一床，忽然大声叫起来："老张！老郑！小姐！"

现在还是老张当班，可是开过午饭后，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汪小姐听见叫声，走过来，问道："哪样？"

"我要灌肠，我过不得啊！"第十一床吼着回答。

"好的，我跟大夫讲一声，等一阵给你灌肠，"汪小姐温和地说。

"快啊，快啊！"第十一床痛苦地喊道。

“你不要着急，要等大夫来过，他签了字才能灌肠，”汪小姐又说。

“我过不得啊！……”

“你不要喊。大夫没有在，你喊也没有用。起先大夫来了，你又不对大夫讲，”汪小姐带了点抱怨的口气说。

“我过不得啊！……”第十一床仍旧痛苦地叫着。

“那么你多吃点水嘛，”汪小姐说着，就拿起壶来，把壶嘴送到病人口边，病人骨嘟骨嘟地喝了几大口。“好啦，等一阵再吃。多吃点水，心里头也会好过点。”汪小姐说了，便把壶放回到方木柜上去，她转身走了。

她走后不过两三分钟，第十一床又用了粗暴的声音叫起来。

“老郑！老张！老郑！老张！”他不停地叫喊。

没有人理他。那个广东青年坐在床沿上，睁大两只眼睛，好奇地望着他的脸。没有人走到他的身边去。

“我过不得！做做好事啊！小姐！……”他像一只野兽似地哀叫着。

“十一床，你不要喊！大夫不在，你喊也没有用。等一阵会给你灌肠的，”张小姐在条桌前大声说，她抬起头望了他一眼。

“我过不得！我过不得！”他也许已经听不见张小姐的话了。他也许除了自己的痛苦外，对什么事都不知道，都不关心了。他只是不断地叫吼着。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他自己不能不叫喊似的。

"张小姐，你喊老张来给他灌肠罢，他叫得多烦人！"第九床忍不住坐起来讲话了。他的腿屈着，两只手抱着膝，抬起头向条桌那面望去。

"就来，"汪小姐答道，"老张也不晓得到哪里去罗。密斯张，你去请张大夫来看看十一床，他今天有点不大对。"

张小姐答应着走出去了。

"我过不得呀！我要灌肠！我出钱！我出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疯狂地喊道。他的身子摇动着，我看见床摇晃了一下。

"四十块钱，你给老张，他还看不上眼嘞，"第三床感慨地在一边发议论。"他们那种人就只有一对势利眼睛。你有钱叫他做你儿子，他也肯。没有钱，就该他做你老子！"

"我过不得呀！四十块钱！我有钱！"第十一床继续叫喊道，他的声音里含着多大的怨恨啊！我记起来，那个朋友昨天给了他八十元，他用去四十元买糖，还剩下四十。这四十元应该是他唯一的财产了。这"四十块钱"引起了第八床的笑声，可是它却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浑身不舒服起来。那张紫色的圆圆脸和那个剪得光光的头老是隐隐约约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睡在第十床的广东青年受不住跑出去了。第八床几次说话干涉，都没有用。第十一床只顾粗声叫着，他好像神志不清了。

张小姐从外面匆匆地进来，大声说："不要喊了，老张给你灌肠来了。"

这虽然跟我不相干，但是她这句话也给我带来一点安慰。

紧张的心稍稍松弛了。这种烦人的叫声也应该停止了罢。

果然老张拿了灌肠器进来了。他走到第十一床那里，带笑地说："来啦，来啦。你何必着急，这种味道不见得好受。人家怕灌肠，你倒求之不得。你把身子朝那边转一下……好啦，不要动啦。"

第十一床的叫声停止了。我的心也得到了片刻的安静。广东青年拿着一块奶油面包回到他的病床前。他看见灌肠的动作，他的好奇心似乎得到满足了。他放下面包，掩着嘴在笑。

"好啦，你忍一下，我给你拿大便盆来，"老张嘱咐道，我知道瓶里的水已经灌完了。我看见老张把洋磁瓶和橡皮管拿开，又看见老张把大便盆放到铺盖下面去。这些时候，病人没有作声，除了偶尔哼一下。我想，大便出来以后，病人的痛苦应该减轻了。

但是半点多钟(大概是半点多钟罢)以后，第十一床又带着更大的痛苦叫起来了：

"我过不得呀！我过不得呀！"

这个时候是老郑当班。胡小姐和刘小姐也来代替李小姐和张小姐了。另外还有一个护士小姐，就是胡小姐那天讲过的袁小姐，身材高高的，相貌也端正，年纪应该过了二十。

老郑提着壶来冲开水的时候，他并不在第十一床床前停留。第九床问他为什么不给第十一床冲开水。他粗声答道："他吃开水！他快回老家了。"

"奇怪，给他灌了肠，他还在喊过不得，"第九床说。

"火毒攻心了。要是肯花钱，也不至于这样受罪，"老郑说。

"哼，你懂得！那么还要大夫做什么用？"第三床在一边低声表示他的不满。

"小姐呀！我过不得！我要打针！做做好事啊！张大夫！张大夫！……"多么痛苦的喊声！

"现在他倒要打针了，"第八床吃吃地笑道。

"你还要笑！人家是性命交关的事，"第九床抱怨地说。

"我并不想笑，可是我忍不住就笑出来了。你看老广也在笑，"第八床指着那个广东青年说。

"他笑？过几天他就会哭的，"第九床冷笑道。

忽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崩塌的声音，我的眼前发生了一个大的震动。好几个人惊惶地叫起来。我起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居然毫无理由地以为是墙塌了，或者屋瓦落了下来。但是过后我就明白了。第十一床连人带床板和靠背一起跌落到地上，他的下半身还裹缠着被单，破棉絮盖到他的前胸，两只光膀子露在外面，左边的一只膀子还带着一段没有解完的绷带。头离开床板放在地上，脸还是圆圆的、结实的，眼睛呆呆地睁着，嘴张开，仍旧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睡处已经换了地方，他伸出左手要去抓第九床的板凳脚。

汪小姐、胡小姐、刘小姐、袁小姐全跑过来。

"你在作死呀！"刘小姐望着他说。"你这样真不想活命了。"

"密斯刘，你跟他讲没有用。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你快去

喊老郑他们来，把他抬上去，”汪小姐说。刘小姐匆匆地走开了。接着汪小姐又自语道：“怎么张大夫还不来，真急人！”

第九床当时吓得呆呆地站在床上，身子紧贴着木壁，头靠着纸窗，好像害怕那个病人会倒在他的身上似的。现在他才慢慢地坐下来，对自己说了一句：“好险啊！”

“你怕什么？怕他拉你一路回老家吗？”第八床嘲笑道。

“我不怕，我跟他还隔了两省。你们是同乡，你倒应该送他回去，”第九床笑答道。

病人继续呻唤，声音粗大，但是别人却不能够分辨出字音来。

张大夫匆匆地走进，问了一句：“怎么啦？”就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来了。

“张大夫，你来得正好。他起初吵着要灌肠，给他灌了肠，他还是吵着心里头难过。你看看要不要给他打针？”汪小姐带了点放心的口气说。

“先把他抬起来罢，老郑到哪里去了？”张大夫皱起眉头说。

“我们来抬，”胡小姐忽然兴奋地提议道。

汪小姐微微摇着头，说：“不行，我们抬不好，还是等老郑来。老郑也怪，上班的时候总喊不到他……”

“我出去总有事情。我只有一个人，又不会分身，这里也喊，那里也喊……”老郑跨进门槛，听见汪小姐的话，有点不高兴，不等她说完，便接着抱怨起来。

“快把病人抬上去，不要多讲了，”张大夫厌烦地吩咐道。

“我一个人怎么抬？”老郑板起脸孔说。

“我跟你两个抬罢，”张大夫说着，就弯下身去，老郑不好意思再讲话了。他们两个把病人连床板一起抬回到板凳上去，汪小姐和胡小姐在旁边帮忙照料着。

那个病人搬回床上以后，还是含糊地大声叫喊。他的痛苦似乎并没有因此减轻。他仍旧像一只垂死的猛兽似地在哀号。

“给他打一针××××，”张大夫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汪小姐说，他说出一个外国字，那一定是药名，但是我弄不清楚是什么药……

针打过了。病人的情形也没有见好。张大夫在旁边守了一阵，便走了。

他走后，众人对第十一床的兴趣似乎淡了许多。那种单调的、痛苦的呻唤大家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也是这样，我起初还盼望着他（第十一床）什么时候会把嘴闭上。后来我却有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要是他的声音突然停止，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个病室太冷静了。

其实这个病室不会太冷静的。第二床不久也有了呻唤的机会了。

杨大夫又来了。还是她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迈着大步，身子一摇一晃的。

“密斯汪，给第二床预备四瓶盐水针，”我听见她对护士

长说。

“老头子也要吃盐水针了！”第八床觉得有趣地说。

杨大夫在第二床旁边停留片刻，就走到我的床前来。

“你这样睡着觉得闷罢，”她说，大方地笑了笑。一对大眼里射出来无限的善意。

“还好，”我答道；她的笑使我感到愉快，我又问一句：“我是不是下星期三开刀？”

“你又来了！你真性急，上午还跟你说过要到下星期才能决定！你最好还是不要想那些事情，”她温和地笑道；接着她又问我一句：“你带什么书来没有？”

“没有，我忘记了。”我说的是真话，我想带几本小说来，临时却把它们忘记在一位父执的家里，那个人现在应当因公到某处去了，他那位出身高贵的太太新近从上海来，和我只见过几面，她不会来看我。

“你要不要看书？我可以给你找几本来，”她微笑道，我只觉得她两个圆圆的黑眼珠在我的脸上滚动。

“那么谢谢你，哪天给我带几本来罢，”我感谢地说。

“我给你挑几本看起来不费脑筋的。你现在不能太用功啊，”她又笑了笑。我望着她，我觉得她的整个脸发亮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掉头朝第二床看了一眼。盐水针已经预备好了，架子放在第二床的脚下方，汪小想正把盐水倒在架上那个大瓶里面。杨大夫便撇开我到第二床那边去了。

针插在病人的两只大腿上。第八床朝第三床呶一呶嘴说：“老苏，你等着看这个老头子怎样哼法。”

老人好像睡熟了似的并没有哼一声，也不曾动一下。瓶里盐水走得虽然慢，但是我也看得出它逐渐在减少。

“这个老头本领倒不小，他哼都不哼一声！”第三床惊奇地说。

“嗯，倒也奇怪。再等一阵罢，看他受得住多久，”第八床摆动着他那张猴子脸说。

并不要等多久。再过两分钟光景，老人叫出了第一声。

“我受不住啦！……再打不得啦！……做做好事啦！”他拖长声音叫着。也许是由于他的高龄罢，他的声音不像是痛苦的呼号，倒像是一个粗人笨拙地唱出来的歌。

“怎样，我说过不会等多久罢，”第八床低声笑起来；“这边一个这样叫，那边一个那样喊，好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

老人并不动一下，只是不停地哼着：“我受不住啦！……打不得啦！……就要死啦！……我要死啦！……我就要死啦！……”

杨大夫站在条桌旁边，俯下头在写字。她听见老人的叫声，也忍不住微笑了。她放下笔，走到第二床那里。

“你不打才要死嘞！”她说，接着又问：“老先生，以后你儿子给你送汤来，你吃不吃？”

“我要吃啦！”

“猪肝吃不吃？稀饭吃不吃？鸡蛋吃不吃？”她又问。

“我吃，我吃！”

“你不吃素吗？”

“我不吃素啦！不要再打针啦！……我要死啦！……”

“就只有这一瓶了，”她说着便把方木柜上那瓶盐水倒进大瓶里去。过后她立在床前继续说：“老先生，你以后要多吃东西啊。我要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身体太坏，不多吃营养的东西，烂掉的肉便长不起来。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懂！”

“你懂，那么你儿子给你煮的猪肝汤为什么不吃？”杨大夫指着方木柜上那碗猪肝汤问道。

“我要吃，我要吃，”病人连忙答道。

“密斯胡！密斯胡！”杨大夫唤道。胡小姐马上走了过来。杨大夫把碗递给她：“请你喊老郑拿去热一下。等一阵，你看着老先生吃完它。一定要他吃。”

胡小姐拿着碗出去了。她回来的时候，杨大夫已经走了。后来大瓶里的盐水快流尽了，胡小姐便过来把老人腿上的两根针拔去，又把架子搬开。老人立刻不作声了。

“好了，这一边不响了，”我的右邻第四床低声自语道。经他这一说，我也觉得病室里清静些了。

可是第十一床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呻唤。不过他叫得更单调、更痛苦了。他已经念不出一个准确的字音，并且人在他的声音里找不出一点近似人类语言的地方。他的叫声现在更像是野兽的哀吼。他哀叫着，哀叫着，不管有没有人同情他，有没有人来照料他。

他的手还在动，身子也还在动，床板时时左右摇晃。每次动得厉害的时候，要是向左，就会听见第九床和第十床的惊叫

声；要是向右，又会听见第十二床的叫唤。

“胡小姐，汪小姐，刘小姐，十一床又要跌下来了！”第九床和第八床这样接连叫了好几次。

“你喊我，我又有什么办法？”有一次刘小姐过来生气地噘起嘴说。“你害怕，你找根绳子来绑住他罢。”

“对，绑住他倒是个好办法，”第九床笑着说。他看见老郑拿着第二床的猪肝汤进来了，便大声唤道：“老郑，快来！”

“什么事？”老郑从第二床床前转过身子粗声问道。

“十一床又要跌下来罗，你来绑住他！”第九床说。

“好，我就来，”老郑笑道。他又向条桌那面说：“胡小姐，猪肝汤来啦。”

“我就来，你放在那里罢，”胡小姐答道。

老郑走到十一床床前，他先看看病人的脸，用一种毫不动感情的声音说：“快啦，我看他过不到今天晚上。”

“你又不是大夫，你知道！”第八床说着，便走近老郑的身边，他也看了看那个病人的面孔。

“我不晓得看过多少了。你不信，等着看罢，”老郑得意地说。这时病人刚巧把身子向他那面一侧，床板晃了一晃，他连忙按住病人的一只膀子，就是那只左膀。他就用留在那上面的绷带把它绑在床板上，不，应该说是板凳脚上。

“这样恐怕还不行，最好那边也绑一下，”第八床提议道。老郑真的再找了一根绷带来把病人的右边膀子也绑住了。

“现在不会再动了，”老郑试了试，过后说，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我从第十一床把眼光移到第二床那边去。

胡小姐站在床前用调羹舀着汤送到那个老人的口里。老人说了好几次："我不吃啦！……"她不听他的话，却逼着他吞下去。

"再吃点，再吃点！你不吃，杨大夫又要来打针了，"胡小姐说，她的话对老人倒有很大的效力。最后我看见胡小姐满意地放下了碗同调羹。

"老头子也真滑稽：怕打针，连吃长素的人也开荤了，"第三床带笑地批评道。

"唉，真是不把人当人。他又不是犯人，就不该绑他，"这是第六床的声音。我转过头去。他正微微摇着头，瞪着眼睛，红着脸在那里生气。"都是爹娘生的呀！"

我同意他这句话。我也了解他的愤怒。他一定在想着他自己。

"他没有家里人，没有朋友在此地。他们可以随便对付他，"第六床看见我对他点头表示同意，便接着往下说。

"他没有钱，他们看不起他，连老郑也要欺负他！真是天晓得！"第六床又说，他的脸一直在发红，眼睛里射出来憎恨的光。

"这样不行。对病人应该平等待遇，况且医院又不是旅馆客栈，"我附和地说。

"是啊。就是旅馆客栈，茶房也不会这样招待客人的，"第六床接嘴说。"你看他好痛苦，心里难过啊！他们就不管他，让他喊下去。他喊了大半天，给他吃点止痛药、睡药也好。"

第六床的声音不高，除了我以外，别人不会听清楚。自然也不会有人考虑他这个意见。整个病室里的人就没有一个出来为那个垂死的患病者说一句话。大家让他哀叫着，挣扎着。

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第十一床的脸色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望过去，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并且他还有很大的力气。他挣扎到傍晚(其实天并没有黑，只是渐渐地暗起来了)，他的左手终于挣脱出来，肘拐下面现出了一条伤痕，血在流着。然而他还是昏迷地挥动他那只手。他的叫声并没有比先前的更痛苦，只是有些沙哑了。

"他老是这样喊下去，今晚上我们大家都睡不成觉了，"第八床忽然耽心地自语道。

"不要紧，他们都说他过不到今晚上，你听他嗓子已经哑了，"第九床接口说。

"他身体结实得很。看他的样子，他再喊三天三夜也不在乎，"第八床含笑地说。

"他不在乎，我们还在乎吗？"第九床笑答道。

这两个人的谈话使我极不舒服。我想到外面去走一下，便穿好衣服走出病室去。

夜色降下来了。空气很柔和。我闻到一股西药的气味，中间夹杂着花香。我顺着石板路散步，我在花丛边走来走去。这露天里的一切使我心胸舒畅。

这个院子里还有四间小屋。两间位置在通外面那道门的旁边，两间靠近通后院空地的门。旧式的糊纸的小方格窗用

竹棍撑起来，四间屋子的窗全撑着。窗台不高，房门大开，我可以看见每间屋子里的陈设。一张床，一张条桌，一把逍遥椅，一把藤椅。在一间屋里一个穿漂亮西装的青年安闲地靠在逍遥椅上。在另一间屋里一个衣服华丽的中年妇人开了电灯对镜梳头，一个衣服整洁的老妈子站在旁边伺候她。不用问我便知道这是头等病房了。这里有的是舒适和优待，只是因为住在这些病房里的人能够比我们多付两倍的钱。

那个服装整齐的青年从房里走了出来。他站在窗前矮矮的石阶上，两只手放在背后，态度闲适地望着院里一丛芍药。他面貌清秀，只是鼻孔里塞了两团药棉。

我仍旧慢步走着。我正在看他，忽然他也抬起眼来看我，他露出惊奇的样子。他不像在看一个同类的人，倒像在看一个奇怪的生物。

我本来打算招呼他，跟他讲话，可是他的表情阻止了我。他这种看法使我生气。心里一不高兴，我就感到疲倦了。我想回到病室里去。我看见杨大夫从后院转了出来。她这次没有穿那件白色工作衣。她穿着一件绛色旗袍，外面罩上一件灯笼袖的灰色细毛线衫。脸上也擦了一点粉。

"杨大夫，你进城去吗？"我带笑问道。

"是的，有点事情。"

"去赴宴会罢？"我笑着问。

"去朋友家吃喜酒，恐怕已经晏了，"她笑着回答。"这本书是拿给你的，"她把腋下的一本书递给我，除了书外，她还挟着一个手提包。

这是一部《唐诗三百首》。她拿这种书给我看，倒是我想不到的。

“我想这本书对你会有好处。我起先就说过你不宜看太费脑筋的书。你读读诗，可以使你的心纯净一点。心境对治病很重要，”她温和地解释道。她两只眼睛恳切地望着我。

“我明白。这些诗我也读过。杨大夫，谢谢你啊！”我感激地说。我觉得她的眼睛也在微笑了。她又关心地说：“你出来好久了？不要多走啊，早点进去罢。”

“杨大夫，我问你一句话，将来我开刀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场？”我忽然想起要问她这句话，就顺口说了出来。

她笑了：“你问得奇怪。不过我也说不定。只要我没有别的事，我一定在场！”

“我是这样想：只要你在场，我一定不害怕，”我直率地答道。

“那么我一定在场，”她似乎感动地说。“其实你也不用害怕。我们刚才又收了一个跟你一样的病人，就住在这三十床，”（她指着青年站的地方隔壁那间病房，门前挂着一方小木牌，写有阿刺伯字30，）“他以前来看过病。他身体现在养好了。下礼拜就开刀。”

我朝那房门看了一眼，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杨大夫在我的耳边说：“你进去罢。”我收回眼光。她往外面走了。她仍旧迈着大步——黄皮鞋，短袜，光腿。不过她的身子摇晃得并不厉害。

我没有立刻走回病房。我站在石板路上，望着她的背影。

我把眼睛都看花了。

夜已经来了。它像一张网，向着我撒下来。

我回到病室。一股臭气扑向我的鼻端。我禁不住发呕了。

条桌前电灯十分明亮。左边的一角没有说话的声音，电灯也已关上，似乎那十二个病人全睡着了。右边一角的电灯照常燃着，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笑，有人在大声讲话。我走过第十一床旁边。我看那个病人一眼。还是那个结实的、滚圆的头，肉还是一样多。脸色却变黑了。眼睛睁得不大，但是它们睁着。嘴半张开，喘气似地在叫喊。左膀露在外面，肘拐以下涂着一片血迹。

电灯差不多就悬在他的头上。他的眼睛并不躲避灯光。两只大眼角都在发亮，我看出来有泪珠。这两颗小小的泪珠使我打了一个冷噤。

我回到病床，躺下来，把《唐诗》放在枕头下。

"我们这一边晚上吵得很，天天都是这样。吵得别人睡不好觉。对面，一到晚上连说话声音也难得听见，"第六床稍稍偏着头对我说。这时我刚刚睡下去。我想他大概闷极了，需要说几句话，找到一个听话的人当然就不肯放松了。其实我现在只想休息，但是为了敷衍他，我也只好唯唯地答应两声。

"他们对别人一点同情也没有。人家快死了，他们还要笑！"第六床接着愤慨地说，他的脸板得更厉害。眼睛和眉毛更朝上竖，更像戏子在台上的脸面了。我忽然想起我从没有看见这个人笑过，无怪乎别人的笑会引起他的反感。

我还是唯唯地应着。后来我倦得连嘴也懒得动了，我便索性闭上眼睛睡觉。

我好像睡去了一会儿，可是第十一床的呻唤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时而近，时而远，我忘了我是在医院里而。我觉得我还是住在朋友的家里，或者亲戚的家里。我并没有生病，我只是走完了长的旅程，现在疲倦地睡了。我不管明天有什么事在等着我，我只是在享受这一刻的轻快和休息。

大夫们来查病房的时候，我给惊醒了。杨大夫不在，冯大夫也不在，廖大夫和张大夫倒是来了的。另外还有两个大夫和一位女大夫。我以为他们会在第十一床旁边停留一些时候，或者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减轻那个病人的痛苦，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过投了一瞥淡漠的眼光。只有张大夫一个人还回头多看了一眼。

我想问张大夫："为什么不再给他打针呢？"但是我没有问。他们在我的床前停了两三分钟。一个年纪较大的大夫同张大夫短短地问答了两句，他们便走了。我唤了一声："张大夫！"那个年轻大夫走回来。他和善地问我："什么事？"

"张大夫，你怎么不给十一床想个办法？他叫得多可怜！"我终于说了。

这个和善的大夫摇摇头，淡淡地答道："他就要完结了。再想办法也是多余的。"他的声音里有的是疲倦，却找不到痛苦和怜悯。

我没有话说了。他也没有工夫再跟我讲话了。我把眼光射到那个可怜的病人身上去。他还是像先前那样地躺着，呻

吟着。只是他的声音低了些，身子也不怎么晃动了。显然他的挣扎的力量已经在减弱，他的生命也逐渐在消失了。

"快啦罢？"第八床忽然伸起颈项看了那个病人一眼，带笑地自语道。

"你不用着急。你等他一道走吗？"第九床开玩笑地说。

"你倒不要等。他一伸手就会把你抓去的，你怕不怕？"第八床说。

"他就要回老家了，他哪里还会动？"第九床昂起头得意地说。

但是那个病人真的伸起左手来了。第八床是看见他的手在动才那样说的。他的手伸着，伸着，显然它想抓住什么东西。它一下就抓住了第九床的被单，用力一拉。被单就往下落。他的床大大地摇动了一下。

第九床本来屈着腿坐在床上，被单一动，他明白那个情形了。他第一眼就看见那只带血的手。他惊叫一声，立刻赤着脚跳下床来。

"你不怕嘛，怎么又叫啦？"第八床冷笑道。

第九床不理他，却大声叫："林小姐！林小姐！"

上班不久的林小姐走过来问什么事。

"你看，他抓我的铺盖。你还是把他的手绑住罢，"第九床说。

林小姐看了看第十一床，摸了摸他的前额，又验了他的脉搏。她把他的被单理好，又把他的左膀放进被里去。然后她对第九床说："不要紧，用不着绑了。"她走回条桌前去了。

她说得不错。这以后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动了，他的叫声愈来愈低，后来变成轻微的喘气，最后连喘息声也没有了。

"林小姐！林小姐！"第九床又叫起来。

"什么事？洪文全，你又在叫！"林小姐走过来，问道。

"十一床归天了，"第九床忍住笑说。

林小姐俯下头去看了一眼，又摸了摸病人的胸口。她说："还没有，不要你替他着急。"

又过了十多分钟，第九床又叫起来："林小姐，请你来看看，十一床这次真的回老家了。"

林小姐又过来，她又摸了一下病人的胸口，然后望着第九床埋怨道："不晓得哪里来的这样高兴！就直是吵！又不是喜庆事情！"

"林小姐，你应该问问他，有没有遗嘱嘛？"第八床插进来开玩笑道。

"呸！你们嘴里就讲不出一句好话，"林小姐说着，她也忍不住笑了。但是她马上又收起笑容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这样爱管闲事？休息半点钟不讲话，好不好？"

"我们不讲话，十一床真的回老家了，哪个又晓得！林小姐，你不要给他送终吗？"第九床调皮地说。

"不要乱讲啊，洪文全，你在第四病室是老资格，应该做个榜样啊！"林小姐正经地说，不过她的声音还是很温和的。

"是啊，我正是在做榜样啊！"第九床嘻皮笑脸地得意说。

林小姐没有理他，只是皱皱眉头走开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两人对望着，吃吃地在笑。我还听见别的几个病人的笑声，

但是他们立刻就不响了。只有那两个人一直带笑地低声讲话。

电灯光很亮。第十一床静静地躺在被单下面，现在他完全不动了。他的后脑靠着床板的边缘，他的头差不多倒垂着，枕头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没有声息。他一直叫了这么些钟点，现在应该休息了。

可是第九床又在叫了："林小姐，真死了。你不信，你来看看。"

林小姐咕噜着走了过来。这次她不做声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第十一床的两只眼睛上动了一下。我看不清楚她是在揩掉他的眼泪，还是使他阖上眼睛。

"是罢，我没有说假话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被单上得意地说。

林小姐仍旧不出声。她走到条桌前站了片刻，便往门外走去。但是她马上又折回来。她在药橱旁拿了一把伞，再到外面去。我知道外面下着小雨了。

不久老郑跟着林小姐进来了。他的头发上的雨点在电灯光下发亮。

"老郑，你来送十一床回老家吗？"第九床大声笑问道。

"有什么办法！吃了这行饭，还敢说不做吗？"老郑不高兴地答道。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把被单拉开，往地下一丢，又把这光着身子的死人拉动一下，死人的头睡回到床单上面了。他找出几张钞票，数了一下，就放到方木柜上去。我听见他大声说："四十块钱！哪个要他这一点钱！"他把床单从四面拉

拢，包过来，一下子就把死人裹得紧紧的。他打好结，又抽去草垫，让这个人形包裹放在光光的木板上。

"林小姐，单子写好了吗？"老郑掉转头问道。

"你来拿罢，"林小姐答道，便拿起一张纸条来。

老郑接过纸条，涂好浆糊，拿回来。他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胸膛）一巴掌打下去。我听见"拍"的一声，纸条贴好了。老郑离开死人往外面去了。

"老郑也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第三床在角落里表示不满地说。

"这样死法，一点牵挂也没有，"第八床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打秋千似地动着，他不住地点着他的猴子脸，那只白蝴蝶还站在他的头发上，我真想把它捉下来。

没有人答话。外面雨下大了。房里也听得见雨声，就像无数根细针落在屋瓦上似的。一阵愁思侵袭到我的心上来。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寂寞。我忽然觉得这个病房太空阔，电灯太亮，人声太稀。我只想哭。

我看左边第六床，那个姓朱的板着脸竖起眉毛不讲话；我看右边第四床，那个姓孔的闭着眼睛睡熟了。他的脸色苍白得多可怕。第三床把半个身子倚在靠背上，带着沉思的样子。第二床发出急促的鼾声，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显然他在梦中也没有得到安适。第七床微微地咳了一声嗽，他应该是醒着的，可是他静静地仰卧在那里。似乎连翻身的念头也没有！

还有在那边，第十床那个广东青年盘着腿坐在被单上，他带着傻气呆呆地望着他旁边那个人形的包裹。刚才第九床还

跟他开过玩笑，做着手势，一面问他："老广，你怕不怕？"他直率地回答："他死了我就不怕他了。"他说的应该是真话。当第十一床正在跟死挣扎，叫着、动着的时候，那个垂死的病人曾经使他害怕过，我听见他发出几次惊恐的尖叫声。在死人的右边，第十二床用一只手蒙住左眼，侧着身子睡了。这个年轻的司机，不见得能够安静地睡眠罢。今天下午我听见那个身材矮小、满脸须根的塌鼻头的大夫对他说，他的左眼十之八九得挖去，他那只眼睛在三天里面就完全失掉了视觉。直到现在，他还时常感到剧烈的头痛。

雨落得更大了。雨声搔着我的心。那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在我好像是难捱的漫长的几个月。屋檐水流着，它开始在捣我的心。

"林小姐，林小姐，又漏雨啦！"第三床忽然大声喊道。他的声音把这凄凉的空气搅乱了。

"不要急，给你搬开就是罗，"林小姐答道，就走过来。

"偏偏今晚上事情多，看把林小姐累坏了，"第九床在旁边开玩笑地说。

"洪文全，你还要笑嘞，你也不帮忙？"林小姐温和地抱怨说。

"那么我来帮忙罢，"第九床说着就跳下床来。他跟着林小姐走到第三床床前。

"林小姐，枕头都打湿了，"第三床诉苦般地说。他蹲在被单上面，带着一种可笑的样子。

"给你换一个就是罗，"林小姐带笑说；"我们把床给你搬一下。"

"老苏，你可以下来吗？"第九床问道。

"我看还是不下来罢。我害怕动得厉害了会灌脓，"第三床嗫嚅地说。

"那么你索性坐下来，我们好抬些，"林小姐说。

第八床摆动着他那张猴子脸，一跳一蹦地走了过来。"我也出点力，"他笑着说。

三个人把那个床铺移动了一尺多的地位，使它跟粉墙、木壁都离开了。我听见雨点打着土地的声音。

"谢谢你们，"林小姐含笑对这两个帮忙的人感谢道。她照料第三床睡下，又给他盖好铺盖和被单。"现在好罗，"她松了一口气地说。

老郑打着伞进来了。还有两个工友包着头，穿着围裙似的衣服，抬着一个担架跟在后面。老郑喊着："林小姐。"林小姐立刻转过身来。"给他们抬走罢？"老郑接着说。

那两个工友放下担架，把人形的包裹抬到担架上去，然后抬着它走了。工友的头上、身上还是湿的，现在又得淋着雨到那个黑暗寂寞的"太平房"去。老郑也抱了草垫和棉絮出去了。明亮的灯光寂寞地照着一张空床。没有一点东西使人想到那上面曾经睡过一个紫色脸膛的人。

"老洪，你晓得林小姐叫什么名字？"第八床忽然问第九床道。

"我晓得她叫什么华，"第九床答道。

"什么华，你就讲不出来了，"第八床得意地说；"她叫林惜华，爱惜的惜，中华的华。"

"你怎么晓得？"第九床不相信地说。

"她在单子上写好的：第十一床病人某某子大月三日午后十时十二分逝世——值班护士林惜华，"第八床笑道。

第九床想了想，正经地问一句："现在你还敢不敢到毛房去？"

"敢是敢的，不过想到太平房，心里总有点那个，"第八床答道。

"我就不敢。我一定会想到十一床先前伸手抓我铺盖的样子，"第九床坦白地说。

"陆先生，陆先生！"第六床忽然在唤我。我掉过头向着他。

"他们会不会安葬他？"他关心地问道。

"葬总是要葬的，不会永远停在太平房里面，"我答道。

"他家里没有人来罢？"

"我不知道。"

"他在太平房里面停几天才安葬？"

"我不知道。"

"一个人这样死法太不值得，"他叹息般地说。

"其实死了也就无所谓了，人横竖要死的，"我赌气地说。我心里有点不痛快。我想：你为什么老是拿这种我不能回答而且不愿意想起的问题来问我。

"不过死也要死在家乡，死在自家屋里头才好啊，"他痛苦

地说，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你怕什么，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你不要难过，还是早点睡罢，”我看见他的眼泪，我的心又软了，我温和地安慰他说。

“我睡不着。我想起我娘，我懊悔不该出来……”他呜咽地说。

第 四 章

六月四日(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到病室来的大夫比往天少了些。上午查病房的时候也只有三个大夫来，并且匆匆地走过病床不问什么话就去了。我们这一个角的十一张病床(今天只有十一个病人)上没有一个重病的病人。第二床当然不算是重病患者。应该挖眼睛的人今天也坐起来讲笑话了。他不到半点钟的工夫就和第九床、第八床成了熟人，又和第三床、第六床谈过话。他说他姓冯，是第六床的同乡。又说他觉得左眼今天稍稍好一点，头也不痛了，他盼望可以保住那只眼睛。

第二床似乎睡得很好，现在听不见他那急促的鼾声了。他的儿子来的时候，这里正在开午饭，老人已经醒了，他要了一碗稀饭，放在方木柜上面，还没有吃。儿子拿着漱口盅进来。他放下漱口盅，对病人说："我今天给你买了半只鸡，炖好汤，你趁热吃点罢。"

"我不想吃，"老人答道，他把头稍稍抬起一点，马上又睡下去了。

"你不吃，杨大夫又要来给你打针啊！"第三床插嘴说。

"大夫说，你不开荤，疮就收不了口。你还是吃点罢，"儿

子顺着第三床的口气温和地劝道。

老人静了片刻，又把头抬起一下，然后说："好，我吃！"

儿子拿起漱口盅来要喂他。他摇摇头说："我自己起来。"

"你就睡着好啦，我来喂你，"儿子说。

"我要起来，"老人固执地说。他的身子本来侧着，这个时候就转动了一下，伏在床上，然后用两只手按住床单慢慢地撑起来，先是跪着，过后盘着腿坐，——这一切动作他做得极慢，而且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身子，他的腿就一直在战抖。他的儿子好几次伸出手去给他帮忙（漱口盅已经放回到方木柜上面了），但是手刚刚挨到他的身上，立刻又缩回去了。

儿子也许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我常常看见他在大夫、护士们用的脸盆里洗手，还用搭在脸盆架上的脸帕揩干（我每天大便回来也在那里洗过手的）。他每次挨近父亲的身体，总要露出一种厌恶或者害怕的表情，这大约是他自己不能制止的，也许是他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他缩回手以后还是要把手伸过去，虽然他做出厌恶的样子，却仍然常常来照料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显得很倔强，很固执，不愿意受别人的照顾，不管身体怎样病弱，事事总要依靠自己。

老人要儿子把漱口盅给他，他不要用调羹，两手捧着漱口盅，放在嘴边，慢慢地喝着。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他的手，他的脸都抖得很厉害。他的儿子立在旁边，望着他，手一伸一缩，老是做出要帮忙又不要帮忙的样子。这种情形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我把眼睛掉开了。

第六床在和两个朋友谈话，一个穿军服，是上尉，年纪三

十以内，另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年纪稍稍大一点。

"……你不要讲我跌伤的话。我自家养好伤会写信回家去。医官讲我过两礼拜就可以好……我下半年定规要请假回去一趟……"第六床说，他始终忘不了两礼拜治好的话，不过这次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他的眼光射在那只吊着的膀子上，他接着说："现在这只手绑好了。这两天都不觉得难过。前几天真受不住。天晓得！"他没有发牢骚，这倒是我料不到的。

"那么你可以放心养病了，"中山装微笑说。

这时我又把头掉向右面，因为我听见了杨大夫的声音。

"老先生，你怎么又坐起来啦！"她带着不满意的调子大声说。

"他在吃鸡汤，"他的儿子立刻替他解释道。

"吃点鸡汤也犯不着坐起来嘛！老实说这点养料也不够他消耗。我连换药也不肯叫他坐起来，"她对他的儿子说。

"我也劝他不要坐起来，他不肯听，"他的儿子陪笑道，过后又加一句："请大夫跟他说，他倒听大夫的话。"

杨大夫改变口气，像警告小孩似地对老人说："老先生，你听见没有？你下回再要坐起来，我就要给你多打几瓶盐水啊。"

"我不坐啦，"老人害怕地说，他把漱口盅递给他的儿子，开始做起躺下的动作来。

"这就好。以后也要这样啊。我马上就来给你换药，"杨大夫把声音放温和了，她的脸上现出了笑意，像开花似地，整

个脸上都有了笑的光辉。她一对大眼睛显得又黑又亮。我觉得她这个时候非常美。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我以为她会到我这里来。可是她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我知道在对面那个角里，她有更多的病人。在我们这一面，她的病人就只有我和第二床两个。我们是属于外科的。外科的病人多，所以实习大夫也不止一个；眼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泌尿科都只有一个实习大夫。不过实习大夫并不限定在某一科实习，他们应当轮流在每一科里实习。因此他们一个月换一次班，换一种科目。这是我从老资格第九床和新来的第十二床两人的谈话中知道的一些事。

（"一个月换一次班"这句话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快。我相信我不会在医院里住到杨大夫换班的时候；我不会住那么久的。）

杨大夫不久就来给第二床换药。跟昨天一样，她不让病人坐起来，不过她的工作似乎进行得快一些。换好药，她在洗脸架前洗了手，又回到第二床床前，看看病人是不是静静地睡着了。

（在换药的时候，她问过病人好些话，大都是她已经问过了的，譬如其中的一句："你在外面玩过没有？"她第一次问他的时候，经过几番解说，他才明白这个"玩"字的意思。现在他一听就可以回答了："我吃长素啊。"他的儿子还怕她不懂他的意思，跟着加一句解释："他是吃长素的，"这个回答使我发笑了。我看见杨大夫的脸上也露出一个有趣的笑容：她想忍住笑，却没有能完全忍住。）

"杨大夫,"我唤了一声。她立刻走过来了。

"昨天吃喜酒热闹吗?我希望你到得不算迟,"我带笑地说。

"我坐车去的。还好,没有迟到。这也是不得已的应酬,推不掉,只好去一趟。其实这里事情忙,我也没有心思进城去,"她温和地说,她没有笑,但是脸上罩着一种跟笑相近的表情。她对我说话不像大夫对病人,倒像是朋友对朋友,所以我敢随便地同她讲话。

"今天是礼拜,你可以休息罢?"

"可是礼拜天病人还是要照常换药啊。病这个东西,你不把它制服,它一天也不会休息的,不管是不是礼拜天。"她说着,自己也笑了,接着又添上一句:"所以我们做大夫的人是不该有礼拜天的。"她不等我接嘴,自己又说:"昨天拿给你的书读过吗?"

"读过了,"我答道。这是假话。一直到现在我连翻也没有翻过。

"你喜欢它吗?"她两眼发光地问。

"我喜欢,"这句话倒并不全是假的。我小时候,哥哥教过我读《唐诗三百首》,有十多首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我相当喜欢它们。

"那就好。我也喜欢读诗。我觉得诗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变得纯洁。我闷的时候,我总读诗。其实我也并不怎样懂诗。这就跟我喜欢听西洋音乐一样。我不懂,我只觉得它是这样,"她这些话并不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她有时似乎想用一两

句更恰当的话来表达她的心意，便停顿一下，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它，她只好随便用些她想到的字句匆忙地把谈话结束。她最后说："你看，我这个做大夫的跟病人讲这种话，别人听见，又会笑我发神经了。"她大方地一转身就走了。她不给我答话的机会。可是她的话却使我思索了好一会儿，她说得这么亲切，这么真实，我不能不感激她。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并且把她送出门去。

"这位女大夫脾气真好，"第四床忽然说了一句，这个姓孔的病人今天更好些了，脸和嘴唇都有了血色，眼睛也有了光，只是胡须长了些。

"是罢，"我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我朝他看了一眼。

"你以前跟她熟罢，"他又说。

"不，我进医院来才看见她的，"我答道。

"那更难得啊，"他赞叹般地说。

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就把脸掉到左面去。

第六床还在跟那两个朋友谈话。

"……我两天没有解大便，他们也不来灌肠，……"第六床又在抱怨了。他刚才还说过几句类似满意的话。不知道怎样，他的朋友们又引出他的牢骚来了。但是奇怪的是，今天天亮后看护小姐来问他大便的次数，他为什么不向她要求灌肠呢？

"那么你发不发热？"上尉问道。

"一百零两度，怎么不发热！"第六床答道。

"医官怎么讲？"上尉又问。

“他叫我多吃开水，我嘴巴淡，不想吃。他看都不来看我，真是天晓得！”

其实林大夫昨天今天都来看过。还有黄大夫也到他的床前问过：“好不好？”他总是简单地回答：“好。”我都听见的。

“医官真没道理！想不到有名的医院也是这样。还是换个医院罢，”上尉说。

“我也想换地方。××哥，请你给我打听还有什么好医院，”第六床接着说。

“我看还是不要换罢。换个医院，你的手又要从头接过，更费时间了，”中山装迟疑地说。

“只要医官好，我情愿从头接过，”第六床固执地说。他挣红了脸，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上尉同中山装彼此对望了一眼，我看见他们用眼光和脸色在谈话。过后中山装就说：“好，我去给你打听。”

第六床不讲话了。

这两个朋友一直到开午饭的时间才离开第六床。他们临走的时候，上尉还放了一卷钞票在第六床的枕边。那个年轻的军人红了脸，低声说了两句话。

“你拿去！你拿去！”第六床右手拿起钞票，向着他伸出去。

“我们走啦，我们走啦！”上尉和善地笑着，边说边走。中山装跟在他的后面。

第六床只好把手缩回。他望着他们出去了，然后收回眼光，数了数手里的钞票，把它们塞在枕头底下。他默默地想着

什么。过了几分钟，他把眼光射到我的脸上来，看见我在看他，便对我说："他们总要送钱来。"

"是啊，这也是朋友的好意，"我应酬地答了一句。

"我这次全靠他们，"他说，便伸手去揩眼睛。

我没有再说话，我有点妒忌他。我想着我的一些在远方的朋友。我在这里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年轻人。

老许端着菜来了。他那张瘦而不长、却点缀了几颗麻子的脸上堆着笑，今天笑得有点不自然。白布围裙黑黑地闪光，上面积的油垢更多了。一只苍蝇叮在他的胸前。他把菜先送给第九床和第八床。他们是他经常的主顾，他不会忘记他们的。我叫的一份猪肝汤他也送来了。我看见他那根黑黑的大拇指在菜碗口上留下的纹印，几乎要打起冷噤来。但是别人都若无其事地吃着，我也不好意思挑剔。我把心一横，居然连猪肝、连菠菜、连汤全吃下去了。我的肚子也实在饿了。在这里除了稀饭和鸡蛋(鸡蛋我不能多吃)外，我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呢？

收钱的时候，老许望着我，低声说："陆先生(他倒容易记住别人的姓！)，你晓得不晓得，这两天湖南根吃紧？"我昨天上午同他谈过一番闲话，他跟我一下子就熟了。

"我报也没有看，怎么晓得？你听见哪个说的？"我惊讶地问道。

"他们都这样说，说是报上也登得有。我们老板有个亲戚在桂林开工厂，说是要搬到这边来。我们老板着急得很。那

个厂他有股子，"老许做出严重的表情低声说。

"我看，不会这样严重罢。即使仗打得不好，也不会一下子就打到广西，打到桂林的。"我不能够相信他的话，他也许听错了别人的传言，也许别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我进医院的前两天，报上刚刚刊载敌人发动湘北战事的消息。这是一年一度的照例文章。不过今年发动得稍稍早一点。大概只是一种骚扰的性质罢。我是这样断定的，所以我摇着头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这种论调。

"我也不晓得。陆先生，你是读书人，当然比我们懂得多一点。我是想，要是他们厂搬过来，我就到他们厂里去做工。当茶房实在没有意思。"老许睁大两只眼睛恳切地望着我，他两只手接连在围裙上面擦着。

"要是有别的事，换换也好。最好能够学一门手艺。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一，"他带着惭愧的表情说。他似乎觉得自己这样大年纪，还没有学到一点本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你还比我小，我今年二十三了，"我说。

"我哪里能跟你们先生比？你在哪个机关办公？"

"我原先在××银行做事情，现在赋闲了。我比你还不如。"

"你现在是在治病，应该休息。病好了，又会有大事情做，"老许笑着说。

第九床已经唤过老许两次了，我不想再留他，便换了语调，催他道："你快到那边去罢。"

“我去，我去。他是老主顾，不能得罪的，”老许自语般地说，他好像还有许多话不曾说出来似的。

午饭后，应该是下午两点多钟罢，病房里相当热，我不能再穿绒线衫睡了，我坐起来，刚把它脱下，杨大夫忽然来了。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她亲切地笑道。

什么好消息？我想不到。难道我不必开刀，便可以病愈出院？我望着她那黑而亮的大眼睛，微微张开嘴，半晌讲不出话来。

“你明天上午就开刀。已经决定了。好不好？”

这的确是意外的消息。它使我激动，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安静被搅乱了。在这一瞬间，我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也许我的脸色也变了，因为我看见她怔了一下，过后她又笑了。

“你害怕吗？”她说。“你说过你不怕的。你不是希望早开刀吗？”

我不好意思正面回答，便改口问她：“头等病房那个病人呢？”

“他明天不开刀了。我便趁这个机会请冯大夫提早给你开刀。照X光的结果也知道了，你没有问题，”她和善地答道，带了点满意的神情摇摇她的浓发。

看见她的亲切的微笑，触到她的柔和的眼光，我觉得我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杨大夫，谢谢你啊，”我说。

“那么你不要怕啊。你放心，我明天会在旁边守着。决不

会有问题。冯大夫手术很好，"她鼓舞地说。

"杨大夫，我说过，你在旁边，我就不怕，"我感动地说。

"你心烦或者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背几首唐诗，那会使你安心的。其实上过了麻药，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全身麻醉，不会有一点痛苦，"她声音柔和地安慰我。我感谢她的好意，我相信她的话，但是我不能不奇怪她为什么这样喜欢唐诗呢？她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

"我知道，"我点点头说。"明天早晨吗？几点钟？"

"八点钟。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总之，你放心，不会有问题。我等一阵再来。"她走了。

我似乎做了一个梦。但是我说不出这是怎样的梦，我的笔写不出我这时的心情。要我口述，我也不成。我的思想好像在跑马，来去很快。我不能说我害怕，但是我仍然很激动，我的心静不下来。我觉得不能等待了，我盼望一霎眼便是明天。奇怪我忽然变得性急了。我愿意马上就有一个决定。

"你明天开刀？"第四床姓孔的问，他多少带了点关心的样子。

我回答一个"是"字。

"大手术，全身麻醉，不晓得怎样啊？"第四床自语似地说，其实他是在问我。可是我拿什么话回答他呢？我没有作声。

"你明天开刀？很好！"第六床姓朱的问。他好像在羡慕我。"你会比我先出院的。就是这个女医官给你开刀吗？"

"不是她。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冯大夫，"我答道。

"这个女医官姓什么？她待病人真好，"第六床又说。

“她姓杨，大家都喊她做杨大夫，”我故意加重语气说。他应当知道她的姓，记住她的姓的。他对于自己周围的事情太不注意了。

“我自家运道不好，碰不到好医官，”第六床自语道。他大概又要发牢骚了。

我不想再理他，便拿出《唐诗三百首》来翻看。我要依杨大夫的话，好好地读熟唐诗。

一首，一首，我慢慢地念着。我在读五言律诗的一部分。那些带有音乐性的句子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进入一个梦境，又一个梦境。我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我这被搅乱了的心渐渐地得到安宁了。

第十一床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想不到医院的生意会这样兴隆。杨大夫多了一个病人了。

新病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大约是一个商店职员。他的两腿两手都在灌脓，说是骑自行车跌伤了，用冷水洗坏了的。杨大夫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孩子似地小声哭起来。

“不要紧，你忍一下。痛过这一阵就没有事了，”杨大夫温和地说，她小心地给他包扎，先包好了两腿，然后再包扎两手。这种上药的工作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中间还因为那个孩子几次的呼痛而稍停顿。但是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善良的笑容。最后她站起来，还叮嘱他：

“以后跌伤了不要再用冷水洗啊！”

她从第十一床又走到我的床前来，笑着对我说：“你不要

出去啊。等一阵你还有许多事情。”

她到洗脸盆架那边去洗了手。但是盐水针架子已经放在第二床床前等候她了。

接着那个好像在沉睡中的老人开始叫起来。还是他那拖长的、小孩唱歌似的叫声。

“打不得啦……我要死啦……我以后吃荤啦……真的要死啦……我儿子到哪里去啦……我死啦……”

我忍不住要笑了。

“他现在要吃荤啦!”第八床扑嗤地笑着说。

“你不要喊了,今天给你少打一点罢,”杨大夫走过来,把橡皮管子理顺,让盐水流得快些,然后一播一晃地走出去了。

“打不得啦……打死啦……”老人仍旧闭了眼睛哼着。

“你再喊,也没有用,杨大夫已经走了,”第三床坐起来说,大概叫声使他感到不耐烦了。他这两天心里烦躁。他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来看他,却始终见不到一个朋友的影子。

“她会来前,”老人忽然接嘴说,这一次他居然听到别人的话,而且马上回答了。

“哼,她会来!她来了,说不定还要叫你多打针哟!”第三床厌烦地说。

杨大夫并没有来。但是老人的儿子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还牵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是老人的媳妇和孙儿。妇人矮小、瘦弱、苍白。孩子眼睛大,脸小,带一种病态的黄色。

“爹,他们来啦,”儿子走到床前俯向枕头说。病人含糊地

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他的脸也被儿子的背遮住了。后来儿子便走开，让媳妇和孙儿到老人面前去。

孙儿叫过了他，媳妇叫过了他。但是他们马上就退开了。他们远远地站着。现在我可以看见老人的脸了。老人睁开眼睛无力地看了看他们，两腮动了动，似乎想笑又笑不出来。他吐出一句："你们来啦！"

"是，你好些罢？"

"我要死啦！……我受不了啦！……你喊人把针给我取出来！……"老人喊道。

我看架子上那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半瓶盐水。水走得慢，他还得忍受一些时候。

那个媳妇似乎很老实，她真的就走到条桌前去找小姐了。我没有听明白她跟袁小姐和刘小姐（汪小姐今天没有来）讲了些什么话，她的声音很低。我只听见刘小姐答道："不行。不能取。就要打完了。你要他多忍一阵。不要紧的。"那个女人红着脸走回来。她把刘小姐的话对她的公公转述了。过后她牵着孩子的手，仍旧站得远远的，望着病人受苦。

儿子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漱口盅，显然他又去煮了什么汤来了。看见他一步一步走着的衰弱样子，我注意到他的脸更瘦，脸色也更苍白了。女人在旁边用了同情的甚至哀愁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用说，在这里她更关心的还是这个伺候病人的人。

"要死啦！打不得啦！救救我啦！儿子嘞！……"老人继续叫着。

儿子俯下头："爹，就完了。我给你热鸡汤来了。打好针你吃点啊！"他说完，又走去洗手去了。我奇怪，他一天要洗多少次手？

眼科主任郭大夫来了。他的姓还是第九床告诉我的。他来检查第十二床那个司机的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女大夫。

"今天好一点没有？"他问道，一只手拨开病人的眼皮，另一只手用电筒光去照病人的左眼。

"还是一样。筋一股一股地蹦起痛。"

"我看还是要挖掉。左眼是救不转来的了。不挖掉，怕的是右眼又发病。理由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你懂吗？"那个身材矮小、满颊须根、相貌和善的大夫严肃地说。

"我懂。请郭大夫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第十二床埋着头问。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郭大夫怜悯地摇摇头说。"不过挖眼睛不是一件小事。你先跟你朋友商量一下，将来开刀的时候，你还要找个朋友在证明书上盖个章。"

"郭大夫，是不是我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把脏东西弄到眼睛里头……"

郭大夫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不会罢。致病的原因，一时也难说。你现在多休息，少动，养几天再说。"

"右眼不会有问题罢？"

"你早点把左眼挖了，右眼就不会有问题的。"

"挖掉一只眼睛，脸上不晓得有多难看，"第十二床自语似地说。

"可以装假眼睛。"

"不过假眼睛看不见，又不能活动。近看起来很吓人！"第十二床耽心地说。

"可是，就目前的医学来说，除了装假眼睛，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大夫说，不禁怜悯地微微一笑。他用英语跟女大夫讲了几句，女大夫只是点头应着。

大夫们走后，第十二床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望着大门出神。过了一会儿他躺下来，两只手蒙住脸，头微微颤动。他好像在那里寂寞地哭着。

在他的右边，老人不再哼了。盐水已经打完，针取出来了。老人闭上眼睛，含糊地呻吟着。儿子、媳妇、孙儿全站在床前，不过并不太靠近，他们一直默默地望着他。连那个五六岁的孩子也很驯善地偎在母亲的身旁，只偶尔跟母亲低声讲一两句话。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儿子眼媳妇在谈话，媳妇忽然走到老人的枕头边，俯下头对老人说了两句话，就拿起漱口盅来，用调羹喂他喝汤。老人不拒绝了。他忍耐地喝着，她也忍耐地喂着。孩子要跟到母亲的身边去，却被父亲止住了。那个做儿子又做父亲的中年公务员仍旧保持他那过分的洁癖。他始终不敢多挨近老人，有时挨近了再离开的时候，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露出一点厌恶的表情，而且马上就去用药水肥皂把手擦洗干净。

这一次老人大概喝了不少的汤，因为我没有听见他说过“不要吃”，倒是媳妇自动地把漱口盅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们回去罢，”老人说。“四宝啦？”他问，头微微颤动一下。

“四宝，来！”女人向孩子招手唤道。孩子的父亲便让孩子跑到床前去。

“你喊一声，行个礼，我们就回去啊！”女人温和地吩咐孩子。

孩子听话地唤了祖父，行了礼，然后跟着母亲走了。

“快去洗手！”女人刚离开这张病床，她的丈夫就低声嘱咐道。他还把她领到洗脸盆架前面去。

但是我没有工夫再管别人的事情。杨大夫来找我了。

验血压，扎耳朵，验小便……我看见她为我忙着，我非常感动。我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不晓得怎样啊，”我对自己说，其实我倒希望她给我一个回答。

“不要紧的，”她微笑道，“至多明天难过一天。不过别人都捱得过，你一定也捱得过。而且我明天也在场。我会好好地照料你。”

经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我感谢地对她笑了笑。

她刚走出病室，我忽然听见第一床那个接腿骨的病人叫老郑抱他下床。这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每天大清早他照例要叫老张给他拿大便盆。此外除了他必须和大夫问答的时

候，便难得听见他讲一句话。前天外科主任黄大夫（他是骨科大夫）对他说过："你可以起来走走试试看。你应该走走了。我打算过几天就给你取石膏。"昨天黄大夫又问过他："你起来走过没有？你不起来走走怎么成？你不方便，可以找工友扶着你走。你一定要起来走走。"两天来他并没有动作，他似乎为这件事整整踌躇了两天。现在他决定起来试一试了。

老郑走过去抱他。我听见他着急地说："你把被单给我裹住身子。"接着他被老郑抱起来了，就让他立在床前。一幅白被单像袈裟似地披在他的身上，只露出一只光光的右膀来。他的身子齐腰靠着床板，两只手向后压住床沿。一张白白的长脸，一头昨天刚剪过的短发，两只不住地霎着的眼睛。他觉得新奇而且带了一点歉意地微微笑着，好像在对谁讲话似地自语道："不行。头昏。站不惯。"他把头略略移动，似乎想看看这个病室里四处的景象。可是他的眼睛霎得太厉害了，他一定不会看清楚什么。

"不行，不行，头还是昏，"他微笑着，抱歉似地说。

没有人陪他讲话。第六床一个人低声在抱怨："他可以站起来了，我还是跟刚进来一样，动都不能动，真是天晓得！"

我看第六床一眼，他的脸通红，眼睛竖得更高了。

"他进来两个月了，你还不到两个星期，当然不同。你何必着急！"我说，我一半是安慰他，一半是反驳他。

"过两个月还是医不好。我晓得我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想换地方。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娘望着我哭，我怕我再看不见她啦！"

"不会的！你怎么能相信梦！你住医院就应该相信大夫！"我说着有点生气了。我想：怎样一个顽固的人啊！

"好医官，我们才信得过。我那个医官一天来一趟，也不管病人死活，脾气又大得很。他会治好病，真是天晓得！"他皱起眉头带着哭相说。

"那么他每天早晨来问你'好不好'，你为什么总是说好呢？"我反问道。

"我说'好'说'不好'，还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管你，站一下就走开。"看他那神情，倒是我的固执和罗嗦使他着恼了。

我不敢再向他说话，便拿起《唐诗三百首》来，念了几页，我觉得疲倦，又放下了书。

"请你把书借给我看看，"他说。

我迟疑一下，我不愿意把杨大夫的书转借给他，而且我以为他不会喜欢这种书；但是我终于把书递过去了。

他翻开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即刻阖上书，或者往后翻过去，他却用了近似唱山歌的声调从头读起来。他一首一首地读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好一会儿。我再睁开眼睛，第六床还继续在读唐诗。我觉得奇怪，我偷偷地看他。他的眼睛似乎松弛地放平了一些。脸色也不怎么红了。他专心在念书。他的眼光就在字句上移动。我发觉他的嘴角带着笑意，我有点高兴，杨大夫的书居然使这个从来不笑的人笑了！

可是我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泪珠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滚出来。他不是在笑，他哭了。他读到什么人的诗句呢？我

注意地听着。他好像是在读“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句子。那么他又在想念家乡罢。我那一团高兴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也不敢再注意他的事情。我害怕我自己也会像他那样地哭起来。我也是孤零零地在他乡作客的啊！

晚上，刚查过病房以后，第八床回来了。他是这天午饭后出去的，说是到他的妹夫的茶馆里去玩。第三床托他买一盒藕粉，第九床托他买一些食物，我也顺便请他代买胶布和药皂，他全带回来了。我还得补他十块钱，我感谢地拿给他了。他含笑地接受了我的谢意。他身上穿着整齐的灰布中山装，一张脸仍然让白手帕镶着边，白蝴蝶又从旧草帽下面露出来了（他刚刚揭下草帽来）。他夸耀似地站在第三床面前。

“十多天没进城，东西又涨罗，药皂小块的也涨到一百五，本来大的也只卖两百，”第八床得意地说。

“你在城里玩得好罢，”第三床羡慕地说。

“还不错，看了一场马戏。在我妹夫的茶馆里吃了一顿饭。他们茶馆里生意真好！客人川流不息，一天好几万的进账！”他眉飞色舞地说。他的头一摇一摆的，头发上那只蝴蝶仿佛要飞起来一样。

“他的茶馆地点适中，又宽敞，所以生意好，我也去过两次，”第三床接着说。“你在外面听见什么消息没有？”

“还不是战事的消息。有人说湖南的仗打得不好；也有人说，不要紧，日本人不过来骚扰一下就要退兵的，”第八床满不在意地说。

"老许今天来说，湖南战事打得很不好，不晓得他从哪里听来的？"第三床压低声音说。

"不会的，"第八床摇摇头说。"老许不晓得在哪里听来这种谣言。我可以断定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会退回去。"他又改换了语调："你要不要冲藕粉吃？我给你拿去冲。我也要冲一碗。"

"好罢，谢谢你，糖在这里，还拿个鸡蛋去，"第三床感谢地赔笑道。

第八床去了片刻又回来了。他满意地微笑着对第三床说："我碰到胡小姐，拿给她去冲罗。"

不久，胡小姐端了两碗藕粉进来。她一边走，一边低声笑着。她把碗递了一个给第三床，抱歉似地笑道："冲得不好，太干罗。我不会冲。"

"很好，我就要吃干的，"第八床跑过来接着另外一个碗，笑着抢先说。

"烫啊，你当心点，我去把藕粉盒子拿回来，"胡小姐转身去了。

第八床就站在第三床的床脚边，埋下头把藕粉一调羹一调羹地送进嘴里，满意地咂着嘴。

"老苏，我今天看马戏碰到汪小姐，她居然给我打了招呼，"第八床忽然抬起头来说，他匆匆忙忙地几下就把藕粉吃光了。

"她一个人吗？"第三床问道，他一面吃着藕粉。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比她大一点，头顶有一点秃罗，衣服

倒很漂亮。她正挽住他的膀子走路，看见我，连忙把手松开。汪小姐今天打扮得很摩登，嘴擦得通红，衣服也换了一身崭新的，不像在医院里穿的那样，"第八床得意地说。

"那是她的未婚夫，上个月才订婚的，是××银行的会计主任，好像上海还有一个家，不然就是续弦。听说这是廖大夫介绍的。汪小姐命不好，从前订过婚，刚要结婚，新郎坐飞机出事死了，所以三十二岁了才订婚，"第九床忽然坐起来兴奋地插嘴说。

"原来这样，难怪汪小姐脸上总带苦相，"第三床笑道。

"你们不要乱讲啊，汪小姐是个好人，待人也厚道，你们嘴少刻薄点，不要乱讲人家的私事，"胡小姐拿着藕粉盒进来，听见了第九床和第三床的谈话，便噘起嘴干涉道。

"你胡小姐倒是一个好人，我就没有听见你讲过一句别人的坏话，我们哪里可以跟你相比？"第九床大声笑着说。

十一点的光景，老李来给我灌肠。另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中年人来剃去我的胸前的柔毛。这些奇怪的经验。……它们叫人觉得多不舒服。

"那个剃毛的人，你给他钱没有？"第四床没有睡，他忽然问我道．剃毛的人已经拿着剃刀和肥皂水碗走了。

"什么钱？"我奇怪地问。

"小费，你要给的，多则五十，少则三十，"第四床微笑地说。

"他并没有要就走罗，"我答道。

"他会来的。要钱的事他们哪里会放过！这个医院就是

这点不好：处处要钱，尽花在小地方，而且要现钱。其实医院也没有得到好处。这大概是什么'抗战作风'罢。我从前在南京、上海住医院，都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多争论一两句，他们就会拿什么物质条件不够的话来堵你的嘴。其实呢，在我们后方，只要你有钱，什么条件都够。"他好像故意不睡觉等着这个机会来对我发一通议论似的。他这两天静静地躺着，难得讲几句话。他现在大概憋不住了。不过他是不应该抱怨的，他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今天张大夫对他说，再过两天就要给他抽线了。

"是啊，你的意思不错，"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掉过身子把背向着他。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静，是沉默。我应该先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回想一番。不管生和死，不管怕与不怕，从明天起我得开始一个新的经验了。

我的微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因为我觉得一个黑黑的人影立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我就看出来是那个剃毛的人。他来做什么呢？他不说话，却带着笑容（多么勉强的笑容）望着我。他在等候我的吩咐。

我明白了。第四床没有说假话。我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他。他带笑地接着，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我奇怪我的笑。我为什么要笑呢？我说不出。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我和这些人、这些东西好像隔得很远似的。我觉得许多事情都可笑。我奇怪为什么人们的眼光会那样地窄小！

病室里就只开着条桌前面的那盏电灯。林小姐穿着红绒

线衫在那里读书。病人似乎全睡了。痛苦的鼾声仿佛变成了一些有形体的小鸟，它们飞不出屋去，只是盲目地四处撞扑。它们向着我这边扑过来。

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怀疑地问着自己。我越想睡，越不能睡。我的思潮汹涌起来。过去二十三年的生活对我变成十分可以留恋的了。心境的安宁扰乱了。我感到心慌。为什么？难道我的生命到了末日？

我看见了我那个在沦陷区的老父的面颜。他和善而带悲哀地望着我。我后悔两年多没有写信给他，六年没有回去见他一面。他不知道我生病，更不知道我明天要剖肚皮。他是我在人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因为他续弦的事跟他起了冲突，甚至断绝了信函的来往。难道我就这样静悄悄地永远离开他吗？

"哎哟！哎哟！"忽然从第三病室里传过来这个可怕的叫痛声。真是可以撕碎人心的尖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晚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明天我会被人当作一架机器剖开肚皮取去胆囊。在冯大夫的眼里我也许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可是我自己呢，我真的就会没有一点感觉么？

"不要怕！"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浓发大眼，厚嘴唇和无拘束的和善的微笑。杨大夫！救救我！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没有用。女病人的叫声毁了一切。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仿佛看见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滚动，牢牢地抓

紧被单，疯狂地叫喊。

我在思想中找不到出路。我的心得不到安宁。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低声呻吟。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杨大夫来了。她没有穿工作衣，只穿了一件灰布旗袍。我没有注意到她来。可是她轻轻地唤我的名字。

“杨大夫，你还没有睡？”我惊喜地说，我从枕上抬起头来。“现在有十二点罢？”我感激得淌下泪来。

“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罢，睡得好吗？”她亲切地问。

“我睡不着，心里烦，”我像一个孩子似地诉苦道。

“不要紧，我喊小姐给你吃点睡药，你会睡得很好的，”她和善地安慰我。

我看见她在条桌前和林小姐谈了几句话。她走了。林小姐却端了一个小小的药杯过来。“吃罢，”林小姐说，把药杯递到我的手里。

我一口喝光了睡药。药是咸的，而且带着怪味。林小姐就用这个药杯从我的茶壶里斟了两杯冷开水给我喝。

我的心温暖了，我的心安宁了。我相信我可以睡去。

第 五 章

六月七日(星期三)

我想不到我还会活着。我想不到我还能够躺在床上安静地(虽然是虚弱无力地)看着、听着四周的一切。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其实我不过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还不知道我前昨两天是怎样度过的。我不敢回想那两天中的痛苦。

现在我似乎没有大的痛苦了。开刀的地方有时隐隐地痛一阵,然而这是很容易忍受的。不方便的倒是我不能转动身子,我必须安静地仰卧,而且我还很虚弱。我容易感到疲倦。我只能吃流质,我的胃口也不好。

上午冯大夫和杨大夫来看我,问我的肚子胀不胀,他们对我的状况相当满意。我着急地问他们我开刀的结果,他们只说经过良好,开刀时间不久,流血也不多,并没有找人输血。这似乎是个好消息。我听到也有点高兴。

杨大夫并没有离开病室。她在给第二床和新十一床的病人换药。新十一床那个孩子的伤口好多了,今天换药的时候他没有哭,不过轻轻地嘘了几声。第二床似乎还是那个样子。她换好药洗了手以后,又到我这边来。

"你今天好多了，我并不骗你，没有危险罢？"她笑着问道。

"杨大夫，谢谢你啊，"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还记得前天的情形罢，起先你两只眼睛老是望着我，后来……"她像一个长姊似地微笑道。"后来"下面的话她咽住了。

"电灯那么亮，睡在手术台上，绑住两只手，就像牛羊等人宰割一样，我有点害怕，"我慢慢地轻声回答。

"后来？"

"后来你们把帕子蓋到我的脸上，我听见你在喊我嘘气，又喊我数一、二、三。我只觉得难过，透不过气来。难过到了极点，我就没有知觉了，"我仍旧慢慢地一边想一边回答。

"后来？……"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你在给我打盐水针，我只觉得两只腿又肿，又烫，又痛，说不出的难过。我心里又发呕。我伤口又痛。肚子又胀。我不晓得那天跟你讲了几句什么话。"

"你不肯打盐水针，你吵着要把针弄断。幸而你没有气力，我还给你打过一针葡萄糖，还给你放过气，"她带点哂笑地说。"好了，你休息罢。你还不能多讲话。"

她正要走开，我却把她唤住了。

"杨大夫，第二床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我问道。

她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她皱起眉毛摇摇头说："恐怕好不了。我给他换药的时候，我真害怕。他生梅毒。"

"梅毒？你要当心啊！"我吃惊地说；接着我又问："他不是

吃长素吗？年纪又这么大，怎么会生梅毒？”

“哪个晓得他会生这种病！到第三期了，一身都烂了，臭得很。我真害怕……”她把下嘴唇咬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我知道她到对面那一角给病人换药去了。

我替她感到不快。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对那个老人的命运，我并没有多大的关心。只是那个中年公务员的有苦无处诉的苍白脸孔却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打击他应当用怎样的力量去忍受啊……

我倦，我头昏，大绷带（它另有一个正式名字，但是我却叫它做大绷带，这是专用来绑肚皮的）使我气闷，我的背压在大绷带的垫布上很不舒服，我的四肢酸痛。我不能再用思想了。

白天我的心境还好。我没有感到特别的不舒服。我只是虚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兴致。我想睡，也能睡；不过我容易惊醒，醒后更觉得疲倦。

夜给我带来了痛苦。电灯光，哪怕是从条桌的上空远远地射过来的，也会刺痛我的眼睛。病人的谈笑，哪怕就只是偶尔的几句，也像利爪似地搔着我的脑子。偏偏一到晚上，他们（第三床，第八床，第九床，还有那个等着挖眼睛的第十二床）就大声讲起种种的笑话。我烦躁，不安，伤口痛，肚子胀。我一闭眼就觉得那根细的橡皮管从我的鼻孔伸进来。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说不出的厌恶。……我的思想，我的记忆全破碎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脑子里装了一堆渣滓，一堆碎玻璃。

昨晚比今晚更难熬，痛苦似乎就不会有终局。人世跟我离远了，我仿佛陷在地狱里受苦刑。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安静，

可是那些轻病的病人却带说带笑地吵个不停。他们快乐的声音就像许多木棒在敲打我的脑子。第三床用牙齿敲着拍子低声唱歌。第九床讲着笑话。第八床哼着小曲。这其间第十二床还插嘴进来，要第八床唱《十八摸》，第八床并没有理他，他自己却色情地唱起来："伸——手摸在——姐姐的……"我真想打他一个嘴巴！我又想大声叫喊，可是我没有力气。……我头痛，伤口痛，四肢痛。我怕我不能再忍下去。我以为我的末日已经近了。但是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应该休息了。人家病重的，刚开过刀的，晚上需要安静，你们这样吵不是故意给人家添病吗？"

"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病人这样答了一声。病室里立刻静下来了。我看见杨大夫穿着白色工作衣立在我的床前。

"你觉得好点吗？"她关心地问道。

我无力地摇了摇头。

"你能睡罢？"她仿佛知道我的痛苦似的，再问一句。

我又摇摇头。我忽然想起她对我说过要我在痛苦的时候背诵唐诗，我以为她会再拿这句话劝我，我便用力说："我的脑子完了。唐诗也完了。我全记不起来。"

她扑哧一笑，声音小，而且马上就忍住。她哂笑道："你不要管什么唐诗不唐诗。还是睡觉要紧。我给你再吃点睡药。明天你的脑子就不会'完'了。"

今晚，她来得早，就是在查病房的时候。

"你觉得好点吗？"她还是关心地问。

我摇摇头。

"睡药给你开好了。你吃的时候，问小姐要罢。我看你今天好多了。你可以放心。"她和善地笑了笑。

听了她的话，我才觉得我的确好些了。我还可以听清楚并且强记住外科主任黄大夫和林大夫在第六床床前谈的话：

"他不应该有这样高的热度。四天都不退热，你看会不会是Malaria(疟疾——他们讲英语，讲得慢时，我可以听懂一些单字)?"黄大夫的声音。

"我在研究。我看又不像Malaria。……"林大夫回答。以后他讲着很流利的英语，我抓不住他的意思。

黄大夫也讲了两句英语，我听懂几个单字，我猜想他是在说，要是转了别的病，膀子就有点麻烦了。

林大夫拿起方木柜上第六床的茶壶摇了摇，大声对病人说："你要吃水嘛。你不吃水不会退烧啊。"

"我嘴巴淡，"第六床答道。

"这不是理由。你应该把开水当药来吃，不管嘴巴淡不淡都要吃!"林大夫的话总是用那种粗暴的声音说出来的，他什么时候都像在跟别人生气一样。他这几句话像起锈的锯子似地在我的头骨上迟钝地锯着。

我居然支持着听了这几句对话。但是现在我崩溃了。我的头像被什么东西打碎了一样。

我想到了我的救药，那唯一的可以给我带来睡眠的东西。我放弃了挣扎。我高声唤起"小姐"来。

第 六 章

六月八日（星期四）

昨晚我睡得熟，我似乎还做了一些梦。我一夜没有醒过。但是老李把我叫醒了。那个时候我真恨他。我需要睡眠，我需要安宁。天都还没有亮，他为什么要唤醒我？我努力睁大眼睛，我昏昏沉沉地捱着时刻。

像前昨两天那样，林小姐来给我洗了脸。

窗外一阵一阵的雀噪随着晓风送进来。我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鸟声像水似地在我的脑子里流过，我感到一阵轻微的舒适。这种情形，前昨两天都不曾有过。杨大夫并没有骗我。我的确慢慢地好起来了。

一群麻雀愉快地从一面破纸窗飞进来，又从另一面窗户飞出去，还留下一只在梁上安闲地唱歌。病室的上空一片金光，外面是一个美丽的晴天。

我的记忆恢复了，心安定了。脑子像被清水洗净了似的。昨晚的痛苦变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我高兴地想着：我复活了。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病愈的人。虽然我还不能够剧烈地转动我的身子，可是我的伤口已经不痛了。

每餐一碗"半流质"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饥饿。我决

定求助于老许。那个年轻的茶房每天仍旧到我的病床前站一两分钟。他不是来问我要不要菜，却是来问我的病有没有起色。我并不是他的老主顾，几块钱的小费和几句温和的话使他对我发生了好感。在我的痛苦中我看到了他的同情和关切。我感谢他，我也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原是很容易接近的了。

上午大夫们来看病人。冯大夫和杨大夫到我的床前来了。

"怎么样？今天好些罢？"冯大夫长者似地问道。他那锐利的眼光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他的八字胡盖着的嘴唇半张开微笑了。其实他不是在发问，他一定已经看出我的健康的进步了。

"好些了，"我点头答道。杨大夫没有讲话，她亲切地微笑着，她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

"伤口不痛罢？"冯大夫又问道，他一面在翻看手里拿的病历表。

"不痛，"我答道。

"我看看你的伤口，"冯大夫说着，就把病历表递给杨大夫，过来揭起我的铺盖。我上身没有穿衣服，伤口被大绷带绑着。他动手解开大绷带的结头，像剥笋似地解开一层又现出一层，最后伤口快露出来了。我忽然害怕起来。我掉开头，不敢看自己的伤处。

"很好，"冯大夫仍旧埋着头说。"下星期就可以抽线了。杨大夫，请你过去拿点棉花、纱布来。"

我看见杨大夫掉转身子走开，又看见她回来。我始终不

敢看自己的胸膛。我觉得伤口痛了一下。我咬住下嘴唇，准备忍受更大的痛。但是冯大夫的手已经在收紧大绷带的头子了。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

冯大夫抬起头来，他的眼光又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不要紧了。再养几天就完全好了。"他满意地笑了笑。

杨大夫没有说什么话便跟着冯大夫走了。我看见他们站在第二床的近旁谈了好一阵话，似乎在议论那个老人的病势，过后又到对面那一角去了。第二床静静的，一声呻吟也不发。他的生命似乎在渐渐地消失。他的儿子仍旧一天早晚来两次。他上午停留不到半点钟，下午倒常常耽搁一两个钟头。上午照旧拿来漱口盅，下午又把它带回家去。他似乎希望就靠这一点点鸡汤和猪肝汤挽救父亲的生命，却没有注意到那生命已经临近油干灯尽的境地了。这天他照常地拿着漱口盅来，照常地俯下头跟他的父亲讲一两句话。不过他不再用手帕蒙盖嘴、鼻了，他戴上了纱布做的白口罩。这使他的脸显得更苍白，更无精神。他弯下身子扶着父亲翻了一个身。过后他便到洗脸架前面去洗了手，正朝着门外走去。

杨大夫也到那里去洗手。她把他唤住了。他们就站在病室门口谈了一阵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后来他们一路走到第二床床前。儿子站在那里，垂下头，弯着背，带着可怜相呆呆地望着他的父亲。杨大夫却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来。

"杨大夫，我可不可以在外面叫猪肝汤、叫面来吃？"我不等她开口便问道。

"可以的，"她笑答道；"不过你不要吃多了！最好叫他们

弄干净点。"

"医院里那一点点东西，实在吃不饱，"我解释道。

"这就证明你的病已经好起来了。可见你的脑子并没有完，唐诗也还没有完啊，"她抿着嘴笑道。

我略略红了脸。我想起前三夜的情形，解释地说："杨大夫，你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多难过。"

她怜悯地看了我一眼，含笑说："不过现在算是过去了。以后我担保你不会再痛罗。"

"头等病房那个人开刀没有？"我忽然想起就问道。

"昨天开的刀。结果很好。他的胆囊拿掉了。他身体真好，"杨大夫答道。

"那么我开刀的结果怎样？我的胆囊拿掉了吗？"我接着关心地问。

她迟疑半晌，才说："也很好。你没有流多少血。"她只算回答了半句，并没有答复我的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了。在她的鼻上眉间我看出一点阴影。

"杨大夫，请你对我讲真话，我的胆囊是不是没有拿掉？"我着急地问。

"没有，"她低声答道。她把眼睛掉开去看别处，但是马上又掉转来望着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你胆囊旁边粘液太多，只来得及给你分开整理一下。要拿掉，时间不够，你身体又差一点。其实以后也不见得会再发病。即使几年后再发，你还可以来医院开刀。"

"那么他，头等病房那个人——"我带着愤怒说，后面的

话，我说不下去了，我掉开眼睛不看她。

她受窘地红了脸，踌躇了一下，过后她温和地、充满感情地说："你不要误会，并不是故意不给你拿掉，当时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冯大夫总算尽了力量。三十床身体好，他没有那许多粘液，拿掉也容易些。绝不是因为他住头等病房我们就特别看待他。你可以相信我。"我的眼光又射到她的脸上了。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它们慢慢地却又是深透地进到我的心里。我的不平，我的愤慨，我的愤恼全被赶走了。我觉得惭愧，我不敢正眼看她。我想说一两句解释的话，但是，我张开嘴，只吐出一个含糊的字音，我的嗓子就哑了，我觉得我淌了眼泪。

"你真是一个孩子。我说两句话，你就哭起来了，"她带着怜惜的口气责备说。"这是我大意，我不该说得这样早。我以为你会相信我的话。"

"我相信的。你不像一般的大夫，把病人当成机器一样。你跟别人不同，我说不出，你不要笑我……我那两天想到过。要是我像前一个十一床那样死在医院里，你会为我流眼泪……"我激动地声音战抖地说。

"你不要讲这些废话，"她挥着手阻止我说。"你不要把我也引哭了。不管怎样，你还是我的病人，你还得听我的话。好好地保养身体，不要去想那些无益的事。其实你的病不见得会再发，胆囊不拿掉也好。"

"是，我听你的话，"我感动地说。

她满意地笑了。"这样就好。你休息一会儿罢。等一阵密

斯脱周要来给你灌肠，"她说。

第三床昨天并没有出院，为这件事他几乎跟廖大夫吵了架，廖大夫已经用了英国的粗话骂他了。他也赌气地明白说他就要赖在医院里面。后来还是杨大夫和张大夫两个人来把廖大夫劝开，第三床才安静地躺下去蒙着被单睡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睡，可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一直沉默着，就是他露出头来不睡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寂寞的样子板起脸孔不作声。一直到傍晚，朋友给他送了钱来，他才坐起来有说有笑了。

今天午饭前老许来的时候，第三床刚看见年轻茶房的头(头先伸进病室来)，马上高兴地叫起来："老许！老许！"

老许带笑地走到他的床前。这个年轻人的笑容里似乎藏得有忧愁。

"给我来一份'大红蹄'，一碗猪肝汤，我吃完中饭就要滚蛋罗，"第三床孩子一般快乐地说，一排黄牙露了出来，眼睛接连地闪了两下。

"你今天出院吗？"老许客气地问道。

"不出院就赖在这里吗？人家已经赶过几回啦！"第三床收了笑容板起脸答道。

"你讲笑话罢。你不出院，哪个会赶你？你要走，留都留不住，"老许陪笑道。

"哪个跟你讲笑话！你还不晓得我昨天差点跟廖大夫吵起来！我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不讲理的大夫！昨天上半天钱没有送来我走不了，只好受他的气。现在我不怕他！"第三床冷笑道，说到最后一句，他现出得意的神情，颧骨显得更高，嘴显

得更突出，口沫也溅出来了。"快去！快去！不要耽搁时间。"

老许唯唯应着，却走到我的床前来。他望着我说："你今天好些了？"

"好些了，"我点头答道。"给我煮碗猪肝汤罢。"

"要不要吃面？我给你弄点真正的鸡汤下碗面来，包你吃着会讲好，"他俯下头压低声音说。"对面十六床今天炖得有一个鸡，匀点汤，不要紧。"

"好罢，"我起初想说不要，后来又想答应他，最后便说了这两个字。"这两天消息怎样？"我忽然想起湘北的战事，顺便又问了一句。在这个病室里难得有人讲起战事的消息，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连我也不怎么关心外面世界的事情。

老许摇摇头说："不大好，听说长沙已经丢了。"

"不会罢，长沙会战三次都没有丢过。报上怎么说？"我不相信他的话。

"报上没有提，说是离长沙还远嘞，"老许低声说。

"那么你不用害怕。不要乱相信马路消息，自寻烦恼，"我哂笑地说。

"老许，快去呀！"第三床不耐烦地催他。

"老许！老许！过来！"第九床大声叫着。

"还早嘞，现在离开饭还有一点多钟，"老许咕噜着走到第九床那里去了。

"快去，先给我煮碗大卤面来再说，"第九床昂着头得意地说。

“我来盘白菜炒肉丝，”第八床正站在他那个朋友的床前，身子一蹦一跳的。脸上老是带着故意做出来似的滑稽的笑容。这是一个原籍湖南的人，可是他同别的病人（我也应该算在里面）一样，对湖北的战事一点也不关心。别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次的战事，在病室里，人无法看到当地报纸。

“老沈，过来坐坐罢，”第三床拍拍床沿对第八床说。

“老苏，你今天真的要走吗？”第八床转过脸去，笑问道。

“不走我在这里养老？”第三床在高兴中带了一点愤慨的调子说。

“你走了，第四病室也就清静多罗！”第八床笑道。

“我看你也该走了。赖在这里有什么好处？”第三床说。

“你不要说，这里住一天究竟比在外面花钱少得多！横顺我那位郭大夫脾气好，容易讲话，多住两天也不要紧，还可以多点几天眼药，”第八床满意地笑着，走了过去。

“奇怪，廖大夫跟郭大夫相貌身材都很像，脾气却差了那么多，”第三床说。

“郭大夫是塌鼻子，所以脾气好。廖大夫鼻子高，你如果对准鼻子打他一拳，他脾气一定会变好的，”第八床开玩笑地答道。

“我们这些人当中，我看还是老广最舒服，他一天只晓得笑，只晓得吃，”第三床两眼望着第十床说。那个广东青年穿了一身拷绸短衫裤，盘着腿坐在床上，正把一块大面包塞进咖啡罐里，面包比罐子大，塞进去也困难，面包屑不住地往下落，他一一地拾起来放进口里去了。“他没有痛苦，随时可以往外面

跑，又不吃药，每天就敷点'热敷'①。自己又有钱花。"

"现在自然舒服。如果真要开起刀来，也够他受的，"第八床冷笑说，他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气。"这个老人家怎样？这两天哼都不大哼了，恐怕又要回老家罢，"他指着第二床说。

"恐怕靠不住，说是害梅毒，想不到这样年纪还生那种病，"第三床说。

"梅毒？那真怪。他不是吃长素吗？"第八床惊讶地说。

"越是吃长素的人越靠不住，——"第三床刚说到这里，看见老人的儿子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匆匆奔进病室来，便住了嘴。

儿子走到条桌前，汪小姐正坐在那里，他喘吁吁地说："汪小姐，杨大夫叫买的针药买回来啦！"就把纸包放在条桌上。

汪小姐转过头，对那个站在药橱前弄什么东西的李小姐说："密斯李，你去请杨大夫来，说第二床的针药买来了。"

瓜子脸的李小姐答应着，离开药橱走出去了。

儿子还呆呆地立在条桌前。

"陈先生！陈先生！"第三床大声唤道。

儿子惊醒般地抬头朝四周看了看，过后就向着第三床走来。

"陈先生，你父亲的病怎样？"第三床问道。

儿子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两边颊上的肉失去了一些。他没有戴口罩，嘴唇四周盖着黑黑的一

---

① 我想起来了：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的中间，男看护周先生要给某几个病人送来三次"热敷"，那是像荷叶蒸肉样的东西，外面是漆布，里面装一叠纱布，蒸得极烫，用来敷在病人的发炎发肿处。冷了再换烫的，每次换四五回。

圈须根，眼角上还留着一点眼屎。他声音破哑地说："恐怕难得好罗。"

"疮口不是好些了吗？"第三床故意惊讶地问。

"他还有别的病。现在连嘴，连身上都烂了，"儿子叹息地说，他的眼圈也红了。从他整个态度上可以看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神气。

"大夫怎么说？"

"大夫也说没有把握。昨天打过一针。今天又叫买针药，好贵啊！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不过不给他医病也不行，心里也过不去——"

杨大夫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了。儿子马上走过去迎接她。

"药买回来了？"杨大夫问道；不等回答，她又说："马上就打。"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杨大夫拿着针走到第二床床前，李小姐跟在她后面。老人接连发出几声含糊的呻吟，过后又寂然了。杨大夫同李小姐一路向着条桌走去。我听见杨大夫吩咐李小姐，要她给第二床洗洗身体。我暗想，这应该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工作。

果然在十多分钟以后，李小姐换上一件背后开襟的工作长袍，戴上一双透明的皮手套，并且挂上口罩，端着一盆水，走到第二床床前去。

"李小姐，好差使啊！"第八床开玩笑地说。

李小姐回头看了他一眼，她和顺地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脸去开始工作。

这个瘦小而容貌端正的女孩忍耐地、毫无怨言地用毛巾在病人的肢体上慢慢地揩着，又用棉花蘸药水给病人洗牙齿和口腔．儿子不敢挨近，却只站在床脚过道中旁观着。眼泪一滴一滴地挂在他那苍白的脸颊上。他不等李小姐做完工作，便猝然转过身逃走了。

"这就是他亲生儿子吗？"第十二床忽然坐起来向第三床问道。

"是的，"第三床答道。

"父亲病这样重，就说在办公罢，也该请几天假来陪陪他。人家看护小姐都肯做这种事情，做儿子的倒转身跑开了，真是岂有此理！"第十二床得意地发议论道。他走到第三床跟前，就在靠床脚的小小空地位上坐下来。

"这也难怪他。一家人靠他吃饭啊，"第三床解释地说。

"老苏，你今天出院，你太太来接吗？"第十二床换了一个话题说。

"他是个光棍，哪里来的太太？"第八床扑嗤笑道。"你给他介绍一个罢？"

"好的，"第十二床笑答道："老苏，你要哪一种人？"

第三床露出一嘴黄牙吃吃地笑着。"只要是年轻漂亮的，随便什么人都好。"

"年轻漂亮的摩登，你吃得住吗？我劝你不要妄想。还是讨个乡下老婆好，任凭你打你骂，都乖乖地一声不响，"第八床眉飞色舞地笑道。

"乡下老婆太呆，不好。要讨老婆，我觉得还是看护小姐

好，又体贴，又周到，——”第十二床一面说，一面望着那个给病人洗好了身体正在铺床单的李小姐。李小姐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连头也不转过来。

“小声点！”第三床打岔地说，他一面指着李小姐。过后他又蒙住嘴暗笑着，第八床也快乐地偷偷笑着。对他们，这种低声暗笑似乎比大声欢笑更有趣味。

第十二床毫不觉得惭愧地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看护小姐脾气又好，又会伺候你……”

但是这次眼科主任郭大夫来打岔了：“你现在就跟我到门诊部再去检查一下。”

笑容立时消失了，第十二床垂着头蒙住左眼跟着瘦小的郭大夫走了出去。

我觉得高兴，我想我的耳朵该可以清静片刻罢。但是男看护周先生来给我灌肠了。

正在开午饭的时候，第十二床蒙住左眼回来了。

“怎么样，老冯？”愉快地吃着“大红蹄”下饭的第三床抬起头问道。我才知道第十二床姓冯。

第十二床摇摇头，也不拿下手来，声音带哭地答了一句：“还是要挖，”就崩溃似地倒在他的床上。

“哪天挖？”第八床放下饭碗，带着幸灾乐祸的样子问道。

“明天，”第十二床哑声回答。

“挖眼睛不晓得是怎样的味道，”第八床把眼睛闪了两下，自语道。

没有人理他。第三床同情地问第十二床："你不吃饭？"

"我不饿，"第十二床哑声答道。我不敢想像他这时同明天的痛苦。

"老冯，吃点饭罢。用不着难过。一只眼睛还不是一样看东西，"第八床似乎是在安慰那个病人，其实他是在说风凉话，我看得出来。

第十二床没有回答。第八床觉得没趣便不作声了。第九床却接嘴说："老沈，你觉得不觉得，我们这班人都是前世欠了债，或者赌错了咒，现在打在地狱里受活罪，有的挖眼睛，有的剖肚皮，有的锯手、锯腿……这叫做命该如此。"他眯着两眼摇头摆脑地笑起来。我气得脸发烧了。

"不错，不错，"第八床带笑附和道。"我跟老苏两个都是债还清了，所以他今天出院，我过两天也要出院罗。"

"其实你今天也该出院的。郭大夫人好，容易讲话。要是遇到廖大夫，早就把你赶出去了，"第三床笑道，他始终没有忘记对廖大夫的那点仇恨。

"那只怪你没有势力。你看头等病房那位太太，病早好了，整天梳头搽粉，廖大夫也没有赶过她走，"第八床接嘴说。

"头等病房，那是有势力、有人情的人住的。你有办法，住个一年半载都没有问题，"第九床冷笑道。

"人家受苦，你们高兴，真是天晓得！你们笑，你们笑，我要亲眼看到你们哭！"第六床这一早晨没有讲过一整句话，忽然咕噜起来。我同情地移过眼光去看他。他的脸色黄中带红，眉毛、眼睛仍旧朝上竖，两眼通红，并且射出憎恨的眼光，嘴唇

不住地动着。

“你多喝水啊，”我看见他的脸，忍不住说出这句话来。

“水吃多了，小便多，你喊老郑倒小便壶，他又要骂人。这些人真是天晓得！”他愤恨地说。我还没有听见他叫过老郑倒便壶，我想这又是他那种爱抱怨的怪脾气发作了，跟他多讲话也没有用。我便不去理他。但是我仍然暗暗地观察他。他伸手在方木柜上面摸索，抓到了茶壶，拿起来放到嘴唇边，大口地喝着。我只听见骨嘟骨嘟的声音。从他的嘴角流出小股的水，他也不管它，只顾把壶柄举高，只顾吞下水。最后他拿开了壶，放回到方木柜上去。“吃完罗，”他静静地说。

“好的，你多喝水，会慢慢退烧的，”我说，我忽然高兴起来。

第三床出院了。“再见啊，我过两天来看你们，”他带了点留恋对他认识的人说。

下午，胡小姐来试表的时候，我听见她惊讶地问第六床：“怎样啦？你刚才喝过开水吗？”

“没有，”第六床瞪着眼回答。这天他没有吃过一碗饭。开饭的时候，人端了饭碗到他的床前，他皱起眉毛摇了摇头，神情相当苦恼。

“你一百零五度啦！要当心啊，要多喝水啊，你懂吗？”

“我懂。”他伸手去摸茶壶，诉苦地说：“没有水罗。”

“你喊老郑给你冲罢，”胡小姐说。

“老郑，我不敢喊他。他理都不会理你，”他抱怨地答道。

"我给你拿去冲，"她拿了茶壶出去了。

"这位小姐姓什么？"他忽然问我。

"姓胡，"我大声说，我心想难道你还不知道，倒故意来问我。

"我要谢谢她，"他自言自语。

胡小姐拿着茶壶走回来，把壶递到他的嘴边，温和地说："不烫，你现在就喝点罢。"

他没有说什么，就捧着茶壶疯狂地喝起来。

"慢点，慢点，"胡小姐觉得好笑地说。她笑起来多像一个小孩子！她仍旧拿着壶柄，站在床前。过了一会儿她说："够罗，够罗！等一阵再喝。"她慢慢地把壶从病人的嘴边拿开，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只管多喝水。喝完了，你喊我，我给你拿出去冲，"胡小姐给他拉好被单，临走时又这样嘱咐他。

"我还要吃。"他伸手去拿壶。

"我拿给你，"胡小姐说着把壶递给他就走开了。

他的喉咙响得厉害。他喝得太急，水进了气管，使他呛咳起来。他连忙放下壶，被单已经湿了一团。他蒙住嘴，但是咳嗽并没有停止，他的一张脸挣得通红。

我想笑他，但是我笑不出声来。他这副滑稽的苦相使我感动。我不禁想：生命的引诱力多么大，生活的欲望多么强！每个人到这里来都只是为了想活下去。谁又不怕死，不愿意避免死呢？

第六床停止了咳嗽，他闭上眼睡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

不是睡熟了，不过他没有出声，他没有转动。这其间有一个司机装束的朋友来看他，那个人静静地在床前站了几分钟，也没有惊动他，就放下一个纸包在床沿上悄悄地走了。

客人走了不多久，第六床便醒了。他望着纸包现出惊奇的神情。他伸手拿起它来，放在胸前慢慢地解开麻绳。

“你一个朋友送来的。他没有说话，就走了，”我告诉了他。

“他以前来过没有？年纪大不大？”他瞪我一眼，问道。

“我没有见过他，年纪跟你差不多罢，”我顺口答道。

“多半是×××，是，一定是他，”他自语道，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听不清楚。脸上的肌肉动着，嘴角的弧线慢慢地松弛，他带点愉快地微笑了。他打开了纸包，那是一包饼干。他又把纸包阖拢，提着它向我伸过来，着急地说：

“你吃，你吃！”

“谢谢你，我现在不要吃，”我摇摇手道谢说。

“你拿住，你拿住！”他显得更着急了。“都是出门人，何必分彼此！不要客气！”

我勉强接过纸包，从里面取了两块饼干，然后把纸包递还给他。

“你等一阵再吃啊，”他恳切地说。他细心地把饼干包好，放到方木柜上去。过后他又伸手到床下去拿便壶。他在凳子上摸到了它，提起来拿进被窝里去。过了一会儿，他把便壶放回到凳子上，凳子震动了一下，从起锈的洋铁便壶口溢出一点小便来。小便带白色，并且有一股浓浓的大蒜臭。

“小便壶又满了，他们也不来倒，”他抱怨着。我知道今天下午老郑上班的时候，已经倒过便壶了。下一次倒便壶的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钟以后。

老郑意外地走进来了，他来跟汪小姐讲什么话。

“老郑！老郑！”第六床大声叫道。

老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连他的耳朵也不动一下。事实上他不会不听见这个叫声。

“老郑！”第六床又叫了一声，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老郑却掉转身子要朝外面走了。

“老郑，第六床叫你去！”第九床坐起来特别用劲地唤道。

老郑板起面孔，大步向第六床走来，但是走近第八床床脚便站住了，不客气地问道：“你喊什么？”

“我的小便壶满啦，”第六床答道。

“我没得空！”老郑冷冷地说，他似乎连看那个病人一眼也不愿意，就把身子掉开了。

“老郑，你就给他倒一下罢，”第九床带点不以为然的神气插嘴说。

老郑的死脸（其实我应该称它做死人脸）上现出一丝活气，眼睛也动了。他对第九床说：“洪先生，你不晓得，我们一天要做多少事情。简直没得一点空。第四病室二十几个病人，偏偏他一个人花样多！我们不能将就偏。”他说得好像他有理似的。

“他生了病，也是没法的事。未必哪个故意解那么多小便！你给他倒一回罢。真是满罗，臭得不得了，”我也插进

来说。

"好罢，我就给他倒这回，"老郑放软口气说。但是他并不过来拿便壶，却扬长地往外面走了。

"他走罗，真是天晓得！"第六床又怨愤又着急地自语道。

"他会来的，他说过就要来的，"我安慰他说，我相信老郑马上就会来。

第六床静下来了，他忍耐地等候着。

但是老郑到一个钟头以后才回来。在他来之前杨大夫来了，还是那件有两团黄色印迹的白色工作衣，两只手插在袋子里。她和张大夫同时进来，他们来看他们的病人。杨大夫先看新十一床。那个少年的伤口快好了。她对他说："你明天可以出院罗。你再到门诊部换一两次药就行了。"她走到我的床前来。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更好些了，是吗？"她带笑问道。

"是的，"我答道。

"不要动啊，还得好好地睡几天，"她吩咐说。

"我知道。"

"这就好，"她满意地说。过后她略略偏起头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笑起来，"你好些地方都像我一个弟弟，你说话的神气，你的笑像得很。"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道。

"他本来在桂林读书，这学期身体不好，住在乡下养病，没有出来，他年纪比你小一点，今年才二十，刚在大学读过半

年书。"

"杨大夫，你跟他分别多久了？"我又问。

"快一年了，我去年回到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她答道；我在她的眉宇间看出一点忧虑的阴影，但是她马上又用微笑掩盖了。她换过话题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吗？盟军在法国登陆了。"

"今天吗，昨天？"我兴奋地问道。

"前天。登陆已经成功，看情形战事一定可以在明年里面结束，"她也显得兴奋了。"病室里没有报看，所以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我忽然想起老许告诉我的关于湘北战事的话，便问道："杨大夫，听说这次湘北打得不大好，是真的？"

她的笑容一下子就消散了，那个阴影又回到她的眉宇间来。她低声说："真的，我的家就在衡阳乡下，所以我有点放不下心。"

"衡阳当然不会有问题，"我说。

她摇了摇头，沉吟地说："这一次跟前三次不同。现在人心惶惶，听说连桂林也骚动起来了。我们中国人爱听谣言这个习惯不好。不过报纸消息太慢，又不一定可靠，更使人容易听信谣言。"

"不会的，战事绝不会坏到那样，杨大夫，你放心罢，"我诚恳地安慰她道。

她用感谢的眼光看我一眼，接着她忽然把头向上一扬，大股的浓发本来拂到她的脸颊了，现在又一齐飘回到脑后去。她

的脸上又露出笑容。她说："真滑稽，现在倒是病人来安慰大夫。你好好休息罢。冯大夫常常笑我爱跟病人讲话，我这个毛病总是改不掉。"她那亲切、和善的笑容，仍旧留在她的脸上，我望着她的脸，我不相信刚才在她的脸上见过了忧虑的阴影。

她去了。她站在第二床旁边，她俯下头似乎在说话。我真替她耽心。"不要靠得那么近啊！你不怕会传染吗？"我真想大声叫起来。

第二床在讲话，声音低，一个字也听不出来。过后又寂然了。杨大夫抬起了头，我的心上的石块去掉了。

老郑提了空便壶回来，摆出不高兴的脸孔，砰的一声把便壶掷(可以说是掷)到凳子上去。"来罗！你屙，你多屙，屙满又好给你倒。"

第六床两眼直瞪着老郑，好像没有听懂那些话似的，右手伸出来，不住地战抖着，但是它终于抓到便壶了，它立刻拿起便壶，匆忙地塞到铺盖下面去。他吐了一口气，他那红黄的脸膛上露出一丝笑意。然后他又把便壶放回到凳子上。

一个扁脸的大夫走到床前来了。这个大夫不算矮，年纪不过二十六七罢。他看了看第六床床头墙上挂的牌子，然后又看一眼那只吊起来的左膀，他问道："你可以翻身吗？"

第六床茫然望着，不知道怎样回答。

"你这只膀子可以取下来吗？"大夫再问一句。

第六床还是瞠目不作声。我忍不住替他答道："不好取

开。他就只能仰起睡。恐怕不能翻身。”

大夫点点头，又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嘴巴淡，头昏，”他答道。

大夫走到他右边来，揭开被单，开始了检查的工作，这也无非在他身上敲敲听听，大夫检查完了，转过身子问我：“他是不是脑子不大清楚？”

“恐怕多少有一点罢，”我答道。

大夫刚走开，第六床忽然唤我：“陆先生。”我把眼光射到他的脸上去。他也在看我。他那两只眼睛的注视叫受到的人觉得不舒服。

“医官说我怎么样？”他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他刚在检查。”

“他有没有说过我要死？”他又问。

“没有！没有！你不过发点热，不要紧！”我起劲地分辩道。

扁脸大夫捧着木匣子过来了。他把木匣子放在方木柜上，顺便将茶壶推进去一点。他的眼光停在茶壶上面。他拿起茶壶摇一摇，问第六床：“这是你的壶吗？你今天喝了多少？”

“两壶。”

“不够，不够！你一天应该喝八壶！”大夫说，一面伸起八根指头给病人看。

“八壶，他们每天只来冲三壶，”第六床皱起眉头说。

“不够。”大夫摇摇头。“你可以用两把壶。我跟小姐说一声，给你多拿一把壶来。”

大夫扎过耳朵以后，果然去跟汪小姐说了。不到一会儿汪小姐便又送了一壶水来。汪小姐的脚应该是个"改组派"，走起路来一歪一拐，她身子的摇晃法和杨大夫的不同。杨大夫走路有点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男子；汪小姐袅娜有致，像一个旧式的女人。她不喜欢多讲话，讲起话来声音又小，所以她虽然是第四病室的护士长，整个病室都在她的管理下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她好像不存在一样。每个病人都认识她，可是她跟谁似乎都不熟，虽然她对待病人也相当和善。

"你现在就吃一点好吗？"她说着，便把壶嘴送到第六床的嘴边。第六床也不出声，只是把嘴张开，让水慢慢地滴下去。

"你自己好好吃罢。吃完了，你喊我一声，我给你冲，"汪小姐柔声地说，她松开手，一扭一扭地走了。一个胖胖的女大夫迎着她走来。她招呼一声："周大夫。"

"就是这个病人发高热吗？"女大夫问道。

"是啊。刚才王大夫来看过，"汪小姐答了一声。

这位周大夫来到第六床床前，检查的工作又做了一次，同先前那一次完全一样。略有一点不同的是周大夫问话较多，第六床答话也较多。从这次对话中我才知道在那所只有一个勤务兵照料的陆军医院里面，他被抬进去的那个晚上，半夜下着大雨，屋子漏得厉害，没有人来管他，让他淋雨到天亮。我猜想，那次淋雨一定是他现在发烧的主要原因罢，可是周大夫并不给我一个解答。

周大夫走后，过两个多钟点，又来了一个瘦大夫。他的相貌和扁脸的王大夫相差很远，可是，奇怪！我刚看见他，竟然

以为他就是王大夫，心想：你已经检查过了，怎么又跑来原样地再做一次！我这个错误，到他走后才被我自己发觉了。

“奇怪，他们一个一个来做什么？”第六床问我道。

“来给你看病，”我答道。

“光是看病，又不给我药吃，真是天晓得，”第六床说。

“查出病来会给你药吃的，你不要着急，”我安慰他说。

“我不着急！我怕我等不得啦！”他又说。我受不住他那火似的眼光，他好像在要求我给他生命似的。

老郑来冲水的时候看见我们这边有三把壶，正要将一把壶拿开，第六床着急地叫起来：“我的！我的！”

“你的？你一个人有两张嘴？”老郑挖苦地说。

我看见第六床口吃着讲不出话的可怜样子，便替他回答道：“汪小姐给他的，大夫喊他每天喝八壶开水。”老郑不再作声，冲了三壶水，便走了。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晚上又来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夫，是王大夫陪着他来的，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个庄严的面孔，我想他也许就是内科主任罢。他简单地把第六床检查了一下，低声和王大夫问答了几句，听筒还挂在颈项上，他慢慢地走了。

“这个医官一定会查出我的病来，”第六床忽然兴奋地说。

“不错，他当然会查出来，”我顺着他的意思说。

可是这一夜并没有谁给第六床带来一点消息。

查病房的时候，大夫到了好几位，黄大夫、廖大夫、杨大夫、张大夫都在。他们走过第六床的时候，那个发烧的病人忽然大声问道：

“医官，我的手会不会好？”

“会好的，哪里有接不好的道理？”黄大夫哂笑地说，他轻轻挨了一下那只吊着的膀子，又翻看一下病历表。“他的热没有退，内科来看了没有？”

“明天就转过去，”张大夫答道。

“好的，”黄大夫点一下头。

“你怎么样？”杨大夫转过身含笑问我道。

“很好，”我答道。

黄大夫听见我的话，连病历表也不看，就走过去了。

“今天，我不给你开睡药了。睡药吃多了不大好，”杨大夫温和地对我说。

“谢谢你。我想我今天会睡得着，”我含笑地回答。

我刚闭上眼睛，就听见第十二床在讲话，他的朋友来了。

我记起来，今天上午，吃晚饭以前郭大夫跟他谈了几句话：

“……不过按照手续，你应该请一个人在证明书上签个字，最好是亲戚，朋友也行；不然我们不好开刀。危险我担保不会有。不过这不是小手术啊……”

“我想……”第十二床说了两个字，就不响了。人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不愿意开刀也可以。不过我怕连你这只眼睛将来也保不住，你好好地想想看。这也得你自己愿意。没有人签字，明天就不能开刀。……”

郭大夫立在床前等候第十二床的决定。

过了一会儿，第十二床声音发颤地说："我想还是开刀罢。我就去请小姐给我打电话找个朋友来签字……"

现在他的朋友果然来了。他在对朋友讲他的事情。我看不清楚那个朋友的面貌，但是装束却是跟第十二床一样，这个人大概是他的同事罢。

"我觉得挖眼睛也不妥，"朋友沉吟地说。

"不过医官说要救住另外一只眼睛，只有快点把病眼挖掉。你不晓得我脑子痛起来，痛得多厉害。其实我也不想挖，光是想起来就怕人。不过不挖掉，我又怕连性命都保不住，"第十二床绝望地解释说。

朋友沉默了片刻，最后说："那么我就给你盖个章。明天上半天吗下半天开刀？"

"医官说上半天八九点钟。"

"我明天请假来陪你，"朋友说。

他们的谈话仍然在进行。可是我非常疲倦，我打起呵欠来。我要睡了。

第 七 章

六月九日(星期五)

今天我觉得精神更好了。一觉醒来，我就觉得肚饿。我吃了一碗稀饭，是用白糖拌的。

"吃饼干啊，" 第六床递过一个纸包来说。他的脸色今天显得更黄，嘴唇干得结壳了。

"谢谢你，我吃饱罗，"我笑答道。

"你拿去，你拿去，我不吃，"他固执地说。我接了过来，放在枕边，但是我并不想吃。

"你今天怎么样？好点吗？"我问道。

他摇摇头："我头有点痛，还是发热。"

看护小姐来铺床了，病房里充满了她们的清脆的笑声。她们经过第六床床前，连床单也不拉一下，就让它乱着。我看见张小姐指着第六床跟那位举动呆板的方小姐低声讲了两句话，她们也走过去了。我们这一排的病床除了第六床外，全铺好了。

"今天怎么啦？"第六床瞪着两眼说。我才注意到他整个眼白都带着杏黄色，眼光显得狂乱。两颊的肉不自然地微微搐动。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似乎想笑，但是他笑

得多痛苦。

我看他一眼，不敢去理他。心里想：他会发狂吗？

"就不管我吗！"他自语道。

但是张小姐捧着一盆水，方小姐抱着干净的床单一路来了。

她们给第六床揩洗了身子，又换了床单和被单。他默默地让她们摆布着。他似乎感到了一点舒适。

"怎么今天又这样客气？"他低声自语道。小姐们不曾听懂，也不曾注意他的话。

汪小姐走过来，也不说什么，就把一小方纸片贴在第六床的号牌上，并且在那上面添了一块红纸的小圆牌。她又默默地走开了。

他忽然觉得不安了。我看见他几次偏起头去看红纸牌，他似乎想看清楚那上面的字迹，可是没有用，他不能够坐起来。

"不要动啊！"方小姐干涉道。

"唉，"他叹了一口气，不再看红纸牌了。可是他的脸上突然笼罩了一层死灰色，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我觉得他似乎要哭起来了。"小姐！小姐！"他忽然望着方小姐大声说。

"哪样？"方小姐问道。

"请你给我带个信到××坡××器材库，找李××库员来一趟，说我的病不得好罗，"他痛苦地着急说。

"不要紧，你会好的。你不要乱想，"方小姐说道。

"我晓得，我要死罗，你们给我在洗身子，"他固执地说。

"今天你转到内科去了，所以给你洗洗身子，你懂不懂？"张小姐大声开导说。

"我没有内病，转什么内科？"他反问道。

"你晓不晓得，你现在害斑疹伤寒，等你转到内科去医好了再来医手，"张小姐接嘴说。

"什么斑疹伤寒，我不懂！我一定要死罗！"他说。

"不要跟他讲，他脑子不清楚，"方小姐对张小姐说。

张小姐点点头，他们铺好床走了。

"我还没有死啦，你们怕什么！"第六床自语道。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朋友来了。一个是那天给他送饼干来过的，还是那一身司机的打扮；另一个穿一件长袍，年纪更轻，似乎还不到二十。

"今天好一点吗？"司机含笑问道。

"你们来得正好，"第六床着急地说，好像肚里有许多话，马上要全吐出来似的："我的病不得好啦！"

"不会的，你好好养一下，"年轻的朋友含笑说。

"我晓得，我一定要死，"第六床固执地说。

"医官怎么说？"司机朋友问。"是不是他说你的病危险？"

"医官不会讲真话，"第六床答道；他又伸手指了指头上的那块红牌子："你看那个红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字？"

年轻的朋友真的去看了，他说："没有关系。是'隔离病人'四个字。并没有说危险。"

"不危险？他们怎么也不来看我？一个医官也没有来过，

也不给我打针。我一定要死的，我晓得我要死，我并不害怕！”第六床瞪着眼说。

“那么我们去问问医官看，”两个朋友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司机朋友提高声音对第六床说。

他们先到条桌前去找汪小姐。我看见汪小姐跟他们讲话，但是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他们又离开条桌了。两个人商量着似乎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走到门口，忽然注意到第十二床旁边立着一个大夫，便掉转身子走到第十二床床前。这是郭大夫，他在开刀之前还来对第十二床解释开刀的必要，并且劝他不要有害怕的心思。他声音温和，略带口吃，但是话很清楚而且有条理。

“医官，朱云标的病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要给他打针？”司机朋友忽然插进来说，把郭大夫的话打断了。

“哪一位？”郭大夫带着微笑客气地问道。

“第六床，”司机朋友指着那个病人回答。

“他不是我的病人，你去问护士长罢，”郭大夫摇摇头抱歉地说。

“不是他的病人，就可以不管。那么该哪一个医官来管？”年轻朋友不高兴地抱怨道。

“我们去问问那个女医官，”司机朋友看见杨大夫跨着大步进来了，便提议道。两个人走去把杨大夫迎了来。

杨大夫看了一眼病人的牌子，温和地说：“他害斑疹伤寒，就要转到内科去了。内科的大夫会来看的。不要紧。”

“医官，医官，”第六床声音打颤地叫道。“我是不是今天就

要死？"

"你要死？笑话。你这个病算什么？现在害斑疹伤寒的人很多，"她带笑说，她把眼光向四处看了一下。"你看第三床那个新来的病人，不也是害斑疹伤寒吗？你不要着急，不会死的。"

杨大夫提到的第三床的新病人是昨天傍晚来的，那个时候我在睡，醒来以后我也没有留心。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内科的病人。从昨晚到现在他似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先前汪小姐来挂红牌子，也曾到他的床前走过。他的床前也有一个"隔离病人"的红牌子。

"你住院好多天了？你还记得吗？"杨大夫问道。

"两个礼拜，"第六床答道。

"那么你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你在什么地方给虱子咬了来？"杨大夫惊讶地问道。

我记起了我住院前听见人说过关于斑疹伤寒的话：这是由虱子传染的一种病，最近由过境的新兵带到这个城里来的。难道医院里也有了虱子？

"不晓得是不是那天晚上在陆军医院得来的，"第六床说。

"不要紧，你不要怕。内科的大夫来给你吃了药就会好的，"杨大夫安慰他说。过后她转过身朝着我问道，

"你今天怎样？更好一点罢？"

"好。"我点点头。

"我等一阵再来看你，"她笑笑便走了。

第二床还静静地睡在那里。他的儿子又拿着漱口盅来了。

"爹，你要不要吃点猪肝汤？"他放下漱口盅，问道。

"我不吃，"老人说。他脸朝着方木柜，侧起身子睡着，讲话时身子也不动一下。

"你今天好一点罢，"儿子稍稍俯下头，关心地问道。

"儿子，我好不了啊……你快去找李三爷，请他把那块地让给我……"老人激动地、用了大的力气说，声音抖得厉害，但是相当清楚。

"李三爷那天说他还有朋友要那块地，他不会让给我们，我又拿不出钱，"儿子着起急来，打岔地说。

"你跟李三爷说，请他看在亲戚分上委屈一点罢。我们如果不是遇到战争，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他可怜我，少要一点钱，我来生愿意变牛变马来报答他。"

"爹，你也不至于有什么……。我连一个钱也拿不出，李三爷怎么肯答应……"儿子带哭声说。

"我不会好啦。我白活了一辈子。家也回不去了。想不到要在异乡埋骨。我只想有一块干净的地。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罢。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一回了，"老人喘吁吁地说，身子不停地颤动。我只能记下他的意思，却无法忠实地写出他的口气和那几个语助词。

他的儿子仍旧立在床前，没有回答他。

"你快点去啊！你早点把地给我弄好，我就放心了，"老人催他道。

"我就去，我就去！"儿子迸出带哭的声音说，忽然伸起两只手抓自己的头发，疯狂似地跑出去了。

这一上午我没有看见老人的儿子回来。老人好像很不安地等待着。我颇同情这个儿子。老人的精神今天显然好起来了，他也许不会有危险。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儿子去做那件为难的事呢？

午饭后不久，老人忽然大声叫起“小姐”来。汪小姐正站在第十二床旁边照料那个挖眼睛的病人，便走过去问他：“哪样？”

“请你打个电话给我儿子，要他马上来一趟，”老人焦躁地说，中间停顿两次才把话说完。

“电话打到哪里？多少号码？”汪小姐问道。

“××局第二科，就在××街，”老人说，声音不十分清楚了。

“要不要说什么事情？”汪小姐再问一句。

“要他快，快来！”老人叫吼似地说，显然他是用了最大的力气说出来的，以后便不响了。但是过了半点钟他忽然大声叫起来。“儿子！儿子！”他只叫了两声。没有人理他。他似乎要翻身，然而他也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过后又寂然了。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再没有发过声音，也没有转动身子。他好像在睡，而且睡得很好。

他的儿子并没有来，我不知道汪小姐电话打通没有。下午快到两点钟的时候，老郑提了铅桶进来倒便壶，他走到第二床床前，拿起床底下的便壶，平日不讲话的第一床忽然说：“老郑，你摸摸看，第二床怕不对罗？”

“这样臭，哪个要摸他！”老郑不高兴地答道。

“怕什么，我不是闻够了吗？”第一床温和地说，但是老郑仍然拿起便壶走了。不过他倒好便壶送回来的时候，忽然伸出手在第二床的额上、手上挨了一下。“他真的走路罗，”他自己说了一句，过后便提高声音唤道：“汪小姐，汪小姐，第二床回老家了。”

“好的，你去喊人来抬罢，”汪小姐就在条桌前这样吩咐道。等老郑提着铅桶走了，她才慢慢地走过来，看了看第二床，又在他的额上摸了一下，才慢慢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老郑便带着两个工人抬了一副担架进来。他们很快地就把老人的尸首包好，放在担架上抬出去了。老郑走在后面，抱着用脏了的棉絮、被单、草垫等等东西。

病室里剩下一张空的床板。汪小姐点了两根香拿过来，插在木壁的缝隙中间。

“又是一个。偏偏我们这一边不吉利，这个月已经死掉三个了。对面一个也没有，”第九床说。

“三个？哪三个？”第八床问道。

“前头十一床，第二床，还有前头第五床，就是一号大清早死的，”第九床说。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内科病人，头天晚上进来，一句话也没有讲过，第二天早晨就翘辫子了，”第八床接嘴说。他的眼睛朝着我的床，似乎在回想那一天的情景。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没有想到，就在我入院的那一天，这个床上还躺着一个死人。内科的病人！他害的什么病？是传染病吗？可是我在这张床上已经睡到第九天了。

一个灰色的影子在我的眼前一晃，老人的儿子匆匆地赶来了。他满头冒着汗，一直向第二床奔去。他大概是办好了坟地的交涉回来向父亲报告的罢。可是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白白的一张空床板。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站在床前忘记了自己地伸起两只手抓头发。

汪小姐慢慢地走了过来，带着同情的眼光看他。她正要开口，儿子先说话了："汪小姐，是什么时候？"他放下手来。

"一点五十八分，"汪小姐低声答道。"抬到太平房去了。天气热，你早点安排后事罢。"其实那个老人死在一点五十八分以前，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他断气的时刻。

"是，"儿子答了一个字，他的眼圈红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睛也失了神，牙齿不住地咬着下嘴唇。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觉察出他再没有理由在空床前面站下去，便猛然扭转身子，急急地走出去了。我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还不到一个钟头，这张空出来的床铺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这也是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不过身材高大，病势不严重，疮口在背上。

"一个去，一个来，床铺永远空不了，倒是开医院生意好，"第八床躺在床上安闲地小声唱道。

没有人为死去的父亲或者活着的儿子叹一口气，流一滴泪。病室里再看不到任何表示那个老人存在过的痕迹了。在这里死显得这样平常，这样不可怕，而且这样容易。

这天八点多钟第十二床被带到手术室去。他是自己走去

的。他去之前李小姐先给他剪去了左眼的睫毛，又给他打了一针，方小姐拿着牌子送他到那里去。十点钟光景，他被工人抬了回来。他昏昏沉沉地仰卧在担架上，好像还没有清醒。头上束着绷带，左眼完全绑住了，但是血还不时地透过纱布浸出来。

小姐们忙着整理床铺。郭大夫跟着来了，他在床前守了一会儿，又走了。他刚走出病室，第十二床便发出第一声呻吟。这痛苦的叫声好像是从梦中来的，多么空虚，它的余音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应该明白它的意义，它对我是多么熟悉。

"放警报啦！"第八床说，他吐出舌头做出可笑的滑稽样子。他永远保持着安闲的态度，对什么事都觉得有趣，但是对痛苦却漠不关心。医院生活似乎使他感到舒适。他好像只是为了好玩，才故意在头上竖起一只蝴蝶，而且一直把它保留到现在。他几次提过出院的话，却始终不见有出院的准备。郭大夫也从没有催过他出去。昨天我听见他同第九床讲笑话，他说："我们两个倒是把医院当成旅馆在住罗！"第九床笑着回答他："你比我更舒服，你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

是的，他是自由自在的。他对别人的痛苦不知道表示同情。那天我开刀回来下午打盐水针的时候，我仿佛也听见他的笑声和他的风凉话。那个时候我真想咒骂他！今天他那个滑稽的样子又引起了我的反感。

第十二床的呻吟开始了。以后一声一声接连着。是那么痛苦的声音，仿佛是被宰割的牛羊的哀号。整个病室被这种

声音充满了。连我的整个脑子也被这种声音充满了。我不能睡，不能用思想。我只有睁大一对眼睛朝四处看，想找什么事情来分我的心。

"小姐！小——姐！"第十二床忽然叫道。汪小姐走了过来。她怜悯地望着他，柔声问道："哪样？你痛吗？我给你打一针好不好？"

"枕头！枕头！太高！"第十二床痛苦地叫着。

"好，我给你取掉一个罢，"她小心地从病人的头底下抽出了一个枕头。过后她再问一句："现在好啦罢？"

第十二床不作声了。他静了几分钟，才又呻吟起来。声音仍然是那么凄惨，仿佛谁在抓他的心似的。汪小姐刚要走开，又被叫声止住了。她站在床前，带了一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她似乎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她却默默地用右手的两根小指头挑她右边的发鬓。

但是郭大夫又来了。郭大夫客气地招呼她的时候，她脸上紧张的肌肉松弛了，她仿佛得到了救星似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意。她听见第二床在喊"小姐"，便趁这个机会离开了第十二床。

"冯永康，你痛吗？"郭大夫把头俯下去，温和地问道，他叫出了病人的名字。

"我痛得要死！"第十二床答道。

"你忍一下罢，过些时候就会好的，"郭大夫安慰他说。

"忍不住啊！"第十二床绝望地叫道。"郭大夫，你给我想个办法啊！"

"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会给你想办法。你不要着急啊。开刀后总不免有痛苦的，"郭大夫温和地说，不过我觉得他的声音并不是平静的，里面似乎含了一点焦虑。我猜想：难道病人的情形很严重吗？

眼科的女大夫来了。她站在病床的右面，郭大夫吩咐她守着病人，他去拿了验血压器来给病人验血压，结果似乎增加了他的焦虑。我看见他伸起右手轻轻地搔着前额，现出思索的样子。然而这只是两三分钟的事。过后他俯下头去解病人头上的绷带，一面对女大夫说了两句话，女大夫到药橱那边去了。绷带解开后，他又揭起纱布（女大夫拿了他需要的东西回来了），把这一叠血淋淋的纱布丢到吐痰杯里去，再换上新的纱布，他用手指轻轻地按住它。病人仍然在呻吟，痛苦似乎并没有减轻，忽然叫着要喝水了。"快，快给他吃，"郭大夫抬起头朝站在对面的女大夫说。

"是，"女大夫低声应着，就顺手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嘴边去。病人吞了两口水，便动一下头，说："不吃罗。"

"不要动！"郭大夫阻止道，这是在病人摇动头时候说的（其实病人也只能微微地动一下头，或许只能够做一点动头的姿势）。过后他关心地问道："你现在好过一点罢？"他另外换了一张湿脸帕，放在病人的额上。

"难过啊！"第十二床痛苦地回答。

"不要紧，过一阵就会好的，你多忍一下罢，"郭大夫柔声安慰说。他用英语跟女大夫交谈了几句话。女大夫走了。

“今天把郭大夫吓坏了，”第八床伸着颈项向第十二床这面张望，他吐了吐舌头，仿佛觉得有趣地说。

“郭大夫总是这样小心。那次给我打了针，反应很大，一下就烧到一百零四度，把他吓得不得了。他也是亲自守在我旁边，给我敷‘冷敷’，给我喝水。等到后来我热度降低了，他才放心走开，”第九床接着解释道。

“怎么，你打‘九一四’反应那样大？”第八床笑着问道。

“那次是第三针，浓度不同罗。一针比一针厉害。譬如上次打零点一五，下次便打零点三，这样加起来的，”第九床一翻身坐起来，双手抱着膝盖，不住地霎眼睛说。

“你当初害眼睛的时候，你也想不到是这种病罢，”第八床说。

“我怎么会想得到！我连玩都没有玩过，说句良心话，我还没有挨过女人。不过郭大夫一检查就知道是那种病。起初我还不承认。后来郭大夫问起我父亲，我就没有话说了。我父亲在时倒是爱逛窑子。他得了病传给我了，说不定要害我一辈子，”第九床带了点苦恼地说。

“怎么说一辈子？你这次不是就可以医好吗？”第八床说，他的声音始终是轻快的声音，他邻人的苦恼并不会引起他的同情。在这个充满痛苦的角落里，他的愉快的心境似乎从没有被扰乱过。现在他的嘴角又挂上得意的微笑了。

“他妈的，我受不了啊！”第十二床忽然痛苦地叫起来，声音特别高，有点像哀号了。

“冯永康，你再忍一下，过一阵就会好的，”郭大夫温和地

说，他又换过一叠纱布了。他皱起眉头，脸上罩着一股阴郁气。他也够辛苦了。

"我痛啊！我忍不住！郭大夫，你救救我！"第十二床哀求地说，多么空虚、多么痛苦的声音！

"这是要痛的，你只有忍一阵。我在给你敷'冷敷'。你不要怕痛。现在给你打一针好不好？"郭大夫俯下头小声说。

"你给我止住痛罢，我实在忍不了啊！"

"密斯李，请你去——"郭大夫下面的话被我的耳朵滑过去了，我不知道他吩咐李小姐做什么事（李小姐是在女大夫走后过来的），我只看见李小姐走到药橱那边去。过了一些时候她拿着药针来了。她在第十二床的膀子上打了一针。

"打过针，你会觉得好一点，慢慢地就会觉得不痛的，"郭大夫说。他的话刚说完，昨晚来过的第十二床的朋友来了，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女人跟在他后面。

这个朋友带着兴奋的脸色急匆匆地走进来。可是他一看见病人的面孔，大夫的脸色和周围的情形，不觉吃了一惊，站在床脚边，半晌才问出一句话："医官，他不要紧吗？"

"不要紧，过了今天就会好的，"郭大夫说道。

"冯永康，冯永康，"那个女人挤上来，大声叫道，她把李小姐的身子稍稍碰了一下。

"不要大声喊，让他安静一下，"郭大夫抬起头，略带警告地说。

"这是他屋里人，才赶到的，"朋友在旁边解释道。

"冯永康，冯永康，我来啦！"女人压低声音，又唤了一遍。

“啊，我看不见。我跟××说叫你不要来，我有朋友照料……啊，他妈的，我痛得要死！”第十二床断断续续地呻吟道，他伸起右手在空中摸索了一下，好像要抓到他妻子的手一样，但是马上又力竭似地垂下去了。

“我原先也说不来，后来碰到有便车，就赶来啦！你不要紧罢？”女人说，她的声音又提高了些，眼里已经包了一眶泪水。这是一个相貌极普通的女人：长长脸，微黑的面庞，嘴唇包不住上牙，靠近门牙的右边两颗牙齿是假的，发着灿烂的金光。

“我不晓得，……哎哟！”病人痛苦地叫一声，他的胸膛稍稍往上挺一下，过后又睡平了，他那声惨痛的叫喊有着很长、很长的余音，整个病室的空气都被它搅得变成悲哀的了。

“不要再跟他讲话，”郭大夫责备那个女人说。

“他眼睛还在流血，不要紧罢，”女人稍停一下，又压低语声问道。

“要他安静睡着，不要说话，不要动，血才可以止住。你们再讲话，我就没有办法了，”郭大夫焦急地说，他似乎要动气，但是又勉强忍住了。

“冯嫂嫂，你不要再说了，让他多休息一阵罢，”朋友在旁边劝道。

“我不说啦。不过我听不得他叫喊，我心里过不得……”女人回答说，她一面埋着头揩眼泪，过后又抬起脸来向郭大夫问道：“医官，他眼睛会不会瞎？他以后还能不能开车子？”

“不会瞎，右眼保得住；不过开车子会不大方便罢，”郭大

夫皱着眉头回答了她的问话。

"我接到他的信，只说他左眼有点毛病，怎么晓得他会病到这样，眼睛挖得血淋淋……多可怕，亏他受得住……医官，你救救他啊！"女人仍然不闭口，不管郭大夫怎样表示不要她多讲话，她还是哭哭啼啼地信口讲下去。

郭大夫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搐动着，他短短地回答了一句："不要紧的。"他的忍耐的限度到了。他并不看她，却向着那个朋友说："请你把这位太太带出去，找个地方给她休息一下。我怕她受不了。并且对病人也不好。"他说完，就把头俯下去，拿起贴在病人额上的湿脸帕来。

那个朋友果然把病人的妻子带出去了。李小姐转过头，目送着他们的背影，郭大夫抬起头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我也跟着他吐一口气，好像我自己在长途旅行以后，得到片刻的休息似的。

病人的呻吟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他的声音渐渐地小下去了。我注意到郭大夫的皱拢的眉尖也慢慢地舒展了。到了刘小姐来代替李小姐的时候，我听见李小姐对郭大夫说："郭大夫，你也该休息了，你还没有吃午饭啊。"

"我不饿，"郭大夫笑答道，他那个塌鼻头显得非常可爱了。

"郭大夫，我们会好好看护他的，你放心罢，"刘小姐笑着说。这个难得笑的女孩居然和善地笑了。

郭大夫迟疑了一会儿，过后说："好的，我等一等再来。"他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了。

第二床新病人来的时候，杨大夫也来了。这又是她的病人。我看见她忍耐地给他上完了药。她洗过手到新十一床床前讲了几句话以后，便走到我这里来。

“杨大夫，你忙啊！”我说。

“还好，”她笑答道。“你今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她现出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不舒服，不过看见那些病人的事情，我心里烦，”我诉苦般地说。

“是不是你看见那个老先生死了，心里难过？”她微微蹙着额低声问道。

“我觉得我好像在地狱里面，我尽看见挖目拔舌的事情，”我烦恼地说，我已经养成了对她信口说话的习惯。

我看见她的眼睛忽然亮一下，马上又黯淡了。她略略埋下头说：“其实我应该比你更难过。你是没有责任的。我倒有责任。”

“这不怪你啊，我觉得你是尽了力量的，”我说。

“尽了力量？你不晓得我什么力量也没有！我有时候真想改行做别的事，我真后悔学了医，”她声音低，但是里面充满了苦恼，苦恼似乎并不深，可是它使我打了一个冷噤。怎么，像杨大夫这样的人也会有苦恼吗？

“为什么？做大夫不是很好吗？这是救人救世的事情啊！”我惊讶地说。

“你这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她带着苦笑摇摇头说。“我

就是学医学到了天大的本领，也不见得便能够救人。我敌不过钱。没有钱的人得不到我的好处。就譬如第二床，要是他的儿子有钱，他也许不会死。要用药没有钱买药，连营养的东西也吃不起，这样敷衍地对付过去，我等于在杀人……"

"其实医院里应该供给药品，"我插嘴说。

"医院里只有普通的几样药。你不晓得医院多穷，多节省，不然也不会一个病房住二十四个人，而且连内科传染病人也可以挤进外科病房来。"说到这里，她忽然改变语调，低声说："你要当心啊，你隔壁就是个传染病人。还有第三床也是的。这个办法真不好。我要催内科早点把他们搬过去。这个人也很可怜，膀子还没有接好，又染到了斑疹伤寒……"

我感激她的关心。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接触到了她的广大的心。我以前多么不了解她，我还以为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

"杨大夫，今天前线的消息怎样？"我停了半晌，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道。

她呆了一下，以后又微笑了。她说："你不要管什么前线消息，你好好养病罢。大后天就要给你抽线了。"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听到抽线的话，心里高兴起来。

"这个月月半就可以。你要多住两天也行，"她答道。

"医官！医官！"第六床用沙哑的声音叫道。他把杨大夫的话打断了。

杨大夫惊讶地转过头去问什么事。

"他们怎么不给我吃药啦！医官，是不是我今天要死啦？"第六床粗声问道，他的眼光停在杨大夫的脸上，那对眼睛好像不能够灵活地转动了。

"他们就会给你药吃的，你不要着急嘛，"杨大夫答道。她又问我："今天内科大夫来看过他没有？"

"来看过两次，"我答道。

"那么，怎么还不给他吃药？"杨大夫纳闷地自语道。

好像回答她的话似的，胡小姐跑过来了，这个胖脸的女孩气咻咻地说："第六床，拿钱来！给你买药。没有钱吗？"

"有钱，"第六床爽快地答道。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了半晌，拿出用手帕包着的一叠钞票来，递给胡小姐。

"你还有没有？就只有这一点吗？"胡小姐数了钞票以后着急地问。

"没有罗，"第六床瞪着眼回答。

"不行。买药要一千多块钱。你才只四百七十块钱，不够，"胡小姐失望地说。

"你通知他的保人，叫他们送点钱来罢，他总有朋友啊，"杨大夫插嘴说。

"我们查过了，他的保人住在××坡，有三四十里路。刚才寄了信去。不过今天来不及了。现在有人进城，本来可以顺便买回来的。这样至少又要耽搁一天，"胡小姐说。

"这没有办法。做大夫没有药，比什么都苦，"杨大夫摇摇头叹息地说。

"那么，只好明天再说了，"胡小姐说，就把钞票交还给病

人。"好，钱在这里，你收起来罢。"她走了。

"你看，又是这样的事情，"杨大夫转过身来，望着我诉苦般地说。她的眼里射出来忧郁的眼光，那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它现在烧着我的心。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她的苦恼传染给我了。我怎么能够安慰她呢？但是我看见她默默地含愁望着窗外树梢的情景，我的心逼着我说出话来：

"杨大夫，你也不应该灰心啊。至少我得过你的好处，你使我的心得到了温暖。我怕我说不好，医病也不单靠用药，你还医治我的心……"我自己很感动，我说得很吃力，我觉得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我不敢看她。

"可是你的胆囊并没有拿掉啊。你不抱怨我们吗？"杨大夫故意带笑地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抱怨了……"我声音颤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挖苦我们吗？"杨大夫打岔说。

"不是，我也许没有能力把意思说得很明白。我进医院以前，除掉自己外，什么也不相信，我总以为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生活的。现在我才知道，人的心并不全是这样窄小。在这个充满痛苦的地方，也有人在努力帮忙别人减轻痛苦。至少，你杨大夫就是一个。不管我的胆囊有没有拿掉，至少我得到了启发。对你说来，我是一个陌生的人，我走出医院也许再见不到你，可是你对我的关心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不是用钱换得来的……"我觉得很窘，我相信自己没有说得明白，我的脸发烧了。"我怕我说得不清楚，我不会讲话。我的意思是，在这里

你不把我看成一架有毛病的机器，你把我看作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样的人，我这个病人的心得到多大的安慰！……”

“不许说了！我要以大夫的资格禁止你再说下去！”她以长姊的态度阻止我说话。她把头朝后一仰，一缕浓发掠过耳畔搭到脑后去；她感动地微笑了，却又勉强止住笑。“在医院里别人都笑我，称我做哲学家，就因为我爱跟病人讲话。你现在倒真是哲学家了。话讲多了，对你身体很不相宜。……啊，我问你，十一床上那个病人马上就要出院了，你要不要搬到那边去？我等一会儿叫人连你床板一齐搬，不会震动你的伤口。我有点耽心你会传染到那个病。”

我为这个感激她。但是我不愿意再麻烦她，我说：“不要紧，不搬也可以。我当心点就是罗。”

她想了想，说：“也好。”她走了。

我的枕头边还放着那一包饼干，我马上把它塞到方木柜下面去。

老郑倒过便壶以后不久，第六床又在叫着“老郑”，说小便壶满了。

“这是紧急警报了！”第八床笑嘻嘻地自语道。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理第六床。看护小姐们正忙着。第十二床半昏迷地在呻吟。对面一个角里那个锯了两只脚的小孩得了内病，今天没有放警报了。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孩每天上午换药的时候总要“妈呀妈呀”地哭叫一阵，第八床称这个为“昆明警报”，说

是他从前在昆明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每天一到那个时间就要放警报，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错过一回。然而这也是他信口讲出来的话，我无法知道它是真是假。不过今天下午那个可怜的孩子似乎病得厉害，胖胖的林大夫到那边去过三次（他同第六床一样，也是林大夫的病人），内科的大夫也去过好几个，看护小姐们也慌慌张张地朝那边跑。

老郑的影子始终看不见。第六床脸都挣红了，他停了一下又叫，叫了两声又停，后来他的叫声变成呻唤了。他掉过眼光来看我，好像在说："救救我罢！"可是我连动都不能动，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我看见刘小姐还站在第十二床床前，便大声喊道："刘小姐！"

"哪样？"刘小姐转过头来问道。

"第六床要老郑来倒小便壶，"我大声说。

"老郑岂有此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又走不开，你们哪位帮他喊一声罢，"刘小姐皱着双眉说，她的眼光朝四处看了看，到了第八床的脸上便停住了。她的意思不说出来，别人也知道。

"要我去罢，我晓得！"第八床轻轻一跳，下了床，望着刘小姐滑稽地笑了笑。他扎了扎裤带，然后笑嘻嘻地对第六床说："不要喊啦！我去给你找老郑来。看你忍着小便也可怜得很，不晓得是哪辈子作的孽！"他低声哼着小调，跳跳蹦蹦地走出去了。

过了片刻第八床笑着走了回来。他走到第六床床前，大声说："老郑不在，找不到。"

"哎哟!"第六床忽然痛苦地叫了一声,泪水迸出他的眼眶来了。他脸上的肌肉厉害地搐动着。

"不要哭啦,我给你拿去倒就是罗,"第八床带着嘲笑的样子说,他真的拿起那只满满的便壶来,故意用左手捏住鼻子,做出小心翼翼的滑稽脸相走出去了。不到一会儿他便拿了空便壶回来,递到第六床的手里,还说一句:"你要罢?"他把脸皱缩在一起地笑了。

"谢谢你啊,"第六床抓住便壶柄,同时哭笑地说。他马上把便壶放进被里去了。等一下他拿出它来放到凳子上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咕噜:"又满了半壶啊!"

不久老郑提着铜壶来冲水了。第八床看见他便叫起来:"老郑,你到哪里去了?刚才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找我做什么啊?"老郑冷冷地问道。

"找你给第六床倒小便壶。还是我替你拿去倒的,"第八床得意地笑道。

"管它的!哪个喊他要两壶两壶地吃水!我没有空。一个月那点点工钱买不了我的命!"他又发起牢骚来了,他的脸板得很难看,眼白上仍旧有几根红丝,两只眼睛带了点痛苦的样子不停地霎着。

傍晚的时候第六床又在叫"老郑"来倒便壶了。他的沙哑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看护小姐站在条桌前,听不见他的叫喊。第八床躺在床上笑着自语道:"恐怕又要我去倒小便壶了。"

"那么我的也请你顺便倒一下,"第九床开玩笑地说。

“只要医院里给我发工钱，我一定去倒，”第八床扑嗤笑起来。

第六床仍旧含糊地叫着，他急得额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他那一脸的苦相使我心里难过，我看见胡小姐站在条桌前，便大声叫着：“胡小姐。”我只叫了两声，她就过来了。我对她说：“第六床请你去喊老郑来倒便壶。”

她出去好一阵才回来。“老郑找不到，你等一下罢，”她对第六床这样说。

“哎呀！”第六床痛苦地把脸向左右两边摆了两摆，低声吐出了两个字。

胡小姐马上忘记了这个人的痛苦。她到第十二床那里去了。那个病人从四点钟开晚饭的时候起就没有呻唤过，他好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刚才郭大夫还来看过一次。郭大夫穿一身蓝布中山服，拿着一把油纸伞，好像要进城去似的，看见病人睡得很熟，他吩咐胡小姐几句话，就放心地走了。病人的妻子和朋友是在吃晚饭以前来的，他们就一直留在床前。胡小姐给那个女人搬来一个凳子，让她安静地坐着守护她的丈夫。现在胡小姐又去跟她讲话。这个女孩像大人似地在安慰病人的妻子。

第六床忽然又叫起来，“老郑！老郑！快！”他的声音与其说是叫给别人听，倒不如说是给他自己听的。他叫了四五声，都没有用。我只得又把胡小姐请了过来。

“老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真急死人！”胡小姐抱怨说。她带着焦急的神情又往外面走了。

“其实小姐也可以倒小便壶，何必拿架子啊！”第八床在一边嘲讽道。

胡小姐去了好一阵都没有消息，第六床断续地发出唱歌似的低声呻吟。我心里很烦躁。他的痛苦似乎传染给我了。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老郑进来……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黑影从外面闪进来。“老郑来了！”我仿佛听见一个快乐的声音这样说。我定睛一看，却是老许端面进来了。他把面碗递给第九床，便在第十一床空床板上坐下，同第九床、第八床两个病人谈着闲话。

“老许，老许！”我忽然灵机一动（我用了这句成语），朝着那个方向叫起来。老许果然走过来了。

“你要叫面吗？大卤面没有罗，吃碗炸酱面罢，”老许笑着说。

“不是，我就要睡了。我请你做一件事：你把第六床的小便壶拿去倒一下好不好？看他胀得可怜，喊也喊不出声音来，”我恳切地要求他。

“老郑哪？”他问道，我想他大概要推脱罢。

“喊了大半天都喊不到，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扫兴地答道。

“那么我就去一趟。”他弯下身子拿了便壶在手里。“好臭啊，”他厌恶地说，但是他终于拿到厕所里去倒了。

胡小姐一个人回来，一句话也不讲，她气冲冲地坐在条桌前写字。老许笑嘻嘻地提了便壶进来。

“老许，你什么时候给老郑当替工的？”第八床笑问道。

“第五床陆先生喊我帮忙倒的，”老许笑答道；“这个差使我干不好。”他把小便壶放回到原处。

“老许，谢谢你啊，”第六床感激万分地说，他马上伸手去抓便壶，用力猛，手碰着凳子，把便壶撞到地下去了。

“啊呀！”他绝望地叫了一声。第八床和胡小姐都跑过来了。老许默默地弯下腰去拾起便壶，放在床上病人的右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老许，你救了我啊！”第六床接连地说。老许默默地把两只手在围腰上两用力地擦。

“第六床的药买来没有？”扁脸的王大夫进来问胡小姐道。他已经来过两次了。

“没有。奇怪，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一个也不来！”胡小姐正坐着，便站起来答道。

“药买不来怎么办？信发出去了吗？”王大夫皱着眉说。

“发出去了，明天总会有人来的，”胡小姐说。

“那么现在先给他打六瓶盐水针再说。请你准备一下，”王大夫想了片刻，然后用决断的声音说。

“好的，”胡小姐应道。她同王大夫一路走了出去。

天已经黑尽，条桌前电灯光非常亮。刘小姐似乎在对面一个角里照料那个断脚的孩子。病室忽然显得空阔起来。没有大的声音。平日不讲话的第四床放下帐子睡了。我为了避免蚊子的骚扰，点起两支蚊香（这是我昨天叫老郑在合作社买来的，点燃后平放在左右两边两个方木柜上，让半截香贴着柜

面，用茶壶压住香棍，然后慢慢地向前推移。一晚上点过这两支便够了。即使不够，我睡着了，也不觉得什么了）。蚊香的气味使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觉得不舒服。我不能安静地闭上眼睛。而且第六床的受苦而固执的脸老是摆在我的眼前，对这个人的命运我不能漠不关心。

王大夫来打盐水针的时候，他揭开第六床的铺盖，一股尿臭直扑进我的鼻孔来，这个气味比蚊香的气味更强烈，更刺鼻！

"怎么你连小便也不晓得！弄得这样脏！"王大夫责备地说。

第六床瞪着眼答不出话。我忍不住，代他说了："他小便壶满了，没有人给他倒，他胀得很苦。喊工友，总喊不来。"

"喊不来工友，你找看护小姐呀，总不该在床上小便啊！"王大夫仍旧不肯原谅他。

"看护小姐，哼！说得好，未必小姐还肯给你倒夜壶！"第八床在旁边冷笑道。

王大夫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正埋着头把长长的针插到第六床的大腿上去。

"等着罢，马上就要放警报了，"第八床幸灾乐祸似地说。

"你真是——人家吃苦，你倒快活。我希望你哪天也打打盐水针，"第九床带笑地骂道。

第八床拱一拱手，笑答道："对不起，我过两天就要出院罗，恕不奉陪了。"

王大夫和胡小姐把第六床腿上的插针处贴好胶布，又盖

好铺盖和被单，便走开了，让第六床慢慢地享受六瓶盐水的滋味。

第六床静静地躺在床上，身子没有动过一下，也不曾发出一点声音，要不是他睁着眼睛，我倒以为他睡着了。水走得相当慢，过了好一阵，林小姐上班了，瓶里的水少去还不过三分之一。可是第六床忽然像从长梦中惊醒过来似地大声说："我到了哪里啦？"

我吃了一惊，掉过脸去看他。他好像看不见我似的，两眼直望着前面，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怎么没有看见桥啦？"他严肃地说。"这不是五里桥那座塔吗？还有乌桕树？船还不靠岸？到啦，到啦！上岸啦！……怎么不看见我老母亲啦？我回来啦！朱云标回来啦！……喂，你拉着我干什么？走开，走开！"他把脸掉向左边，用力去拉左膀上的绷带，他一边骂，一边疯狂地抓着，扯着，绷带被他拉开了一段，手上流着血，好像是他自己抓烂的。

"不要抓呀！不要抓呀！"我吃惊地叫起来。

他掉过头来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一张脸古怪地红着，眼里射出茫然的、近乎疯狂的眼光。"不要抓？他拉住我，不让我回家！"他又把脸掉向左面去："滚开！不要拉我！让我上岸！到啦，到啦！"

"你不要抓！抓破就不得了啊！"我着急地干涉道。

"不要抓？"他又转过脸来冷冷地问道。

"你把绷带抓掉，手就不得好罗！"我瞪着眼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好，不管它，”他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说；“那么我拿掉这个，”他说着就伸手去揭被单。

“喂，动不得！”我惊叫道；“林小姐，快来，快来！”

上班不久的林小姐马上走过来了。

“林小姐，他要把针拔起来，绷带也给他拉开了！”我着了急大声地说。

“它挡住我的路，我要拿开它，”他望着林小姐解释说。

“你不要动手，你把针弄断了，开起刀来够麻烦的，”林小姐正色地说。“你看你把膀子弄得血淋淋的，这怎么啦？”连温和的林小姐也蹙起前额来了。

“只有找人来把他右手绑起才行，”第八床提议道。

“好的。我去找老李来，那么请你照料一下，不要他真的把针弄断啊，”林小姐回头对第八床说。

“我会照料的，”第八床笑着答应了。他走到第六床床前来。“喂，你到哪里去呀？”他故意问道。

第六床果然把手缩回来，他看了看第八床头上的白蝴蝶，正经地答道：“我回家。你怎么啦？你带了伤吗？”

“是啊，头都快打破罗。你回家做什么？”第八床忍住笑说。

“老沈，你倒装得像啊，”第九床开玩笑地插嘴说。第八床没有理他。

“看我老母亲啊。我这趟回去，要跟着我姐夫做生意，不出来了，”第六床正经地回答。

“你母亲多大年纪？身体好吗？”第八床又问。

第六床做了一个手势，答道："五十八啊，她精神好得很。走几十百里路，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有我一个独子。她不放我出来，是我定规要走的……"

林小姐带着老郑来了。老郑拿着一幅旧床单，卷成了一根粗带子，走到第六床跟我的床的中间，不由分说就拿起第六床的右手，用带子套住手腕，套得紧紧的，他边套边说："朱先生，你右手拴住舒服点。"他把那只手放平，又把带子系到下面板凳脚上去，他把带子扎得很紧。

"你绑紧点啊，"第八床嘱咐道。

"不会脱的。我绑人还绑得少了！力气再大的人我也绑过！"老郑粗声答道。

第六床起初一句话也不讲，就让老郑绑着，等到老郑说出上面的话以后，他忽然摇摇头叹口气说："这又何必！大家都是中国人，客气点啊！"

"客气点，现在还不客气吗？"老郑试了一下知道绑得很牢以后，便站直身子，得意地哂笑道。第八床吃吃地笑起来。

第六床也不叫，也不挣扎，只是板起脸孔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在想什么似的）。我不敢多看他：一方面他的痛苦使我心里很难过，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会发狂。可是他忽然大声叫起来："老陆！……老陆！……老陆！"

他的眼光使我害怕，我不敢正面对着他，却只他偷地看了他一眼。

"陆先生，我晓得喊陆先生你才答应，"他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这面说。"兄弟是个粗人，近来常常承陆先生关照，兄弟也非

常感激。兄弟有得罪陆先生的地方，还请陆先生原谅，原谅。陆先生，你何必不理我啊，兄弟读书少，学问不够，有不对的地方，也请陆先生指教。”

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差一点要笑出声来了。我连忙忍住，板起脸对他说：“你不要吵，你睡觉罢。别人也要睡觉，你有话明天讲。”

他摇一下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何必到明天，今天我有灾难，你陆先生不来救我？我受够他们的欺负啦！我要走啦！”

“你不要吵啦。我要睡觉，有话明天说罢，”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陆先生，兄弟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要请陆先生指教。兄弟并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我的手绑住？我要回家看我老娘，船怎么不靠岸啦？”他一字一字很清楚地说，脸色红中带黑，眼光强烈却又似乎罩着一种网似的东西。虽然他在看我，可是我疑惑他看见的也许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么一想，我更加害怕起来。我便掉过脸去不理他了。

“陆先生，你不要生气啊，我给你赔罪罢，”第六床还在那里说话。“好，大家都不理我啦，我走啦！船开啦！各位，再见啊！”

“再见啊！”第八床接嘴说，我听见他吃吃地在笑，又听见第九床在抱怨他不该老是跟病人开玩笑。

“各位再见！再见！”第六床又说。“真正岂有此理，手也绑住了。”

林小姐走过来，把两瓶盐水一齐倒进架子上挂着的玻璃瓶里去。

“这位漂亮的小姐来做什么啦？她不是我家乡的人啊！她姓啥，你晓得吗？”第六床不停地说。这次我真想笑了。林小姐自然没有理他。

这以后他安静了几分钟，过后又叫起来：“你们拿我关牢监啊！放我走！我要回去！啊哟！……我一定回去，你们留不住！哎呀！……啊哟！娘呀！我受不住了啊！”他拉长声音像唱小调似地唱起来了。“我难过呀，娘呀！……你在哪里啊！……你有儿不能见面呀！……我有娘难相见呀！……‘老母望儿儿不转，妻子望夫夫不还。’……‘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他用同样的调子唱过京调和唐诗以后，居然呜呜地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他又唱起了《孟姜女》的小曲。

病室里的人，谁也无法制止他，就索性让他一个人吵去。他起初还挣扎着，想把被绑住的右手拉出来，后来看见没有用，也就放弃了这个企图，只顾哼着，唱着，哭着，一直到针打完，林小姐把针拔出来，又把绑住他右手的带子放松些，使他除了拉解左手的绷带外，便可以自由地使用右手，他才安静地睡了。其实他是不是睡去，还是疑问，不过我倒睡着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第 八 章

六月十日(星期六)

今天我醒得比较迟，我记得老李喊我三次。等我用手揉了眼睛把睡意赶走以后，天才开始发白。林小姐站在我的床边，背向着我，正在给第六床揩脸。揩过脸，林小姐把脸帕绞干，挂在方木柜旁边钉的木架上，然后弯下身去把便壶拿在手里，朝床底下一个大便盆里倒进去(我后来才知道大便盆是林小姐昨天半夜里拿来的)，倒过后，又把便壶放回原处。她端起脸盆正要走开，第六床红着脸，用力说了一句话。

“哪样?”林小姐不知道他说什么，便问道。

“他说，你是他救命的恩人，”我替他翻译道。今天他似乎神志清醒了。

林小姐微微一笑，露出了害羞的样子，这句话使她相当高兴。

我洗过脸，觉得精神很爽快，伤口完全不痛了。茶壶里昨夜的凉水进到嘴里，非常可口。窗外天大亮了。阳光多么可爱，麻雀吱吱喳喳快活地吵个不停，而且穿梭似地在病室里飞来飞去。不管我的周围有多大的痛苦，今天早晨，我觉得很高兴，在我这个不强健的身体里，我感觉到充沛的精力。

早饭端来的时候，我居然喝了两碗稀饭。第六床什么也没有吃。他板起脸，带着沉思的样子，一直不讲话，只有在老张来扫地、把大便盆给他拿走的时候，他才烦躁地说："又拿走罗！真是天晓得！"这以后他又沉默了。

听说对面那个断脚小孩的病势已经减轻了。第十二床的情形也好了许多。他的妻子昨夜走得迟，今天一早就来了。

看护小姐们有说有笑地从外面进来。今天似乎大家都很高兴。刚铺好床，她们立在条桌四周讲闲话，忽然一个东西从梁上落下来。李小姐立刻像孩子似地扑过去，胡小姐和张小姐也跑到她的身边。

"又是一个！"第八床笑着说。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可是我看见李小姐立起来，摊开右手，手掌心里有一样幼鸟似的东西，她满脸含笑地望着它。小姐们都挤到她的身边来看。"快！快！密斯胡，拿个盒子来！"李小姐说。胡小姐跑到药橱那里去了，但是马上就拿了一个放药的小小方盒子回来。她打开它，急急地说："放进来，快点！"李小姐把幼鸟放到盒子里去了。"这个归我，"李小姐笑道。"那么你给它起个名字，"张小姐说。"它叫，它叫琳黛！"李小姐得意地说。"琳黛，"众人小鸟似地笑起来。

"你们在笑什么？"杨大夫同汪小姐从外面进来，杨大夫温和地问道。小姐们不回答，却笑着散开了。李小姐珍惜地捧着盒子到杨大夫的面前说："杨大夫，你看，我们的小琳黛。"

杨大夫俯着头用右手第二根手指在盒子里拨弄了一下，笑着说："你好好地养着罢，这个黄嘴巴倒逗人爱。"李小姐放

上盒盖兴高采烈地跑出门去了。她跑得急，差一点碰到男看护周先生的身上。“当心啊！”周先生大声警告道。他两只手提着一个类似大茶炊的铜器具（我在厨房里看见过它，全身擦得亮晃晃的），气咻咻地从外面进来，吃力地提到药橱前，在柜面上放下了。

杨大夫给她的病人们上好药以后，便走到我的床前来。她照例先对我亲切地笑笑，接着就问：“今天怎样？好吗？”

“今天更好了，”我愉快地回答。

“不错，我看你脸色好些了，”她满意地说。她把眼光稍稍掉向第六床，压低声音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

“好像好一点，今天不吵了，”我回答。

“你还是不想搬？”她问道，看了一下第十一床的空床板。

我摇摇头，答道：“就在这张床上罢。”

“也好，横竖第六床明天就可以搬开，我刚才还到第二病室去看过。啊，你唐诗念完没有？”

“读完罗，我还给你罢，”我说着就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拿书。这本书我开刀以后就没有挨过，她不提，我差一点忘记它了。

“现在不要还我，等你出院的时候再还给我罢，”她挥着手阻止我拿书。“你留着，闷的时候还可以念一两遍。明后天我再找几本书给你看。”

我不拿书了。我缩回手来，望着她那亲切、和善的面容，我想起了那一个我时常想起又时常忘记的问题，我便问她：“杨大夫，战事究竟怎么样？”

“欧洲打得很好，”她短短地回答。

“湘北哪？”我又问。

“不要管它。消息乱得很。你再过一星期就可以出院罗。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会知道的，”她改变了声调回答，我看见一片灰黑云飞过她的脸。我知道那方面的战事大概打得不大好。我怕触动她的乡愁，不敢问下去。

“不要紧，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你不要耽心。我后天要给你抽线啊！”她把头往后一仰，勉强微笑着安慰我道。过后她迈着大步走向药橱，周先生正在那里把一件一件上药的用具从大铜器中取出来。她笑着同他讲了几句话。

过一会儿大夫们来查病房的时候，杨大夫也在内，他们经过我的病床，冯大夫照例对我点头笑一笑，然后又同杨大夫讲两三句英语，便过去了。他们在第四床旁边停留的时间多一点。我听见那个病人在向廖大夫要求允许他当天出院，廖大夫答应了他。我奇怪，他开刀以后还没有下过床，为什么就忙着出院。所以大夫们一走开，我便问他（虽然在我开刀以后，他难得同我讲话，而且每天午饭前，他的太太要给他送菜来，她在他的床前一直坐到傍晚，两个人不断地喁喁私语，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有那么多的话好讲！）：

“怎么，你今天就要出院？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我住不惯，我又害怕得传染病，还是自己家里舒服些，”他先摇摇头，过后他那张清瘦的脸上浮出一种夸耀、满足的微笑。

我并不羡慕他。可是他的话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怅惘。

其实"莫名的"这个形容词用在这里也不大恰当。我知道我为什么心里不痛快。我不但没有"家"，也没有一个关心我的人。至于我那个音信断绝、远在沦陷区的父亲，他是不是还认我这个儿子？

第四床不会知道我这种心情，而且我想，他这个时候除了等候他的太太来接他以外，什么事都不会注意到了。他的太太自然不会让他久等的，到了她往天来的那个时刻，她果然来了。不过今天她还带了两个工友和一副床板来，后来就用这副床板把她的丈夫抬了出去。于是我的右边又多了一张空床了。

为着第六床的事情，扁脸的王大夫今天来过三次了。每次他都是扫兴地走开。但是下午两点多钟，他第四次来的时候，站在药橱前面的胡小姐不等他开口，便摇着头先说："还是没有人来过。"

"这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看着病人死掉吗？"王大夫脸色发青气恼地说。可是他并不退出病室，却直接到第六床床前去。

"你城里有什么朋友吗？"王大夫怀着希望地问道。

第六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王大夫，动了一下嘴，却不曾说出一句话。他为着小便壶的事刚才吵过将近一点钟的长时间（还是照样的那一幕悲喜剧，不同的是，他实在胀得没有办法，后来空便壶给他拿回来，他把它拿到床上，掀开铺盖，并不把便壶放好就胡乱地小便起来。他的身子底下从昨天起就垫了

一幅油布，尿完全淌在油布上面了。第八床高兴地笑着，并且故意叫了胡小姐来看。胡小姐生气地教训病人几句，把油布抽走了，过了一会儿又给他换了一幅来），现在或许疲倦了不想出声也未可知。

"你懂不懂我的话？"王大夫俯下头大声地再问一句。

病人默默地摇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王大夫失望地转过身子，正看见两个穿蓝布工服的人张惶地朝第六床走来。

"你们来看朱云标吗？"王大夫拦住这两个人问道。

"是的，"两人中有人回答。

"那么你们快去给他把药买来，药方就在护士长那里，"王大夫兴奋地说，他把两个人拉到条桌前面去了。

两个人从汪小姐那里拿到药单以后，又匆匆地走到第六床床前来。他们站在床前，关心地望着第六床。两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话。

"你们来做什么啊？"第六床忽然转过头问他们道。

这一问使得两个人都楞住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你们来搭船吗？不要来啊！装不下啦！你们先回去罢！"第六床正正经经地大声嘱咐道。

两个人含糊答应着，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脸上现出了窘态。

"你们好好回去，不要站在这里啊！"第六床继续大声说。

我忍不住了，便对那两个莫名其妙地站在床前的人解释："他发烧发了几天，脑子糊涂了。你们快点去给他买药罢。"

两个人去了后，一直没有消息。王大夫每隔半点钟就来看一次。而且在三点半钟的光景，他又给第六床打过一次盐水针。病人的忍受力似乎比昨天差多了。盐水刚刚走了一点点，他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了一阵又唱小调，唱够了小调又哭。他不但常常拉解左膀的绷带，他还把铺盖揭起，让光赤的下身露出，有人来给他盖上被单，他立刻又掀开，并且像顽皮的小孩似地捏着生殖器朝各处小便。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同室病人的笑声和看护小姐的责斥。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上次送饼干来的那个人，恰恰在这时候来了，看见这种情形，只站了一下，就逃走了。“这个人来干什么？一句话也不讲，就走了，岂有此理！”他望着我骂那个人道。他的右手仍旧不停地动着。

最后还是老郑来解决了一切，老郑又把那只手牢牢地绑住了，似乎比昨天绑得更牢，绑的时候，他神色自如地（不过带了一点憎恨，我看得出来）说：“要上法场吗？客气一点好不好？我认得你，你是我的仇人，二十年后我会来报仇。”老郑得意地笑答道：“好罢，我等着你！”便又加了一把力。我看第六床被绑得要挣扎也没有办法了。……

打完针以后，胡小姐来撤开了架子，说是害怕第六床再把铺盖揭开或者做出种种可笑的举动，便没有放开他的右手。病人起初不作声，不久却吵着要小便，但是也不见有人来给他松绑。他不停地吵着，终于骂起不堪入耳的话来了。

“我来救救你罢，”第八床笑着说，他摆出滑稽的脸相走过来了，他好像准备来做一件冒险而有趣的事情似的。“我放了

你，你要规矩点啊！"他故意装出教训的调子说，他真的蹲下去解带子。

"我晓得，"第六床认真地答道。

手松开以后，第六床满意地笑了。但是这笑容是相当可怕的，他好像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在笑一样。但是他明明白白地说："好啦，开船啦！"

"你不是说要小便吗？"第八床忍住笑霎着眼问道，他大概盼望第六床再闹点笑话罢。

"我屙过罗，我刚才在岸上屙过罗，"第六床答得很爽快。

"胡小姐，不得了，第六床在床上小便啦！"第八床故意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不要紧，随他去罢，"刘小姐做出厌烦的样子答道。

这以后第六床倒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动，也不吵，只是不时地念着："快到家罢……还不到！……好慢啊！……快到了……"

这种机械的、病态的声音意外地把我感动了。"不管他怎样地受苦，在这些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就只是他一个家和一个老母亲啊！"这样一想，我也不觉想起我那个久别的老父的面容来了。

开晚饭的时候，老许给我端了大卤面来。今天我的胃口很好，吃完满满的一大碗面，还觉得有点饿。

"陆先生，我以后不来罗，"老许来收钱的时候，忽然带着沮丧的神情对我说。

“怎么，你不干啦？”我惊讶地问道。

“老板把馆子顶出去了。他就要到桂林去，叫我跟他一块儿去，”老许答道。

“你老板去干什么？”

“他去帮忙搬工厂，说是很大的机器厂啊，我们老板有股子。”

我停了一下，才吐出一句：“那么你明天不来了？”我忽然起了惜别之感。我照平常加倍地把小费给了他。

“谢谢你。我吃过晚饭就进城去。”老许也露出了留恋的脸色。但是他微微一笑，又说：“将来你陆先生有事情，我来给你帮忙啊。”

“好的，再见，”我对他点点头。心里却耽心着杨大夫的家。“战事大概更紧急了罢，”我不能不这样想。

老许向他的主顾们一一地辞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还没有离开病室，先前买药的两个人回来了。我看见他们立在条桌前跟胡小姐讲话，接着胡小姐就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药买来了，是不是会太迟呢？病应该有转机罢，”我想着，我祈祷似地想着。他的受苦引起了我极深的同情，我早已忘记传染的危险了。

王大夫来看着第六床把那些白色的药片吞了下去。那两个朋友在病床前一直站到天黑，都没有机会跟病人清清楚楚地交谈一句。病人好几次用诧异的眼光看他们，他大概已经忘掉他们的友情了。两个朋友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终于失望地离开了病室。

晚上查病房的时候，常常看见的几位大夫都到了，他们经过第六床床前，我听见黄大夫问林大夫道："明天搬过去，这只手怎么办？"

"我明早晨给他取掉，现在只有牺牲了，"林大夫毫无表情地答道。

"这太可惜了，"黄大夫摇摇头叹口气说。

在我的病床前他们只停留了一分钟，黄大夫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问，就满意地过去了。杨大夫走在最后，她从工作衣的袋子里取出一本相当厚的书丢在我的枕头边，带笑说了句："你明天可以看看，"便追上他们去了。

我拿起书来，读着书名：《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名下面有一个"（一）"字，再下一行印着"罗曼·罗兰著"的字样。四周还有一个红色框子。书相当重，而且在这个病室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印在洋纸上面的小字，我决定听杨大夫的话，把这本书留到明天来翻读。此刻呢，我倒想闭上眼睛睡一觉！

眼睛的确闭上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能够好好地睡一会儿，刚刚打瞌睡，马上就惊醒了。我的脑子里装满了那许多事情，它们不让我休息，它们逼着我思索，逼着我回想。

第六床还不时地咕噜着，因为声音不大，我也不去注意。不过后来我无意间睁开眼睛，我看见两个黑影立在第六床的左面。我吃惊地仔细一看，是两个小孩。

"朱库员，朱库员！"身材较高的一个低声唤着。

"啊，你们来啦，很好，很好！"第六床忽然大声说。

"张股长喊我们来伺候朱库员的，"那个小孩又说。

"很好，很好，你们把行李给我拿下船去，"第六床正经地吩咐道。

两个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

"去啦，去啦！"第六床催他们道。

第八床在旁边插嘴了："他说胡话，你们不要理他。"两个孩子听见这句话，便蒙住嘴笑起来，跑出去了。

等一会儿两个孩子又跑进来了。他们站在病床前，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

"你们喂他吃点水罢，"第八床又提议说。

那个较大的小孩真的就拿起茶壶放到病人的嘴边，一面说："朱库员，吃点水罢。"

第六床顺从地喝了几口，忽然推开壶短短地说："不吃啦，我快到家啦！"

这两个小孩又闲着了。他们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有趣味，又一起跑到外面去了。

我睡到下半夜（其实我已经醒过了好几次，但是这次醒来之前睡得比较久一点），忽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了。"陆先生，陆先生！"第六床轻轻地但是固执地唤着。

我看了他一眼，却故意不出声。接着我把脸掉开不再看他，我怕他拿疯话来跟我纠缠。

"陆先生，陆先生，我求你，听我说两句话，"第六床带着悲声恳求道，声音低，但是很清楚，而且正常。我吃了一惊，便又掉过脸去。

第六床的脸朝着我，脸色青得可怕，两眼含着泪水，口里

不停地叫着："陆先生。"

"什么事？"我问道，我的心软了。整个病室里除了林小姐穿着红绒线衫坐在明亮的电灯下看书外，醒着的恐怕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罢。两个小孩穿着衣服在第十一床的空床板上睡着了。

"我晓得我的病不会好。我不怕死。不过我想起我娘……"他抽泣地说。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乱讲，你不会死的！"

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就说不死，这只手也成残废啦。我哪有脸回去见我娘！我实在对不起她。……如果我死了，请你陆先生给我娘写封信，把我的事情告诉她，说我临死还想她，我后悔没有听她的话，"他愈说下去，眼泪愈流得多，说话愈显得吃力。

"夜深了，睡觉罢，你明天说不是一样吗？"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也想中止谈话，我的心已经被他的话搅乱了。

"请你原谅我。明天我害怕我又糊涂起来。现在我清清楚楚。第一床那个病人今天已经取了石膏，他快要出院罗。我的伤比他轻得多。这两天我烧得真难过！……我不晓得我干了什么事，大家都看不起我，都在笑我……我真恨，恨我生这种病。我不是没有羞耻心的人。……请你一定给我娘写封信，说我对不起她，信封上面就写××，×××、×××，五号门牌，交朱云标母亲收。"

"好，我一定写，你放心罢，"我爽快地答应下来。我不相信他的病一两天便有问题，他会用得着我来写这封信，我只是

用这个允诺安慰他的心，我应该说，安慰他那颗被回忆折磨的心。我希望他能安静下来，不要再拿他的痛苦折磨我。

“××，×××、×××，五号门牌，朱云标母亲收，你记得吗？”他露出感激的样子，接着又叮咛地问了一遍。

“记得，”我顺口答道，其实我听过去就忘了，我并没有想到我应该记住这个地址。

“谢谢你。还有，”他迟疑地说，“我女人，请你添一笔，我不怪她，就说让她改嫁罢。我脾气跟她合不来，她过来一个多月，我跟她相打，就出来了。我朋友都不晓得我结过婚。”这是一个不小的秘密，他居然向我这个陌生人吐露了。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十分踌躇的：他似乎在思索，是不是要说出来，但是终于断念似地说了。

“难道他还是在说胡话吗？不然为什么向我这个陌生人说这种话？”我忽然怀疑起来。我注意地望着他，我从他的脸上得到了一个解答。

他刚刚拿被单揩了脸，擦了眼睛，脸上没有一点泪痕。看他的表情，他好像是看透一切彻悟了似的。还是他那正直、善良的农民脸相，但是比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消瘦多了，眼里射出和善的眼光，再没有丝毫狂乱的痕迹。他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刻他是清醒的，也许比我还清醒呢！

“好，我写，我写，我写，我照你的意思写，”我感动地说。我觉得一阵难过，现在他没有哭，倒是我要哭了。

“谢谢你啊。请问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

"我还比你小，我才二十二岁，"他勉强地笑一笑(他笑得多苦涩)，接着说，过后便向左边掉过脸去，不再理我了。"二十二岁……二十二岁……"他一个人低声念了好几次，以后便寂然了。我只见他的肩头在耸动。

"难道他偷偷地在哭吗？"这个疑问使我苦恼了许久。我许久都不能睡，思想潮似地涌上来。我难过，我痛苦，我烦躁，但是我终于疲倦地落进了昏沉的睡眠。

第 九 章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今天我醒得最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护小姐们正围着条桌在谈笑。奇怪的是，我刚把眼睁开，就觉得眼前较往日明亮，好像左边少去什么障碍似的。我连忙向左边看。第六床空了，只有一副光光的床板。那个耸立着的铁架子也不见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第七床安静地睡在床上。

"他今天真的搬到内科病房去了，他在那边一定可以得到更周到的看护和治疗，"我想着，我感到一阵轻松。刚才我还觉得心上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紧紧的，睡眠不足和做怪梦使我疲倦。

胡小姐来给我铺床的时候，我随口问她一句："第六床搬到内科去啦？"

"搬内科？搬到太平房去罗！"胡小姐噘起嘴说，好像在生气似的。

这对我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过了半晌我才吐出问话来："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没有一个人晓得，天刚发白，林小姐去给他洗脸，才发觉

他已经断气罗。那两个小孩还睡得昏昏沉沉的。他脸色倒并不难看，就像在睡觉一样。不过近看就看得出他眼睛微微睁开，大眼角上嵌得有眼泪。这是林小姐告诉我的。……”

胡小姐的声音有点颤动，可见她对这个陌生人的病死，是感到遗憾的。那么我呢，我想起昨夜我和他中间的一段对话，我感到悔恨了。要是我当时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吐露胸怀的时刻啊！……

现在太迟了。……可是对于实践我诺言的事还不算太迟呢。那应该是他的真挚的要求。我的信是必须写的！……可是地址呢？我寄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昨夜亲口对我讲过两遍，为什么不好好记住呢，既然，我对他说我会记牢的？

“我还可以从他的朋友们、同事们那里打听到他家里的地址，我还可以到库里去找他们，”后来我这样一想，便不像刚才那样地着急了。

今天杨大夫来得比平日早些，刚铺好床她就来了。她先给别的病人换药。我正靠了墙坐着，挥着手回答第八床出院时告别的招呼，今天他脚步比较平稳，而且头上的白蝴蝶也已经飞走了。他走后，第九床应当感到寂寞罢，我想。但是杨大夫走过来了。

“你坐起来啦！很好。他们怎么不给你拿个‘靠背’来？”杨大夫带笑说；“密斯李，请你给第五床拿个‘靠背’来！”（李小姐远远地答应一声，过了一会儿她就把那个竹子做的靠背给我拿来了。）

"杨大夫，你昨天给我的那本书我还没有看过，"我看见她，便记起她昨晚丢给我的那本书，我对她说了实话。

"你慢慢看罢，"她温和地说；然后她望着我，低声添了一句："我现在给你抽线。"

"你不是说明天吗？"我惊喜地问，提早抽线就表示我的伤口长好了，这总算是比较可喜的消息。

"今天就可以罗。你买了胶布吗？……好，拿出来罢。"她迈着大步走了。我的眼光落在第十二床的头上，那个挖了左眼的人正侧着脸倾听妻子的低语。他的头上仍然绑着绷带，但是他现在好得多了！过了片刻杨大夫又拿了换药的东西回来。

"你睡下来罢。……好，这样就好罗。……你把眼睛掉开不要看啊，"她叮嘱道，就侧着身子在我的床沿上坐下来。她解开了我胸口上的大绷带。"不要怕，不会太痛的，"她安慰我说。我的确感到好几下针刺似的痛，我忍耐着。一下……一下……最后我听见她说："好罗，没有罗。再给你绑两天，带子就可以取消罗！你只要好好躺着，不要多动，过三四天就没有事了。你掉过脸来罢。"于是她站起来，包好剩余的纱布，拿着那个换药时候用的缸子走了。

"杨大夫，"我在后面唤道。

"我还要来的，"她头也不回地答道。

过了十多分钟她果然来了。

"杨大夫，谢谢你啊，"我说。

她笑了笑，"你出院以后打算怎样？"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愣了一下，才答道："我打算找个地方养一下。或者先到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去暂住几天。"其实我能不能到那里去住，还没有把握，他那位太太这些天都没有派一个人来看过我，她会把我当子侄辈看待吗？

"也好。你应该好好养两个月。你的病十之八九不会再发的，"她亲切地说。

"是，"我答道。我忽然发觉她的两眉中间现出了"川"字形的皱纹，我立刻明白她为着什么事情发愁，我关心地问她："杨大夫，你是不是在想你的家？"

她吃惊地抬起头，接着又把头向后一仰，一缕黑发马上飞到后面去了。她咬了咬嘴唇，忧郁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最后她终于用平稳的声音报告我一个消息："我明天一早就回湖南去。"

"真的？你骗我罢？"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说。

"我已经向院长请了假，"她还是用平稳的声调说，可是我觉得她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当沉重的，"我回去把家里人接出来，我想一个半月就可以回来。我兄弟身体不好，此外家里就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嫂嫂和一个四岁的侄女。所以我要回去一趟。"

"杨大夫，我把书还给你，"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偏偏找不到，却说出来这样的一句，我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两本书来，预备交给她。

"不要还我，你留着做个纪念罢。我回来，你已经早走了，"她边说边做手势阻止我。但是接着她又伸过手来把书拿了去，

"我给你签个字罢。"她摸出自来水笔，在两本书上都写了字，然后递还给我，用姊姊对待弟弟的口气对我说："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她的脸上现出了笑容，眉字间阴郁的皱纹已经消散了。她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地说："我走罗。"她刚刚走了一步，马上又转回来，诚恳地说："你的病十之八九不会再发的，你可以放心，我不会骗你。从今天起我把你交给张大夫了。你记住你是他的病人啊！"她终于微笑地走了。

"杨大夫！杨大夫！"我连忙喊道。

她微笑着转过身来看我。

"以后我可以写信给你吗？"

"你就寄到医院来罢，"她答道。这次她真的走了。虽然她还站在条桌的右端跟汪小姐讲话，可是，对于我，她是真的走了。

我手里还拿着她送给我的两本书，我想起她刚才说的那段话，我埋下头翻开书的第一页，那是里封面，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两行相当娟秀的字：

怀民弟存念

杨木华 1944年6月11日。

两本书上都有这样的笔迹。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再抬起头去看她。她正走到门口，穿着宽大白色工作衣的摇晃的背影在我的眼前亮一下就消失

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十床的广东青年正坐在床上，一边吃面包，一边望着我傻笑。

第　十　章

六月十八日（星期日）

今天又是星期天，这是我在医院里过的第三个星期天了。可是我今天上午就要出院了。

张大夫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床上。我远远地唤着他：“张大夫，张大夫，我要出院罗！”

“好的，我马上就给你签个出院证。你上半天走吗下半天走？”他含笑说，这么一来他的眼睛小得好像是一笔绘成的了。

“上半天走，”我答道。

张大夫走到我的床前来，一面说：“让我再看看你的伤口。”

我躺下来，自己解开衣服，露出胸脯。我已经不用大绷带了。伤口上只盖着一叠纱布，是用胶布粘牢了的。张大夫把胶布揭起，纱布拿开，伤口上干干净净的结了一条疤疤。

“很好，不用再上药了！”张大夫满意地说；“你等等，我给你洗一下。”他到药橱前去挟了一块酒精棉花来，把我的伤口擦了两下。“你把衣服扣好罢。以后当心点，就没有问题了。”

“张大夫，杨大夫有信来吗？”我迟疑半晌，终于吐出这句问话来。

“没有，不会这样快罢。这两天信啊，电报啊，都挤得不得了，当然慢起来罗，”张大夫回答道，他的笑容看不见了。

“你看战事不要紧罢，”我带着焦虑地问道。

“也难说。不过我有点替杨大夫耽心。刚才听说衡山已经丢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现在外面谣言太多，弄得人真假都难分辨了，”张大夫压低声音说，他伸手在他的稀稀落落的头发上搔了一下。

“恐怕不是真的罢，我希望杨大夫平安无事地早点回来，”我说到这里，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再也吐不出一个字，便埋下头不作声了。

“杨大夫不会有问题，”他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停了片刻他又添上一句：“那么你就准备出院罢。”

我不需要准备。我的东西全收拾好了，衣服也穿好了，就只等着去办出院手续，我也知道出院手续是很简单的。

“啊，还有我上次讲过免费的事，”张大夫走了几步又转回来对我说，“昨天我到入院处看过你的账，你还存五千多块钱，所以我没有去找院长谈免费的事。我想也用不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简单地答道。我应该坦白地说，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的花费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自然我同意他的话，并且我感激他还记得我刚住院时他对我提过的那件事情。

张大夫签过字以后，我便拿着林小姐给我的通知单到“入院处”去算账。星期日上午“入院处”照常办公，我领回了五千四百五十元的余款，就把这个零数四百五十元送给老郑、老

张、老李三个工友作为赏钱。那个永远板着面孔粗声讲话的老郑居然带着微笑向我道谢。看着这张不自然的笑脸我不由得想起第六床朱云标的受苦的面容。他为什么要那样地对待他的同胞？难道就只为了几个钱？

我提着衣包向张大夫、林小姐告别(林小姐从十六日起就换来做早班了，这个时候别的小姐都不在病室里)，我留恋地望着他们的笑容(并且我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了杨大夫的笑容)，挥着手说："谢谢，再见！"我终于跨出了门槛。

外面是一个晴天。昨晚落了一夜大雨，院子里开残的芍药全打落了，泥地上还留着一些花瓣。芭蕉倒给雨洗得碧绿。我沿着石板路走出去。刚跨出第二道门，我遇见了十七天前引我进"第四病室"里来的那个看护小姐。我笑着想：这真是巧遇了。我带笑地向她打一个招呼。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她似乎不认识我。我还想对她讲一两句话，但是她匆匆地转弯走了。"她怎么会记得我呢？"想着，我不禁失笑了。

今天是星期日，门诊部全关着，天井里和两边石阶上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候诊的病人。我抬头望"入院处"的大钟，才九点一刻。

我用不着再在这里逗留了。

我带着胆囊进来，仍然带着胆囊出去。我并不后悔白白割了一次肚皮。我并不是把这十七天的长时间完全睡过去了的。我好像得到了一点东西。然而要是有人问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实在也说不出。倘若被追问，我只好拿那两本书来搪塞，同时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杨大夫的话："变得善良些，纯洁

些，对别人有用些。”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变得善良了，纯洁了，对别人有用了。这只是说我已经知道我应当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以前我连这个还不知道呢！至于能不能变成那样，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现在呢，我必须坐人力车到我那位父执的家里去。

我跨出了医院门，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

后　记

《第四病室》是去年在重庆西郊沙坪坝友人家中蚊子的围攻下写成的，但排印成书时已是胜利后的若干日了。中间因了种种缘故，这本在重庆排成的小书直到今年一月才在上海出版。可是过了两个月，不但这本书没有下落，连出版这书的书店也渺无音信了。我五月中回上海后，即着手交涉收回版权，到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晨光出版公司愿意重印我这本“不走运”的小书，我感激地把纸型送了去。今天看见再版书的样本，我很高兴，我仿佛走完了一段路，回到家，宽慰地叹了一口气。我可以暂时休息了。

又，我并没有染到霍乱死去，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位卫生局长。

巴　金 1946年11月11日。

附　录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后记

这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写的《憩园》和一九四五年写的《第四病室》），我自己觉得都是失败之作（其实我的其它作品又何尝是成功的?）。一位外国朋友读过《憩园》和另一部小说《寒夜》（见《文集》第十四卷）以后，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

我为这两部中篇小说写过“内容说明”。我为《憩园》写了如下的话：

> 这部中篇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写出封建地主家庭的必然的没落。在这书里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爷病死在监牢中，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认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

有勇气冲出来。

为《第四病室》我写的是这样的说明：

> 这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写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可是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作者写出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其实我讲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我当时的确想把它们写成那样。至于做到没有，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且细心的读者单单从这两个"说明"也会看出小说的缺点：我只是简单地写出了我自己看到的一点东西，或者我个人一时的感受。有时候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对应当灭亡的人给了一些同情，例如对《憩园》里的杨老三和姚国栋。

《憩园》的背景在成都。我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回成都的见闻帮助我写成这部小说。杨公馆就是我们老家的房子。我一九二三年离开它以后就不曾再见到它。我是根据我的记忆写成的。杨老三就是我的一个叔父，我一九四一年

一月回到成都，听说他刚刚在监牢里死去，那情形和我在小说中所写的差不多。他花光了家产和妻子的嫁妆，后来被妻儿赶出来，靠偷盗乞讨过日子，这都是真事。他的小老婆离开他另外嫁给军阀，后来送钱给他，也是真事。连老文和李老头都是真人。然而我凭空捏造了一个早熟的、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感情里面的"杨家小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写得更复杂、更曲折了。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并没有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我不应当悲惜那些注定灭亡和没落的人的命运。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凯歌，这才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

至于《第四病室》，它是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小说的背景在贵阳。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们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不用说，姓名都是假的），我只有在杨大夫的身上加了好些东西。第六床那天早晨真的搬到内科病房去了，他究竟是死是活，我并不知道。进院来割胆囊的是睡在我旁边病床上的病人，给我看病的也不是女医生，虽然在这个病房里常常看得见像杨大夫那样的一个年轻女医生（我指的是相貌和动作）。我躺在病床上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

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我联想到当时的旧社会，我有很深的感受。对那个烧伤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极大的愤怒，关于他我写的全是真事。他的烧伤面积比丘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公司不出钱给他治病，公立医院也因为他没有钱不好好给他治疗，让他受尽痛苦而死亡。别的病人也因为没有钱买药耽误了治病。这些都是真的事实。只有那个“善良、热情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是我凭空造出来的。这是病人们的希望。至少我躺在病床上受苦的时候，盼望着有这么一个医生来给我一点点安慰和鼓舞。

《第四病室》跟《憩园》和《寒夜》不同。它没有《憩园》的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没有《寒夜》的那种悲愤的哭诉。然而它的“一线光明”也只是那个同情贫苦病人、想减轻他们痛苦的“善良热情的女医生”，再没有别的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

别的话，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了。

巴　金 1960年2月29日。

寒　夜

《寒夜》，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迄一九五一年九月，共印行六版(次)。

一九五五年五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排新版，迄一九五七年十月，共印行六版(次)。

一九八三年四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一版。

一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像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像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就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

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到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过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

慢慢说，好像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

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

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像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啊！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像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像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

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了。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

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并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

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像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像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零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像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便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

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像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像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

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惶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朝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

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像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

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像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受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是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自语道："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难怪她生气，"他又说。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去。"

他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便惊讶地问："九点半钟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九点半钟！他应该去上班！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洗脸？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一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绞干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也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像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请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天那堆高。那些半清晰半模糊的字迹，那些似乎还带着油墨气味的字迹，今天并不比往常更叫人厌烦。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儿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

是“她”！

铃声早已响过了。但是他没有听见。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时候他应该下楼去吃饭。别人好像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似的，没有人上楼来叫他。他们更没有想到他还在楼上。

但是他的脑子终于活动起来。他醒了。他离开了办公桌，走下楼去。

饭厅里碗碟狼藉的桌上还有人在吃饭。

“怎么！你在上面！”一个同事惊讶地说，同时用了类似怜悯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想了想，也不坐下吃饭，就走出饭厅，往门外去了。

他好像听见了同事们的轻蔑的笑声。

“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这样想道，他觉得脸上烧到耳根了。

他不饿，他也没有想到“饿”同“饱”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

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们会跟在我后面吗？“他们”指的是他的同事们。这个念头使他放慢脚步，他感到踌躇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他开始在想像他就要同她见面的情景：她会用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话对待他。

“她会原谅我的，”他对自己说了两遍。他温柔地微微一笑。他觉得他是在对着她笑。他的勇气又增加了。

他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她办事的地方。

四

她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员，大川银行就在附近一条大街的中段。他刚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男子在一块儿。他们正朝着他走来。的确是她。还是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烫过了，而且前面梳得高高的。男人似乎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

男人带笑地高谈阔论，她注意地听着。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他觉得心里发冷。他不敢迎着他们走去。他正想躲开，却看见他们走下人行道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了。他改变了主意，他跟着他们走到对面去。他们脚步下得慢，而且身子挨得很近。他看得出来，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他起初不敢走近他们，害怕她觉察出来他是在跟她。这时他忽然有了勇气，他跟在他们后面。那个男人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声音清脆地笑起来。这熟悉的笑声刺痛他的心。他的脸色变了。他的脚也不动了。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的丰满的身子显得比在什么时候都更

引诱人，这更伤了他的心。他望着，别人的身体遮了他的视线。他忽然向前走去。他一张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她同那个男人走进前面一家新开的漂亮的咖啡店去了。

他站在门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找她讲话罢？——不好，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公司去，等着另一个机会，再找她谈话罢。——不好，他放不下心。他应该争取时间，早点同她和解。那么就站在门口等候他们出来罢。——不好，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她对付他呢？万一争吵起来，他没有什么权利约束她。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现在他却后悔他那么轻易地丢开了他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这样一想，他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一路上尽是妻同那个年轻人亲密讲话的影子，偶尔还听见她的笑声，他差一点被一辆人力车撞倒了。

他走进公司，两个同事坐在楼下办公桌前看报。

"怎么啦，老汪？你今天气色不好，连饭也不吃，有什么心事吗？"那个姓潘的年轻人带着讽刺的调子说。这个人一定知道了他的事情，他想道。

"没有事。我肚子不大好，"他连忙做出笑容，临时编出一句假话来。

"肚子不好，吃点药罢。今天下午不要办公了。汪兄，你就请半天假罢，"另一个姓钟的同事说，这个人年纪在五十左

右，身子肥壮，头顶全秃了，两腮的肉重重地垂下来，使他的脸成了方形。鼻子特别大，鼻头发红色。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常带笑容，和同事们处得不错，爱喝酒，爱说话。他在这里没有家室，也没有亲人。这里的同事们都称他做“钟老”，并且赞他“会生活”，“会享乐”，“会安排生活”。

“不要紧，我精神很好，”他（现在我应该写出他的完全的姓名了：汪文宣）敷衍地答了一句，就要上楼去。

“老汪，在下面坐一会儿罢，现在还不到办公时间，你何必就上楼去？”姓潘的笑着挽留道。

“你近来瘦了，应该多休息。为这点薪水卖命，也太值不得，”钟老关心地看他一眼，劝道。

他在一个空凳子上坐下来，忍不住低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什么事？”钟老惊问道，接着就在他的肩头拍一下：“你们年轻人，看开点罢。不要太认真啊！这个年头谁又真正高兴啊！要紧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

“靠这点钱连自己的老婆也养不活！哪里说得上保养身体！”他沮丧地答道。

“我懂罗，你跟你太太又闹过架了，”钟老省悟地说。

“不是，不是，”他连忙摇头分辩道，但是看他的脸色，人便知道他是在掩饰。

“汪兄，你不必否认，”钟老微笑道。“夫妻吵架也是平常的事。要是真的吵起来，你让她一点，尊夫人也就会体贴你的。这种事何必放在心上！”

他没有做声，心里思索着，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钟老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一味让步岂不成了'惧内懦夫'吗?"小潘笑着说。"夫妻吵架，男人不应该让步。女人有什么本事，除了哭，除了骂，难道她们还打得过我们!"

"不要讲了，谁不知道你是怕太太的!"钟老挥着手笑道，"这里又没有外人。"

小潘一张脸通红，掉开头不作声了。汪文宣抬起头看了小潘一眼，嘴一动，似乎要讲话，却又闭紧了。

"汪兄，这里有句俗话：听人劝，得一半。这个年头，大家都在吃苦，还有什么好吵的!女人不及男人会吃苦，有时候闷不过，发点牢骚，也是人情之常。你就让她讲几句，不去理她，什么事都不要紧了。对付太太的最好武器便是沉默。"

"钟老这是经验之谈啊!"小潘大声笑着说。汪文宣吃了一惊。他似乎听懂了这番话，似乎又没有听进去。他忽然站起来，低声自语了一句："我再去找她。"他就往外面走。

"老汪，走哪里去?"小潘在后面问道。

"我就回来，"他匆匆答道，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他去干什么?"小潘好奇地问道。

钟老默默地摇着头，过了片刻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五

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步。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像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战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

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像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像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尘土狂奔。他想道：“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话。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像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戳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容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像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

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做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来，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那么你今天跟我回家去罢。”

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但是过了片刻，光又灭了。她把头掉开去看窗外，只一分钟，她又回过头，叹息地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的眼圈红了。

“过去都是我不好，”他埋下头负罪似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变得这样……”

“这不怪你，”她不能忍耐地打岔说。“在这个年头谁还有好脾气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想我们以后总可以过点好日子，”他鼓起勇气说。

"以后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便略略埋下头去。

"那么我又怎样说呢？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原谅我这一次，今天就跟我回家去，我以后决不再跟你吵架，"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哀求地说了。

"你镇静点，人家在看我们啊！"她把头朝着他伸过来，小声警告说。她拿起杯子放在唇边，慢慢地喝着咖啡。

他觉得一瓢冷水泼到他的头上，立刻连心里也冰凉了。他也端起杯子喝着，今天的咖啡特别苦。"很好，越苦越好，"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他把满杯咖啡喝光了。

"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这样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负担。你也该想明白点，像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她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声音里泄露出来一种极力忍住的酸苦。

"可是小宣——"他痛苦地说出这四个字。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她一字一字十分清晰地说。

"但是我需要你——"他还在要求。

"你母亲更需要你。我也不能赶走她。有她在，我怎么能回去！"她坚决地说。

"那么我怎么办？我还不如不活着好！"他两手捧着头悲苦地说。

"我们还是走罢，你也该回去吃饭了，"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柔声说，便提高声音叫茶房来收钱，一面把钞票放在桌上，自己先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一步。他也只得默默地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他们走出咖啡店，夜已经来了。寒气迎面扑来，他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再见罢，"她温和地说，便掉转了身子。

"不！"他不能自主地吐出这个字。他看见她回转身来，抑制不住，终于吐出了这个整天都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疑问：

"请你坦白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不是说我母亲。"

她的脸色和态度似乎都没有改变。他的问话并不曾激怒她，却只引起她的怜悯。她明白他的意思，她忧郁地笑了笑。

"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点了点头，便撇下他，毅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走着。

"失败了，谈了许多话，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真不晓得她究竟是什么心思。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样想道，他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黑。

"回家罢，"他好像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没精打采地转过身走了。

"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他一路上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六

他回到家。大门里像是一个黑洞，今天又轮着这一区停电，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在门口点一盏油灯。他摸索着走完了漆黑的过道，转上楼梯。他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他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漏出一点光来。他推门进去。母亲坐在方桌前垂着头吃饭，听见门响，抬起脸来，高兴地说一句："你回来啦！"他点了点头。"快来吃饭。我等你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她絮絮地说。

"我有点事情，所以回来迟一点，"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走到饭桌前，在母亲对面的一个方凳上坐下。母亲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饭放到他的面前。

"快吃罢，趁现在饭还热，"她坐下望着他带笑地说。"我下午在二楼方经理那里分到一斤肉，煮了一碗红烧肉。这是你爱吃的，我放在饭锅子里，刚才拿出来，还是热的。你尝尝看，这是你爱吃的菜。"她匆忙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几口吃光了。

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桓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可是他仍然低着头用唯唯的答应口吻敷衍他母亲，并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胃口，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

一筷子一筷子地挟着红烧肉。他在母亲的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

"你今天不大舒服,是不是?"母亲注意到他这种忍受性的沉默,她感到不安了,便关心地问道。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接着添一句:"我很好。"他又低下头不出声了。

他母亲关心地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不住又说:"菜没有冷罢?"

"没有,"他机械地答道,也不抬起头来。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他放下碗筷,默默地站起来。

"吃饱啦?"她压住刚刚升上来的怒气,温和地问道。

"是,"他答道。他动手收拾饭桌。

"你才吃一碗嘛,"她又说。

"我刚才同树生喝了咖啡,"他大意地老实说了出来。

她的怒火立刻冒上来了。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份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你怎么还会去找她?……她还有脸见你?"她大声说。

"我要她跟我回家,"他低声答道。

"哼!她还好意思回来!"她冷笑道。

"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

他胆怯地说。

"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在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们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的口里念着还十分亲热。

"我看她也有她的苦衷，不过她不肯讲出来，——"儿子似乎并没有听母亲讲话，他只顾想自己的事，说出的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话说了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

"你现在还替她辩护，真不中用！媳背着你交男朋友，写情书，还有什么苦衷可说！"母亲也站起来，拿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端说。

"那不见得就是情书啊，"他解释道。

"不是情书，为什么害怕拿给你看？为什么要私奔——"说到"私奔"两个字，做母亲的人也讲不下去了，她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哀求地唤一声，眼里已经装满了泪水。他半晌接不下去。

"你说嘛，"过了片刻，她和蔼地说。他的眼泪赢得她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仿佛他还是从前那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来向母亲哭诉似的。

"妈，你太不了解树生，她并不是私奔，她不过到朋友家里

住几天，她会回来的，"他痛苦地说。

"哼，我不了解她？"她冷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到现在你该明白了罢。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阔也好。你说我不了解她，是不是她对你那样说的？"

他看见母亲又动气了，对她的最后一句问话，便不肯老实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说："不是，她没有说什么。"

母亲瞪了他一眼，过了片刻，才长长地叹一口气，她说："你去休息罢，等我来收拾。你一天也够累了。"

"不要紧，我不累，"他没精打采地说。他的确很倦，但是他终于支持着，帮忙他母亲把碗筷洗干净了放进碗橱里去。

母亲把瓦烛台放在屋中央方桌上，吩咐他说："我在这儿缝点东西。你没有事，还是躺一会儿罢。"她走进旁边小屋去拿了一件男孩的大衣出来，坐在方桌前，将就着烛光，开始补衣服。她的头埋得低。眼镜也戴上了。烛光摇晃得厉害，过不多久，光线又暗淡了，她的头似乎也埋得更低了。

他本来到了床前，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只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走回到方桌前，默默地立在那里。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像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小宣也可怜，这件大衣穿了三个冬了。就是不坏，明年也穿不上身了。论理今年该给他做件新的，不过他爸爸这样苦，能够给他

上学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唉．蜡烛越来越坏了，三十块钱一支还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亮，又伤眼睛。我究竟老了，人简直不中用了。也只有这几针，花了我这么多的功夫。他妈又不管他。也是他命苦，才投生到我们家里来，”她唠唠叨叨地在自言自语，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站在她旁边看她。

“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他感动地、痛苦地大声说。

“我快完了，没有几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他，回答道。“晚上不做，白天又要买菜煮饭，哪儿有功夫做啊！我这双眼睛也没有别的用处，还要保养它们做什么？”她右手拿着穿了线的针打颤地在那件旧大衣上面动着。“比不得他妈，像鲜花一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说是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

“妈，还不说贴补家用，单是小宣的学食费也就亏她了，这学期已经花了两万多，快三万了，”他插嘴说。

“那还不是她自己招来的，她一定要把他送到那种贵族学堂去。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钱花。小宣常常叫苦，”她说。

他实在听不下去。不管他怎样倦，他心里烦得厉害。他不能安静地睡去，也不能安静地做事，他甚至不能安静地看他母亲工作。屋子里这样冷，这样暗。他的心似乎飘浮在虚空里，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但是

他不能安静地站在母亲的身边。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七

他走到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水果摊和面担子旁边几盏电石灯星子似地在黑暗的街中闪光。他感到冷意，把肩头耸了一下。"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他找不到回答。他大步走下街心。

他无目的地走过三条街，差一点被一辆飞跑下坡的人力车撞倒。车夫骂了他两句，他也没有听进耳里，仿佛他周围的一切都和他隔得很远似的。他心里空虚得很。

他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对面那条街灯光辉煌，不知道有多少盏电灯。两条街成了两个世界！他便朝着灯光走去。

他刚走到街角，忽然一个声音在唤他的名字："文宣！"他吃惊地侧头一看。他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冷酒馆的门前。就在靠门一张方桌旁边，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立起来招呼他。

"你来得正好，坐下来吃杯酒罢，"那个人大声说。他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们有半年光景没有见面，那个人却苍老了许多。要是在平时，他至多站着谈三四句话就走了。现在他却默默地走到方桌旁，拉开板凳，在那个同学对面坐下来。

"来杯红糟!"同学掉转脸向着柜台大声吩咐道。

柜台那面有人答应着，于是一杯香喷喷的大曲酒端上来了。

"给我再来一杯，"同学一口把杯里的残酒喝干了，红着脸拍着桌子叫道。

他说话了："柏青，我记得你从前不会喝酒，你几时学会的?"

"我没有学过，我没有学过。我想吃，我非吃不可，"同学摇摆着头大声说。"你先干一杯。"

他望着同学，并不答话。过了片刻，他拿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长叹了一声。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压不下去，打了一个嗝。

"干一杯，干一杯！你没有干，不行！"同学做着手势接连地催他喝酒。

"我干，我干，"他激动地说，他真的一口把剩余的酒喝干了。他觉得心跳得厉害，脸也烧起来。

"再来一杯，"同学拍着桌子叫道，一面从桌子中央几个瓦碟子里拿了一块豆腐干，又抓了一把花生放在他的面前，说："你吃。"

"我不能喝了，"他连忙摇手拦阻道。

"老兄，怕什么！吃醉了有什么要紧！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同学说。酒已经送到他面前了。

"可是人不能一辈子喝醉啊，总有醒的时候，"他寂寞地苦笑道。他望着同学的脸，他发觉这个三十岁的人在半年中间

至少老了十年，额上现出好几条皱纹，两颊深陷进去，眉毛聚在一起，眼睛完全失了光彩，两颗眼珠呆呆地望着他。他心里一阵难过，又加上一句："醒来岂不是更苦吗？"

那个人不作声了，埋下头喝了一口酒，又抬起脸看他一眼，然后又喝一口酒。"我心里真不好过，"同学摇摆着头自语似地说了。

"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他关心地说。

"不吃酒又干什么？吃多了至多也不过病——死，我不怕。死了也好，"那个人带着痛苦的表情说。"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

"你不明白，你的处境总比我好。我都能忍下去，你还不能吗？"他同情地说。他望着那张瘦脸，觉得自己的伤痕被触动了，心里一阵痛，他差一点掉下泪来。"你太太好吗？是不是还住在乡下？"他换过话题说。他想到那个孩子面孔的女人，他们一年前在百龄餐厅结婚，他同树生还去参加了那个简单的婚礼。他后来也到他们乡下家中去作过客。那个年轻太太笑起来多么甜，树生也喜欢她。他想到自己的痛苦，就想到树生，于是联想到那位太太的身上。

"她过去了，"同学低声说，掉开脸不看他。

"她不在了？什么病？"他吃惊地说，他仿佛坐到了针尖上一样，差一点要跳起来了。

"她没有病，"同学摇摇头冷冷地说，脸色却十分难看。他难猜出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她——"说到"她"字他连忙住了口，他自己也害怕听下面的话：自杀？惨死？好像一根锥子在钻他的心。

同学不作声，他也不作声。这沉默太叫人难堪了。别的桌上的酒客们似乎都不快乐，有的人唠唠叨叨地在诉苦，有的在和同伴争论一件事情，右边角落里桌子旁边一个中年酒客埋着头，孤寂地喝着闷酒，忽然站起来付了酒钱走了。这个人出门后，堂倌告诉一个白脸客人说，这是一个每晚必到的老主顾，不爱讲话，喝酒也不过量，两块豆腐干便是他的下酒菜。他按时来准时去。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干什么样的职业。

汪文宣听得厌烦了，昂起头长叹一声，酸苦地说："无处不是苦恼！"

那个同学吃惊地望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今天是她的头七。"歇了一下他又说："十天前她还是很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她怀着小孩已经足月了，我陪她到那里的卫生院去检查，医生说她还不到月份，最早也要在半个月以后，不让她住院。我不能够在乡下多住半个月，我那个机关的科长跟我合不来，他故意捣乱，不准我的假。我进城来了。第三天我女人就发作了。她痛了大半天，没有人管，后来同院子住的太太发觉了，才送她进卫生院去。从前检查的时候，说是顺产，一切都没有问题。到了卫生院，孩子却生不下来。接生的医生把我女人弄来弄去，弄到半夜，才把孩子取出来，已经死了。产妇也不行了。我女人一晚上叫着我的名字，她叫了一两百声才死去。据说她叫得很惨，她的声音连楼下的人也听得见。

她只想在死去以前跟我见一面，要我给她伸冤。可是我住在城里哪里知道！我得到电话，立刻赶去，她已经冷硬了，肚皮大得吓人，几乎连棺材也盖不上。我还是跟没有结婚以前一样，一个人。我葬了我女人，进城来第一件事就是请长假。我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听见我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不管我在家里，在街上，我都听见那个声音。你听她在叫：柏青！柏青！”说话的人用两根手指敲着右边太阳角。“是，的确是她的声音，她叫得多惨！……所以我只想吃酒，我只想醉，顶好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候我才听不见她的声音。活着，活着，真不容易啊！以后除了酒，我还有什么伴侣呢？”这个人用右手蒙着脸，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像睡去似地寂然了。

汪文宣听完了这个人的故事，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大手把他的心紧紧捏住似的，他尝到一种难忍的苦味。背脊上一阵一阵地发冷。他的自持的力量快要崩溃了。“你这样不行啊！”他为了抵抗那越来越重的压迫，才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更难过，他又说：“你是个文学硕士，你还记得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为什么不拿起笔来？”

“我的书全卖光了，我得生活啊，著作不是我们的事！”同学突然取下蒙脸的手，脸上还有泪痕，两眼却闪着逼人的光。“你说我应该怎样办呢？是不是我再去结婚，再养孩子，再害死人？我不干这种事。我宁愿毁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

“所以我们还是拚命喝酒！”汪文宣大声接嘴说。他完全崩溃了，他用不着再抑制自己，堤决了一个口，水只有向一个

地方流去。他悲愤到了极点，他需要忘记一切，醉自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拿酒来，拿酒来！”他喝着。堂倌又送来一杯酒。他望着杯里香喷喷的液体，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咬着牙吞下去，立刻一股热气冲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我喝不了酒，”他抱歉地说。他想：我真不中用，连酒也不会喝，就该永远受人欺负。于是他反抗似地把余酒接连几口就喝光了。

“你脸红得跟关公一样，你吃醉没有？”同学好意地问道。

“没有，没有！”他用力回答道，他觉得脑子凝成一块重重的硬东西，他一用力讲话，脑子就痛，脸烧得厉害，身子轻飘飘的。他想站起来，没有立稳，又颓然坐下。

“怎么！当心啊！”同学大声说。

“我一点也没有醉，”他说着，想笑一笑，可是他连笑也不会了。他只想哭。他觉得一切可悲的事都涌到了他的心头。他也分不清楚是些什么事情。他头晕得厉害，心里也很难过。他忍不住。他觉得那个同学的眼睛变成了许多对，在他的面前打转。他用力一看，还是那张忧郁的瘦脸孔。但是过了片刻，他又看见许多对眼睛了，连电灯光也在旋转。他挣扎着，终于支住桌子站起来。“我醉了，”他认输地说。他朝同学点一个头，就踉跄地走出了冷酒馆。

他东歪西倒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条多街，忽然想起了家。好像看见一道光照亮自己的身子，他有点清醒了。“我怎么会这样啊，”他懊恼地想道。他掉转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刚走了两步，一个庞大的黑影迎面撞来，撞得他眼前直冒火

星，大半个脸发巨痛又发烧，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差一点倒下去。

那个人凶狠地骂了两三声。他没有听进耳去，仍旧歪歪斜斜地走了。他想走得快，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似乎有一肚皮的东西在向上翻腾。他还想忍耐，但是他终于张开口，喷泉似地吐出了他先前在家里吃的晚饭。

他觉得吐够了，也不揩干净嘴，便又往前走。那种酒臭连他自己也厌恶。他只想回家静静地睡一觉。他恨不得两步就走到家。可是他的心越急，脚越是走不快。走了大半条街他又吐起来。这次他吐得不畅快了，仿佛未吐尽的饭菜都塞在他的喉管里，他心里烧得难过。他用力挣一下，才吐出一口来。他一路走，一路呕。过路人中间有几个好奇地望着他。那些眼光并不曾引起他的反感，周围的一切都跟他不相干了。这时候就是有人死在他的旁边，他也不会掉头去看一眼。

可是就在这时候两个女人从一家灯光耀眼的下江饭馆里谈着话走出来。他的眼光无意地触到她们的粉脸上，他大吃一惊，连忙掉开了头。他的动作十分不灵活，两个女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已经把他看清楚了。她叫了一声："宣。"

他不答应她，却大步走向黑暗的地方去。但是走了不多远，整个身体已经不由他控制了，他就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弯着腰吐起来。他大声呕着，吐出来的东西不多，可是心却像被熬煎似地难过，满口都是苦味。他慢慢地伸直身子，靠着旁边一根电线杆喘气。

"宣，"他听见这一声柔和的呼唤，不自觉地掉过脸去。他

的眼里泪水模糊，她又背了光立着，他匆促的一瞥，只看见她一个轮廓，但是他已经认出树生来了。"你怎么了？"她惊问道。

他喘着气，望望她，觉得有满肚皮的话，不知道怎么说起，实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生病吗？"她关心地说。

他摇摇头，觉得气顺了，但是眼泪又流了出来，先前的泪水是呕吐时挣出来的，现在流的却是感激与悲伤的眼泪。

"你怎么不回家去？看你吐得这样难过！"她又说。

"我喝醉了，"他悔恨地答道。

"你怎么去喝酒？你本来不会喝的。快回家去睡觉，看真的闹出病来，"她着急地说。

"在家里妈也不了解我。我心里很烦，到街上走走，碰到一个同学拉我去喝酒，就喝醉了，"他抱歉似地解释道。"谢谢你，再见。"他觉得好了些，便离开电线杆走下街心去。身子仍然在摇摇晃晃。

"当心，看跌倒的！"她在后面大声叮嘱道。她马上又跟着他走下去，走到他的身边，说一句："我送你回去，"便挽着他的左膀往前走了。

"你真的送我回去？"他声音发颤地问道。他胆怯地看看她。

"我不送你，我怕你又会跑去喝酒，"她含笑地说。他感到一丝暖意，心里也舒服多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地说，便让她扶着走回家去。

八

他们走到大门口，他看见那个大黑洞，就皱起眉头，踌躇着不进去。

"你看不清楚，当心，慢慢走啊！"她并不离开他，反而偎得更紧，她关心地嘱咐他，一面用力抬他的膀子。

"你？你不进去？"他耽心地问。

"我陪你上楼去，"她在他的耳边小声回答。

"你对我真好，"他感激地说了一句，他真想搂着她高兴地哭一场。可是他只看了她一眼，就默默地低下头，移动脚步，走进大门，踏下他极熟悉的台阶。"当心啊，"她不断地在他的旁边说，她还用了全力支持着他，可是她的扶持只有使他走得更慢。

"上楼啊，"她又在叮嘱。他暗暗高兴地又答应了一声。

他们终于走上了三楼，刚踏完最上一级楼梯，就看见隔壁那位公务员的太太举着一支蜡烛从房里出来。

"汪太太，你回来啦！"那个苍白脸的女人含笑招呼道，脸上露出一点惊讶的表情，不过人可以看出来这是带善意的。

她对这个温顺的女人点头笑了笑，然后应酬说："张太太，你下楼去？"

张太太一面应着，一面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温和地问道：“汪先生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垂着头站在妻子的身旁，答不出话来。她代他答道：“不是，他喝了酒。”

“我们张先生也吃醉啦，我出去给他买几个广柑。汪太太，你快陪汪先生进去罢，让他睡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个小女人亲切地微笑道，她的笑容并不是虚假的，不过就在笑的时候，她额上几条忧郁的皱纹还是十分显露，双眉也没有完全开展。“这个小女人，生活把她压得太苦了！”汪太太每次看见她，就要起怜悯的念头。小女人走着慢步子下楼去了。他们夫妇借着她的烛光，走到了房门口。

门并没有上闩，他一推，门就大开了。屋里还是那样阴暗，蜡烛仍然点在方桌上，母亲仍旧坐在方桌旁，戴着眼镜，补衣服。她显得那样衰老，背弯得那样深，而且一点声息也不出。烛芯结了小小的烛花，她也不把它剪去。她好像这许久都没有移动过似的。

“宣，你到哪里去了？也不先对我讲一声。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你也是……我劝你还是死了心罢。现在的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母亲一面说话，一面动针，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她还以为她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宣，不要难过，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她没有听见儿子回答，便诧异地抬头一看，她满眼金光，什么也看不出来，眼睛干得十分难过。她放下针线取下眼镜，用手在眼皮上揉了几揉。

他母亲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便痛苦地皱起眉头，一面伸手去紧紧握住他妻子的一只手，他害怕他妻子会跟他母亲吵起来。可是他妻子始终不作声。到这时他不能再忍耐了，便叫了一声：“妈！”声音里含着恳求和悲痛。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这次她看见了，在他的身旁就站着那个女人！

“我陪他回来的，”树生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说。

“好，你本领大，你居然把她请回来了，”母亲冷笑道，她又埋下头动起针线来。

树生带着微笑看了母亲一眼，后来才说：“并不是他去请我回来的，他不晓得在哪里喝了酒，在街上到处乱吐，我看见，才送他回来的。他走路都走不稳了。”她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气他的母亲。

“宣，你怎样不给我讲一声就偷偷跑出去吃酒？”母亲差不多惊得跳起来，她把衣服针线全丢在桌上，走到儿子的面前，她仔细地看他。“你不会吃酒嘛，怎样忽然跑出去吃酒？你不记得你父亲就是醉死的！我从小就不让你沾一口酒。怎么你还要出去吃酒！”她痛苦地大声说。

“他心里难过，你让他睡觉罢，”树生打岔道。

“我没有跟你讲话！”母亲掉过脸带怒地抢白道。

树生冷笑一声，赌气地不响了。

“宣，你告诉我你怎样吃酒的，”母亲像对一个溺爱惯了的小孩讲话似地柔声说。

他疲倦地垂着头不答话。

“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你说呀！”母亲催促道。“你尽管直说，我不怪你。”

“我心里难过，我觉得还是醉了好些，”他被逼得失掉了主意，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碰到她的？”母亲还不放松地追问，另一种感情使她忘记了她儿子的痛苦。

“你让他睡罢，”树生忍不住又插嘴说了一句。

母亲不理睬，还是要儿子回答。

“我——我——”他费力吐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自己身上和母亲的身上都溅到了他吐的脏东西。

“你快坐下来，”母亲慌张地说，她把她那些问题全抛在脑后了。

他仍旧立在原处弯着腰呕吐，妻子给他捶背，母亲为他端了凳子来。他吐出的东西并不多，可是鼻涕眼泪全挣出来了。他坐在凳子上喘气，两只手压在两个膝头上。

“真是何苦来，”妻子立在他背后怜惜地说。

“你照料他去睡罢，”母亲终于心软了，让步地对她儿媳说；“我去弄点灰来扫地。”

母亲出去以后，妻子便扶着丈夫走到床前，她默默地给他脱去鞋袜和外衣。他好些年没有享过这样的福了。他像孩子似地顺从她。最后他上了床，她给他盖好被。她正要转身走开，他忽然从被里伸出手来将她的右手握住，并且握得紧

紧的。

"你好好睡罢，"她安慰他道。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他睁大眼睛哀求地说。

她不答话。她在思索。她在他旁边站了好一阵子，泪珠从两只眼角慢慢地滚了下来。他不久就睡着了。可是他的手始终没有放松。

这晚上她留了下来。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好，一直睡到天大亮他才醒过来。他妻子正坐在窗口小书桌前化妆。

"树生，"他惊喜地唤道。她回过头看他，脸上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柔声问他：

"你好了？要起来吗？"

他点点头，伸一个懒腰，满意地答道："我好了。我就起来。"

她又转过头去继续化妆。她脑后烫得卷起的头发在他的眼里显得新鲜，好看。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她回来了。这并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事。

九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

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耽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 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像你整天拚命卖气力，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采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

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

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 Bir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耽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

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像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

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去。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耽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挣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

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十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痛，好像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

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像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

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 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像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

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决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

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耽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彷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

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耽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庞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

里也有老鼠了。它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它在做什么？它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像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它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像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悉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

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十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战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像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像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像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

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

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像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像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

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 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耽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 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像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可怜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像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

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像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

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像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十 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像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

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天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像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

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拾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 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

---

① 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耽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 bridge 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摊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

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像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十 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

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耽心。母亲或许耽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像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

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安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像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像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

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罣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罣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他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他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他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像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像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十 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

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像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

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像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像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像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它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像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

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 你病好了，时局好

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捡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像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

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

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采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彷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耽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

"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分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像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脚轻手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像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像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

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耽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

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像并没有用意，但是又像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像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像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　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响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像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

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十 五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

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像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①，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战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

---

① "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下来。

陈主任付了账，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像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

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像无数只眼睛在闪动，像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

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罴，"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战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

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像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

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像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像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像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彷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像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十 六

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像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

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战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

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像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

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账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来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

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罗，”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耽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像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

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江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像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响，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十 七

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

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像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逼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像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 生 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去。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赔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赔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赔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这是我不好,妈本来不放我走,我一定要走,我怕假请多了,公司方面不满意。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周主任、吴科长都是刻薄成性的,我吃了他们的饭就没有自由了,"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

"可是你在吐血生病啊,难道生病也不能请假吗?他又没有买了你的命!"她答道。

"公司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他苦笑道。"听吴科长今天的口气,好像他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她赌气地说。

他脸红了一下,他略略埋下头,喃喃说:"不过……"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气愤地说。"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跟她不相干,"他连忙打岔道。

"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

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她愈往下说愈激动,也愈生气,一张脸挣得通红,两只眼睛里燃着怒火。

"树生,你稍微忍耐一下,"他惶恐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她要到昆明——"

"等到抗战胜利!"她冷笑了一声,"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那么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他脸上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心里很难过。

"忍耐!忍耐!你总是说忍耐的话!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她烦躁地问。

"只要环境好一点,大家就可以相安的,"他带着希望地答道。

"等环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她又生起气来,脸又挣红了。

"那么你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罢,她这两年也吃够苦了,"他脸色惨白地央求道。

"那是她活该,生出你这个宝贝儿子来!"她忽然变了脸色说,从手提包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面上,也不再说什么,就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几分钟才跑出去追她。

他满眼都是人，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他掉头四望，他看不见她的背影。“她一定是去银行，”他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大步走着，全身发热，淌汗。

他走过大半条街，终于见到她的背影了。他兴奋地唤了一声：“树生！”她似乎没有听见。他鼓起勇气向前跑去。他离她愈来愈近了。他第二次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连忙跑上去，抓住她的膀子。他睁大两只眼睛瞪着她，半晌才气咻咻地吐出一句话：

“树生，我都是为了你。”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

“你何苦来！”她怜悯地望着他说，“为什么不回家去躺躺？你病还没有好，怎么能办公啊？”

“我应该向你说真话，”他仍旧很激动地说，“我去办公，我不过想借支一点钱。”

“我原先就说过，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办公”她打岔地说。

“我想买点东西……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至少也要买一个蛋糕才……”他断断续续地说，带着羞惭的表情，略略低下头去。

她显然吃了一惊。他的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你是这样的打算？”她感动地小声问。

他点点头，又添一句：“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微笑道,带着柔情望他。

"我说了,你一定不让我做,"他答道,他的紧张的心松弛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倒忘记了,我真该谢谢你,"她感激地含笑道。

"那么你不再生我的气了?"他也怀着感激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她坦白地回答。

"那么你不离开我们?"他又问,声音还略带战抖。

"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她答道。她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安慰的表情,便柔声劝他:"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母亲——"她突然住了嘴,改口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去休息罢。不要再去公司了。"

"我去一趟,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回去,"他说。妻点点头,两个人就在十字路口分别了。

他回到公司,已经是办公时间了。他的精神比较爽快,可是身体还是疲乏。他坐下来,立刻开始工作。他觉得很吃力,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打算回家休息,但是他想到"当天要"三个字,他连动也不敢动了。

校样一页一页地翻过了。他弄不清楚自己看的是什么文章。他的心在猛跳,他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眼前起了一层雾,纸上的黑字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放松我?你不过比我有钱有势!"他愤慨地想道。

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

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过了三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里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

"那么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道。忽然听见周主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子在字纸篓里拾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刚揩好痰，他又发出接连的咳声。他走到痰盂前弯下身子吐了几口痰。嘴里干得厉害。他想喝一杯茶，却没有人理他。他按着胸膛在喘气。

周主任叫工友来请他到小房间去。

"密斯脱汪，你今天不要办公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罢，我看你身体太差……"周主任靠在活动椅背上，慢吞吞地含笑说。

他竭力装出平静的声音回答一句："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然而他的身体却不想支持下去。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身子忽然摇晃起来。

"密斯脱汪，你身体不好，趁早休息罢。不然病倒了，医药费是一笔大数目啊，"周主任又说。

"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他气恼地想道，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罢。"他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咳起来。

"半天恐怕不行罢……。也好，你先回家再说，"周主任带了点嘲笑的表情说，便把头朝面前那张漂亮的写字台埋下去。

他不想再说什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那个人要求："我想借支一个月薪水，请主任——"

周主任不等他说明理由，立刻截断了他的话，厌烦地挥手说："支半个月罢，你去会计科拿钱。"

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只好忍羞到会计科去支了三千五百元。他想：这点点钱能够做什么用呢？他带着苦笑把钞票揣在怀里。

他把看完的校样交出去以后，便走下楼。没有人理他，却有些怜悯的眼光跟随他。"何苦啊，"周主任摇摇头低声说了这三个字。

他希望在楼下看见钟老，他盼望着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但是楼下没有钟老的影子。

天还是灰色，好像随时都会下雨似的。走惯了的回家的路突然变得很长，而且崎岖难走。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全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

十八

他到了家。房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进去。母亲立在方桌前洗衣服。他一看便知道旧洋磁脸盆里面泡着的正是他的罩袍。

“宣，你回来了！”母亲惊喜地说。

“我累得很，”他喘息地答道。接着他苦笑地对她说：“妈，你还在给我洗衣服！我不是说过拿给外面洗衣服的大娘去洗吗？”他把书桌前的藤椅掉转方向在它上面坐下来。

“包月洗要八百元一个月，太贵了！横顺我在家里没有事做。我不比树生，她可以到外面去挣钱，”母亲发牢骚地说。

“树生回家来过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母亲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回答：“她没头没脑地发了一顿脾气又走了。我看她越来越不像话。你也得管管她。像她这种脾气，我实在伺候不了。我想等你身体好一点，我要回昆明去住一个时候。唉……”（她改换了语调叹一口气）“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

看见母亲的眼泪，他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也就想哭了。他连忙安慰她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

你的儿子——”

不等他说完她便插嘴说：“是啊，她不过是你的姘头。她动不动就说走。其实她走了倒好。她走了，我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

母亲的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反感，他不敢反驳，却用不安的声调说：“我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钱来结婚？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有人嫁给我？”他苦笑了。

“养不活，怕什么！这个年头哪个有良心的人活得好？拖也好、捱也好，我们总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就连妻子、儿女都不要了！”母亲愤慨地说。

“不过我实在离不开树生，结婚十四年了，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他痛苦地说，话还未说完，他觉得一阵头晕，就把藤椅放还原，将头压在书桌上。他像睡着了一样，半天都不出声息。

母亲走到他的身旁，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他。“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她低声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她又唤道：“宣。”他应了一声，却不抬起头来。

“你到床上去躺躺罢，”她柔声说；“她会回来的，你何苦这样难过。”

“我不是为了她的事情，”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她会回来，我知道。我先前还看见她。”

“你看见她？她去公司找过你吗？真不要脸！还好意思向你告状！”母亲气红脸，离开他走一步，大声说。她恼怒地想：这个女人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他痛苦地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头说："她没有讲什么。她……她不过说时局不……大好。"

"时局好不好，跟她有什么相干！"母亲气愤地说；"她要走，一个人走就是罗。做什么还要来害人！"

"妈！"他不能忍耐地叫起来，这太过份了！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她不走，她说过，她不走。她就要回来。"

"她回来？她还有脸见我？"母亲又惊奇又愤恨地说。

"是我要她回来的，"他畏怯地说。

"你还要她回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两手蒙住脸，好像在哭。她又取下手，站起来，自语似地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咬牙切齿地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她说完并不理他，马上走进她的小屋去了。

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在做梦。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他忽然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

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

"妈！"他大声唤道。她应着，翻身坐起来，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

"你还有什么话？"她哑声问道。

"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罗，"他立在床前，温和地说。

她用手帕揩了眼泪，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你这是真话？"她问道。

"妈，是真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

"那么你答应我了？"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

"我答应你。你放心罢，"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他忘了自己，忘了病，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

"只要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了！"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点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

他带着苦笑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望着她搓洗衣服。他忽然觉得头发晕，眼睛发黑，心里难受得很，他差一点跌倒在地上。他连忙靠着墙壁，闭上眼睛养神。

母亲埋着头，看不见他这情形。她还在对他讲话。她说："家里少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简单多了。……小宣这个星期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妈从来不管他。……今天外面谣言更多，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却不管。这些年头什么日子我没有过过！未必还有更苦的在后头！……你公司里有什么消息吗？"

"啊，"他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应道；"没有，"他摇摇头。

"那么不会搬兰州……"她又说。

"好像要搬，又好像不搬，我不大清楚，"他答道，接连咳了几声嗽。

"怎么你又在咳嗽？你快躺下去歇歇罢，"她关心地说，她抬起头来看他。"你快去睡！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的病刚刚好一点，现在怕又要发作了，"她惊惶地说。

他一直咬紧嘴唇在支持着。但是他听见母亲的这几句话以后，他的精神的力量马上崩溃了。他并不回答她，却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倒在床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她惊问道，连忙走到床前来。

"我睡一下，我睡一下，"他喃喃地说。

"宣，你要当心啊。时局这样坏，你又病倒，叫我怎样办？"她有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带着哭声说。

"我不是病，我不是病，"他有气无力地说，接着他又咳了几声嗽，他的咳声空虚无力，很可怕。

"你还要说不是病！还不肯休息！要是真的再倒下来，你怎么受得住？"母亲着急地责备道，她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流。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种贱骨头不会死得这么容易，"他吃力地、感伤地说。而其实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死"字。"死"使他悲观，使他难过。

"你不要说话，你先睡一会儿罢，"她忍住悲痛说，她给他盖上了棉被。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自语似地说。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母亲愤恨不平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大开，树生回来了。

"怎么，宣，你又躺下来了？"她顺口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脸上带着笑容。

"我走累了，现在躺一会儿，"他连忙撑起半个身子答道。

母亲看见树生进来，大吃一惊。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羞和愤压倒了她。

"你睡你的，不要起来。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独山克复了，"树生望着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晚报。"她把手里捏的一张晚报递给他。

"我们可以不逃难了，"他读完了那条消息放心地说；他想下床，可是他刚刚移动他的腿，身子就倒了下去。他叹了一口长气。

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板起脸孔躲进小屋去了。"妈，"他在床上唤她，可是她连头也不回过来。

"让她去，让她去，"树生低声对他说，一面做了一个手势。

他摇摇头恳切地说："这样不好。你看我的面上对妈客气点。你们和解罢。"

"她一直恨我，怎么肯跟我和解？"树生说，她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

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着：“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罢？”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副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随便几副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罢，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罢，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像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

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的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像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

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像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像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

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个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呻吟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走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罢,”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像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

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罢。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像有痰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罢，"她为了想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故的脸。仍旧是那样

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他挨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略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副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罢,"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吃两副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检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检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罢?"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罢,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

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罢。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

十九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悉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

(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

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的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像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

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副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咳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

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极限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像不认识她似

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但是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战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

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

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另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汪兄，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①。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了起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

① T.B.：英文，肺结核。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采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

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战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副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像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二十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像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像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耽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像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像大人，尤其是像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像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像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像一个小孩。他就像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像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

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像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二十一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像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像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景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道。"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像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

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像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袍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痠、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是这一次却像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掩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痰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

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拾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像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

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像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采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像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罗。"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二十二

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接连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 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痰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咻着。这咻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 X 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

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像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不像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束着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耽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

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

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

"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着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

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

"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

"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

"妈，你对什么人都好，就是对树生太苛刻。她并不是那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缘故才答应去兰州的，"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改变了脸色，她忍受似地点着头说："就依你，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放心睡觉罢。你话讲多了太伤神，病会加重的。"

他不作声了。他埋着头好像在想什么事情。母亲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执迷不悟啊！可是她仍然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宣，你还是睡下罢，这样坐着看着凉啊。"

他抬起头用类似感激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停了一会儿，他忽然下床来。"妈，我要出去一趟，"他匆匆地说，一面弯着身子系皮鞋带。

"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道。

"我有点事，"他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公司已经辞掉你了。外面冷得很，你身体又不好，"母亲着急地说。

他站起来，脸上现出兴奋的红色。"妈，不要紧，让我去一趟，"他固执地说，便走去取下挂在墙上洋钉上面的蓝布罩袍来穿在身上。

"等我来，"母亲不放心地急急说，她过去帮忙他把罩袍穿

上了。"你不要走，走不得啊！"她一面说，一面却取下那条黑白条纹的旧围巾，替他缠在颈项上。"你不要走。有事情，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她又说。

"不要紧，我就会回来，地方很近，"他说着，就朝外走。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一样。

"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她站在原处思索了片刻，然后走到他的床前，弯下身子去整理床铺。

她铺好床，看看屋子，地板上尘土很多，还有几处半干的痰迹。她皱了皱眉，便到门外廊上去拿了扫帚来把地板打扫干净了。桌上已经垫了一层土。这个房间一面临马路，每逢大卡车经过，就会扬起大股的灰尘送进屋来。这一刻她似乎特别忍受不了肮脏。她又用抹布把方桌和书桌连凳子也都抹干净了。

做完这个，她便坐在藤椅上休息。她觉得腰痛，她用手在腰间擦揉了一会儿。"要是有人来给我捶背多好啊，"她忽然想道。但是她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她责备自己："你已经做了老妈子，还敢妄想吗！"她绝望地叹一口气。她把头放在靠背上。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但是接着她低声说了出来："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她一阵伤心，掉下了几滴眼泪。

不久他推开门进来，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揩眼睛。

"妈，你什么事？怎么在哭？"他惊问道。

"我扫地，灰尘进了我的眼睛，刚刚弄出来，"她对他撒了谎。

"妈，你把我的床也理好了，"他感动地说，便走到母亲的身边。

"我没有事，闲着也闷得很，"她答道。接着她又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来？"

他喘了两口气，又咳了两三声嗽，然后掉开脸说："我去看了钟老来。"

"你找他什么事？你到公司去过吗？"她惊讶地问道，便站了起来。

"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一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

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像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像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像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像一张惨白脸

对着他。灰黑的云像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采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而，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已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赔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

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像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战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像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用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

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去找了昨天用剩的半截蜡烛点起来。烛光摇曳得厉害。屋子里到处都是黑影。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风震摇着烛光，烛芯偏向一边，烛油水似地往下流。一个破茶杯倒立着，做了临时烛台，现在也被大堆烛油焊在桌上了。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从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

母亲拿了剪刀来，把倒垂的烛芯剪去了。烛光稍稍稳定。“你现在吃饭好吗？我去把鸡汤热来，”她说。

“好嘛，”他勉勉强强地答道。几小时以前的那种兴致和食欲现在完全消失了。他回答“好”，只是为了敷衍母亲。“她为什么还要我吃？我不是已经饱了？”他疑惑地想道。他用茫然的眼光看母亲。母亲正拿了一段还不及大拇指长的蜡烛点燃了预备出去。

“妈，你拿这段长的去，方便点，”他说。“我不要亮，”他又添一句。他想：有亮没有亮对我都是一样。

“不要紧，我够了，”母亲说，仍旧拿了较短的一段蜡烛出

了房门。

一段残烛陪伴他留在屋子里。

“又算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好活，”他自语道，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答话。墙壁上颤摇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还是站着，应该睡去还是醒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动作。他仍旧立在方桌前，寒气渐渐地浸透了他的罩衫和棉袍。他的身子微微战抖。他便离开方桌，走了几步，只为了使身子暖和一点。

“我才三十四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他不平地、痛苦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惋惜地自叹。大学时代的抱负像电光般地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自负的言语……全在他的脑子里重现。“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他追悔地说。

“那个时候我多傻，我一直想着自己办一个理想中学，”他又带着苦笑地想。他的眼前仿佛现出一些青年的脸孔，活泼、勇敢、带着希望……。他们对着他感激地笑。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蜡烛结了烛花，光逐渐暗淡。房里无限凄凉。“我又在做梦了，”他不去剪烛花，却失望地自语道。他忽然听见了廊上母亲的脚步声。

“又是吃！我这样不死不活地捱日子又有什么意思！”他痛苦地想。

母亲捧了一菜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饭进来，她满意地笑着说：“我给你煮成了鸡汤饭，趁热吃，受用些。”

"好！我就多吃一点，"他顺从地说。母亲把碗放在方桌上，他走到方桌前一个凳子上坐下。一股热气立刻冲到他的脸上来。母亲俯着头在剪烛花。他看她。这些天她更老了。她居然有那么些条皱纹，颧骨显得更高，两颊也更瘦了。

"连母亲也受了我的累，"他不能不这样想。他很想哭。他对着碗出神了。

"快吃罢，看冷了啊，"母亲还在旁边催促他。

二十三

他吃过晚饭后就盼望着妻，可是妻回来得相当迟。

时间过得极慢。他坐在藤椅上或者和衣躺在床上。他那只旧表已经坏了好些天了，他不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修理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枕边，他不断地要求母亲给他报告时刻。……七点……八点……九点……时间似乎故意跟他为难。这等待是够折磨人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忍耐力。

终于十点钟又到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取下老光眼镜，揉揉眼睛。"宣，你脱了衣服睡罢，不要等了，"她说。

"我睡不着。妈，你去睡，"他失望地说。

"她这样迟还不回来，哪里还把家里人放在心上？明天一早就要走，也应该早回来跟家里人团聚才是正理，"母亲气恼地说。

"她应酬忙，事情多，这也难怪她，"他还在替他的妻子辩解。

"应酬，你说她还有什么应酬？还不是又跟她那位陈主任跳舞去了，"母亲冷笑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

"你总是袒护她，纵容她！不是我故意向你泼冷水，我先

把话说在这里搁起，她跟那位陈主任有点不明不白——”她突然咽住以后的话，改变了语调叹息道：“你太忠厚了，你到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你真是执迷不悟！”

“妈，你还不大了解她，她也有她的苦衷。在外面做事情，难免应酬多，她又爱面子，”他接口替妻辩护道：“她不见得就喜欢那个陈主任，我相信得过她。”

“那么我是在造谣中伤她！”母亲勃然变色道。

他吃了一惊，偷偷看母亲一眼，不敢做声。停了一两分钟，母亲的脸色缓和下来，那一阵愤怒过去了，她颇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她用怜惜的眼光看他。她和蔼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人老了，脾气更坏了。其实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母亲啊！”

他又得到了鼓舞，他有了勇气。他说：“妈，你不要误会她，她从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她对你本来是很好的。”他觉得有了消解她们中间误会的机会和希望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她指着他的脸说：“你也太老好了。她哪里肯对你讲真话啊！我看得出来，我比你明白，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妈，你的确误会了她，她没有这个意思，”他带着充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母亲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就在这时候电灯突然亮了。整个屋子大放光明。倒立的茶杯上那段剩了一寸多长的蜡烛戴上了一大朵黑烛花，现着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

母亲立刻吹灭了烛，换过话题说："十点半了，她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不作声，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左胸又厉害地痛起来。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母亲，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罢。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压下了感情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他平平淡淡地对母亲说："妈，你不必等她了。你去睡罢。"

"那么你呢？"母亲关心地问。

"我也要睡了。我瞌睡得很。"他故意装出睁不开眼睛的样子，并且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你还不脱衣服？"母亲又问。

"我等一会儿脱，让我先睡一觉。妈，你把电灯给我关了罢，"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好的，你先睡一觉也好，不要忘记脱衣服啊，"母亲叮嘱道，她真的把电灯扭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拿了一个凳子，放在掩着的门背后。于是她走进她那间小屋去了。她房里的电灯还亮着。

他并无睡意。他的思潮翻腾得厉害。他睁着眼睛望那扇房门，望那张方桌，望那把藤椅，望一切她坐过、动过、用过的东西。他想：到明天早晨什么都会变样了。这间屋子里不会再有她的影子了。

"树生！"他忽然用棉被蒙住头带了哭声暗暗地唤她。他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揭开他的被，能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回答："宣，我在这儿。"

但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母亲在小屋里咳了两声嗽，随后又寂然了。

“树生，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他再说。他盼望得到一声回答：“宣，我永远不离开你。”没有声音。不，从街上送进来凄凉的声音：“炒米糖开水。”声音多么衰弱，多么空虚，多么寂寞。这是一个孤零零的老人的叫卖声！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缩着头，驼着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破旧油腻的棉袍挡不住寒风。一个多么寂寞、病弱的读书人。现在……将来？他想着，他在棉被下面哭出声来了。

幸好母亲不曾听见他的哭声。不会有人来安慰他。他慢慢地止了泪。他听见了廊上的脚步声，是她的脚步声！他兴奋地揭开被露出脸来。他忘了泪痕还没有揩干，等到她在推门了，他才想起，连忙用手揉眼睛，并且着急地翻一个身，使她在扭开电灯以后看不到他的脸。

她走进屋子，扭燃了电灯。她第一眼看床上，还以为他睡熟了。她先拿起拖鞋，轻轻地走到书桌前，在藤椅上坐下，换了鞋，又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镜子，对着镜略略整理头发。然后她站起来，去打开了箱子，又把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去。她做这些事还竭力避免弄出任何响声，她不愿意惊醒他的梦。但是正在整理箱子的中间，她忽然想到什么事，就暂时撇下这个工作，走到床前去。她静静地立在床前看他。

他并没有睡去，从她那些细微的声音里他仿佛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到了他的床前。他还以为她就会走开，谁知她竟然在床前立了好一阵。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

不能再忍耐了。他咳了一声嗽 他听见她小声唤他的名字，便装出睡醒起来的样子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一面睁开眼来。

"宣，"她再唤他，一面俯下头看他；"我回来迟了。你睡了多久了？"

"我本来不要睡，不晓得怎样就睡着了，"他说了谎，同时还对她微笑。

"我早就想回来，谁知道饭吃得太迟，他们又拉着去喝咖啡，我说要回家，他们一定不放我走……"她解释道。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的同事们一定不愿意跟你分别。"这是敷衍的话。可是话一出口，他却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绝没有讥讽她的意思。

"你是不是怪我不早回来？"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骗你，我虽然在外面吃饭，心里却一直想到你。我们要分别了，我也愿意同你多聚一刻，说真话，我就是怕——"她说到这里便转过脸朝母亲的小屋望了望。——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他接嘴说。"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他改变了话题问。

"差不多了，"她答道。

"那么你快点收拾罢，"他催她道；"现在大概快十一点了。你要早点睡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起来。"

"不要紧，陈主任会开汽车来接我，车子已经借好了，"她顺口说。

"不过你也得早起来，不然会来不及的，"他勉强装出笑

容说。

"那么你——"她开始感到留恋，她心里有点难过，说了这三个字，第四个字梗在咽喉，不肯出来。

"我瞌睡，"他故意打了一个假呵欠。

她似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说："好的，你好好睡。我走的时候你不要起来啊。太早了，你起来会着凉的。你的病刚刚才好一点，处处得小心，"她叮嘱道。

"是，我知道，你放心罢，"他说，他努力做出满意的微笑来，虽然做得不太像。可是等她转身去整理行李时，他却蒙着头在被里淌眼泪。

她忙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还以为他已经睡熟了。事实上他却一直醒着。他的思想活动得快，它跑了许多地方，甚至许多年月。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它始终绕着一个人的面影。那就是她。她现在还在他的近旁，可是他不敢吐一口气，或者大声咳一下嗽，他害怕惊动了她。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岁月都去远了。……甚至痛苦的争吵和相互的折磨也去远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分离（马上就要来到的）和以后的孤寂。还有他这个病。他的左胸又在隐隐地痛。她会回来吗？或者他能够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他把脸朝着墙壁，默默地流眼泪。他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些时候。然而那是在她上床睡去的若干分钟以后了。

他半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汗背心已经湿透了。屋子里漆黑，他翻身朝外看，他觉得有点头晕，他看不清楚一件东西。母亲房里没有声息。他侧耳静听。妻在他旁边发出均匀的呼

吸声。她睡得很安静。“什么时候了?”他问自己。他答不出。“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愣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

渐渐地、慢慢地他又睡去了。可是她突然醒来了。她跳下床,穿起衣服,扭开电灯,看一下手表。“啊呀!”她低声惊叫,她连忙打扮自己。

突然在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他来了,我得快。”她小声催她自己。她匆匆地打扮好了。她朝床上一看。他睡着不动。“我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地睡罢,”她想道。她又看母亲的小屋,房门紧闭,她朝着小屋说了一声:“再会。”她试提一下她的两只箱子,刚提起来,又放下。她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他的后脑向着她,他在打鼾。她痴痴地立了半晌。窗下的汽车喇叭声又响了。她用柔和的声音轻轻说:“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觉得心里不好过,便用力咬着下嘴唇,掉转了身子。她离开了床,马上又回转身去看他。她踌躇片刻,忽然走到书桌前,拿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用墨水瓶压住它,于是提着一只箱子往门外走了。

就在她从走廊转下楼梯的时候,他突然从梦中发出一声叫唤惊醒过来了。他叫着她的名字,声音不大,却相当凄惨。他梦着她抛开他走了。他正在唤她回来。

他立刻用眼光找寻她。门开着。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他一翻身坐起来，忙忙慌慌地穿起棉袍，连钮子都没有扣好，就提起那只箱子大踏步走出房去。

他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觉得膀子发酸，脚沉重，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下了楼梯。楼梯口没有电灯，不曾扣好的棉袍的后襟又绊住他的脚，他不能走快。他正走到二楼的转角，两个人急急地从下面上来。他看见射上来的手电光。为了避开亮光，他把眼睛略略埋下。

"宣，你起来了！"上来的人用熟悉的女音惊喜地叫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身上。"啊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她连忙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箱子。"给我，"她感激地说。

他不放开手，仍旧要提着走下去，他说："不要紧，我可以提下去。"

"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看了说话的人一眼。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他顺从地把箱子交给那只伸过来的手。他还听见她在说："陈主任，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你快来啊，"那个年轻的声音说，魁梧的身影消失了。"冬冬"的脚步声响了片刻后也寂然了。他默默地站在楼梯上，她也是。她的手电光亮了一阵，也突然灭了。

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汽车喇叭叫起来，叫了两声。她梦醒似地动了一下，她说

话了："宣，你上楼睡罢，你身体真要当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罢。你不要送我。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在屋里，"她柔情地伸过手去，捏住他的手。她觉得他的手又瘦又硬(虽然不怎么冷)！她竭力压下了感情，声音发颤地说："再见。"

他忽然抓住她的膀子，又着急又悲痛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定，不过我一定要回来的。我想至迟也不过一年，"她感动地说。

"一年？这样久！你能不能提早呢？"他失望地小声叫道。他害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也说不定，不过我总会想法提早的，"她答道，讨厌的喇叭声又响了。她安慰他："你不要着急，我到了那边就写信回来。"

"是，我等着你的信，"他揩着眼泪说。

"我会——"她刚刚说了两个字，忽然一阵心酸，她轻轻地扑到他的身上去。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

她并不离开他，反而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听到那讨厌的喇叭声，才离开他的身子，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她用手帕揩了揩脸，小声叹了一口气，又说："妈面前你替我讲一声，我没有敢惊动她。"她终于决然地撇开他，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剩余

的那几级楼梯。

他痴呆地立了一两分钟，突然沿着楼梯追下去。在黑暗中他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但是他赶到大门口，汽车刚刚开动。他叫一声“树生”，他的声音嘶哑了。她似乎在玻璃窗内露了一下脸，但是汽车仍然在朝前走。他一路叫着追上去。汽车却像箭一般地飞进雾中去了。他赶不上，他站着喘气。他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脚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

他看着他们，他浑身颤抖起来。周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寒夜。就只有这两个孩子睡着，他一个人醒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像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

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像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二十四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耽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

你。

妻 ×月×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

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丁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

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像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像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像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

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插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

辉，他好像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战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

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像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着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它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背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耽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

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十五

寒冷的冬天像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挺。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

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像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的心颤得厉害。他觉得鼻酸。他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账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二十六

那一叠信笺上全是她的笔迹，字写得相当工整，调子却跟往常的不同。她不再说她的"忙"和银行的种种事情。她吐露她的内心，倾诉她的痛苦。他的手跟着那些字战抖起来，他屏住气读下去。那些话像一把铁爪在抓他的心。但是他禁不住要想："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他已经有一种预感了。

她继续吐露她的胸怀：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对我好的人带来痛苦，我也知道在这两三年中间我给你添了不少的烦恼，我也承认这两三年我在你家里没有做到一个好妻子。是的，我承认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有时我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特别是近一两年，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你不了解我。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就怕看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那些

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事后我总是后悔，我常常想向你道歉。我对自己说，以后应当对你好一点。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

一下叩门声突然打岔了他。一个人在门外大声叫："汪兄！"

他大吃一惊，连忙把信笺折好往怀里揣。钟老已经走进来了。

"汪兄，你在家，近来好吗？没有出街？"钟老满面笑容地大声说。

"请坐，请坐，"他客气地说，勉强地笑了笑，他的心还在信笺上。"近来很忙罢，"他随口说，一面倒开水敬客。他的举动迟缓，他的眼前还有一张女人的脸，就是树生的脸，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不喝茶，不喝茶，刚才喝了来的，"钟老接连点着头，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只有开水，随便用一杯罢，"他端了一杯开水放在钟老的面前，略带羞惭地说。

"我喝开水，我喝开水，"钟老赔笑说，"喝开水卫生，"便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伯母不在家，近来好罢？"他朝四周看了看。

"还好，谢谢你，"他也笑了笑，但是立刻又收起了笑容，他

的心还在咚咚地跳，他的思想始终停在那一叠信笺上面。“家母刚刚出去，”他忽然想起了对方的问话，慌忙地加上一句。他没有说出他母亲在晒台上晾衣服。

“我有个好消息来报告你，”钟老略现得意之色说；“公司里的周主任升了官调走了。新来的方主任，不兼代经理。他对我很客气。昨天我跟他谈起老兄的事，他很同情你，他想请老兄回去，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他要我来先同老兄谈谈。那么老兄的工作没有问题了。”

“是，是，”他答道，他只淡淡地笑了笑，他并没有现出欢喜的表情。他的眼睛望着别处，他好像并不在听对方讲话似的。

“那么老兄什么时候去上班？”钟老问道，他的反应使钟老感到惊讶。钟老原以为他会热烈地欢迎他带来的好消息，却想不到他连一点兴奋的表示也没有。

“过两天罢。啊，谢谢你关照，”他惊醒般地说，还提高了声音，他刚要做出笑容，却在中途改变了主意，仍旧板起脸孔来。

“你身体怎样？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钟老又问，这次带着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我还好，”他吃惊地看了对方一眼，摇摇头回答。心里在想：树生写这封信来有什么用意？难道她真要——他的脸突然发红，脸上的肌肉搐动起来。

“那么你早点来上班罢。日子久了，恐怕又要发生变化。这个机会也很难得，”钟老停了片刻又叮嘱道。

“是的，我过两天一定来，”他短短地答道，又不作声了。

钟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却又不便问他。多讲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个好心的老人再坐一会儿，又讲了几句闲话，觉得没趣，便告辞走了。

他也不留客，便陪着钟老走出房来。到了楼梯口，钟老客气地要他留步，他却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大门口。

"汪兄，请早点来上班啊，"钟老在大门口跟他分别的时候又叮嘱了一次。

"一定来，"他恭敬地点头答道。他转过身急急走上楼去，在过道里他撞在一个老妈子的身上，那个女人提着一壶开水，开水溅了好几滴到他的脚背上，烫得他叫出声来。

老妈子还破口大骂，他连忙道了歉，忍住痛逃回楼上去了。他的心仍然被束缚在那一叠信笺上，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使他关心。甚至钟老的"喜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他回到房里，母亲仍然不在。照理她应该晾好衣服回房来了，她不在，正好给他一个安心读信的机会。他在藤椅上坐下，又把妻的信拿出来读着。他还没有开始，心就咚咚地大跳，两只手像发寒战似地抖起来。

他在信笺上找到先前被打断了的地方，从那里继续读下去：

……我说的全是真话。请你相信我。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我痛苦。我想不出这

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曾经发愿终生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也不了解我这番苦心。而且你越是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越是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她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甚至不惜破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我至今还记得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这些都是空话，请恕我在你面前议论你母亲。我并不恨她，她过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我何必恨她，她说

得不错，我们没有正式结婚，我只是你的“姘头”。所以现在我正式对你说明，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我也许会跟别人结婚，那时我一定要铺张一番，让你母亲看看。……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离开你，去跟别人结婚，又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不愿意再回到你的家，过“姘头”的生活。你还要我写长信向她道歉。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写，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在做梦！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仿佛在他的耳边敲着大锣。他整个头都震昏了。过了半天他才吐出一口气来。信笺已经散落在地上了，他连忙拾起来，贪婪地读下去。他的额上冒汗，身上也有点湿。

宣，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在跟你赌气，也不是同你开玩笑。我说真话，而且我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与幸福，我们必须分开。分开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知己朋友，在一起我们终有一天会变做路人。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

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同情我。

我不向你提出“离婚”，因为据你母亲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所以我们分开也用不着什么手续。我不向你讨赡养费，也不向你要什么字据。我更不要求把小宣带走。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求你让我继续帮忙你养病。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妻子，我不再是汪太太了。你可以另外找一个能够了解你、而且比我更爱你、而且崇拜你母亲、而且脾气好的女人做你的太太。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好女人，这两年我更变得多了。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你也许会难过一些时候，但是至多也不会超过一两年，以后你就会忘记我，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我希望填我这个空位的女人会使你母亲满意。你最好让她替你选择，并且叫新人坐花轿行拜堂的大礼。……

他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像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每根针都在刺他的心。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

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呼冤似地长叹了一声。他想说："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

没有回答。他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官。这时候他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未读完的信，才埋下头把眼光放在信笺上继续读着：

（这里还有两行又四分之一的字被涂掉了。他看不出是些什么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了这许多话。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而且我要自由。宣，请你原谅我。你看，我的确改变得多了。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生活，我一个女人，我又没有害过人，做过坏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地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小宣那里我不想去信，请你替我向他解释。我自己说不明白，而且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失去做他母亲的权利 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为了要同别人结婚才离开你，虽然已经有人向我求婚，我至今还没有答应，而且也不想答应。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

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朋友给我帮忙。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那么请你放我走，给我自由，不要叫我再担"妻"的虚名，免得这种矛盾的感情生活，免得你母亲的仇恨把我逼上身败名裂的绝路……

请原谅我，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坏女人。在你母亲面前也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我现在不是她的"姘头"媳妇了。她用不着再花费精神来恨我。望你千万保重身体，安心养病。行里的安家费仍旧按月寄上。不要使小宣学业中断。并且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祝你健康。

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

树　生　×月××日。

信完了，他也完了。他颓然倒在椅背上。他闭着眼睛，死去似地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被母亲唤醒了。他吃惊地把胸部一挺，手一松，那一叠信笺又落在地上。

"妈，你晾衣服，怎么这样久才回来？"他问道。

"我出去了。宣，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母亲说。她看见落在地上的信笺，便问道："哪个写来的信？"她走去想拾起信笺。

"妈，等我来。"他连忙俯下身子去捡信，一面解释似地加上一句："树生的信。"

"写得这样长，她说些什么？"母亲再问。

"她没有说什么，"他慌张地回答，立刻把信揣在怀里，他明明是在掩饰。母亲想，一定是媳妇在对丈夫说她的坏话。她忍不住又说：

"她一定在讲我的坏话。我不怕，让她讲好了。"

"妈，她并没有讲你，她在讲别的事，讲——她那边的生活，陈经理对她……"他大声替写信人辩护道，可是他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哑了，他只得中途闭了嘴。

母亲注意到这个情形，不再谈论那封信了。她想起另一件事，便换过话题说：

"刚才我碰到钟先生，他说已经跟你讲过，你的事情已经弄好了，你可以回公司去做事。不过我说，如果新来的主任容易说话，最好让你休息两个月再去上班，只要他肯帮忙先讲好，就不会有问题。"

"我想，明天就去，"他说，脸上没有丝毫欣喜的表情。

"何必这样急，等钟先生来回话以后再去也不迟，"母亲说。

"钟老要我早点去，他说日子久了恐怕会发生变化，"他竭力装出淡漠的声调说。可是他自己觉得有许多小虫在吃他的肺，吃他的心。

"明天就去，未免太急了。或者你后天先去看看情形。明天不要去，明天我做几样好菜请你吃，我想把张伯情也请来。他给你看了好多次病，我们也没有多少钱酬劳他，"母亲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母亲的脸。他痛苦地说："妈，你又当

了、卖了什么东西？你为了我把你那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弄光了！”

“不要紧，你不要管，”母亲答道，她的笑更显得不自然了。

“不过你不想一想，万一我死了，你怎么办？你拿什么来过日子？”他争吵似地指着母亲说。

“你不要耽心，我会死在你前头的。而且还有小宣，他一定长大成人了。又还有树生，她究竟是你的妻子，我的媳妇啊，”母亲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微微笑道，可是他的心却像被铁爪捏紧了一样。

“妈，你怎么能靠他们！小宣太小，树生——”下面的话已经滑到了他的嘴边，他连忙收住。但是感情的流露却是收不住的。泪水迸出他的眼眶来了。他猝然站起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走出房去。

他听见母亲在房里唤他，他并不答应，却迈着大步急急走下了楼。但是到了大门口，他又迟疑起来。对着这一条街的灰尘，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他站在门前人行道上，他的脚好像生了根似的，他朝东看看，又朝西看看。他的眼前尽是些漠不相关的陌生人影。在这茫茫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渺小病弱的人找不到一个立足安身的地方！他寂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深的寂寞。脸上的泪痕还不曾干去。心里似乎空无一物。

旁边布店里柜台上堆着各色各样的布，生意似乎还好，三个少妇模样的时髦女子(并不太时髦)有说有笑地在挑选花布。另一边一家新开的小食店门前立着两块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牌上有一个年轻女侍对着行人微笑。

"他们都比我快乐,"他想道．但是这所谓"他们"究竟是谁，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可是他觉得胸部仍旧一阵一阵地在痛，他不自觉地把手按在胸上。

"宣,宣,"他听见母亲的声音又在后面叫唤。他茫然转过头去。母亲走得气咻咻的,刚走到他的身边,便问:"你到哪里去?"

"我走走,"他做出淡漠的样子回答。

"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还是改天上街罢，横顺你没有什么事,"母亲劝道。

他不作声。母亲又说:"你还是回屋去罢。"

他想了想,其实他并没有用脑筋,他不过愣了一下，接着就说:"不,妈,你让我走走。"他又低声加上一句:"我心里烦。"

母亲叹了一口气，用疑虑的眼光看了看他，她低声嘱咐道:"那么你快点回来,不要走远啊。"

"是,"他答应着就撇下母亲拔步走了。母亲却立在门前,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

他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是在"疾走",也不是在"散步"。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

人碰到他的头，人力车撞痛他的腿。他的脚在不平的人行道上被石子砖块弄伤了，他几次差一点跌倒在街上。他的眼睛也似乎看不见颜色和亮光，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灰暗。他

的世界里就只有一片灰暗。

他的脚在一个小店的门前停住。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走了进去，在一根板凳上坐下。这家冷酒馆于他并不陌生，连那张方桌旁边的座位也是他坐过的。

堂倌走过来问一句："一杯红糟？"

"快！快！"他惊醒似地大声说，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堂倌端上酒来。他糊里糊涂地喝了一大口。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受不住，立刻打了一个嗝。他放下酒杯，又从怀里摸出树生的信来，先放在桌上，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他又打一个嗝。他赌气不喝酒了。他拿起信笺，随意地翻着，低声念了几句。他心里很不好过。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想不再看信。可是他刚刚把信笺折好，忍不住又打开来，重新翻看，又低声念出几句。他心里更难过，眼泪成股地流下来。他下了决心地端起酒杯大口喝着。他感堂到一股热流灌进肚子里去。他的喉管里，他的胃里都不舒服。他的整个头发烧，思想停滞，记忆也渐渐地模糊。只有信笺上的字句像一根鞭子在他的逐渐麻木的情感上面不停地抽着。

酒馆里白天很清静，除了他，另外还有两个客人对酌谈心。其余的桌子全空着。没有人注意他。堂倌看见他的酒杯空了，便走过来问一句："再来杯红糟？"

"不！不！"他摇摇头含糊地说；一张脸通红，他才只喝了一两白酒。

堂倌站在旁边用惊奇的眼光看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

反复地翻看她的来信。他自己也不知道看了几遍。他不再流泪了。他只是摇头叹息。

"再来杯红糟?"过了一会儿,堂倌看见他不动也不走,又走过来问一句。

"好,好,"他短短地回答。酒送上来,他立刻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全身发热,头又有点晕。他埋着头,眼光在信笺上,心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他忽然觉得对面坐了一个人,也低着头在喝酒。他便抬起头睁大眼睛看,什么也没有。"我想到唐柏青了,"他自语道,揉了揉眼睛。他又埋下头去。他恍惚地看到唐柏青在对他苦笑。"怎么我现在也落到他的境地来了?"他痛苦地想。他就像听见警报似地立刻站起来,付了钱便往外面走了。

一路上唐柏青的影子追着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

到了家,他才稍稍心安。他一进屋坐下来就给树生写信。母亲同他讲话,他含糊地应着,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在信上写着:

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所说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公司已允许我复职,我明日即去办公,以后请停寄家用款。我们母子二人可以靠我的薪金勉强过活。请你放

心。这绝非赌气话，因为我到死还是爱你的。祝

幸福！

文 宣 ××日。

他一口气写了这些话，并不费力。可是刚刚把信写好，他就觉得所有的力气全用尽了。好像整个楼房全塌了下来，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绝望地伏在书桌上低声哭起来。

"宣，什么事？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连忙到他的身边去。

他抬起头来，让她看见他满脸的泪痕，他就像小孩一样哭着说："你看她的信。"但是他递给她看的却是他写给树生的信，并不是树生寄来的信。

母亲看了那封短信，不用听他解释，便明白了一切。她说："我原说过，她不会跟你白头偕老的。现在怎样！我早就看透了她的心了。"

她气愤，但是她觉得痛快，得意。她起初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她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

二十七

树生的信像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像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

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气喘，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

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像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像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

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像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①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

① 端公：巫师。

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溻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二十八

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像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像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功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哂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像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战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愣，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布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

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气得朝地上吐痰。她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

来咕嘟咕嘟地喝光了。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遢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顾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植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

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耽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像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像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

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点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像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着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像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

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像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罢，”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十九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像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一个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

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像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像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像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

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像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让她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耽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

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像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

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在纸上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战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战。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像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像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像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战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三十

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像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

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像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战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战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像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迸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份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像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

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拚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愣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

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第一。痛苦逐渐增加，不停地增加，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尾　　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悉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太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像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

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像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像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

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时身边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舍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像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白，"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揩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悉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悉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

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像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曲。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握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来，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耍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一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道，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像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四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像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

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耽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

后　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

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已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

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　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附　录

《寒夜》挪威文译本序

我知道我的小说《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〇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 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小说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

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观绝望的书；一说是充满希望的书，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说是常常跟着评论家走。现在我头脑清醒多了。我要说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因为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究竟怎样，挪威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很高兴挪威的读者通过我的小说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过去艰苦的生活和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互相了解是增进人民友谊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说能够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1981年12月30日。